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

复旦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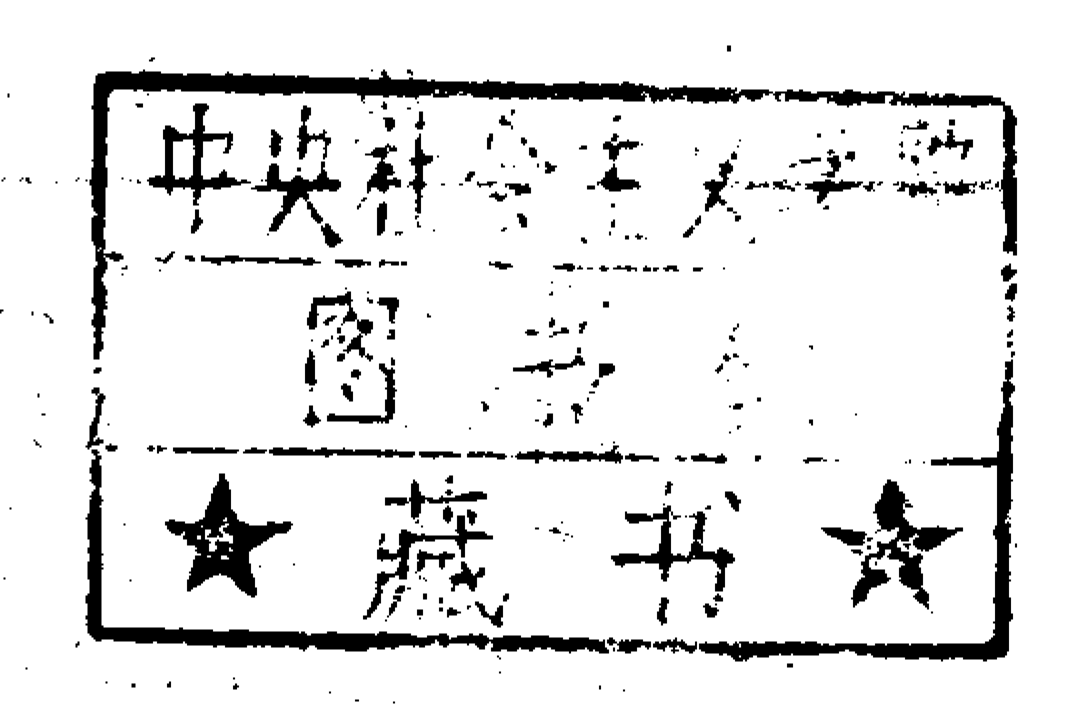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

·内部发行·

（美）约翰·斯帕尼尔　著

钱宗起　邬国孚译

张伟民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BND THE
KOREAN WAR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
和朝鲜战争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9 千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1985 年 2 月第一版　198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3253·004　定价：1.43 元

译者的话

本书原是约翰·斯帕尼尔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在他的指导教师亨利·基辛格的诱导下写成的，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主要是通过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冲突，"分析在有限战争中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阐明美国传统的"文官统治"这一原则，斯帕尼尔着重分析朝鲜战争前期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政治决策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他为此而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官方文件)，并说出了许多比较客观的实话：

例如，承认美国派遣军队去朝鲜是在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作出决议之前"，而且指出联合国的作用是"可有可无的"(见第二章)；指明美国出兵侵犯朝鲜是自己单独决定的，"没有事先征询盟国的意见"(见第十四章)；写出美国政府供认自己对朝鲜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见第五章)，它的侵朝战争的失败是"在于我们的失算"(见第二章)；揭露美国在受到朝、中人民的打击之后提出谈判停战，还由于它的盟国对美国政策的分歧和异议(见第九章)；引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句话，总结美国的侵朝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认了的敌人作战。"(见第十三章)

这些比较反映事实的论述和所引用的丰富的资料，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现代史——特别是朝鲜战争史的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我们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提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

术界和工作部门作参考资料。

必须指出，作者是站在美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为美国当时的政策辩护，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总结历史经验的。书中多处有攻击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的言论。如：捏造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对大韩民国发起了攻击”，“很象纳粹和法西斯的侵略。”(见第二章)；污蔑“共产党人……打算征服全世界”(见第四章)；攻讦斯大林是“极权主义暴君”(见第一章)；等等。同时又大肆美化美国帝国主义，为美国的侵略政策辩护。如：宣扬美国“反对强权政治”，它使用强权“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胡说美国侵略中国，是“来拯救、造福中国人民”，美国“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保护人”(见第三章)；鼓吹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是为了反对极权主义暴君，它“使用武力是正当的”(见第一章)；等等。这些相信使用本书的人会加以认真鉴别和批判。

为节省篇幅起见，特将书中原有插图、注释和附录，全部删去。在本书校译过程中得到刘同舜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　1983年6月

序　言

1951年4月11日，午夜刚过，白宫宣布将在凌晨一时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来到白宫，疑窦满腹，揣测纷纷，有什么紧要之事必须他们在深更半夜赶来开会呢？他们很快得悉：杜鲁门总统已经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切职务——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兼远东美军总司令以及远东美国陆军司令。以下是总统声明中的一部分：

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执行任务时，不能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完全保持一致。鉴于美国宪法赋予我的具体职责，以及联合国附加给我的责任，我决定更换远东的统帅。……按照我国法律和宪法的规定，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危急时期，这种考虑尤为必要。

美国人最虔诚恪守的信条，莫过于总统所说的文官统治这一原则。但是在1951年4月，当麦克阿瑟将军由于公开抗拒政府的政策被撤职回国时，却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而人们焚烧了杜鲁门人像，嗤之以鼻。正如一位对国内问题具有卓见的观察家所说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这一冲突实际上起始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高潮——促成了自从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最激动人心的体制危机。这场争论关系着文官统治是否要继续下去，以及总统是否保持全军总司令和外交政策主要决策人的权力，所以极为重要。

本书旨在探讨这场冲突的性质，并通过对美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期间所作的重要决策的分析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决策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共产党的挑战，并以武力击退北朝鲜的侵略。别的还有：福摩萨①的中立化；仁川登陆；跨过“三八线”，“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在共产党中国干涉后，不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谴责北京是侵略者，以及麦克阿瑟的撤职。这样的分析将清楚地展示导致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殊途的政策上的分歧，说明这些分歧是怎样引起的，以及为什么会发展到总统只得撤换战区司令官而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本书的目的还不仅在于探索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在有限战争中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朝鲜战争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军人服从文官这一由来已久的原则，在有限战争中是否还切实可行。作者持有这种信念的根据以及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冲突的分析，将在引言这一章中予以评述。

本书多承两位先生协助，我在此表示感谢！一位是塞缪尔·比朱斯教授，没有他的指导和鼓励，本书也许永远不会问世。另一位是我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哈特曼，出于他对我的友谊和关心，总是乐意倾听我在写作过程中碰到的疑难问题。不论当初作为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还是目前经过大量修改的增订本，他们都审阅过全部手稿。我还得感谢其他三位朋友和同事对本书的批评指正，他们是查尔斯·法里斯、艾尔弗雷德·克拉伯和艾尔弗雷德·迪亚曼特。我个人对本书负全部责任。

我衷心感谢几位漫画家和一些报刊同意把他们的作品转

①指我国台湾省。——译注。

载在这本书里，他们是保罗·洛林和先后在《新闻纪事报》和《伦敦标准晚报》任职的维基。另外，还得感谢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同意我从考特尼·魏德迈将军所著《麦克阿瑟的历史作用》一书中摘引一些片断；《时代》公司允许我引述杜鲁门总统回忆录中的某些段落；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沃尔特·李普曼先生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允许我引用这两位著名评论家文章中的一些论述。

我还感谢在哈佛大学教过我的两位老师：威廉·埃利奥特首先激起我对制订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的兴趣；我的高年级指导教师亨利·基辛格诱导我对军事发生兴趣，把重点放在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上。

最后，我的全部手稿是由佛罗里达大学研究院慷慨打成清样的。脚注和目录是由政治系秘书科顿夫人和C—1研究室秘书赛伯森夫人帮助打字的。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约翰·斯帕尼尔

于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

1959年1月15月

目　录

第 一 篇

引言：克劳塞维茨的现实主义和美国的自由主义

第一章

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关系和有限战争

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得好，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他认为，军事冲突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没有它自己的逻辑；逻辑还是政治的逻辑。武力是外交的侍女；军事权术通常并不能决定政治战略。"战争是政策的产物，要政治观点服从于军事是不合理的；政策是才智的体现，战争只不过是实现政策的工具，而不能本末倒置。因此，唯一正确的认识是军事观点服从政治需要。"

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这个定义生来就要求由文官来治理军事。诚然，军人可以左右政策的成功或失败，但是最后的决策却不能由军人来作。我们现代的艾基利斯可以提出致命的弱点，但是他只能诊断，而不能处方。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把职权授与一些人，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指引国家前进的航线。在美国，总统和由他选择的顾问决定全国性的"重大战略"，既正规，又有效。军人则执行他们的命令。这就是军人的职责。可以说军人是军方的"文官"，是执行国家政策的超党派的职业军官。军人在任职期间，不得公开过问政策，而必须服从命令，服从是军人的主

要美德。如果他不能接受已经收到的命令，就应当辞职，这是一个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应当遵循的准则。如果他不愿辞职，那就必须被撤职。文官治军，就得这样。

杜鲁门总统就是根据这个理由在1951年4月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官职务。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总统的行动是正确的，因为他作为国家总司令和首席外交官的地位有累卵之危。美国总不能以两种相互矛盾的调子向世界讲话，一个是文官的，另一个是军人的。麦克阿瑟在向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政策挑战，并把挑战升了级：他不与文职和军职的上司商量，直接向国会中的反对党和美国人民提出呼吁，企图以此来扭转政府的政策。这种情况是无法容忍的，应当予以解决。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当军人有一、二个靠山的时候：一是想在下次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反对党；再就是不大愿意打有限战争的沉着而敏感的公众。而这二个因素都不大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那么，政府是否有能力保持文官统治？

只有在全面战争期间，政府和国会之间分掌的权力才服从于战争的需要；没有这种全力以赴的国难事件，党派政治看来是难于消除的。两党合作可能免除党派之间一些不必要的争吵，让总统获得他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支持，使他在紧要关头能代表美国对国外讲话或采取行动。但是对政权的企求不能等到冷战结束，甚至也不能等到比较温和的间歇期。尽管现实令人感到多么遗憾，外交政策毕竟不可能完全摆脱舆论和政党的命运。党派利益和外交事务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外交政策几乎和一切国内事务相关联。对国内事务的看法有分歧，必然会影响外交决策。何况当美国的存亡压倒其他一

切问题的时候，即使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有可能分开，也不可能企求两大党的政治冲突局限于国内问题上。同对待国内事务一样，在对外领域中，两党把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见提交给人民，比较起来，党派体制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借此可以沟通他们的意见和感情。事实上，公众情绪的变化，在两党作出反应之前，早就有所表现了。还应当注意到，执政党是不愿与其政敌共享政绩的，他们唯恐不能在选民中取得完全的信任；同样，反对党也希望能随便利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差错和公众对某一具体政策的不满情绪，如进行有限战争。

美国人民不愿打局部战争，有的战争没有可能转变成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美国人也不想打。朝鲜战争的经验，似乎并不会改变美国人民的这种意愿。宁愿为取得全面军事胜利而战的这种心理，在美国人的思想上是根深蒂固的。美国的自由主义憎恶“强权政治”，他们认为强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力量，而使用强权是有罪的。美国人民奉行的信条是：人是有理性的，而且是讲道义的，可以通过说理和道义上的劝告去解决人类的矛盾。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论是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都应当是和平而谐调的。冲突就背离了这种准则。这主要是由于邪恶的（即不民主的）政治家在作祟的缘故：像凯泽·威廉二世那样的独裁者，或是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的极权主义暴君。

但是，当暴君迫使民主力量不得不诉诸武力时，只有按照普遍的道义上的原则来使用武力才是正当的。而战争，这个罪恶的工具，只有用于高尚的目的、彻底摧毁敌人时才算是合法的。敌人是指对这些道德原则，即使不是全盘否定，也在威胁其完整性的人。美国的政权必须是“正义的政权”；

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才能拯救灾难或消除罪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全国就由对暴力的反感转变为以暴力为荣，我们进行的战争就成为自觉保障世界民主的十字军的征讨。

在这种情况下，由暴力专家、职业军人来施行暴力是合乎逻辑的。正如医学家有责任治疗病人的某种疾病一样，军事家应对国际社会由于染上强权政治带来的疾病进行治疗。一旦外交家通过道义上的呼吁和说理而不能维护和平时，军事"大夫"就要担负起责任来。总之，美国的自由主义在传统上拒绝接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并把军事手段当作政治上中立的武器，只应在其特有规律的指导下使用。军官是超政治的，他以严格的军事技术有效地指挥作战。赢得胜利是军人的唯一目的，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是他奉行的唯一准则。

从战争是纯粹的军事手段这个概念出发，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军人在战场上对战略和战术可以作主到什么程度。他是否应当成为作战的唯一决策者呢？麦克阿瑟将军坚持肯定的态度：

> 几十年来人们公认：战争是政治的最后阶段，就是说当一切政治手段都不能奏效时，才诉诸武力。一旦开战，就进入相互厮杀的阶段，关键是控制军事。战区指挥官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不应当局限于掌握他的军队，他应当掌管整个战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在政治手段行不通、军方负起责任时，人们就得有所信任，就得信任军事家……

即使有人拒绝接受传统的美国信念，否认应该由军事准则来决定战争的打法，而把战争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这里仍然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政治控制和政治干预之间的分

界线应当划在哪里。一方面，政府必须保证军事行动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军事策略必须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另一方面，政府不应当对战区指挥官控制过紧，以免妨碍他对作战的指挥。总之，承认这条分界线的存在并没有说明它划在哪里。分界线的位置应视不同的战争而有所区别，它在战争进程中可能会有一次或几次变更。

这两个基本论点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有限战争中，文官治军是否仍然适宜。由于美国长期以来把文官统治当作他们民主制度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他们很少怀疑其日后的功效。他们相信，国家创建者已明智地在宪法和制度上保证了文官统治。这些条款是：

1. 文官任政府首脑，他们是多数公民的代表，他们对人民负责，人民可以通过现行的立法和政治程序撤换他们。

2. 宪法规定军事首脑必须有效地服从政府文职首脑的领导。

3. 军事机构各部门的事务都必须在文官的权威性指导下进行，文官协调各方面的计划，他们就是有关领导机构的负责人。

4. 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制订各项政策，包括决定战争，决定用于军事目的的人力和财力，必要时可以紧急授权，并对负责执行政策的人员实行最终的和全面的监督。

5. 法院有权约束军方，保护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尽管文官统治的原则在宪法中奉为神圣不可侵犯，在立法中确定通过，在联邦政府机构中得到体现，但是朝鲜战争令人信服地说明，文官统治仅凭这些形式上的法律条文是得

不到保证的。事实上，文官统治若要仰仗宪法条款、法令和机构安排的保证，那就颠倒了因果。也就是说，文官统治由许多正式的法令和规定来维护，而这些条文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本身固有的性质，而是由于缺乏积极的、稳定的外交政策。总之，地理位置、基本技术、强权政治带来的好处，和宪法条款中的智慧混杂在一起了。先前，美国由于东边和西边隔着大洋，南边和北边都是弱小的邻国，加上英国强制下的和平，因而有可能奉行孤立主义，没有必要保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可以把军事领导人排除在政府最高机构之外。换句话说，维护文官统治靠的是宪法以外的一些因素，宪法本身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考验。

美国理想中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主义，由于1940年欧洲力量均势的崩溃而一去不复返了。文官统治这一宪法原则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什么文官统治。罗斯福总统意识到自己缺乏军事业务知识，几乎全部听从他的总参谋部的意见。虽然总统坚信文官应当担任政治上的领导人，但是他赞同传统的观点，即一旦战争爆发，就应由军事技术人员来指导作战，而不必去理会那些据说是不相干的“政治”条件。军事领导人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用兵与政治无关，他们的行动只受战争规律的指导。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及其同事们执行美国政策的结果，意味着政、军截然分开，政治服从军事。

国务院因之而被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罗斯福总统习惯于和邱吉尔首相与斯大林总理进行个人之间的会谈和交往，以取代外交渠道；另一方面，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个人信念和气质也非常不适宜于他所担负的工作。但

是，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因素：国务院简直没有领导制订政策的能力，无法为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力量均势的军事战略提供政治纲领。近二十年来，国务院几乎全力在搞经济事务。在美国，事务就是事务，从不“干预”别国人民的事务。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开辟并保持贸易渠道的畅通。结果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除了对拉丁美洲算是唯一的例外，政治上很迟钝，于是国务院就没有培养出能胜任这样重要工作的人才。国务卿赫尔仅关心与军事无关的两个外交问题：联合国机构和戴高乐将军。等到国务院确实卷入战争的日常事务时，它就成了军方的一个助手。

国会由于授予总统以战时特权，也放弃了对政府行政机构的控制。当然，从理论上说，它仍然掌握拨款的权力，但是对预算却没法加以有效的监督。全面战争需要全面动员；全国资源都被用来击败敌人。着眼点不在于节约资金，而在于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不在于平衡预算，而在于战胜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节约开支的主张就很容易被看成是全力赴战的障碍，因而是不爱国的表现；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愿在这方面触怒选民。于是，军方对战时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控制就有了加强。

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让军事领导人作出一些重大的决策，即使不能令人满意，至少也是行得通的。这些决策是：集中全力从军事上击败轴心国；打败德、意于日本之前；迫使三国都得无条件投降；一切有关战后处理的政治决策待到敌对行动结束后再说。这项政策至少能产生两个前景：第一，军队在战后所处的地位本身就会说明新的政治形势；第二，西方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将占领日本，并进驻西欧和中欧，形成有利的新的力量对比。

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全部军事行动并不是美国的主要外交活动。进行这场战争只是美国必须处理的几个重大问题之一；在遥远的亚洲半岛的敌对行动只是整个局势的一个方面。因此，朝鲜事件的军事反应不能只由战场形势来决定，不允许战区司令官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等程度的军事自由。军事活动必须受到严密的控制和政治上的监督。在朝鲜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军事行动确实很少出自军事上的考虑，如我们把南朝鲜从北朝鲜的侵略中拯救出来的决定；跨过“三八线”，以及在共产党中国干涉后保持战争有限性的决定。制订政策的文官总是敏锐地觉察到，正是朝鲜外部的事务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将在朝鲜贯彻执行的政策和目标，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也已经或将要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在政治上的总纲，它指导着美国在朝鲜的政策，使政府决定既要在朝鲜作战，又要对战争加以限制。例如，考虑西欧的安全，防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分崩离析，这在政府的那些决策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自从美国积极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朝鲜战争第一个成为考验文官统治的主要实例。在朝鲜战争中，由宪法和制度规定的文官统治受到了彻底的考验——非常彻底，事实上几乎经受不住这次考验。显然，这个问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问题性质有所不同。在罗斯福任职期间，由于文官胜任不了制订政治和军事战略的任务，只得由总参谋部来填补这个真空，别无他法。总之，文职领导人对放弃文官统治负有责任。在杜鲁门任职期间，政治和军事方针是密切协调的。在朝鲜战争中，不论是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的关系上，在欧洲和亚洲各自对我国安全的贡献上，还是在我们盟国和联合国对美国政策的作用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看法是完全一

致的。这是美国政府行动的一个明显特征。

战区指挥官对作为全军总司令和首席外交官的总统的权威，进行公开的挑战，这就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时说："当时出现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况，一个战区司令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和反对，这一新情况导致麦克阿瑟将军必然被撤职的结局。"

然而，即使从来也没有麦克阿瑟的存在，在战争进行中也完全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矛盾。因为麦克阿瑟号召的"军事胜利"，以及他竭力反对在作战中的"政治"框框和干预，正迎合不愿打有限战争的美国人民的心意。由于不进行一场把敌人彻底打垮的战争，人们普遍感到灰心丧气。从国家自诩的形象来看，美国是代表道义原则的高尚无私的十字军，但是它没有达到宣布过的目标，也就是没能彻底打败侵略者以示惩罚。结果产生了消极失望的情绪，即使没有麦克阿瑟，同样也会有这种情绪。但是麦克阿瑟的魅力，在于他有本事巧妙而戏剧性地利用这种情绪，他向人们许诺，他可以取得这种胜利，只要政府撤消政治框框，给他军事上的自由。因此，当他号召击败中国共产党人并把他们逐出朝鲜时，赢得了公众的强烈支持。

这里必须强调，人们普遍认为麦克阿瑟与政府的分歧是出于"纯军事"观点，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朝鲜战争的评论家只是从表面上来理解麦克阿瑟对战争所下的定义。例如，罗伯特·奥斯古德在他关于现代美国军事战略的一篇精辟的评论中，总结了为公众所接受的、对麦克阿瑟指挥朝鲜战争的评价："麦克阿瑟当真下决心迎接'最大限度的反攻'以取得明显的军事胜利，鉴于政府优先考虑政治，对军方横加约束，只要这种约束妨碍他的决心时，麦克阿瑟的脾气是

无法忍受这种约束的。……任何由于政治原因而偏离这非达到不可的军事目的，就意味着‘姑息’。”

自相矛盾的是，美国有少数几位将军并不赞同军人应当不考虑一切“非本行的”政治因素的观点，麦克阿瑟恰恰是其中之一，他并不完全认为彻底击溃敌军是唯一的目的。麦克阿瑟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虽然从他平时的谈话来看，仿佛“胜利”的含义只在于军事，而不在于政治内容。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诡谲的手段，用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的政治支持，以证明他所信奉的、否定文官权威的“民主的异教”是正确而合理的。

朝鲜战争的有限性以及战区指挥官公然抵制总统制订美国外交政策的特权，并不是全球战争结束五年以来动摇文官统治的仅有的两个因素。还有第三个因素在对政府指导战争和控制麦克阿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美国国会。1949年末蒋介石被迫从中国大陆撤退到福摩萨的事件，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一直是反对党激烈攻击政府的理由。当时不仅对政府的明智和能力，而且对其忠诚和正直都提出了质询。朝鲜战争开始后，这种攻击的强度升级了。而在中期选举后，不仅来势更为凶猛，而且范围也扩大了。抨击不再限于政府的远东政策，还涉及到全面的外交政策。总之，政治并不在于击败国外敌人这个任务，还得强调挫败国内的政敌。党派斗争并不局限于国境线内，经过仔细考虑，其范围往往出线。如果要政治停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外交政策也只好停在那里了。

美国的民主不会对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的忠诚表示怀疑，它们都被认为是忠诚的。但是1950—51年的政治气氛和群众情绪，使许多议员和大部分公众看来都认为政府拒绝采

取麦克阿瑟的战略几乎是“不忠于美国”。很多美国人都不相信总统会引导这个国家赢得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怀疑总统，并和麦克阿瑟站在一起，争夺总统的外交决策权。文官曾经一度控制住麦克阿瑟，那时麦克阿瑟和国会中共和党强大而保守的右翼之间的联系，即使没有完全断掉，也已经削弱。但是也有一段时间，将军由于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摆脱了这种控制。只是一个预料不到的、特别是出乎麦克阿瑟意料的总统法令，才恢复了平衡。但是杜鲁门为了恢复领导战区指挥官所付出的代价，却是部分地采纳了麦克阿瑟主张的政策。

把朝鲜战争看作罕见的事例，那将是错误的，虽然出现过某些独特的现象，如战区指挥官竟敢公开抵制他所执行的政策。这场战争暴露出来的两个根本问题并不是临时性的。朝鲜颇有可能是未来战争的模型，而不是一场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在原子时代，全面战争意味着相互毁灭，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自杀的别称。所以人们希望，两个超级大国会觉察到：打有限战争而不打全面战争，从政治上来看要合算得多，也比较主动。如果这个希望得到实现，那么由美国的传统信念和准则所引起的问题，以及由权力分离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将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这个希望破灭，那么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关系将不再成为问题。我们中间能活着而为此操心的人就很少了。

第 二 篇

朝鲜战争，1950年6月到11月：

北朝鲜侵略时期

第二章　北朝鲜的进攻：共产党的“解放”和美国的“遏制”

1950年6月25日朝鲜时间凌晨4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对大韩民国发起了攻击。在两小时的重炮轰击之后，北朝鲜军队以一百辆左右的苏制T_{34}和T_{70}坦克为前锋，在三个不同点越过三八线；与此同时，他们在东海岸几个地方进行两栖登陆。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立即在现场作了调查，并在6月26日将调查结果提交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其结论是：第一，北朝鲜军队进攻的过程表明，这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对南朝鲜的全面入侵；第二，部署在三八线的南朝鲜军队纯粹是防御性的；第三，南朝鲜军队由于事先没有获得即将受到入侵的情报，因而完全处于措手不及的境地。

三天以后，该委员会执行主席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北朝鲜进攻的前一天，联合国前线观察员从三八线上视察归来，他们在报告中断定南朝鲜军队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没有条件对北朝鲜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这一结论是根据许多观察资料得来的，三八线南侧的守军都是些小分队，驻扎在分散的哨所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为发动进攻而集中起来的大部队；在“好几个地方”，北朝鲜军队“实

际上占领着三八线南侧的突出部”，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南朝鲜军队采取过任何步骤或作过任何准备，以便把北朝鲜军队赶出这些突出部。“至于南朝鲜军队的装备，既没有装甲车，又缺少空中支援和重炮，从任何军事目标来看，要侵犯别人是不可能的。……南朝鲜军队没有任何向北扩大侦察的形迹，在师或团的指挥所里，也没有任何准备进攻的不正常的兴奋情绪和活动。观察员可以自由进入各级指挥所的一切部门，包括作战室在内。”

对南朝鲜发动的这一进攻给了美国政府当头一棒，因为政府长期以来认为共产党侵入的这一地区在战略上只是次要的。1947 年曾为评价朝鲜对美国安全所起的作用，作过第一次分析。这年 9 月，总统指示国务卿马歇尔，要参谋长联席会议“从美国军事安全的观点”来估价延长军事占领的必要性。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在答复中指出：驻守在朝鲜的部队和基地，对美国安全的战略价值并不很大。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非正式主席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驻守在朝鲜的美国军队将成为军事上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在战争打响之前，如果没有大量的增援，就无法在这个半岛上坚持下去。而且，美国对亚洲大陆发起的任何攻击，完全可能绕过朝鲜。当然，如果敌人“能够在朝鲜半岛建立和保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那么他们就能干扰东亚、满洲、黄海、日本海和邻近岛屿的交通运输和军事行动。”但是“在空军袭击能抵消力量的地区”，要进行这种干扰就需要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利用空军来抵销敌人力量比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更容易办到，花费也更少一些。”

因此，参谋长们建议驻守在朝鲜的四万五千名军队应当撤退，因为把他们用在其他地区更为有利。他们的结论是，

撤退这些部队不会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除非苏联因此在朝鲜建立足以向日本发动攻势的军事力量”。虽然麦克阿瑟将军后来记不起他是否提出对这一撤退的“建议”，或者对此仅表示过“同意”，但是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他并不反对从亚洲大陆撤回美国军队，因为麦克阿瑟和参谋长们一样，从来不赞成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亚洲大陆去打地面战争；他有一句名言：谁主张这样做，谁就得查查他的神经是否正常。特别在朝鲜，军事上容易受到俄国地面部队的攻击，在大规模战争中，美国军队会遭到围歼。此外，在1947年9月，“应决定撤军的时候，朝鲜并未面临特殊的威胁。”于是麦克阿瑟也把朝鲜排除在美国环形防线之外。“太平洋如今已经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湖，我们的防线贯穿着紧靠亚洲海岸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蜿蜒伸展到包括主要设防地区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然后转向日本和阿留申群岛返回阿拉斯加。”麦克阿瑟一向声称，他只是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来设计美国环形防线的，这种声明看来和他在国会调查他被撤职时的询问中所陈述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后面，还包含三个特殊的原因。第一，由于战争军事预算的紧缩，使得低标准的军事设施非常分散，而且正在受到进一步削减的威胁。从职业军人的角度来考虑，就应当从易受攻击的地区撤回分散的部队，把他们集中在几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

1947年1月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十届国会限制了政府的军费支出。当时的参议院由五十一名共和党人和四十五名民主党人组成，众议院由二百四十五名共和党人和一百十八名民主党人组成。在中期选举的投票中，总统和民主党颇受冷落。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众议员和参议员在新的一届

国会上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杜鲁门先生是否愿意或者能够领导美国承担严峻的世界责任，而在于国会能把新政法规扭回到什么程度，削减多少军费和援外的拨款，以及如何把美国拉回到战前的政治和经济的孤立状态。

众议院议长约瑟夫·马丁在开幕词中说明了共和党人的意图：政府支出必须削减到能降低20%的所得税。据传当总统提出一项410亿美元的预算时，共和党领袖建议最低限度要削减70亿美元；而当总统提出一项375亿美元的预算时，共和党人指责这项预算过份庞大，并设法把它削减到315亿美元。陆军部长帕特森警告说，如果按建议削减军事预算，我们很可能只好从德国和日本撤回美国军队；当时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宣称，这一削减实际上将使海军没法打仗。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没因此而警觉，虽然参议院后来确实把预算提高了15亿美元。

在参议院提高预算后没过几天，参议员亨利·洛奇把他的党对总统所提预算的疯狂攻击比喻为“一个在暗室里挥舞着利斧的人，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军队很快成了这把利斧的牺牲品。马歇尔将军在1951年回忆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几年，陆军人数是如此之少，以致在美国本土只有$1\frac{1}{3}$个师；参谋长手中只有很少的部队可以调动，他们甚至担忧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守卫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简易机场！“除了占领军，……即使在日本，兵员也只有编制的60%。除了海军和一支有力而不很大的空军外，我们几乎确实没有什么军事力量”。

考虑从朝鲜撤回美国军队的第二个原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片面地想打全面战争。这就使朝鲜在美国安全的全球格

局中处于军事上无关紧要的地位。因为在全面战争中，朝鲜的命运将取决于其他战场；即使苏联占领朝鲜也不会提高朝鲜的战略意义；因为美国的海空军力量可以使这个半岛不起任何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热衷于搞全面战争的战略，和国会紧缩政府的预算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国会决心把军事费用削减到最低限度并使预算达到平衡，这就迫使各军兵种去选择那些现成可用的武器，以便制止最后的灾难——全面战争，或打赢那场战争。于是产生了"大规模报复"的战略，它是建立在四个假设之上的：(一)未来战争的唯一形式是全面战争，它将由苏联突然袭击美国或美国在西欧的"第一道防线"而爆发；(二)以空中进攻力量给予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打击来制止或赢得战争；(三)俄国人在拥有相当数量的原子武器、充足的运载工具和足以防御美国轰炸机的力量之前，他们不会冒险使用武力，即使是打有限战争；(四)几乎完全依赖一个军兵种所花的费用，远比保持庞大而均衡的部队要省得多。不用说，这一战略是迎合国会心意的；但是这种"少花钱多受益"政策的结果是严重地削弱了海军，特别是陆军的力量。

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提早撤离朝鲜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鉴于建立自由、独立的朝鲜进展迟缓，他们担忧几个月内可能会出乱子，使占领军站不住脚。"在这种局势下，慌慌忙忙地撤退我们的军队，就会降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威信，而且很可能会对我们在其他地区同别人进行合作产生不良的影响，而这些地区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则是更为重要的。"再加上麦克阿瑟将军也强调过，南朝鲜政府本身当时都施加过相当大的压力，要求我们撤军。

国务院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它接受了他们关于力量分散会造成危险的论点；也同意他们只在全面战争的

战略中来考虑朝鲜的重要性；国务院清楚地知道南朝鲜要求尽早结束占领的强烈愿望；而且从1948年12月苏联的声明中得悉，俄国人已经从北朝鲜撤出了他们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务院赞同把美国军队继续驻扎在朝鲜，不理会南朝鲜人民一致要求结束占领的愿望，那么，美国在宣传战中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受命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所作的著名演讲中，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想法。他一开始就说明美国在太平洋的环形防线。他说，这个防线从阿留申群岛（在千岛群岛之外）起到日本，经过琉球群岛（冲绳岛）到菲律宾。在这个环形战略岛屿群中，美国负有直接的责任，并要全力行动。可是，在这条防线之外，美国就不承担具体责任。因此，华盛顿不能保证处于美国这条防线之外的地区不受军事攻击；一切具有这种含意的提议，在“实际关系的范围”内是既不明智又无必要的。国务卿对这些论点确曾作过解释。在美国不能向这些国家提供忠诚、决心和斗志的时候，我们的援助对于万事齐全，只缺美援的地方仍是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援助能够导致功德圆满，没有这种援助，就会功亏一篑。

因此，如果位于环形防线之外的地区遭到进攻，最初就得依靠遭受攻击的人民。他们的抵抗将激发整个文明世界在联合国宪章下行动起来。艾奇逊提醒听众：宪章本身证明，它对于坚决抗击外来侵略以维护独立的人民来说，并不是软弱无力的。

实际上，由于美国没有保证军事支持以抗击北朝鲜的侵略，使南朝鲜完全处于劣势。它的军队只配备轻武器；美国没有给他们装备坦克、重炮和飞机。杜鲁门政府审慎地不给

这类武器，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拥有这类武器，就会试图用武力来统一全国，这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威胁。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武器正是大韩民国军队打退共产党进攻所需要的。甚至连根据1949年共同防御条约提供的军事装备，还是拖延到北朝鲜入侵时才开始交付。总之，南朝鲜军队主要是用来对付内部动乱的，而不是应付外来进攻的：这样，南朝鲜就成了送上门去的、有吸引力的真空地区，为共产党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通过联合国给予援助的承诺，并不会妨碍苏联的贪欲。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知道，联合国没有美国的领导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力量，这个国际组织是软弱无力的。而美国的军事战略则早已把南朝鲜排除在环形防线之外了。

那么，是否象对国务卿的许多指责那样，艾奇逊的发言"招引了"对南朝鲜的侵犯呢？指责者提出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他们的认识：国务卿如果不公开宣布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轮廓，苏联人就根本不会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大量裁减、我们全神贯注于全面战争以及我们呆板的军事战略；苏联也不会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把军队投入亚洲大陆、参谋长手中几乎没有什么部队，以及他们强调把这些军队部署在对美国安全来说比朝鲜更为重要的地区，如果要打全面战争的话。实际情况是，即使国务卿艾奇逊和麦克阿瑟将军从来不公开谈论环形防线，苏联人也照样会知道这一切的。他们两人只是谈了美国关于全面战争的基本战略，在这一战略中，朝鲜确实处于环形防线之外；两人所讲的兵法，都没有估计到共产党人在1950年6月25日会对美国使用的那种军事挑衅——由苏联在亚洲的一个卫星国对美国的友邦挑战，打局部战争，而该友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不"值得"打全局战

争的。总之，那是美国人的政策，而不是美国人的谈话，才使共产党人相信美国是不会保卫南朝鲜的。而在制定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共和党人也起了他们的作用，虽然是消极的作用。

这样，美国政府对于北朝鲜的侵犯竟然一无所知——事实上，已闭塞到了这样的程度：政府得知进攻的最初消息不是来自驻朝鲜的军人或外交人员，而是来自合众社的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几个月来明明知道北朝鲜政权有入侵南方的力量；国务院自己的代表、陆军部、中央情报局和远东司令部，都早已将这方面的情报送达国务院。但是这些机构都不相信北朝鲜人会打算立即入侵：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搞心理战和游击战，施加政治压力和玩弄恫吓手段以破坏年青的大韩民国，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潜力还没有用完。艾奇逊引证说，来自麦克阿瑟的情报曾经认为，入侵南朝鲜的日子可能在1950年春季或夏季；但是将军每次都加上批注——甚至迟到了3月25日——还认为这样的入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北朝鲜在今年春夏季节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是通过游击活动和心理战在大韩民国制造混乱的局势，试图推翻南朝鲜政府”。十五天前，即3月10日，麦克阿瑟曾提到过，苏联人“可能愿意在等待一个时期，让南朝鲜将来自行垮台。”

国务卿艾奇逊：这样说来，你们可能得到过这次入侵即将发生的报告，而来自远东的情报则认为不是那么一回事。

参议员布里奇斯：是的[从1949年10月12日到1950年3月25日]，国务卿先生，记录表明——甚至你在这里念的记录也表明——他们曾经报告，共产党打算在6月份进攻，即使后来他们确实修改了这个报告。那可是很

合理的分析，是吗？

国务卿艾奇逊：不仅仅是修改而已；他们还说，据信不会发生入侵事件。这句话可就不象是修改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的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支持艾奇逊的证词。他说，情报中“虚发的警报实在太多，我们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结果朝鲜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从得到警告。”

北朝鲜入侵后不久，专栏作家约瑟夫·斯图尔特和艾尔索普写道，“克里姆林宫发动的对朝鲜的进攻，彻底打碎了美国赖以拟订政策的基本设想。这个设想就是克里姆林宫现在不准备、而且最近几年内也不准备冒险打世界大战。但是克里姆林宫已经明显地、自觉地冒一场全球战争的风险了。这意味着华盛顿对苏联的力量和意图估计错了。这样就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新形势。”《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以同样的语调写道，直到6月25日，政府还认为俄国领导人将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利用韩国国内的苦难和不满，“他们的军事力量要达到顶峰那得在1952年到1954年之间，至少在那之前，他们是不会断然下决心使用武力的。”将来有一天，苏联会突然袭击美国或西欧，美国的政策过去只是准备应付这样的全面挑战。如果不爆发朝鲜战争，美国的战略家就决不会相信居然会有地区性的挑衅，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北朝鲜的进攻使美国面临一场战略上没有准备的挑战。政府应该怎么办呢？为了南朝鲜的独立，“值得”付出全球战争的代价吗？如果不值得，美国能对这有限的挑战作出对等的有限反应吗？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否已使政府面临无法解脱的困境：要么回报以全面战争——看来不大可能——否则就置之不理？我们在日本的一些师是否缺员和“缺少训

练”？把占领军全部调出日本行不行？而且即使冒险这样做，军队是否能够及时到达朝鲜？是否有足够的人数来阻止北朝鲜军队的迅速南下？如果不能完成这一任务，那就听任南朝鲜陷落并否认其“纯属军事上”的重要性，这不是比在一场不能打赢的战争中牺牲美国的军队和威信好得多吗？总之，难道朝鲜会在美国防卫和安全的格局中，突然身价百倍，以致值得把麦克阿瑟的军队投进去冒险吗？

政府突然面临的这个问题，生来就有这样的假设，即克里姆林宫用心狠毒地“放纵”它的傀儡。由于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因而至少在逻辑上可以这么说：北朝鲜开始是在俄国人不知道也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动攻击的，然后设法使苏联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支持他们的行动。有几点理由可以说明这个观点是有些可信的。第一，苏联惯常使用的是通过颠覆以谋求统治的伎俩，而不是赤裸裸的侵犯；美国政府自己的情报表明，共产党人在暗中破坏南朝鲜的运动中一般是成功的。第二，仅在敌对行动爆发前几天，南朝鲜一届新的议会刚开过，议员多数是反李承晚的；这样就有可能使李政府很快改组，并变得较为愿意和北朝鲜人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第三，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缺席；因而无法否决美国可能采取的对抗手段。

政府含蓄地拒绝这些观点，因为它从来没有考虑过。政府为什么这样，道理是不难明白的。当然，李政府是不得人心的；最近的选举就说明了这个事实。同样，众所周知，南朝鲜军队士气低落，开小差和逃跑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正如《纽约时报》的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在北朝鲜入侵后数天所写的，“军队和警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靠不住，这是抵抗苏联统治的防卫力量的最大弱点。”在这种情况下，这次进攻

同共产党人的政治战术是一致的——凡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已被内部颠覆、经济困难和政局不稳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就用武力给以致命的一击。况且，这次配合协调的对南朝鲜的侵犯，事先经过长期周密的策划，要想完全瞒过将近三千五百名的俄国军事顾问团，看来是难以相信的；如果美国能够阻止李承晚发动一场对俄国卫星国的战争，那么，苏联对北方政权的控制要严密得多，他们必然会防止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地区内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最后一点，苏联继续抵制安理会，只能说明俄国人相信美国不会保卫南朝鲜，而不能说明俄国人打算进行这场战争。苏联领导人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种信念；"如果他们以自己的准备来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将默许一个卫星国的军队有限度地进入次要的战略地区，正如下国际象棋的人在他无法防卫的时候，会容忍一兵一卒的侵入一样。"

关键不在于苏联的无知，而在于我们的失算。对南朝鲜的入侵一下子改变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原来建议的整个基础。他们本来是从全球战争的角度来分析朝鲜的战略价值的。但是冷战把注意力集中到共产党侵占南朝鲜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以及它对远东所造成的威胁。

约翰·杜勒斯，这位起草即将签订的对日和约的总设计师和国务卿的共和党主要顾问，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后果。根据他的理解，北朝鲜的侵犯是由苏联鼓动的，因为苏联想阻止日本东山再起，成为亲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工业和军事强国。由于苏联控制着正对日本北方的萨哈林岛①，而朝鲜又

① 即库页岛。——译注。

紧靠着日本最南端的本洲岛，俄国的战略行动将把日本置于“俄国熊上下颚之间”——或者用更确切的比喻，俄国将把一支匕首直刺日本的心脏。据说，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有这样的忧虑。在北朝鲜入侵的时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写道，东京的有识之士认为，在日本海岸百哩之内建立共产党政权将会诱发严重的政治动乱。

杜勒斯先生进一步认为，根据他的看法，苏联领导人颇有可能想防止日本重新武装，因为他们相信历史可能会很快重演。他回忆起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控制朝鲜的日本曾经攻占旅顺港（朝鲜以西150哩），并且威胁符拉迪沃斯托克①（朝鲜以东75哩）。“俄国人分析这次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控制着朝鲜半岛。此后，俄国的战略家一直在谋求对该岛的控制”。如果日本在与美国联盟的情况下重新武装起来，这一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只好期望日、美方面对北朝鲜和中国增加压力了。正如杜勒斯所说，美国“已从看来是放任自流的政策中醒悟过来，我们的政策正在完善，使受到新型国际奴役制威胁的独立国家获得希望。”在谈到他最近和国防部长约翰逊以及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访问日本时，杜勒斯先生得出结论说，美国曾经表示，“我们不允许苏联对未来有否决权，也不能让无所作为的政策长此存在下去，这种政策会让共产党获得巨大的无形的好处”。

1949年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人的统治。美国现在正通过重新武装日本在太平洋部署强大的力量。因此，能让苏联肆意破坏美国的亚洲政策而不受任何反击吗？杜勒斯先生认

---

① 即海参威。——译注。

为这是办不到的。如果政府不能制止并挫败北朝鲜的入侵，美国军队该被派去支援他们，"即使要冒俄国人反击的风险。坐视朝鲜受到无理的军事进攻的蹂躏，将会带来一连串的灾祸，非常可能导致世界大战。"

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也看到，美国拒绝拯救南朝鲜将是一系列不幸的开端，最后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世界大战；因为对南朝鲜的覆灭袖手旁观，就会向全世界表明，华盛顿不是害怕俄国的强权，就是不关心盟国的安全，同时还表明美国维护盟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保证是一钱不值的。大家知道，美国和南朝鲜之间没有签订过任何盟约，但是没有人怀疑，年轻的大韩民国是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的，如果没有别的原因，华盛顿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支援他们。1943年，美国曾在开罗保证，朝鲜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后，要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俄国人两年后在波茨坦签署了这项英、美方面的协定，但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在满洲的扫荡式的军事行动，以及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后两天，苏联军队进入朝鲜一事，使美国不可能履行这些诺言。当时，最近的美国军队在六百哩外的冲绳岛和一千五百到二千哩外的菲律宾！因此，原来决定建立三八线的目的，是为了俄国人和我们分担解除日本武装的任务，也至少是为了维护南朝鲜的自由。

除了道义上的责任外，美国还和联合国一起保护过南朝鲜。国务院曾经试图在双边基础上谈判怎样履行开罗和波茨坦协定；在遭到碰壁后，国务院在1947年末又把这个问题交给联合国，并要求该组织在整个朝鲜主持自由选举。联合国大会曾因此建立一个朝鲜临时委员会，责成它主持并监督这一选举；然而苏联拒绝该委员会进入这个国家的北半部，

选举仅限于半岛的南部。以后，美国、国民党中国、英国和法国承认南朝鲜为合法的大韩民国，承认经选举产生的李承晚政府是合法的代表。美国还提供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以支持这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帮助朝鲜人民建立民主的社会。就在这次入侵前两星期，杜勒斯先生在对朝鲜国会的一次演说中还重申了美国对南朝鲜所承担的责任：

> 按照你们的自尊心，并主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美国人民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
>
> 我们在精神上把你们看作联合国的一部分，联合国几乎一致同意促进你们政治上的自由，它正在寻求你们和北方之间的统一，虽然你们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正式会员国的资格，但联合国仍然要求所有的国家都来遏制对你们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威胁或使用武力。
>
> 美国人民欢迎你们，把你们当作组成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这个世界拥有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还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些条件保证：任何专制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
> 自由世界没有宪章，但是和有宪章一样。成员资格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的行为；这是没有否决权的。我们要求一致行动的愿望是强烈的，因为它的思想根源是共同的命运，
>
> 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永远不会孤立，只要你们在人类自由的伟大规划中，继续起着应有的作用。

因此，北朝鲜的入侵使美国处于“不行动，就闭嘴”的困境，真使它进退两难。共产党侵略是对美国诺言的价值的考验。如果在武力威胁下，美国放弃了朝鲜，那么我们的欧洲盟国就会相信，在同样的危机中他们也将被抛弃，因为他

们对美国孤立主义复活的迹象，一直很警惕。他们将认为美国条约的保证是靠不住的，并转向中立主义作为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势必屈服于日益增长的俄国的压力，最后接受苏联的统治。

总统和国务卿决心防止这一灾祸的发生，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欧洲及其属地给战略空军司令部提供了基地。如果丧失了这些基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斗力将受到严重的、或许是致命的影响；因为该部手中昂贵的洲际喷气轰炸机是有限的，主要得依靠中程轰炸机。迟至1951年7月10日，战略空军司令部只拥有87架可以投入作战的B—36型轰炸机，另有60架正在改装成现代化，而月产量只有二、三架。当然，基地离可能的敌人越近，就越能迅速地消灭敌人，越能减少飞机和空勤人员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独立和安全需要在欧洲内部保持均势，以阻止任何野心国家征服沿海国家作为必要条件，接着首先消灭英国，然后征服全世界。在十九世纪绝大部分的岁月里，英国海军维护着这一均势。到二十世纪，英帝国衰落，美国被迫参加两次大战以帮助维持这个均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远程轰炸机、新式潜艇和导弹的年代里，美国在欧洲的利害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西欧控制的海上通路——英吉利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对美国安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除了美国，西欧拥有最大量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它的工业力量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它还控制着美国为保持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所必需的绝大部分战略物资（橡胶、锡、铜、锌、汞、钴、钨、铬、石墨和铀）。因此，美国的安全需要维护西方联盟。

如果听任北约组织瓦解，全球均势就会出现根本的变化

——决定性地转向对俄国有利。那时候，美国安全最好的情况也将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而要生存下去，只有把我们社会组织成“警备队的国家”——一种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任何含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状态。最坏的情况是，苏联集团几乎完全控制了欧洲大陆，美国将听其任意摆布。

这样，美国不采取行动对于它将来的安全和独立来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由于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看到北朝鲜入侵很像二十年前纳粹和法西斯的侵略，这是令人不安的一点。想起英国和法国试图姑息希特勒及其独裁者同伙的后果——慕尼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就更加相信：扔下南朝鲜不管是愚蠢的。一位记者总结来自接近美国领导人的消息说，他们“肯定把北朝鲜的入侵看作是对奋起反抗共产党扩张的国家的考验，包括美国在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越过南北朝鲜的边界，就很象当年希特勒惯用的手法：以进攻来试探对方的反应”。总之，总统和其他最高决策者把斯大林的挑衅看作是希特勒式的考验，朝鲜是他们的“莱茵河地带”。这种比拟是明确的，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象他以前的希特勒一样，是贪得无厌的，如果允许他不战而吞并一个“弱小者”，那么他那受了刺激的食欲会促使他去吞并其他地区。

从对独裁者行径的概括分析中，总统和他的顾问得出结论：如果不迎击苏联的挑战，如果美国经不住俄国的考验，那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就会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成功：向全世界显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同时暴露美国的恐惧和不可靠；瓦解西方联盟；阻止在太平洋部署力量；以及吓唬东南亚和中东的中立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由此产生的力量真空将引起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在最糟糕的环境里：政治威

望大跌、士气低落、战略地位孤立不利，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非打不可。因此，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立场。"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其自由的国家，那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决地和胜利地回击对南朝鲜的威胁，那就会使我们在反对共产党人的侵略行动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提醒我们的盟国，每次胜利看来都会使苏联人在采取新的类似行动时，更加小心一些。这样，自由世界的安全和前景就会有所改进"。由于这样的论证，美国军队才投入战斗。

因此，总统和他的全体顾问一致同意，必须击退北朝鲜的入侵。用总统的话来说，从一开始，"每个人几乎一致地默认，凡是为了应付这次侵略行动所必须做的，就必须做。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说是联合国或美国可以置之不理。这是对过去五年来关于集体安全的所有谈判的一次考验"。没有一个人怀疑是否要使用武力。唯一的问题是，南朝鲜军队在只有美国海空军的支持下，是否能够制止北朝鲜的进犯，或者是否需要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6月25日星期天，也就是进攻的当天晚上，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谢尔曼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都认为使用海空军力量就够了；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则说，如果南朝鲜军队已经被击溃，那就必须使用地面部队。

然而，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南朝鲜军队是否需要这类援助；在那个星期日傍晚，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顾问，都不

知道南朝鲜溃败的程度。因此，总统指示麦克阿瑟将军派个调查组去朝鲜，估计一下需要美国提供的军事力量的数量和品种，以制止并击退北朝鲜的侵略。当时，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星期一，麦克阿瑟将军向总统报告："南朝鲜的部队抵挡不了北朝鲜的猛攻。敌人的有利因素并不完全在于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从有关战斗情况的数据来看，南朝鲜的伤亡数表明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也缺乏战斗意志，据我们估计，很快就将全部崩溃"。总统立即命令麦克阿瑟使用美国的海空军，以支持南朝鲜军队；但是应将美国军队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这一决定是在第二天清晨公开发布的。

6月29日，麦克阿瑟亲自飞往朝鲜视察。他目睹的情景令人不安。在他回到东京后，立即电告华盛顿：南朝鲜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他们扔掉了给养和装备，丧失了联合行动的能力。这样，就存在着进一步被突破的危险。"如果敌人继续向前挺进一大步，那就将威胁大韩民国"。麦克阿瑟补充说，要守住汉江防线和收复失地的唯一办法是投入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没有地面部队的支持，继续使用海空军是没有效果的。他说，根据这一理由，如果他被授权的话，他将立即调美国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去朝鲜，作为集结初期反攻用的两个师的核心。

杜鲁门先生立即表示同意。6月30日，在官方新闻稿里，总统宣布他已撤销先前对海空军的约束："他已授权美国空军，只要军事上有需要，就可对北朝鲜特定的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并已命令海军封锁整个朝鲜海岸。"这条消息的结尾很简洁："麦克阿瑟将军已授权使用某些地面部队。"现在美国三军都已投入了战斗。

根据几位接近华盛顿的观察家的看法，没有确切掌握南

朝鲜崩溃的程度，并不是延缓投入美国地面部队的唯一原因。显然，华盛顿直到6月29日还希望莫斯科会被说服而让北朝鲜撤军。如果莫斯科认为美国不会有决心对它的行动作出反应而“放松”北朝鲜，那么美国力量的显示就将促使苏联人把他们的卫星国拉回到三八线。正如1936年，假使英、法肯出兵，看来就会迫使希特勒撤出莱茵河地带。这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名的第一个决议的目的，决议呼吁北朝鲜撤军，这也是总统第二天声明的目的，总统答应给安全理事会强大支持，以结束这个严重破坏和平的事件。杜鲁门先生的声明最后庄严地宣告，“那些对这次侵略行动负有责任的人应当认识到，美国政府是怎样认真地对待这种威胁世界和平的行动的。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对于顽固地漠视维护和平的职责，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当时美国和西欧都普遍认为，总统的讲话表露出优柔寡断，或者愿意援助但不愿介入战争的想法。但是后来有人告诉贝弗利·史密斯：总统在当天早晨曾经走到他办公室的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的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关于总统6月27日命令美国海空军援助南朝鲜军队的声明，艾尔索普兄弟以同样的语调作了解释：“杜鲁门总统这一决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克里姆林宫相信，美国人是说到做到的。人们希望克里姆林宫在确信美国是当真的之后，会很快撤回他们的傀儡。”在指示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后不久，美国给苏联政府的强硬照会也证实了这种观点。“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北朝鲜政权之间有着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美国政府要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证对这次无缘无故、自作主张的侵犯拒绝给予支持，并对北朝鲜当局施

加影响，促其立即撤回他们的侵略军。"有位观察家曾经见过参与朝鲜战争决策的领导人，据他说，这个照会旨在"给俄国从棋盘上体面地下台的一个机会，如果它已被美国显示的决心所震动的话。"

但是，苏联并没有让它的卫星国撤军。在两天后的复照中，俄国政府反而把战争的责任推在"南朝鲜当局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挑衅上。"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华盛顿在收到苏联的答复后，却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

这样，俄国的照会就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因为华盛顿可以不再担心这次对朝鲜的侵犯仅仅是声东击西的行动。杜鲁门先生后来描述说："我打算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但是，我要确保我们不能深陷在朝鲜，以至照顾不了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有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人已把部队结集在面对福摩萨的中国大陆上；苏联人在靠近南斯拉夫的边界上活动；苏联有可能进攻伊朗、德国和北欧。这一切自然增强了总统对可能发生事件的关切。

总统对于美国没有力量迎击俄国人挺进这些地区的忧虑，甚至使他起初考虑过接受国民党中国提供的"装备最精良的"三万三千名军队——虽然这些部队需要美国大量的后勤支援。在朝鲜使用蒋军就可以减少美国在那里的部队，其他纠纷地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可以调他们去应付。但是国务卿艾奇逊极力主张，国民党军队应当集中力量保卫福摩萨；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反对接受蒋的建议，因为他的部队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总统让步了。"我还是担心，以我们所能

使用的为数很少的部队，是否有抗御敌人的能力。但是在进一步讨论以后，我接受了别人的看法，事实上除了我，参加（6月30日）会议的人都是这种看法，那就是应当谢绝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接着我便决定应当让麦克阿瑟将军全权使用在他指挥下的地面部队。"不仅使用一天前他在海底电报中建议的两个师，而且使用驻扎在日本的所有部队。

因此，作出使用"一定的地面支援部队"的决定，是在北朝鲜人表示无意停止他们的进攻之后；是在苏联拒绝对平壤"施加影响"而同时又表示无意在其他地方进行干预和进攻之后；最后，也是在华盛顿接到麦克阿瑟将军个人的判断之后，将军认为：南朝鲜军队已经崩溃，只有美国军队才能挽救局势。

投入这些部队是挡住北朝鲜挺进的决定性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卓越而灵活的防卫战，谁也没有比麦克阿瑟本人描绘得更富有戏剧性了：

……我觉得我们是否能拯救南朝鲜的残余部队，是否在朝鲜立得住脚，那是完全有问题的。

我命令在釜山附近建立一个滩头堡，并采取我认为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步骤以支持朝鲜政府，并帮助南朝鲜人坚持下去。

我明白当时我的力量实际上仅限于我手头有的，我必须把关心日本的安全作为一项基本的政策。

我从第二十四师空运一些部队到朝鲜，希望建立一个抵抗中心，我可以在这个据点周围集结迅速溃退的南朝鲜军队。

我也希望用耀武扬威来欺骗敌人，使他们相信，可供我调遣的力量远远超过我实有的力量。

我安排投入两个步兵营中的一部分，在他们被消灭之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或许，这一抵抗会成为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毫无疑问，敌人无从理解我们会用这样的小部队来进行顽强的抗击。

敌人没有迅速地进军釜山，他们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一星期内到达那里的，但是他们却停了下来，在汉江对岸部署重炮。

我们已经把桥都炸毁了，敌人得花上几天时间来修桥。

这样，在敌人沿着以水原为中心的150哩前线部署兵力时，我们得到了十天的时间来准备。

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迪安将军指挥下的第二十四师余下的部队投入朝鲜。我训令他在我把第一骑兵师和第二十五师从日本调来之前，阻击敌人以延缓他们的前进。

他接连打了几次孤立无援的殊死战，他和那个师的大部分士兵都在战斗中阵亡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二十五师已在釜山登陆，他们搭乘火车前进。第一骑兵师在东海岸登陆后，向前推进并严阵以待。敌人本来占压倒优势，我想不出战争史上会有比这两个师所显示的势力更为壮丽的场面了。

那时，第八军司令部在一位骁勇的指挥官沃克将军率领下进驻朝鲜。从这时起，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守住一个滩头堡。记得在7月19日，我在第一次发表的公报中预言：我们将不会被赶下海去了。

这个公报是一篇对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颂词，它赞扬将

军的军事技艺和胆略，敢用别出心裁的战术来挡住北朝鲜军队的冲击；它也称赞总统的天赋，能在重大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定。北朝鲜军队有着良好的组织、训练和指挥，他们曾经迅速地击溃过他们的对手。美国军队是否能及时抵达朝鲜，是否有足够的兵员以阻止北朝鲜人的长驱直入？北朝鲜共军的一部分曾在中国内战期间受过训练和考验，如今要美国军队去抵挡并击退共军，他们受到的训练够不够？如果在严峻的战斗中，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美国的威信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总统的行动，按《纽约先驱论坛报》6月28日头版社论的话来说，“具有伟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我们必须采取这种立场。朝鲜侵略一开始就成功时，苏联卫星国报刊的欢乐劲，以及那些指望美国在他们为自由而战时给予支持的人们灰心丧气的反应，都足以说明，如果美国苟安地默认共产党军事渗透的又一次胜利，那必将引起其他的灾祸。因此总统不愿意听之任之。他的行动是政治家的行动，本报认为这是在我们动荡而烦恼的世界中，对真正和平所作出的基本贡献。”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同意这种看法。

美国军队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两个决议的授权下，正式投入战斗的。第一个决议在6月25日通过。其目的是让双方终止敌对行动，恢复原状。由于注意到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已经破坏了和平，它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呼吁北朝鲜军队撤退到三八线；要求联合国临时委员会提出建议，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还号召全体会员国支持决议的执行，不要给北朝鲜政府以任何援助。因此，这个决议并没有同意使用武力。使用武力是在6月27日通过的第二个决议中才提出来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称为“合乎逻辑的第二步。”这个决议指出，北朝鲜当局没有

停止他们对南朝鲜的进攻，因而建议所有会员国“对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击退军事入侵，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在通过第二个决议之前出了两件事：6月26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警告说，安全理事会关于停火和撤退北朝鲜军队的号召可能很快会变成“书生的空谈”；更为重要的是，杜鲁门总统在同一天收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个报告，将军预见到南朝鲜军队将“全面崩溃”。总统立即指示麦克阿瑟使用美国海空军去支援南朝鲜军队。“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党已不再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是要搞武装入侵与发动战争。……在国际事务中恢复强力统治将会有深远的影响。美国将继续维护法律统治。”

总之，在6月27日通过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北朝鲜入侵的决议之前，美国军队已被派遣去朝鲜。从这一点看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只是对**既成事实**的事后批准而已。然而，美国政府认为，北朝鲜人没有按照6月25日安全理事会的呼吁实行停火并撤退军队，加上南朝鲜已危在旦夕，这就使美国的紧急军事援助既是合法的，又是绝对必要的。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第一，从狭义的法律角度来解释它的条文是次要的。

只有苏联及其卫星国对美国的行动提出了质问：“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开始武装干涉朝鲜是在6月27日安全理事会召集会议之前，没有考虑安全理事会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这样，美国政府以其破坏和平的行动使联合国面临‘既成事实’。”俄国人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节第二十七条，对美国行动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一条款规定，“安全理事会对所有

其他事件(除程序问题外)的决定，必须取得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七个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苏联人指出，当时有两个常任理事国代表没有出席："中国的合法代表"共产党中国，和因抗议排斥共产党中国而缺席的苏联。因此，"美国用来掩饰其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是在严重破坏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让安全理事会非法而草率地通过的。造成这样的局面只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安理会的成员国施加巨大的压力，使联合国组织变成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分支机构，成为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破坏和平政策的驯服工具。

美国的答复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常任理事国，过去在就实质性问题表决时，曾多次不参加投票，而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的合法性提出过任何疑问。所以弃权并不构成否决，而国务院认为缺席就等于弃权。不管怎么说，联合国宪章第一节第二十八条责成安全理事会的每个成员国必须派有常驻代表，以便安全理事会随时都能起作用。苏联既然从宪章的其他条款中得到好处，当然就不能在同时违反这个规定。至于共产党中国，它应当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取代国民党中国的这个决定，只能有安全理事会本身作出；然而安全理事会还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

因此，苏联的缺席使安全理事会能迅速行动，未经冗长的辩论就作出了决定。但是如果认为苏联出席安全理事会并投了否决票，美国就不可能对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挑衅作出反应，这种逻辑上的假定都是讲不通的。如果北朝鲜的入侵象总统和他的顾问所声称的，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如果共产党的侵略象政府所认为的，威胁着欧亚两洲的力量均势，那么仅仅由于俄国的一票否决，美国对苏联的扩张还是不会放弃其遏制政策的。如果苏联出席安全理事会并投了否决票，

西方强国很可能就会利用第五十一条。这一条允许联合国会员国在联合国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进行个别的和集体的自卫，并谋求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批准其行动。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在1950年7月5日向下议院的声明中提出的正是这个可能性：

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认为，任何被侵犯的国家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任何其他国家也有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的权利。

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取消这个固有的权利。相反，它在第五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如果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遭到武装侵犯，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目前的宪章将不会损害个别或集体自卫的神圣权利。”诚然，第五十一条说的只是对联合国成员国的武装侵犯，而大韩民国并不是会员国。但是第五十一条的目的不是为了规定一项新的权利，而仅仅是为了明确，在赋予每个国家固有的权利时是不存在偏见的。……唯一限制自卫权和接受其他国家援助权的只有这么一句明确的话：“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

所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都清楚地知道，第五十一条所述集体自卫的权利，适用于那些遭到侵犯的非会员国，如意大利和葡萄牙。……如果允许侵略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抢走侵略的果实，那么，每个国家都可能遭到危险，这是基本的原理。

这位首相的话清楚地阐明，美国及其盟国参与朝鲜战争是为了保护他们**有选择的安全**，是为了维护全球均势以抗衡苏联，是为了防止我国的主要保护伞——北大西洋联盟的瓦

解。杜鲁门总统后来强调指出，美国政府认为“朝鲜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1950年末，有十四个国家的军队在朝鲜作战或正在开赴朝鲜途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其中十个是美国的盟邦，他们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或者是与北约组织密切合作的集团——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那时有八万名军队在印度支那作战)、希腊、荷兰、新西兰、土耳其、南非联邦和联合王国（它有二万五千名军队在马来西亚作战，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着相当大的责任；经济上和法国一样，无力供应跟美国同样数量的武器和黄油)。十四个国家中的另外两个是泰国和菲律宾，他们是美国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个实际上是太平洋环形防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余两个是哥伦比亚和埃塞俄比亚。

这场战争具有明显的西方特征，从其他三个集团对北朝鲜侵略所持的态度来看就更加清楚了。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第一个集团，大多数当然是赞同美国的决定的，虽然由于资源有限，国内情况复杂，更有燃眉之急，他们只作了些象征性的贡献。第二个是亚非集团的成员，他们在反对北朝鲜使用武力的同时，决定不卷入冷战。第三个是苏联集团，他们谴责美国的行动是侵略，是非法的和没有根据的干涉朝鲜内政。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联合国批准它赴朝作战的决定呢？这要从两方面来回答。一方面，联合国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新生的国家——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所说，北朝鲜的进攻是“对一个经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而诞生的国家的侵犯，这是对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出来的政府的军事侵略。这样的进攻冲击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目的。这样的进攻公开地蔑视了联合国的利益和权威。”另一方面，美国外

交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把冷战政策和国际组织的人道主义与象征性的价值联系起来。从传统上来说，一些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美国的政策中，这种倾向更为突出。由于美国蔑视强权，在人类事务中也不愿承认与接受强权是一个因素，这就使美国在心理上有需要按照思想目标和普遍的道德标准，在国际舞台上使它的行动合法化；美国的强权必须是“正义的强权”，使用强权不是为了建立“强权政治”和谋取自私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因此，联合国的作用就局限于批准和建议会员国采取行动；给西方强国在遏制克里姆林宫扩张势力的行动中挂上它的金字招牌，赞同他们所做的事业，允许美国及其盟国利用这个象征全球性的组织来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联合国的这种职能决不意味着它是个无关紧要的组织；在西方强国和苏联集团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全球性冲突中，联合国的作用也许注定是重要的。但是必须认识到那终究是可有可无的作用。事实上，如果朝鲜的行动是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来进行的，那倒正好是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本来应该起的作用了。

朝鲜战争期间的一些重要决定，不是在成功湖而是在华盛顿和东京作出的，在共产党中国干涉后，则是在伦敦作出的。阿诺德·沃尔弗斯曾经现实地强调指出：“朝鲜行动的性质，应当从美国及其同伙的决定和行动中来判断。事实上，主要应当看美国的所作所为，才比较合乎情理．因为其他一些国家看来只是由于他们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才对保卫南朝鲜提供援助的。”美国在这方面突出的影响，莫过于因国内政治的影响而单方面决定福摩萨中立化；也没有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显得更有代表性了。

第 三 章

国内政情与福摩萨：共和党倾向保守

朝鲜战争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卷入美国国内的政治旋涡中。这是由于自 1949 年末到 1950 年初以来，美国人民对政府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戏剧性地为党派所利用，它是在下述四种情况下产生的：遏制政策从感情上和心理上来说，都是和传统的美国对外关系相抵触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使许多美国人确信政府的对外政策已告失败——不久，俄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和朝鲜战争的发生更证实了这一看法；在国会两院中，外交政策领导权又回到共和党占优势的保守派手中；共和党右翼坚决相信反对党的真正任务是反对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结果是：美国人民在1950年开始激烈反对政府把他们拖入没法很快结束的冷战，对政府推行看来在亚洲已遭到惨败的遏制政策，也表示强烈的不满。在经过了漫长的和世界事务相隔绝的时期后，人们自然会无限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公众的心情是发牢骚和提意见。共和党反对派代他们说出了心里话，他们的批评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因为这些意见深刻地表达了美国人民沮丧、无聊、惶惑和恐惧的心情。这样，党派政治和群众情绪之间相互作用，肯定会影响朝鲜战争的重

大决策。

毫无疑问，沮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人不能适应领导世界的新任务所引起的。就传统上来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避免牵连到国外事务中去，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上。美国的事是只管美国——不管别的国家。当然，国外事务有时也会干扰专心致志地搞国内事务。那时事情就会很快得到解决：假如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行动越轨”，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就会迅速“纠正”冒犯者的不轨行为；又如在这个世纪里，德国曾两次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美国就利用全部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它的军事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垮敌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主要的一点是迅速而彻底地解决冲突。只有在迅速、全面地解决国外危机之后，美国人民才能回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上去：从事国内开发和谋求生计。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外事务被看作是令人烦恼的、却又是短暂的插曲。

遏制政策直接背离了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历史经验。政府的意图不在于摧毁俄国及其卫星国，而是要建立力量均势以遏制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在一场闪电战中把苏联消灭掉，而是接受共存的既成现实。杜鲁门和艾奇逊只是设法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力量，旨在改善在共存中的条件和可能性，而不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苏联的威胁。他们不是以战争、而是以代价很大的经济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不是在单干，而是有盟国的支持，这些盟国并不总是赞同美国政策的，有时甚至还是反对美国政策的。

就感情上来说，这种政策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是“防御性的”、“消极的”，把主动权让给了苏联。可以肯定，遏制政策的短期目的是：阻止俄国领导人发动全面战争来统治

全世界，引导他们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一切突出的东西方之间的分歧。长期目的是：增加苏联社会内部的压力和紧张关系，让他的领导人不得不把他们的目标改得温和些，不然的话，就让他们目睹他们政治制度的瓦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个目的是密切相关的。政府并不期望在实现第二个目的之前，达到第一个目的。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2月说过，和俄国人谈判就象跟大自然打交道一样，"你不可能和一条河流争论，它一直在川流不息。你可以筑坝来抑制它，可以利用它，可以使它改变流向，但是你没法和它商谈。在取得协议方面，我们已经发觉，即使是避免战争、导致和平的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办不成的。"总之，只有谈判才能结束冷战。而冷战是不可能结束的，除非共产党人不成其为共产党人。所以苏联的威胁将是长期存在的了！

遏制政策受到挫折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它的失败令人无法忍受。中国的事情更是如此。美国人长期以来把中国看作他们特别照顾的地方。近五十年来，美国对外政策在欧洲只限于两次短暂的、决定性的军事干预，这是由德国威胁欧洲的力量平衡所引起的。而美国参与远东事务，特别是对中国，则从本世纪开始以来就一直是积极的。最初对中国的兴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商业方面。中国被认为是美国产品的广阔市场，但是我们对华政策不乏大量的利他主义的因素：以基督教的真诚来拯救、造福中国人民。事实上，美国早就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保护人，使它免受外国的剥削和侵略。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防止英、法、俄、德和日本排挤美国商品，使美国有同样的机会在中国市场上推销商品和进行投资。通过这个政策，美国就在政治上承担责任：必须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是美国人民从来也不准备

为此而战。结果是美国确实没能保护中国免受外来的压力和侵略：俄国于1900年左右在满洲建立了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成为这个战略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日本扩大了它在中国的影响和控制。1931年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企图实现它蓄谋已久的野心，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或殖民地。因此门户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口头的政策。美国从来也不打算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但是，美国人向来不懂得，他们的言词是不足以维持中国在政治上的独立的——事实正是如此。由于他们不准备为此而战，所以每当俄国或者日本向美国的承诺进行挑衅时，美国往往不予重视。美国人甚至相信，言词能代替有效的政策。并因此产生了幻觉，认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保护人和朋友，慷慨地把西方基督教、政治思想，科学和医药赠送给了中国人民。

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在1949年的垮台和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使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决不会想到，从北京发出的宣传竟会谴责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反动没落力量的中心……完全可以打败的纸老虎。”他们曾经期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一个“忠实的”、基本上是民主的中国，它感激美国过去提供的保护和援助，它将成为美国强大的朋友，一个在远东的强盛而可靠的盟国。这些希望的破灭，正如1949年8月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中所说，给美国公众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由于政府对这个灾难没有造过舆论，以致使震动变得更为厉害些。由于成功地在欧洲运用遏制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中补给线——而产生的相对安全，仿佛一下子都分崩离析了。看来好象美国在欧洲顶住了共产

党的威胁，只是为了让它在亚洲打开个缺口。另外两件事使不安全感和忧虑的心情变得更为沉重：1949年9月，俄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打破了美国在原子武器上的垄断，这种垄断曾普遍地被认为是阻止苏联进攻的主要威慑力量；另一件事是，1950年初对阿尔杰·希思的判决——随后紧接着又揭露了克劳斯·富克斯和朱迪思·科普朗的间谍案——这些都说明苏联继续在高级机构里搞间谍活动。

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关系也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而每况愈下。“有一段时期，”《华盛顿明星报》在1949年末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在共和党内部存在着无休止的争吵，掀起了反对‘随风倒’的运动，有人认为“‘随风倒’的人应对共和党连续在选举投票中的失败负责。人们已经不再怀疑，几位有影响的共和党人正在试图把这个运动发展到丢弃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希望在乱糟糟的结局里，捞取党派的利益。”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是主张两党合作的头面人物，他在给亲密的朋友外交政策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信件中，发现在共和党人内部存在着同样的倾向。范登堡写道：“有人捏造一部份共和党人在两党合作的外交政策上是彻头彻尾的‘随风倒’，”他对“这种越来越强调的说法感到腻味和讨厌。”参议员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 我认为“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他在1950年1月5日给一位选民的信中写道）意味着共同的努力，在我们必不可少的两党制的条件下，把我们国内官方的意见统一起来，使美国人讲话具有最大的权威，以抗击那些企图分裂并征服我们和自由世界的人们。这丝毫不意味着在决定我们方针政策时放弃自由辩论。相反，真诚合作和自由辩论是最终达到团结所必需的。总之，这只是

为了把国家安全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每一项对外政策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而“忠诚的反对党”则对政策的贯彻执行负有特殊的责任。

然而，尽管范登堡有这些想法，他因病离开了参议院，加上参议员杜勒斯在纽约一次特别选举中遭到失败，共和党人在国会中负责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和下届中期选举战略的决策权，还是落到了传统的占优势的中西部保守派手中。这些共和党的保守派在国会中占了多数。

1948年以来，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肯尼斯·惠里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领导的共和党右翼政治家，把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失败归因于他在对待国内外事务中的“随风倒”。这些人确认，选民把打上政府商标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执政党，而不会称赞支持这些政策的反对党。据他们看来，总统选举中的三次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他们认为，从政治利益角度着眼，就不应当支持总统的各项计划，而应当加以攻击。所以他们就得提出另外一套办法，以便在下届选举中取得选票。他们也不同意把反对党的真正任务局限于反对有关国内事务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单凭保守派在国内的本钱，他们看来不会在国会中取得明显的、稳定的多数——或者让他们当中的一个进入白宫。所以他们热切地寻求并利用对外政策上的问题。二十年在野党的处境更增长了这种热切的情绪。遏制政策的挫败，中国的崩溃，核垄断的丧失——接着而来的朝鲜战争——这一切使他们在八十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很容易利用公众的恐惧、惶惑和焦躁的情绪。

过去的外交政策是政府和参议员范登堡及共和党自由派共同制定的，下决心加以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权术和

谋官心切。这里还有个坚定的信念问题，因为共和党的保守分子深信，“奉行新政”的民主党的大多数，在共和党左翼支持下，正在破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只有把权力交回给共和党“正统的”嫡系继承者和维护者，才能阻止并扭转这一进程。

这种传统体现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哲学：主张立法机构要强，行政部门要弱，政治和经济方面应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还得有一个平衡的预算。这种学派憎恶唯我独尊的政府授权行政机构去干预经济，它不同意征收高税，据说这将损害私管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它同样反对庞大的政府开支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因为这一威胁为政府控制经济提供额外的借口。对塔夫脱那帮共和党人来说，维护他们的理想，维护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制定国内外一切政策和立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由于他们坚信，一项积极的、代价大的对外政策会带来机构庞大的政府、掌握大权的总统、高税率以及比新政还要严格的经济管制，他们对这两者都反对。确实，他们似乎把两者都看作是民主党人消灭私营企业的阴谋，而私营企业则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基础。他们还把两者都看作是民主党人的手段，其目的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和独裁政治来代替传统的民主制度。

因此，保守的共和党人在考虑美国的安全时，不是首先估计国际形势，然后决定是否可以削减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的巨额支出，缩小重新武装的规模，或者是否可以限制总统独断独行的权力。他们单纯地认为美国和西半球基本上是安全的，自给自足的。如果不是这样设想的话，那就等于接受民主党人的观点，就是说，美国处境不安全，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唯有建立强大的，化费很大的军事设施，依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破坏的盟国。这就需要给予经济援助，帮助他们恢复元气。还得有精明强干的总统来制定、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保守的共和党人不能接受政府的这个观点。因为如果接受，他们就会被迫投票赞同某些措施，如对经济界征税“过”重，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过”多——这个“过”是低标准的——而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对美国经济和民主是个威胁。为了维护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正统的”共和党人应当取代那些控制着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国际主义者”；这些“国际主义者”不只是指民主党人，而且也包括被保守派看作是异教徒的共和党自由派。

在为11月份的大选作准备的过程中，共和党保守派居然会注意政府的远东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利用中国问题做文章，在国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共和党人没有参与制订政府的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由行政机构执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罗斯福总统，后来是马歇尔将军。共和党人由于没有参与商议，因此得以冷眼旁观，坐等政府犯错误，乘机利用并捞一把。当然，共和党的政治家不时地在提醒群众，他们没有被征求意见，并公开表示要大力援蒋。但是，他们完全明白，埋头在搞重建欧洲的政府把宝贵的财力过多地化在蒋介石身上是踌躇不决的，政府认为，由于蒋介石本人无能，局势已经无法挽救。所以，两党对外一致仅限于欧洲，结果是在对华政策的每次转折时，民主党人向他们的对手提供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

政府对蒋的垮台的解释并不是缺乏说服力的。美国认为已竭尽全力支持了蒋的地位。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向蒋提供了大约二十亿美元的贷款。这还不包括国民党化二亿三千二百万美元取得的价值十亿美元的军用和民用剩余物资。国

务院在《对华问题白皮书》中，以社论形式宣布："有人强烈提出，对国民党政府再增加少量的援助——军事的经济的——就可能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我们政府得到的最可靠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情报，都没有证实这种看法。……我们在现场的军事观察家报告说，在紧要关头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没有哪一次打败仗是因为缺少武器或弹药。"

根据这一官方解释，只有蒋本人才应对他的困境负责。他没能清除政府机构中普遍的腐败和不称职的行为；他拒绝按照民主的路线来改组政府，也不肯约束秘密警察横行不法；他无力或不愿意进行某些早该实行的社会改革，特别是重新分配土地，以及降低几乎全部压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国务院援引了国民党领导人的坚决支持者——艾伯特·魏德迈中将1947年对中国人说过的话：

> 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能以武力来击败的。今天侵略中国的是一种思潮，……我个人的意见要战胜这种思潮，只有用另一种更有吸引力的能取得人民拥护的思潮。这就是说，中央政府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清除他们机构中的腐败和不称职的行为，树立公正和平等，保护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人身自由。概括地说，中央政府不能靠武力打败共产党人，只有立即改善政治和经济的现状，才能赢得广大人民忠诚的、热情的和真正的拥护。我认为，这些改革是否有效和及时，将决定中央政府在抵御共产党人的攻击中的成败。

蒋对他朋友明智的进言充耳不闻。结果使他失去了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好投靠共产党，以期摆脱贫困和苦难。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总结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危机面前已经显得无能为力，部队丧失了斗志，

政府没有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有着严格的纪律和信仰的狂热，自以为是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军队是用不着打的，他们自己会瓦解。”历史再一次证明：“丧失自信心的政权和士气低落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考验的。”艾奇逊的结论是简单明确的：“这个不幸的、但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的结局是美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美国做过的、或本来可以做的事情，都不能改变这一结局。这个结局的造成，并不是由于我们还有什么不尽力的地方。它是中国内部力量的产物，美国曾试图施加影响，但是没有用。中国国内作出了决议，即使是一方不在场的决议。”

政府关于蒋介石垮台的解释是否正确，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判断，我们只需要指出政府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给了反对派抨击的把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把它的对华政策和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协商过。和他们通通气本来是明智的做法，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政府有可能防止群众攻击它的对华政策；共和党人几乎很难对他们共同参与制订的政策发动全面的攻击。第二，这样的协作不大会使美国的政策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国会中几个最有名的共和党人也提不出什么其他建设性的方案。在参议员范登堡于1948年提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他把中国称作“神秘的迷宫”。他说，美国人不可能知道要多大数量和什么形式的援助才能恢复稳定的、独立的中国。杜鲁门先生重新当选后，范登堡再次强调这一点。他写道，中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这样一个可悲的程度，以致在这危机的最后时刻，我们极难知道还能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光靠拨款……纯粹是浪费我们的物力。再者，国民党政府没能把自己改组好，以继续取

得那里和这里民众的信任。"在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痛斥两党协作以平息共和党人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时，范登堡回答道："兰登先生可能认为，我们这些'受骗的'共和党人应当在过去一二年中为中国及其大元帅大声疾呼，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只会促使我们强调讨论蒋介石的软弱无能，把他残存的威信一扫而光。同情蒋介石是容易的。……但是，不用美国战斗部队进行武装干涉，而要计划有效的援助，那却是另一回事。过去我从不赞同军事干预，今后可能也不会赞同。"

参议员范登堡的这些观点和政府对蒋的能力和士气的估计是相似的。因此，政府在制订和执行对华政策上，没有象在欧洲政策上那样采取党派协作的形式，是一个主要的错误。直到1948年末或是1949年初，才有人厉声指责对华政策并呼吁制订一项巨大的新的援助计划，但此刻要援蒋已为时太晚了。如果在这段时期前，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和参议员范登堡及其追随者搞过合作，那么在援蒋显然已嫌太晚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惠里、布里奇斯和诺兰特就不可能处于如此有利的政治地位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共和党保守派就不可能对遭到失败的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发起正面攻击，正象他们不可能攻击取得成功的两党一致的对欧政策一样。

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支持国民党政府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美国人民颇有可能会拒绝批准一些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蒋介石的地位，如耗费大量增援的款项，以美国军官来指挥国民党军队以及重新动员美国陆海空三军进行可能的干预，这种拒绝也完全可能会是事实。政府曾公开讨论过欧洲在美国防卫计划中的重要性，

但它从来也没有表示过愿意公开讨论中国在美国安全体系内的重要性。美国人民从来也没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权衡利弊，作出选择。如果提供过这样的机会，再假定艾奇逊对美国人民愿意支持这样一个政策的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蒋垮台后，政府就能毫无拘束地推行它对共产党中国的新政策——就是说，利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所谓的民族利益冲突，引导它使之有利于美国。”

1949年10月初，大多数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在国务院开会，首先提出了把毛泽东转变为毛铁托的可能性，建议国务卿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新的政策。他们主张“谁断言中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俄国的另一个招牌，谁就得负举证责任。”他们预言，中国共产党政府将“纯粹是中国式的”。只有伯纳德·布里迪，他主要兴趣在武器工艺和军事战略，而不在远东政治问题，他争辩说，战后在欧洲与共产主义打交道的经验表明，共产主义和一个被迫接受共产主义的民族的文化结构并没有多大的关连，因为共产主义主要依靠强烈的手段。因此，他认为美国只好正视不愉快的现实：与强大的中苏集团相抗衡。

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这篇讲话过程中，国务卿声称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传统的原则上的，即任何一个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与我们的利益不相符的。这个主张仍然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第一条原则。”它反映了美国关心亚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国务卿强调指出，这种关心并不只是反共的产物，它有深远的历史根源，我们确信，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尊严和权利遵循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挫折是他们自

己的，胜利也是他们自己的。

国务卿艾奇逊说，对国家独立的共同信念，加强了美国和亚洲之间的主要联系。但是俄国长期以来一直有侵犯这种自由的野心。“俄国人对中国北部和其他地区的态度和兴趣，早在共产主义前很久就有了表现。这压根儿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产物。它比共产主义要早得多，但是共产党政权在推行俄国帝国主义时，加添了新方法、新策略和新概念。共产主义思想和策略武装了俄国帝国主义，使它有非常阴险的新武器——渗透”。

苏联帝国主义不仅对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是个威胁，甚至对共产党中国，它也是个严重的威胁。国务卿艾奇逊讲话的主题是中苏之间利益的冲突。他的基本设想是，不管统治中国的政权的思想意识性质如何，这两个邻居传统的政治地理上的冲突将要继续下去。新添了权力的克里姆林宫，“正在把中国北方的几个省区割离中国，使之附属于苏联。这样的过程在外蒙古已告完成。在满洲也已接近完成。我敢肯定，在内蒙古和新疆，苏联情报人员正向莫斯科送上非常可喜的报告。”国务卿艾奇逊强调说：“苏联攫取中国北方四省这件事，在任何一个外国和亚洲的关系中，是唯一的重大事故。”

这一分析指出，美国必须从中国的政治纠纷中脱身出来，以防止中国人民反美情绪的滋长。这样，中国人的注意力才会集中于北方省份背离祖国、并入苏联。俄国的这种行动能更充分地暴露它的意图，比任何美国人的演讲都有说服力，这将撕下苏联帝国主义戴着的共产主义的假面具。“……我们不应当去夺取俄国人费力为自己取得的那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国务卿说，“我们不应当把中国人民必定会

燃烧起来的对俄国人的正义的怒火、愤慨和仇恨，转引到我们自己这方面来。”

艾奇逊预言，俄国在满洲和中国北方扩大势力范围的欲望，将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论点的含义是很深远的。它首先意味着，假如北京真正关心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就必定会抵制苏联的渗透。所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颇有可能是个潜在的铁托。国务卿讲话的第二个含义是，假如不向毛铁托主义的方向发展，假如毛和他的同僚们甘愿屈从于苏联，他们将会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由于中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他们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老百姓就会把他们认作外国统治。这种“外国统治”，艾奇逊说，仍然隐藏在改革运动的招牌下面，其根源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只要给予时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将再次表现自己，扔掉外国的枷锁”。这两种发展趋势中，不论发生哪种，美国总能从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中得到好处。

当然，在美国尚未和蒋政府脱离关系，在福摩萨陷落之前，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取得丝毫成功的。在时机成熟之前，美国还得和蒋介石保持联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联系。政府第一次企图摆脱蒋介石，是在发表白皮书的时候，白皮书认为，尽管美国提供足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还是丧失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说得明白些，由于蒋介石不再值得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撤销对蒋政府是合法政府的承认；反之，作为既成功的事实和友谊的表示，中国共产党将被承认为合法的政府。1950年1月初，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艾奇逊明确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试探委员们的看法，承认共产党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国务卿

强调，除了几个孤立的地区外，共产党人现已控制了整个中国。一方面由于他不敢肯定新政府是否会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和承担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另一方面，无疑是为了抚慰他的听众，艾奇逊建议“没有必要急于承认”中国的新领导。

事实上，艾奇逊正在等待时机以便解决承认的问题。事态的发展本来会使中共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因为福摩萨预计将在1950年陷落。从1948年十月到1950年1月，艾奇逊后来作证说，美国虽然认识到福摩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足够的军队来保卫这个岛屿。因此，国务院的政策是试图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福摩萨落入敌人的手中。可是到1949年8月，即使是这样的政策也行不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国务院的估计，虽然福摩萨对于美国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但还不值得批准美国军队去占领它。1949年10月12日，陆海空三军和国务院一致得出结论，福摩萨在1950年底前将被中国共产党所征服。中央情报局麦卡恩上校甚至表示相信，共产党人用不着大规模的进攻就可以攻占这个岛屿。中央情报局的意见是，有两个因素向共产党人提供了颠覆活动的温床：第一，由于过去的失败和领导的无能，国民党军队军纪松弛，士气低落；第二，对日战争胜利后，岛上的蒋政府搞得老百姓“切齿痛恨”蒋介石。

1949年12月，国民党人放弃中国大陆去福摩萨后，国防部长约翰逊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福摩萨形势，他就建议派个实地调查组去该岛。国务院不同意国防部的这一提议：“我们的态度是，”国务卿艾奇逊说，“由于在有关问题的声明中已提出过，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只有派

驻美国武装部队才能拯救这个岛屿，我们想做的只是在这里干，这将是纸上谈兵，毫无用处，还会进一步损害我们在远东的威信和整个地位。”结果在12月22日，总统告诉约翰逊部长，他“没有表示不同意作军事方面考虑……，他不打算和我*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但在政治方面，他将和国务院一起作出决定”。

一星期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把决定呈交给总统。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他的决定：

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打算动用军队来干预当前的形势。美国政府不会采取使自己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美国政府同样也不愿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美国政府认为，福摩萨的资源已足够他们取得防卫该岛所必要的东西。美国政府建议，在现行的立法权限内，继续执行目前联合国亚洲经济委员会的经济援助计划。

国务卿艾奇逊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些话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解释说，总统的用词“目前”，并不限制、修改或削弱总统在声明中其他地方提出的基本政策。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在未必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可能会受到攻击。“美国出于本身安全的需要，应有充分的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

艾奇逊清楚地说明总统的决定并没有在战略上加以考虑。“决定的根本因素不在那个地区。这些因素关系到美国

---

* 约翰逊自称。——译注。

立国之本，使全世界继续相信，一旦美国采取什么立场，它就要坚持这个立场，不会因权宜之计或单方面的利益而有所改变。”在做这个声明时，艾奇逊指的是战争时期的诺言，那就是1943年在开罗和1945年在波茨坦对中国的许诺：一切被日本窃据的领土都将在战后归还给中国。中国国民党现已被中国共产党击败的事实并不能改变美国的立场；许诺是给中国的，不是给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的。

因此，美国军队将不可能去保卫福摩萨，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艾奇逊强调，蒋介石在福摩萨有充足的后备力量，1948年以来，他从美国得到了“非常可观的”军事装备。“岛上现有的军队和装备已经足够，保卫该岛的困难不在于武力，不在于他们短缺武器或弹药。……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别的地方，在这方面，美国是起不了作用的，美国不愿也不能试图向任何人提供战斗的愿望和目的，这些都应该是自发的。”假如对蒋来说，1950年1月5日标志着他的末日的开始，美国政府是不会表示吊唁的，它认为，只有蒋本人才应对他的困境负责。

华盛顿非常肯定蒋的覆灭和福摩萨的陷落，国务院甚至早就准备好了宣传资料，并已分发给新闻官员作为指导，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占领该岛后，该说些什么话。国务院通知他们，他们的任务是抵销这样的“假象”：以为福摩萨的失守“将严重损害美国或者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

国务院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它当真赞成福摩萨的陷落，这正是批评者所猛烈抨击的；国务院的理由是希望在福摩萨陷落时，尽量减少对美国的威信和其他国家士气的损害。艾奇逊解释说：

……假如指挥一个连队的军官发现他两侧的连队都

在后退，并因此而受到惩罚，他必然会向士兵们说，“不用去管它，这一点也没关系，你们干得都很好。掘壕。固守。一切都顺当。”

你们都熟知邱吉尔先生1940年的著名讲演，他说，英国将在海滩上战斗，在街道上战斗，在山头上战斗。我想你们中间不会有任何人以为这是英国总参谋部军事计划上合乎科学规律的报告。……

……如果你认为，正如我们确实认为——而认识是正确的——有损于我们威信的事件即将发生时，我们只能说，“没关系，不要灰心，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其他办法，我们将继续前进。”我想，除了这种鼓舞士气的态度，再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1950年1月3日，东京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泄露了1949年12月准备好的情报资料，于是，国会中坚决要求美国护卫福摩萨、要求不承认北京政权的共产党人，就猛烈抨击政府的远东政策。参议员诺兰立即公开前总统胡佛的一封信，信中竭力主张美国不要承认新中国政权，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假如需要的话，就给予海军保护。胡佛先生接着概述了他认为可行的目标：在太平洋建立反共防线；保护日本和菲律宾；警惕在美国“以及我们的友好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变成共产党的谍报中心；防止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内增加另一个共产党成员国；消除共产党中国参与制订对日和约的危险；维持象征性的抵制，为我们“拯救东南亚创造较好的基础”；最后“继续保持希望，有一天把中国重新引上自由的道路”。

参议员诺兰痛斥政府不愿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存在，他指出，政府在欧洲遏制共产主义而在亚洲却允许它扩张的政策

是相互矛盾的。在诺兰看来，“共产主义在亚洲所得到的东西比它在欧洲所损失的要多许多倍。”参议员塔夫脱在1月3日也呼吁派海军保护福摩萨，对上述打算表示赞成。为了在欧洲遏制共产帝国主义，他说，美国曾几次冒同苏联打仗的风险，警告苏联“到此为止，不准过线”。但是在远东，政府就不愿划这样一条线来保护蒋介石，虽然那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假如我们渡海干预福摩萨，俄国会同我们打起仗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跟美国打一仗，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又何况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他继续说，福摩萨，“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极小的代价就能制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参议员塔夫脱接下去说，这样的政策“不会让我们背上包袱，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我们可以在以后决定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安排福摩萨的最终去向。”

美国总统曾说过，美国不愿让自己卷入中国的内战——但是这个国家介入过希腊、朝鲜和其他几个地方类似的战争，难道不正是他的主意吗？杜鲁门先生声明，政府不再向国民党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顾问，但这不是和他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行的政策“矛盾得出奇”吗？“遏制共产主义的问题主要是个实际问题，”参议员塔夫脱最后说，“福摩萨形势引起如此热切的关注，唯一原因就是人们痛恨国务院及其亲共盟友扔掉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还反对任何干扰。对远东的了解，莫过于麦克阿瑟将军和前总统胡佛这两个人，他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客观事实。那里是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没有什么困难，也不用花什么代价，我们就可以制止共产主义扩张到那个岛屿上去，该岛可能有巨大的战略价值，那里的人民是要求独立的。”

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支持塔夫脱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允许福摩萨落入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或者归俄国人统治。他甚至建议在联合国托管下由美国控制该岛。他说，虽然美国曾同意在日本战败后把福摩萨交还给中国，但对日和约迄今尚未签订。所以，从技术上说来，该岛依旧是日本的一部份，“形势的逻辑”要求美国应该“和平而友好地占领”该岛，直至最终确定其主权的时候。

然而，共和党人并不把他们自己局限于要求保卫福摩萨和不承认共产党中国。他们还制造一种政治气氛，那就是任何政府企图抛弃蒋介石、而和毛泽东建立外交关系就会被普遍当作“非美国的”和“亲共的”；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其做法是攻击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奉行新政的政府已有意或无意地“把中国出卖了”。共和党人不同意官方的一些解释，诸如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群众的社会骚动，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或者是国民党的士气低落、无能和高压政策；或者是共产党优越的组织、方向、士气和跟群众打成一片的能力。他们也不接受民主党人的那些论点：中国革命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是个土生土长的政党，俄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还不是太平洋的强国，只是三百年来和中国有一条共同的边界线。蒋的崩溃，共和党人攻击说，应归咎于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国务卿马歇尔、艾奇逊以及他们的外事顾问，他们都曾试图强迫蒋和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他，不以武力支持他和毛的战斗。

共和党人的论点是非常简明坦率的：美国的对华政策随着共产党统治中国而告结束。国务院及政府领导人对制订和执行这一政策负责；看来，政府里必然都是共产党人和“共

产党的同情者”，他们“制定了美国的政策，促进了苏联统治全球的目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罗斯福总统派去中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停的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他指责白皮书时对这种阴谋作了典型的揭露。“这份白皮书，”他说，“是国务院中亲共分子圆滑的辩词，是他们策划推倒了我们的盟友，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府，帮助共产党人征服了中国。”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朋友，至少不会去指控他；大多数保守的共和党人就没有那么敏感。对他们来说，罗斯福是美国政府中“亲共分子”的代表。

二十年来，这些“亲共分子”，也就是那帮“新政奉行者”，他们在国内损害美国的体制，征收高税，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领域进行普遍的干预，这就抑制了私营企业；也就是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在战争期间信任斯大林，天真地希望他们能赢得他的好感，把他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民主主义者，以便在战后有段很长的和平时期；就是这些“进步分子”，使美国执行了符合共产党人目标的政策；就是这些“国际主义者，”他们不但“出卖了”中国，还“出卖了”东欧；就是这些“社会改良家”，现在正以庞大的“赠送”计划浪费着美国的资源，这将进一步削弱传统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

正是这些看法使性格和背景如此不同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约瑟夫·麦卡锡站到一起来了。大多数美国的政治观察家往往不能理解，从俄亥俄来的非常关心他同乡自由的参议员，不仅宽恕而且实际上支持了从威斯康星来的肆无忌惮的参议员，这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以不安的、厌恶的目光看待这一时期塔夫脱的政治生活，认为是暂时的反常。事实上，他们的联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两个人都把对

外政策看作是新政奉行者手中的工具，想借此来完成他们深思熟虑地搞了二十年的计划——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麦卡锡的口号，“叛逆的二十年”，可能是言过其实，但在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还是有道理的。塔夫脱等共和党人确实感到，奉行新政的民主党人——民主党的多数派——以他们“非美国的”观点和行为背叛了祖国；从他们猛烈攻击杜鲁门的政府的远东政策中，可以看出这种感受的深度。

这场攻击的结果造成了两个主要政党间的对峙。民主党人只给蒋一些经济援助，不愿对蒋承担任何义务；由于这些最低限度的美援至少保证了美蒋之间的继续联系，并暂时阻碍了对共产党政权的承认；共和党人要求把这种经济援助作为他们支持政府在其他地区政策的最低代价。他们有本事攻击并牵制政府对西欧的政策，这就是他们约束政府的能力。假如民主党人不愿为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而操心，共和党人对在欧洲遏制共产主义也将不予关注。确实，由共和党人首先制造并加以利用的整个怀疑猜忌的气氛，使民主党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蒋介石，或者与共产党中国建立任何关系。当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案公开揭露后，共和党人关于中国崩溃的解释就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在政府和国务院中或许到处都是搞颠覆阴谋的人。有人合理地指责现有的安全规章是“一纸空文”，哈里·杜鲁门断然置之不理，这只有进一步使人相信：美国正在被内奸出卖。在这种情况下，抛弃蒋介石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无异是政治上的自杀。

由于国内僵局使政府的政策不能灵活机动，这就使它不可能利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政策上采取主动，却把在远东的主动权交给了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消灭了蒋介石，

才能帮助美国决策者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

不幸的是，共产党人主动采取的政策偏偏打乱了政府的设想。他们不去进攻福摩萨，而是打了朝鲜。于是福摩萨立即被中立化。第七舰队负有双重使命：第一，保护该岛免受中国共产党人的侵略，第二，防止蒋介石向大陆发动任何进攻。在宣布这一决定的正式声明中，总统从军事角度来解释他的命令。他说，福摩萨被占领，"将会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威胁在该地区执行必要合法任务的美国军队。"稍后，总统对他的声明作了阐述：当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朝鲜的被攻而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刻，美国的行动是个基本的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在太平洋任何地方的攻击，都会扩大朝鲜的危机，使联合国在履行职责时遭到更大的困难。

总统继续说，中立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对福摩萨抱有任何领土上的打算，或者想在该岛谋求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权。中立化也不会损害福摩萨的政治地位；待和平一恢复，这个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在朝鲜受到蛮横的毫无理由的侵略期间，为了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这个问题不得不暂时放一放。

不管保卫福摩萨的主要原因是否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国内政情本来也会迫使政府采取同样的政策。在美国面临危机期间，达到国内政治上团结一致看来是人心所向；而政府已做到了这一点。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不久，参议员詹姆斯·凯姆在参议院发言，谴责共产党的侵略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悲剧性交易的收获"，并对总统超出宪法规定的权限"作出武装进攻的决定"表示异议。这时，对政府远东政策批评得最厉害的参议员诺兰立即站起来打断了他的发言。诺兰说，

总统的声明，“在远东划出了一条界线，而这是早就该划定出来的。……我认为美国总统采取的这个步骤非常重要，……他应当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不论他属于哪个党派。”后来，当参议员惠里质问总统，在没有取得国会批准前，是否有权派遣军队去朝鲜时，诺兰作了简洁的回答，他说，总统具有最高统帅的权力。“可以肯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行动并不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我认为这也不是一场必须通过美国国会宣布的战争。目前行动的性质只不过是一种警察行动”！总统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就太晚了。

参议员塔夫脱的讲话，是政治上重新团结的最重要的标志，虽然他一方面把美国的远东政策仍然理解成是一种阴谋，但在另一方面，他赞同——并非毫无保留地——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塔夫脱断言，目前的危机是“同情接受共产主义的结果，认为它是爱好和平的哲学。”政府应对北朝鲜的进攻负责，理由有三：第一，因为“我们按照十分愚蠢的政策，报答俄国协助我们打日本，而我们并不需要这种协助，反而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划分朝鲜，把这个国家的北半部送给了俄国人。……第二，因为我们不曾向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武器，以保证其国防安全。第三，因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鼓励了北朝鲜的侵略。假如美国不准备派兵援助国民党中国打中国共产党，那它怎么会派兵保护大韩民国去打朝鲜共产党呢？”这一政策，塔夫脱继续说，是和国务卿艾奇逊的“环形防线”相一致的，他把福摩萨和朝鲜都排除在外。“如此反复重申我们的远东政策，使朝鲜共产党人得以利用国务卿的谈话，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今天为了保卫朝鲜和福摩萨，总统完全推翻了艾奇逊的“环形防线”政策。塔夫脱建议“任何一位国务卿，他的意

见已被上级否定；而他的政策又造成了战争的危险，那他最好是辞职引退，让其他什么人来执行他过去、或许现在仍然坚决反对的方针。”

然后，塔夫脱却赞同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符合“在远东以更坚决的态度来反对共产主义，”也是他长期以来所竭力主张的。“依我看来，这一天迟早总要到来，到那时，我们将明确通知共产党人，越过已经宣布的界线势必导致战争。这就是我们在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我相信，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虽然，他谨慎地补充道，他不能肯定，总统宣布新政策的时机和地点是否选择得恰当。只有总统才能对此作出判别，因为他掌握作出这一决定所必须的情报。

但是塔夫脱最后说，必须指出，总统未经征求国会意见，就授权在朝鲜使用武力；他认为，总统盗用最高统帅的权力，他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不过，塔夫脱立即补充道，“我可以说，假如参众两院提出联合决议，要求同意使用早已派去朝鲜的美国军队，并全力支持他们目前的冒险行动，我将投票赞同。”塔夫脱在温和的讲话中做了办不到的事情。

“共和党先生”的这些话标志着政府于朝鲜危机期间在恢复政治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杜鲁门已经对朝鲜，特别是对福摩萨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保守的共和党人为此感到如愿以偿，认为这是他们的功劳。六个月来，他们竭力主张要在远东推行更强硬的政策。现在，总统采纳了他们的政策。哈里·杜鲁门以他的行动恢复了两党之间的合作；更有意义的是，他第一次在远东问题上取得了两党之间的合作。但是两党间的合作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由此产生的政治团结并不是积极的，它不是共同的政治信念的结果，也不是对外

交政策有一致的看法。这是一种消极的团结，是外部危机的产物。两党没有真正地携起手来；他们只不过是宣布了暂时的休战。而这样的休战不可能转变为真正的和平，因为共和党人要求支持民主党对外政策的代价是竭尽全力支持蒋介石。由于政府不愿支付这一代价，共和党人很快就会恢复抨击。当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表露出他自己和政府之间有不同政见的时候，这一重新发动攻势的时刻就来到了。

第四章　麦克阿瑟、福摩萨和仁川：战功显赫的将军

1950年7月8日，杜鲁门总统正式任命麦克阿瑟为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国军总司令，这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朝鲜危机的第三个决议的第二天。那个决议要求所有会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6月25日和27日的决定而提供的“军队及其他援助，一律归以美国为首的司令部调配”；要求美国委派这支军队的统帅；授权联军司令部在作战过程中，可以“随意”使用联合国旗号；要求美国“在联军司令部的行动过程中”，向安理会提供适当的报告。至此，联合国的形式和美国权力占支配地位的实质取得了完善的统一。美国的远东司令部已改组为“联军司令部”；但是总统还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来指挥麦克阿瑟将军。

这条指挥渠道并不是通行无阻的。麦克阿瑟不是一名普通的仅仅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麦克阿瑟在自己的权限内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太平洋军队。在朝鲜战争前夕，将军就已拥有不可一世的指挥权。他是驻日盟军的最高统帅。在这方面，他单独负责执行盟国的占领政策。由于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国，盟国的政策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政策。这就意味着麦克阿瑟是八千三百万日本人民真正的统治者。华盛顿很少过问

它的总督；可以肯定，总统一次也不曾公开指责过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所采取的行动。麦克阿瑟担任的职务，有几项通常都是国家首脑干的，这一事实说明，他经常拟订并执行的占领政策很少受到华盛顿的干预。举例来说，日本政府除了通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外，和其他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派往东京的外国使节是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报到，而不是向日本天皇，接见外交官的正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长期对一个本土外的大国行使几乎是绝对的权力，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时看来，将军确实有点象二十世纪中叶印度的前总督克莱夫或沃伦·黑斯廷斯那样的太上皇，以西方帝国仁慈的传统专制政治，统治一个亚洲国家的人民。

麦克阿瑟还担任远东总司令的职位，他有权指挥属于远东司令部的全部美国海陆空军。该司令部管辖日本、菲律宾、琉球群岛、马里亚纳、关岛和其他一些岛群；却不包括朝鲜。最后，麦克阿瑟又是远东美国陆军司令，这个职务实际上是远东总司令的兼职。

除了他军事上的职务外，麦克阿瑟深得共和党保守派的信任，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当过胡佛总统的参谋长。在那经济萧条的年代里，他曾驱散过华盛顿阿纳科斯达广场上“迫切”要求额外津贴的人群。虽然这次他是奉文职上级的指示行事，但他军服笔挺有光，皮靴闪闪发亮，干得异常出色，赢得了有影响的保守派多数的支持和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激烈反对罗斯福总统欧洲第一的战略。在这次分歧中，麦克阿瑟得到许多共和党孤立主义分子的支持，他们宁可在远东打一场“民族性”的战争，而不愿在欧洲联合英国和苏联进行一场“国际性”的战争；这样，在不显出妨碍作战的同时，这些孤立主义者也表达了他们对罗斯

福的敌意和不满。1944年共和党有人领导让麦克阿瑟竞选总统的运动，结果由于麦克阿瑟在政治上表现得出人意外地不行，运动就流产了。

战后，实际上作为拥有美国人口一半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对华政策越来越有意见。麦克阿瑟作为美国驻日总督，对于日本的未来自然是非常关心的。他认为，日本没有中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没有中国的销售它产品的市场，就不可能重建它的经济和恢复大国地位；他在1947年曾预言，假如中国成为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并向邻国扩张的话，日本总会有一天不得不"乞求"共产党人允许它进入铁幕。蒋介石当真垮台的时候，麦克阿瑟认为，我们没有给他以有效的支持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他觉得所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政府继续优先考虑欧洲的缘故。

麦克阿瑟不关心欧洲的理由，在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的声明中已说得很清楚。他在声明中，以基督启示的语调叙述了亚洲及其未来："欧洲的体制处于垂死阶段，正在日趋衰亡，终将为苏联经济和工业霸权所统治。……濒临太平洋并拥有亿万居民的地区，在今后一万年内，必将决定历史的进程"。根据这一观点，麦克阿瑟曾建议把第二战场开辟在太平洋地区，而不是在欧洲。罗斯福曾于1942年5月6日给他一个电文，解释他不能满足麦克阿瑟提出的增援的要求，因为"在今年春夏两个季度里，我觉得不能正视这简单明白的事实，俄国军队杀伤轴心国军队的人数和破坏他们物资的数量，超过其他二十五个协约国加在一起的数字。看来，在1942年中，完全有理由支持俄国所作出的这种巨大的努力，尽我们所能动员的军需物资都调给他们，还要修订计

划，诱使德国的陆军和空军离开俄国战线。”麦克阿瑟回答说，他同意“总统的看法：俄国战线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完全有必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任何阻碍都是不应该的。然而，能运送到那里去的物资是有限的，因此，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战场必须在太平洋地区。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容易发起攻击，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能支援俄国。日本现在加在俄国西伯利亚的压力将因之而立即消除，使俄国能利用西伯利亚的资源直接支持欧洲战场，或者和盟国一起参加太平洋的攻击战”（麦克阿瑟早在1941年12月10日，就把这个战场的优点向华盛顿建议过，以后又继续提出过，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由于欧洲注定是俄国工业的前院，怎么搞也没有用，麦克阿瑟认为，欧洲的丧失可以处之泰然。当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后，麦克阿瑟猛烈抨击他们受了俄国共产党人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启发，才拟订出欧洲第一的战略。麦克阿瑟战后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评，仍然反映着同样的态度。

因此，共和党人对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感到很高兴。使他们宽慰的是这样一来，在负责执行美国政策的人员中，有“一个他们的自己人”。这就使政府不可能“出卖”蒋介石和“姑息”中国共产党。在福摩萨问题上的几次交锋，很快就显示出麦克阿瑟的立场是多么接近右翼共和党人，而在亚洲政策上，他和政府的分歧又有多大。

虽然美国现在承担着保护福摩萨和蒋介石政府的责任，政府还是希望把这个责任保持在最低限度内，理由有两个：第一，政府认为，亚洲动乱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民穷得可怜，又拒绝接受西方的殖民主义。由于蒋介石不愿或者没有能力迎合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社会变革、争取更好前途的愿

望，他已经丧失了人民对他的支持。美国的援助，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会疏远中国的群众，还会在亚洲各国人民中激起强烈的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因为他们把美国的干预看作是为了蒋的缘故——特别是如果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强迫中国人民接受他的独裁统治——而把这当作是西方统治和殖民主义的延续。由于北朝鲜的侵略，美国国内的政情，以及军事上安全的考虑，自6月25日以后，与国民党领导人脱离关系的政策再也搞不下去了；不过，和蒋的关系还是不能太密切。

其次，假如对保卫福摩萨国民党政府的承诺必须扩大，或者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的话，那就很难推行新的对华政策：使毛泽东脱离莫斯科，并利用他在远东和苏联力量相抗衡。相反，我们的承诺将会迫使中国和苏联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可能导致和两个最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至少也将同中国的新政权打一场远东地区的战争。远东战争最合苏联的心意，因为这样就能把美国有限的兵力调出欧洲，从而让那个重要得多的地区暴露在红军的前沿。政府意识到蒋介石唯一得救的希望，在于挑起大战，因此，它非常急于把美国与蒋的关系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盟国紧张畏惧的思想情绪和我们一样。事实上，他们已经表示，美国单方面作出的关于中立福摩萨和保护蒋介石的决定与他们无关。

根据限制对国民党中国的承诺的政策，美国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拒绝国民党人迅速而实惠的建议：派遣三万三千名“装备最优良的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总统本来打算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国务卿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劝阻了他。国务卿认为，国民党中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是有所区

别的，既要派遣第七舰队去保卫福摩萨，同时又把福摩萨的守军调走，那是自相矛盾的；况且，使用这支军队颇有可能促使北京参加战争，致使蒋的军队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削弱他今后保卫该岛免受入侵的能力。那些参谋长指出，蒋军的战斗力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蒋军将和南朝鲜抵抗北朝鲜一样无济于事。此外，他们需要运输和后勤的支持，这还不如用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军队更为合算些。正如麦克阿瑟在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时所说的，国民党中国的特遣部队将是绕在我们脖子上的累赘。

为了避免由于保护福摩萨和蒋介石而引起进一步的国际纠纷，政府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欢迎联合国考虑福摩萨问题，并提议由国际组织进行实地调查。美国政府的这一提议，是为了回答共产党中国的指责，他们说，美国中立福摩萨构成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在美国大使奥斯汀致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的信中，以下述七点说明了美国的立场：第一，美国不曾蚕食或侵略过中国；第二，美国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该岛和大陆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共产党人威胁着在朝鲜作战部队的安全；第三，美国的行动是公正的、中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美国并不想把该岛占为己有；第四，美国的行动不会对今后政治解决该岛的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五，美国对中国人民有历史悠久的友谊，而苏联则不然；第六，美国欢迎联合国考虑福摩萨问题，并建议实地调查；第七，美国将坚持在朝鲜击退联合国曾遣责过的侵略。

政府作出的这些努力，是为了缩小它在护蒋行动中所起的暂时的作用，但是受到了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反对。将军要求政策能"更坚决地"支持中国国民党，"更积极地"反

对中国共产党。他作出这样的考虑，是因为总统中立福摩萨的命令，使中国大陆上的共产党军队及其设施可以“完全不受影响地”作好进攻该岛的准备。“中共因此还能由美国海军来保卫他们的整条海岸线，这样，他们就能够把防守部队使用到亚洲的任何其他地区。”麦克阿瑟后来说，正是这种保护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调动两个野战军作为他们干预的先遣部队进入北朝鲜。

在福摩萨问题上第一次公开的冲突，发生在7月31日麦克阿瑟将军访问福摩萨的时候。这次访问本来是华盛顿让他去的。美国在给国民党政府关于蒋提供军队的照会中，拒绝了蒋的建议，但又表示，须待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和国民党当局商讨该岛的防卫问题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麦克阿瑟自己提出，让他亲自去福摩萨向蒋解释不能接受他建议的原因。正如将军后来作证时说的，在这次访问前的十天内，他不断收到各军种参谋长的函电，对福摩萨形势表示严重的关注，所以他才决定亲自去看一下。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后，就发表声明强调了他和蒋会谈的军事性质，宣称如果该岛受到攻击，中美两国武装力量有效合作的安排已经完成。他说，防止发生这样的侵略，是他肩负的使命。最后，将军热烈赞扬国民党领导人，他“抗击共产主义统治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激起我由衷的敬佩。他的决心与美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是奴隶。”

这篇声明引起华盛顿和盟国首都的不安，其直接原因是蒋介石8月1日发表的公报。蒋在公报中说，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已经奠定了共同保卫福摩萨和“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国民党领导人露骨地说，“中美”的“美”是特指麦

克阿瑟将军的。公报的一半篇幅是颂扬麦克阿瑟的，"因为他坚定地领导着亚洲反共的共同斗争，并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有深刻的了解。现在我们（蒋和他的政府）能再次和老战友紧密携手，一起工作，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国务卿艾奇逊立即电告国务院派驻麦克阿瑟参谋部的官员威廉·西博尔德，要他"就他们在制定总政策的主要关系方面"，向华盛顿详细报告将军在福摩萨的讲话内容。西博尔德回电说，他这次不曾随同麦克阿瑟前往，但将军在离开前曾告诉他，他和蒋的会谈将严格地是"非政治性的"。回来后，麦克阿瑟还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非常谨慎地把会谈局限于"技术性的军事问题"。西博尔德还说，麦克阿瑟曾特别关心地表示，国务院派驻福摩萨的代表，对蒋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这对他保护福摩萨的任务，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言下之意是一清二楚的：美国必须和蒋建立更为密切的外交关系，那是成功地以军事力量保卫该岛的先决条件。

结果总统派了他手下最信任的一名官员，艾夫里尔·哈里曼，去向将军作简要的指示。哈里曼指出蒋和美国之间的基本利益冲突，蒋的野心是重新征服大陆，但只有在美国全面介入对共产党政权的战争时，他才能达到这一目的。麦克阿瑟回答道，他知道蒋的野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又说——可能是开个玩笑——"让他反攻大陆，从而除掉他，倒可能是个好主意。"哈里曼向总统汇报麦克阿瑟的建议时说，将军"看来没有考虑，我们支持蒋反攻大陆会使我们在东方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我提出在联合国内维护友好国家间团结的极端重要性，而在处理中国和福摩萨问题上，走错一步就会使情况复杂化。"麦克阿瑟虽然向哈里曼保证说，他"作为军人"自应支持总统对福摩萨的政策——然而哈里曼"还

是将信将疑。”麦克阿瑟亲蒋已经过份，他认为“我们应当支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人”；与此相反，他将“永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做会提高他们的威望。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消除这种威望。

哈里曼离开后，麦克阿瑟发表了另一个声明。他否认访问福摩萨时曾讨论过任何非军事性的问题。他说，他的福摩萨之行是商讨该岛的防卫问题，这是事先早就和美国及中国政府各部门共同安排好了的；他谈话的内容并未涉及中国政府的前途或者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也没有谈“超越我军事职责范围外的任何事情。……”并说，他这次访问的详细后果已报送华盛顿。

他的结束语是刺耳的，他说，他此行的目的已被“恶意歪曲，那些人过去一直鼓吹失败主义，在太平洋采取姑息政策。我希望美国人民不要因国内外用心险恶的无稽之谈而产生误解，有些人远在事故现场万里之外，但他们含沙射影、信口开河，又始终不肯说出姓名。在当今世界的巨大风暴中，即使他们主观上并不打算，事实上也是在制造分裂，使我们对美国的宗旨、体制和代表丧失信仰和信心。”毋庸置疑，麦克阿瑟尖锐的话锋是针对华盛顿他的上级的。

这些话使总统安不下心。杜鲁门被迫同意哈里曼的结论：麦克阿瑟不完全理解“处于我们的地位，和福摩萨的大元帅一起在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在世界上或东方都存在着困难。”因此，8月14日，麦克阿瑟从国防部得到了进一步的指示。国防部长通知他，他不能授权让国民党反攻大陆，“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我们不能采取引起全面战争的任何行动，也不能给别人以发动世界大战的借口。”麦克阿瑟回电说，他完全懂得总统6月27日关于“保护共产党大陆”的决

定。

当人们对这次访问的记忆开始淡薄时，美国关于由联合国调查福摩萨问题的提议又缓解了盟国的忧虑，并消除了中立国的猜疑，但是麦克阿瑟向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发了个很长的贺电，打算在8月28日他们每年举行的野营中宣读。麦克阿瑟声称，他的贺电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当前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福摩萨在我们太平洋上潜在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麦克阿瑟认为，福摩萨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围绕着亚洲大陆的岛屿环中的一个支点。有了这条环形防线，美国就可以依靠空军力量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港口，还能防止任何敌对行动进入太平洋。来自亚洲大陆的任何攻击必然是两栖进攻战，但是没有一支力量能战胜美国立足于岛屿环形防线上的海空军优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太平洋不再是“今后入侵者具有威胁性的通道——相反，它将是个气氛友好的和平湖。”这是条天然的防线，只要用最低限度的兵力和费用就能加以维持。

麦克阿瑟接着说，要是福摩萨落在敌人的手里，它就会变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将使“美国前沿阵地的中部及南翼在战略上失去作用，或者是相形见绌，”因为它将在我们环形防线的正中心构成个突击部。在结束这次战略课时，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我们守住这条防线，我们就可能赢得和平——失去这条防线，战争就非打不可。”

然后，他把话题从战略转向政治，麦克阿瑟驳斥那种美国保卫该岛就会失去亚洲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说法。这类“陈腐乏味的论点”，只可能来自那些鼓吹姑息和失败主义的人们。他说，“讲这种话的人”，并不了解东方，他们不承认东方人的心理结构：

他们尊敬并服从进取、坚定、生气勃勃的领导，希望这样的领导迅速取代软弱无能、举棋不定的领导——他们低估了东方的精神力量。在过去五年中，美国保卫太平洋战略地位免受未来侵犯的决心，给了远东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采取任何别的方针，势必把太平洋的胜利果实让给潜在的敌人。这将使今后的战场东移五千哩，移到美洲大陆——我们祖国的海岸。

按照"惯常的礼节"，这个电文发到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却没有送交国务院或国防部。当杜鲁门总统获悉有这么个电文时，他命令予以收回，但这时它早已出现在报摊上了。

麦克阿瑟电文的政治涵义使华盛顿大吃一惊。麦克阿瑟首先强烈地暗示，美国应当尽量扩大对蒋的承诺。麦克阿瑟后来作证说，国民党领导人对一般亚洲人来说，是坚决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代表。因此，美国必须给他有力的支持，而不能拆他的台；麦克阿瑟告诉哈里曼，"……我们轻率地扔掉蒋介石，却一直没有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麦克阿瑟）希望总统能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国务院和大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

麦克阿瑟再次强调，他认为蒋是抗击共产主义的有潜力的领导人，如果政府不能同意他的评价，那么，仅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保卫蒋的这个岛屿堡垒。这两个理由自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麦克阿瑟看来，成功地守卫该岛的先决条件，是华盛顿和台北的进一步协作。正如麦克阿瑟早就私下对国务院说过，也曾在哈里曼访问时告诉过他，国务院某些代表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很可能会妨碍密切的军事合作，这是他完成使命的关键

问题。总之，美国的安全要求对蒋更诚恳、更信任。

麦克阿瑟还隐晦地提出，政府应毫无保留地把共产党中国认作敌人，政府为此而感到很被动。他在电文中屡次提到“对美国不友好的大国”和“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军事大国”；只有一个国家够得上这些称号。麦克阿瑟原先告诉过哈里曼，他决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即使不得已行使否决权，也不让他进入联合国。承认中国将提高毛泽东的威望；破坏这种威望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这种见解是不会得到政府及其盟国的欢迎和接受的，因为他们相信，毛的政权是西方潜在的友人，是苏联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如果采纳麦克阿瑟的意见，中苏关系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

最后，麦克阿瑟一笔勾销了政府长期的努力。美国本来想使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中国，相信美国对于福摩萨，用总统的话来说，既无自私之心，也无好战之意，对福摩萨的守卫，将随朝鲜现状的恢复而结束。而麦克阿瑟表示，美国必须长期控制福摩萨，还可能利用该岛作为美国军事基地。这就使人相信，共产党指责美国阴谋侵占该岛是有道理的，于是，又一次引起了盟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事有凑巧，在共产党中国参战后的日子里，有一种现象第一次以相当温和的形式使政府日夜感到不安，那就是：美国的任何政策，凡在政治上得到国内支持的，就不能为我们的盟国所接受。

杜鲁门先生后来透露，自从将军的电文引起他的注意后，他曾认真考虑解除麦克阿瑟远东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但是经过仔细斟酌，决定打消这个主意。“这样做难免有降职之嫌，就我个人来说，并不想伤麦克阿瑟将军的感情。”总统或许也不愿在参战后不久就执行国内反对的外交政策。于是，杜鲁门先生就把奥斯汀大使致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

函件的付本送交麦克阿瑟，其中阐述了美国政府在福摩萨问题上的立场。

麦克阿瑟当然声称他熟知这一政策，他说，在他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电文中所陈述的战略观点，也只是为了表达他充分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让福摩萨落入敌人的手中！但是杜鲁门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他的看法是，麦克阿瑟电文的语调与时间上的选择，同政府保持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努力是不相称的。总统不妨重读几段詹姆斯·赖斯顿在麦克阿瑟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不久所写的文章：

> 七十高龄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现正担负他光辉事业中最伤脑筋的政治任务。……人们要求他不仅是个伟大的军人，而且必须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仅要指挥战争，而且要在工作中使五角大楼、国务院和联合国都感到满意。

艾森豪威尔将军具有搞国际协作的天才。……麦克阿瑟跟他不一样，是高踞于自己权力宝座上的一言堂，顽固地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任这一新职务所需要的政治素养是外交手腕和广泛地关注别人的意见与反应，而麦克阿瑟将军过去被指责的缺陷正巧就是这些。

显然，麦克阿瑟依然故我。

麦克阿瑟还从他和政府在福摩萨与蒋介石问题上的分歧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那些鼓吹“失败主义和在太平洋奉行姑息政策”的人们，基本上都在白宫、国务院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他们主要的罪行之一，是竭力破坏将军的目的：把福摩萨留在友人手中；朝鲜敌对行动结束后，继续保护国民党领导人。麦克阿瑟长期以来认为，“掌握美国军事命运的

人，对太平洋的情况了解甚少，对朝鲜更是一无所知。”对福摩萨问题上的争议使他的信念更趋坚定；而仁川登陆前的争论，不仅使他确信自己观点正确，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他和政府之间的隔阂。

6月末，麦克阿瑟初次去朝鲜前线访问的时候，就有了登陆仁川的设想。仁川是一个邻近南朝鲜首都的西海岸港口，在北朝鲜军队前线的后方一百五十哩。隔不多久，在7月7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他计划在北朝鲜军队背部的纵深处进行两栖攻击，以便击败他们。当然，不能保证这样的冒险行动会取得良好的战果。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种方式的攻击较之正面进攻有利，因为后者即使获胜，也会遭到严重的伤亡。过了十六天，他把以两个师进行登陆的计划电告华盛顿。麦克阿瑟选择仁川作为登陆地点的意图是十分明白的：它将使共产党腹背受敌，它将中断南线共产党军队的军需供应，它将切断贯穿这个国家南北两半部的最完善的交通线；它将占领朝鲜第二个最大的港口；最后，它将占领南朝鲜的首都，给共产党人在心理上和政治上以沉重的打击。

从这次进攻的日期选择上，可以有趣地看出麦克阿瑟的个性，特别是他主导方面的特征：自信。适宜于仁川登陆的潮汐只限于这么四天——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或11月3日。麦克阿瑟选择了第一个日子，因为早日登陆能解除釜山滩头阵地上的压力，那里的美国军队人数少，已经疲惫不堪。登陆后，他们可以免打一场冬季战役；拖延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会给敌人以更多的时间来加强他们的防御，或许使登陆成为不可能；只有早日解放大韩民国才能让南朝鲜人收割晚稻而归自己。但是麦克阿瑟作出这一选择的

决定因素是他自己参谋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意见。这看来似乎有些荒谬，正是他们的反对，使麦克阿瑟深信仁川登陆必定会取得成功。

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反对“首长”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调动的两个师不足以保证登陆成功；从釜山抽调增援部队有丢失滩头阵地的危险；调动驻日占领军是不明智的，或许是危险的；统帅部缺少运输船只；仁川登陆的条件很差，在那里搞两栖攻击，风险很大。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柯林斯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海军上将于8月23日在东京开会时提出了他们的方案。海军方面首先发言。他对登陆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满意。仁川的平均水位是二十点七英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水位之一；9月15日要高达三十英尺。在高潮过后的两小时内，进攻的舰只将会搁浅在仁川港的泥洼中，成为共产党海岸炮火的靶子。因此，只有短暂的时间可以用来压制月尾岛的火力，该岛扼港口出入通道，工事坚固。即使这一任务能胜利完成，午后的高潮只允许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巩固滩头阵地，还要为部队运送足够的给养，以便让他们守住阵地，击退夜间的反攻。最后，登陆战将打进市区，市内的建筑物将为守军提供最大的掩护，增强他们的抗御力量。谢尔曼海军上将总结了他反对的意见，一言以蔽之：“如果把地理上和海军作战上可能遇到的不利条件开列清单的话——仁川港全部具备。”

柯林斯将军继起发言。他说，仁川离前线太远。即使登陆成功也不会立即影响北朝鲜的军队，因为攻克汉城并不能保证和在南方的沃克将军的部队会师。况且，麦克阿瑟的战略需要从釜山滩头阵地抽调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这将使已经很困难的局势更加危险。此外，这支入侵部队颇有可能在

汉城附近遭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以致败下阵来。因此柯林斯提议另作选择，在群山登陆。这个西海岸的港口几乎没有仁川的那些不利条件，而且还有个优点是离滩头阵地比较近。

麦克阿瑟在回答中，注意了参谋长的反对意见。但是，他告诉他们，“正是你们这些认为行不通的见解，使我这个出其不意的因素得以致胜。因为敌军指挥官会推理，没有人会如此鲁莽地做这样的尝试。”他回忆在1759年时，蒙塔卡尔姆侯爵曾以为他能够守住魁北克这个有城墙的城市，把他的军队集中在城北的河岸上，因为侯爵认为，没有任何敌人会攻南边的河岸。但是，沃尔夫将军和他的一支小部队攀登了这条高岸并占领了城市；他也曾遭到参谋部的反对，但他坚持了他的主张。历史记载了这次由于坚持己见而取得的光辉战果。

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仁川将是另一个“难以置信的胜利”。他相信海军能克服潮汐和地形上的困难。他承认在群山登陆比较安全；但这既不能消灭敌人的战斗部队，也不能包围他们。群山登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次侧翼进攻，从最不利处考虑，它将是很少有成功把握的流血战争。与其让他的军队损失在代价这么昂贵的冒险行动中，他宁可把他们直接交给沃克来一次正面进攻。然而这种打法会使北朝鲜人可以沿着补给线撤退。他，麦克阿瑟，不愿对这样的策略承担责任。

但是，麦克阿瑟并没有把他的分析局限于纯粹的军事观点。他以生动的政治论点结束他的发言，充分反映了他对美国已经加入的全球斗争的看法。他告诉参谋长说，反共前线不在柏林、巴黎、伦敦或华盛顿，而在南朝鲜的洛东江。“非常明显，共产党的阴谋家已经选定亚洲这个地区作为他

们征服全球的舞台。"欧洲的反共战争仍然停留在言词交锋上；亚洲却已经开枪放炮了。他警告，假如朝鲜战争失利，欧洲的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西方的威信要求我们在朝鲜的抵抗不能慢慢吞吞、消极被动。千百万亚洲人民注视着这场战争的结局。"我几乎听到了命运的秒针的滴答声，"他下了结论，"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不然，我们就死路一条。"仁川登陆不会失败，它将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七个半月后，麦克阿瑟公开重复了这段预言，将军显然喜欢他这段吸引人的、精采的讲话。

一星期内，麦克阿瑟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照办"的通知，虽然他们的批准是勉强的；确实，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克服自己的疑虑，在最后的时刻，他们还再次探询麦克阿瑟的"魁北克"计划是否可行。显然，将军对此也有几分担忧。莱特湾战役之后，惠特尼将军每次都和长官参加两栖作战，据他说，麦克阿瑟以前从来没有在最后一分钟作过这么多的考虑。这次冒险行动的唯一因素就是出其不意。保密工作是否做好？敌人是否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自然界所造成的障碍是否克服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他自己参谋部的分析会不会是正确的？采取更谨慎的途径，是否更为明智些？"不，对于这次冒险，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这是一场大赌博。"末了，麦克阿瑟当然确认他的计划是周全的，也确实别无选择——除非搞伤亡得多的正面进攻，而那正是麦克阿瑟认为不足取的。

不出麦克阿瑟所料，他大胆设想和熟练指挥的登陆战使敌人惊慌失措。海军陆战队在9月15日拂晓前登陆仁川，上午八时许，已经占领了滩头阵地。这次登陆迅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攻占朝鲜第二个最大的港口；使北朝鲜人腹背受

敌；切断了他们在釜山周围的军队的给养；由于9月22日汉城的解放，在政治上给了北朝鲜政权近乎致命的打击。

第二天，联合国军冲破了釜山的环形防线，开始向北挺进。在九十六小时内，这两路大军成功地完成了钳形攻势，使过半数的北朝鲜军队陷入困境。其余一些被击溃的共产党军队逃跑了。9月30日，联合国军进抵三八线，南朝鲜搞艰苦的后卫战斗将近三个月，终于在十五天内摆脱了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统治，获得了自由。这样辉煌的战役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麦克阿瑟曾打赌"迎着灾祸去争取空前的胜利"，而这场赌博赢得很漂亮。

但是仁川之战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改变了在朝鲜的力量对比，也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上的胜利；它是一次有胆略的军事行动，它将严重影响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关系，因为它纯粹是麦克阿瑟个人的胜利。仁川之战证实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顾一切反对意见，他介入、策划、并取得了胜利。他设想，仁川港不会有重兵设防或布雷；潮汐和地形所造成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北朝鲜驻扎在港口附近的警备部队不会很强；敌军的士气会迅速低落；从日本调出占领军之后，那里照样会平安无事。由于他的设想正确，就扭转了接近失败的局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正是这个胜利为今后伏下了祸根。假如今后再遇到同样困难的情况，他，这位打了胜仗的将军，还会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不同意见吗？他会不会还是相信他自己的判断？仁川之战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最清楚的回答。

胜利使麦克阿瑟坚信，当军事形势显得十分不利的时候，采取大胆果断的行动是明智的。而"拼命一搏"比单纯的防守强——或者用老话来讲，就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登陆仁川曾被认为如同“偷袭魁北克”那样的“不可能”，假如他不愿采取冒险行动，那么仁川至今也不能登陆。拟订周全的计划容易，具体作战就难；后者要求自信与果断泼辣，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他们的文职上级——显然欠缺这些素质。胜利不是靠坐在“几千里外的办公室里的胆小鬼”赢得的。往后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事例说明了这一论点。

麦克阿瑟将军总部认为，精神实质上的这种差别，演变成“志在必胜”为一方，“左右摇摆”和“姑息”为另一方，两者的界线分明，反映在截然不同的战略和战术概念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大愿意调军队，特别是陆军，冒险参加仁川登陆；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事实上，连麦克阿瑟本人在紧急关头也有几分忧虑；他甚至描绘这一仗是“拼命一搏”。但是这位胜利的战区司令官强调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态度反映了他们的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的观点。布雷德利认为两栖作战已经过时，麦克阿瑟毁掉了这种说法。可以肯定，麦克阿瑟看来是非常高兴的。显而易见，布雷德利曾在1949年向参议院某个委员会讲过这样的话，虽然麦克阿瑟没能说明其来龙去脉。不管怎么说，这位远东总司令明显地感到，他在仁川的胜利增强了布雷德利将军对他的敌意。据麦克阿瑟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拒绝接受布雷德利来领导他执行进攻日本的计划，因为布雷德利在击退德国最后一次反攻的战役中，指挥不当，给他留下了不良的印象。当然，这里重要的并不在于布雷德利是否果真怀有这种旧根，重要的只是麦克阿瑟认为，或者说过，布雷德利是记仇的。

麦克阿瑟和他的东京参谋部把华盛顿不予全力支持的原因，不仅归诸于政府缺少“魄力”和墨守过分谨慎的兵法，

而且还由于远东司令部认为：美国全球战略并没有认识到亚洲在美国的安全规划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仁川登陆之所以冒险，其原因之一是可以调动的兵力有限——只有两个师。麦克阿瑟后来说，他曾于7月7日吁请华盛顿提供增援部队，但遭到了拒绝。上级向他讲了好些理由，其中一条是，美国还必须在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强大的防卫力量。麦克阿瑟认为这又是错误的、老一套的“优先”原则在作怪，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远东在美国利益清单中，即使不是安排在最后一个，也得是靠近末位的一个。亚洲将再次为欧洲作出牺牲，虽然，“很明显……在世界的另一边，苏联在东欧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正是在亚洲这个地方，共产党人已经集中力量，打算征服全世界。

回想起来，说仁川是麦克阿瑟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说到底，麦克阿瑟的自信心从未动摇过，而且长期以来，他对亚洲在美国安全规划中重要性的评价，一直比他的上级要高——但也很难否认，仁川在扩大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分歧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在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起进攻和共产党中国全面参战之前，外界并不清楚这一分歧的程度。登陆之后，总统和将军都在欢庆胜利，他们一致同意跨过三八线追击敌军，并在威克岛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这短暂的的间歇，不存在什么危机；至少从表面看来，他们的关系是融洽而亲切的。北朝鲜眼看就要战败；决定跨过三八线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来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然而，这一过线却成了和共产党中国打“热战”、同时和声势显赫的将军打“冷战”的序曲，而这位将军却有四重身份：热衷于东方的事业家，“共和党的”战士，历史学家，胜利的征服者。

第五章　跨过三八线：只能进不能退

随着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的兵力的消失，共产党中国的外交和宣传活动变得愈益活跃，并含有敌意。联合国军总司令认为，北朝鲜取胜的可能性自7月20日起已不复存在。此后不久，东京麦克阿瑟参谋部在7月下旬第一次对北朝鲜遭受的损失作了全面的"估计"，指出，"总数约为三百辆的坦克，已有二百七十辆被击毁或击伤，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总部发言人说，没有迹象表明，坦克的大量损耗获得了补充。他指出，在通往仁川的道路上，共产党开过的坦克过去往往有二十五或三十辆为一纵队，现在只能看到四、五辆坦克的小分队了。有时候，共产党的步兵"作战并没有坦克掩护。""这里第一次发现'有些俘虏'只受过四天的训练，而先前某些兵种的受训期远远超过一年。"有关在分界线两侧"大量征兵"的报道证实，对北朝鲜伤亡人数的估计"可能是保守的"。共产党的空军据说已"损耗殆尽"。在作出这一估计后不到两个星期，釜山滩头阵地的防守已转危为安。

正在这个时刻，中国共产党向美国发动了外交攻势。8月20日，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

伊和安全理事会主席俄国人雅各布·马立克，指控美国发动侵朝战争，阻碍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8月 24 日，周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抗议书，反对“直接武装侵略”中国领土。他要求安全理事会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土的“罪恶行径”,并责令它把第七舰队撤离福摩萨。过了四天，人民政府指控美国飞机在最近几天里扫射了鸭绿江以北的满洲的机场和铁路。据说有三架 B—29 飞行堡垒，五架 F—51野马式战斗机，一架蚊式轰炸机（英国的），加上四架型号未辨明的美国飞机参与了这几次袭击。第二天，8月 29 日，共产党中国再次指控美国蓄意扩大它的“武装侵略”。北京再度建议安全理事会谴责美国的暴行，并责令立即撤出在朝鲜的美国“侵略军”。

在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些指控作了调查之后，美国于10月 2 日承认，8 月27日，两架野马式战斗机由于天气反常和能见度差，曾飞越中国领土，但是它否认了北京指控的其他一些侵犯行为。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在提出指控的时间选择上。从 6 月份到 8 月底，共产党的宣传竭力把美国描绘成亚洲各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混淆北朝鲜的侵略问题，他策略地提出两个别的问题：联合国内共产党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和福摩萨的中立化问题。但是在 8 月 24 日以后，共产党中国和俄国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福摩萨地区转移到了鸭绿江边境。

这一政治攻势开始于仁川登陆之日，一直连续到联合国同意跨过三八线时为止，历时三星期。在此期间，北京的警告中露出焦急不安的调子。9 月底，当联合国军打回到汉城郊区时，北京突然宣布，“在满洲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朝鲜人”已经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去保卫他们的祖国”，北京又

说，“我们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永远站在朝鲜人民的一边。”9月25日，新华社电讯报道，一架美国飞机在鸭绿江边境的对岸安东市投下了十二枚炸弹。同日，中国共产党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通知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中国不能容认美国向鸭绿江进军。9月30日，在联合国军队到达三八线后，中国又公开重复了这一警告。在庆祝中国新政府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主要由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言，他赞扬“北朝鲜的勇敢和决心，”表示相信北朝鲜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他宣称，中国一定要“解放”福摩萨，并谴责美国“疯狂而残暴的帝国主义侵略。”他指控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最后他说，中国决不会“容忍它的邻国遭受帝国主义大国的蹂躏。”10月1日，周又作了一次讲话。这次他强调说，如果北朝鲜遭到侵犯，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虽然中国人民需要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他们决不害怕抗击侵略。如果帝国主义蛮不讲理地侵犯他们邻国的领土，他们决不会容忍外国的侵略而袖手旁观。”过了八天，即在联合国授意跨过三八线，呼吁建立统一、民主和独立的朝鲜之后两天，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提出了这一警告。北京宣称，这一决议是非法的，并指责它的通过是“违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的。”北京最后警告说，“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就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我们对此不能袖手旁观。……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他们决不害怕抗击侵略战争。”

对于这种外交攻势的一种解释是，北京在警告美国，不要跨过三八线。人民政府担心美国正在步传统的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后尘。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唯恐美国和过去的日本一

样，把朝鲜作为侵占满洲和华北的跳板。他们不相信美国会“满足”于在朝鲜的胜利；相反，它的胃口一经刺激，美国政府将会利用军事上的胜利作为入侵红色中国本土的序幕。一位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后来解释说，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政府采取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其目的是实现它统治亚洲和全球的疯狂野心。日本侵略计划的主要制订者之一，田中义一曾说过，谁要征服全世界，就得首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就得首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得首先征服朝鲜和台湾。……美帝国主义……抄袭田中义一的旧谱，正在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老路！”

这种想法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包括许多侵略活动，其矛头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在朝鲜，美国为首的军队在向满洲边境挺进；在福摩萨，美国保护蒋介石，训练并装备他的军队，主观上想在日后打回大陆；在印度支那，美国正以军事装备援助法国；而在亚洲近海岸，日本重新武装和美日结盟的时刻已经临近。约翰·迪尔曾提出过一种假想的情况：俄国军队正向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挺进，美国政府是不会把它的安全仅仅寄托在苏联的诺言上的，尽管苏联答应把红军停留在边境以内。不过民主党政府必然会“大叫大嚷地奔赴格兰德河，而我们却站在那里嗤之以鼻。”或者，把中国共产党的警告及其后来的干预用更熟悉的比喻来解释朝鲜是直刺日本心脏的匕首，而匕首也可以掉过头来刺向对方。如此看来，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在朝鲜的干预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不让敌人抓住匕首的手柄。

但是华盛顿没有认真地考虑北京的警告。是否跨过三八线确实有点象学术性的问题。联合国海军曾航行过三八线，空军则屡次飞越三八线。正如奥斯汀大使在向联合国陈述美

国政府的立场时所强调的，分界线不论在逻辑上和法律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今天，联合国军已经胜利在望，安全理事会授权采取的行动进行得既有魄力又有谋略。支付的代价是高的。焦急、悲哀和伤亡所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充分的报偿。必须建立一个高大的纪念碑，纪念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第一次在政治、社会和精神上取得了成就。

我们当然应该排除新的侵略行动的可能性。要始终不渝地贯彻联合国的目标，采取适当的步骤以摧毁北朝鲜侵略者今后发动进攻的能力，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允许侵略军在虚构的分界线后面获得庇护，因为那将再次造成对朝鲜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三八线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成了联合国最为关切的事项。现在联合国必须决定，这个人为的障碍是否要排除，这个国家是否要统一。

划分南北朝鲜的人为的障碍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没有存在的基础。不论是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或者是大韩民国都不承认这条分界线。现在，北朝鲜人武装进攻大韩民国的行动，否认了任何这类分界线的存在。由于日本投降而造成朝鲜暂时的分裂，这种局面变化多端，谁也不会承认它。在这关键的时刻，在这严肃的事件上，我们最好不要划这么一条界线。相反，我们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制订出标准和方法、原则和政策，使全体朝鲜人民今后能过和平的生活，与邻国也能和平相处。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建议（1）“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2）在联合国主

持下，“开展一切制宪活动，包括进行选举，以便在朝鲜这个主权国家里，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政府”；（3）“在恢复和平，进行选举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应该邀请南、北朝鲜的一切党派和人民团体与联合国机构合作”；（4）“在达到上述（1）（2）两项目的后，联合国军队将全部撤出朝鲜。”

第二天，联合国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务卿艾奇逊曾经声明，联合国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其目的只是恢复大韩民国在北方入侵前的原状。”他从未表示过，军事形势的变化将促使我们修改这一目的。他确曾指出，援助大韩民国的联合国会员国愿意接受三八线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以结束敌对行动。那么联军中最强大的成员国美国，在麦克阿瑟的军队进抵该国南北两半部的分界线时，怎么会改变它的主张呢？

一种看法是，“军事形势的突变超过了政治决定的范围。仁川登陆后，应该立即决定是否跨过三八线以武力统一朝鲜；为了不丧失军事上的主动权和不给北朝鲜人得以重新集结的喘息机会，就没有时间来全面考虑这一问题。如果联合国在稍作等待后跨过三八线，那么，人员伤亡的代价就会相应增加。”决定是受战术需要所支配的。暂停前进意味着把主动权交与共产党人，而使敌人在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后向以美国为主的军队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攻势。随着仁川登陆的成功，这样的暂停是没人理会的。胜利的情绪要求采取更积极更大胆的行动方针：摧毁北朝鲜军队的老窝。必须永远消除第二个6月25日的机会。

这个跨过三八线的战术上的理由，得到了国务卿艾奇逊强有力的支持。他始终认为，“假如对面有人经常过来打

你，”那么，1950年6月27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击退武装侵犯并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跨过三八线的目的不是要以军事力量统一朝鲜，只不过是为了“围歼”北朝鲜军队的残部。假如中国人不干预的话，通过旨在选择全朝鲜政府的选举，朝鲜本来就可以统一了。“联合国在朝鲜的一贯政治目标，”艾奇逊强调指出，从来也不是军事上的：“军队不是为此而在6月份进入朝鲜的。”马歇尔将军支持这一论点：“……联合国军的任务从来也不是以军事行动统一全朝鲜。”由此可见，跨越三八线只是为了消灭共产党军队而采取的战术行动；假如麦克阿瑟在没有中国人干预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作为这次战争的政治副产品，朝鲜也许早就统一了！

参议员凯恩：……请问，要是我们的联合国军不是想打垮侵略者，并以武力统一朝鲜的话，那么，去年11月，他们在鸭绿江边上干什么？

国务卿艾奇逊：……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将军呼吁北朝鲜人交出武器，停止作战；他们不干，退入北方。因此，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使命就是追击他们，围而歼之。……而且正如我多次说过的，这样做，整个朝鲜会获得统一，我们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中国人插手了。

参议员凯恩：国务卿先生，如果中国人不参加战争，我们是否有把握设想，我们正打算以武力来统一朝鲜呢？

国务卿艾奇逊：我们的希望是，围歼或者迫降发动这次侵略的军队，其结果将会导致10月7日联合国决议的实现，这就是在北方进行选举，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设法把全国统一起来。

参议员凯恩：先生，假如红色中国没有卷入战争，而我们的联合国军已围歼了所有在朝鲜参与侵略的人们，那我们或许已经以武力统一了朝鲜；对吗？

国务卿艾奇逊：嗯，武力本来是用于围歼那些侵略者的……而统一……将通过选举之类的程序，才能实现

在围困并击败那些进攻南朝鲜的人们时，武力本来是可以起作用的。

但是，如果不首先使用军事力量把这个国家的北半部从共产党统治下解放出来，那里能进行自由选举吗？1950年10月7日同意跨过三八线的决议中有一系列建议，不是承认军事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吗？建议之一是“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建议之二是开展在联合国主持下一切制宪活动，包括进行选举，以便在朝鲜这个主权国家里，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政府”；次序不是很清楚吗？国务卿从来也没有回答过这些问题，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

况且，如果跨过分界线只是战术行动，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在10月7日前让他军队的主力暂停前进呢？这一行动为什么还要得到联合国的同意呢？其他的战术决策都没有提交给国际组织审批过。如果跨过三八线确实只是为了保证南朝鲜的安全，免得它在将来再次受到袭击，那么，政府必然会根据同样的逻辑，赞成麦克阿瑟的“战术”决策，在共产党中国干预后，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对岸；因为靠近三八线的地方一旦驻上北京部队，那对南朝鲜的威力，要比战败后重建的北朝鲜军队，不知大多少倍。

事实上，进军北朝鲜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建立军事上统一的朝鲜。把9月底和10月所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看，这样的决定是不足为怪的。原来麦克阿瑟在仁川取得军事胜利后，紧接着就提出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遭到拒绝后的必然结果是向北进军。这在以前是很难取得艾奇逊的同意的。1950年6月13日，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两星期，他自己曾说过，“无法进行谈判的一个分歧点是，有些人就是要把你消灭掉。”总之，要求北朝鲜无条件投降将使敌对行动持续下去。用温斯顿·邱吉尔先生的话来说，这种要求只是在理论上假定金日成是在北朝鲜的全权代表，在他的监督下，清洗俄罗斯帝国独裁者在朝鲜的异己分子。

跨过三八线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经常提到的主要理由：麦克阿瑟将军曾在威克岛向杜鲁门总统保证，北京干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于是美国政府就相信，往北进军是安全的，也不会遇到中共的军队。总统曾因之指责麦克阿瑟把错误的情报告诉了他。杜鲁门先生肯定地说，假如他的战区司令官能正确估计北京的意图，他是不会下令向北进军的。对这一指责作出评价需要回答两个问题：要确切地知道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总统说了些什么；他的话对总统有什么影响？

关于第一个问题，麦克阿瑟将军并不否认他曾告诉杜鲁门先生，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入朝鲜。麦克阿瑟说，他的看法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的优势，“假如中国人想进军平壤，势必遭受最大的伤亡。”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左右。第二，即使是苏联的干预，在时间上也已经来不及了。西伯利亚的俄国空军，虽然数量可观，但还不是我们的

对手；而远东红军的力量，除执行其日常任务外再要打仗是不够的。当然，可以派出增援的部队，但在冬季开始前是不能到达的。第三，上述理由排除了中国地面部队在俄国空军掩护下联合作战的可能性。他们都缺乏地面和空中部队紧密配合作战的必要的经验；即使是美国军队，海军陆战队除外，对于地面部队在战术空军支持下熟练地配合作战也仍然有困难。

对中国干预的可能性的估计，还出于两点更为基本的考虑，麦克阿瑟说，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时，他就根据这些考虑推测北京的反应。将军声称，他的基本设想是，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但后来将军受命令限制，不能放手搞迅速报复。麦克阿瑟说，他从来也没想到去问杜鲁门先生他对中国共产党侵略的反应是否将有异于对北朝鲜的侵略——“这就像问我们是否用弓和箭来对付敌人一样。假如有人在那时候向麦克阿瑟建议，我们就让红色中国用全力来打我们吧，我们只限于招架，不要回击，对于任何这类荒谬的主张，他是不会听信的。”北朝鲜发动进攻后，政府批准他去轰炸和封锁；假如中共干预的话，他希望也能获准去轰炸和封锁。

麦克阿瑟还声称，他确信中国不会干预是基于单纯的军事观点，而干预主要是个政治问题。他告诉总统，他的分析是根据他自己的军事情报；但是由于他的空中侦察局限于朝鲜，他曾指出他的估计难免有差错。麦克阿瑟同时指出，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都不曾向他提供任何“政治情报”，向他表明华盛顿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将要采取与他的预见相反的行动。

这些证据都对麦克阿瑟有利。例如，在威克岛会谈期间，

布雷德利将军问他的同僚，是否可以在明年1月份匀出一个师调往欧洲；显而易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预料战争不会拖延得太长。麦克阿瑟也同样乐观。他希望战争在感恩节前结束，除扫荡活动外，第八军将在圣诞节前回师日本。华盛顿和东京显然都认为战争已近尾声，共产党中国是不会干预的了。但是麦克阿瑟把他的预见看作仅仅是军事上的估计，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把情报截然地分为“政治的”和“军事的”两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何况，事实俱在，华盛顿把中国人可能干预的警告和信息都曾传递给麦克阿瑟。远东司令部和政府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满洲集结了三十万军队；情报实际上还是远东司令部提供的。他们都警觉到，北京的领导人有能力进行干预，但是他们是否打算插手？政府或麦克阿瑟都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政府后来承认，它的估计是错误的。麦克阿瑟从未作过相似的认错。

与此相反，他争辩说，他之所以未能完成军事统一朝鲜的任务，是由于间谍告密促使共产党中国进行干预的缘故。按军事上的逻辑来说，对任何这类冒险行动，敌军战略家必然知道会有迅速而拼命的反扑。

> 假如……中国人以武力参与朝鲜战争，我们就要轰炸他们的供应基地；这和以前轰炸北朝鲜一样，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为什么总统和他们军事顾问都没有看到呢？这是麦克阿瑟永远难以理解的。
>
> 但是，麦克阿瑟可以肯定，中国的将军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中国人才会最后作出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必然有人向他们泄了密。

在中国人介入朝鲜之前，必然有人告诉他们甚至连麦克阿瑟都不知道的事情。必然有人告诉他们：即使中国人大批蜂涌渡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即使他们如同日本人当年在珍珠港一样进行突然袭击，即使他们在战场上和在战俘营里屠杀联合国士兵（十个中有九个是美国人），美国政府仍将乖乖地保持满洲的现状，让它作为安全的大后方。……

只有获悉……美国不会袭击敌人的基地和供应线之后，共产党的指挥员才会决定把中国军队的全部力量投入朝鲜。

麦克阿瑟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泄密是英国的两个叛徒干的：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伯吉斯曾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一直到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才离开；而麦克莱恩在同一时期内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假如他们不向克里姆林宫的主子详尽地汇报我们在朝鲜反共战争的机密，那么他们背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应当假设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这种未经证实的猜测使麦克阿瑟的指责——他在威克岛的预言不能兑现是因为间谍叛卖——成了悬案，由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都躲在苏联，此案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

然而，这种指责却暴露了麦克阿瑟的两个问题，第一，很清楚，他从未想到中国共产党政府不会容忍美国军队出现在它的边境，这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北京不会容许美国掌握朝鲜这把匕首的手柄！正如华盛顿不愿共产党人去掌握它一样；第二，麦克阿瑟应当总是百分之一百十地正确。他不可能对敌人的意图作出错误的估计，他的这一估计几乎得到美国所有文官武将的一致同意（乔奇·凯南据说是个例外）；

应当肯定，他被内部的叛徒出卖了。麦克阿瑟声称自己完美无缺，这暴露了他那古怪的思想状态：仿佛这位军人政治家害怕他辉煌的功绩会由于犯了一个错误而全部勾销；仿佛只有在过去的纪录中保持白璧无暇，才能使他的事业值得骄傲。他必须是一贯正确的。麦克阿瑟对梅特尼奇清楚地说过，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失败——也从未在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失败。差错是由于别人的无能或者是不忠实所造成的。标志着他这种思想状态的是麦克阿瑟的一句老话："我能够留意前面的敌人——但没法防备身后的敌人"！再补充说上一句，或许也不会有什么过错，假如世上从来也不曾有过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或者他们不曾逃往莫斯科，麦克阿瑟是会另外造两个出来的；总得经常有个"身后的敌人嘛"。

然而，麦克阿瑟性格上不愿认错的缺点，并不意味着总统能把他跨越三八线的决定的责任推给麦克阿瑟，因为将军确认中国人干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杜鲁门先生为他的辩护人在提及麦克阿瑟的保证时，把将军发表声明的日期1950年10月15日给忘了。这是在第一批南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之后的十五天，也就是美国军队发动向北进攻之后的一个星期。总统在9月11日批准把军事行动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参谋长联席会议在9月15日下达命令给麦克阿瑟，这些都发生在威克岛会谈前一个月

十一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说，他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有权在三八线以北指挥作战。"由此可见，麦克阿瑟提出他的意见时，政府早已决定进军鸭绿江了，还认为不会惹出乱子呢。当然，9月15日的指示确曾告知麦克阿瑟，假如苏联或中国占领了北朝鲜，他就不要把军队派往三八线以北——

命令强调指出：假如中国共产党的大部队进入三八线以南，美国“最好避免与共产党中国打全面战争”。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政府认真考虑过中国的干预问题，也没有证据说明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曾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然会入侵朝鲜，因为他们颇有可能当真害怕“反动”将军和他的“帝国主义”军队驻在敏感而有战略意义的满洲边境上。显然，美国官员从未想到过，北京很可能会引用美国外交上一句得意的口号：“要行动，不要空谈”，从而要求有切实可行的保证，以防止美国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政府深信，它能够以武力统一全朝鲜，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行干预。理由是，据信，中国共产党政府与苏联的矛盾闹得很凶，北京不愿也不能在朝鲜进行干预。

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初就曾透露过，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利用共产党中国和苏维埃俄国间的利益冲突。政府相信，采取这一切政策，它可以减少国民党政府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还能因祸得福。美国政府希望这条妙计能卓有成效。它打算和蒋介石脱离关系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美国希望这将会阻止中国国内反美情绪的滋长，把中国人民及其政权的注意力、忿恨和敌意集中于目前还在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大国——苏联。这一政策背后的基本设想是，新中国政府是中国式的，不是共产化的，所以，它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和共产党那样听任苏联的摆布；最后，北京甚至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反对莫斯科。

等到美国和蒋介石断绝关系之后，这一政策就将立即付诸实施；当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成功地侵入福摩萨，这一时刻就会到来。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对福摩萨的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军事战略和国内政情的紧张状态迫使政府

保护该岛，于是就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把台湾和中国大陆隔开。但是总统随即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要永远保护蒋介石的地盘；他曾宣称，中立化的意图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把太平洋的敌对行动局限于朝鲜。看来，国务卿艾奇逊希望北京不会被政策的临时改变而惹得大为恼火："……总统宣布福摩萨中立化时说，第七舰队要防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而福摩萨也不许进攻大陆。这是个公平合理的主张……"

一旦北朝鲜的侵略被击退，第七舰队就将撤离台湾海峡。那时中国共产党就侵入该岛，把蒋击败，切断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之间最后的联系，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道路也就从此而打通了。福摩萨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中美关系进一步友好的唯一障碍就此排除，反美情绪再也煽动不起来了。相反，中国人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满洲和华北的俄国帝国主义；由于克里姆林宫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动机，中国的反苏情绪将表现为敌对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不认为越过三八线将激起强烈的反美情绪，而美国正企图减低这种情绪。已有的材料表明，美国政府认为，北京当局会把它友好的诺言当作可靠的保证。美国对于他们或者中国人民都没有侵略或不良的意图；它的目标只不过是击退侵略并帮助朝鲜人民建立自由统一的国家。鉴于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独立，他们有什么理由会不相信我们的话呢？怪不得国务卿艾奇逊后来有点激动地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当局居然会怀疑联合国军的意图。军事行动一开始，我们就反复讲明联合国军的唯一任务是击退侵略者并使朝鲜人民重新获得独立。"国务卿接着说，政府曾一再重

申，它希望把敌对行动局限于朝鲜境内；美国政府保证，我军在完成任务后，立即从那个半岛上撤出来。所以，中国共产党进入朝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由于美国表示好意的声明被估计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可靠保证，一般认为后者要进行干预的威胁只是吓唬吓唬罢了。印度驻北京大使转达给华盛顿的补充警告，在乐观主义最高潮的时候，只起了些微波。战役已快结束，战争已经打赢。当战争一度可能会出现美国的敦刻尔克*的时候，中国人克制着没有进行干预，他们决不会愚蠢到在目前阶段把军队投入战斗。据说华盛顿的一个官员曾以辛辣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看法：“我想中国人并不打算被剁成肉酱。”

回想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极少注意中国新领导人意识形态上的特点，北京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稍有了解的人，谁会当真相信艾奇逊先生的保证是可靠的？毛泽东更可能把国务卿的花言巧语当作骗人的诡计，用来松懈他的警惕，让他有虚假的安全感。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工厂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必然对以财产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抱有敌意。难道毛泽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美国的好话讲得再多，也不能动摇这个信念，因为在共产党人的词典里，美国“统治集团”和“华尔街”的友好是不存在的。毛或许没有忘记卡尔·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征服者往往是和平的爱好者。”他也可能记得列宁潦草的旁注：“嗨，嗨，说得好听。”不过，即使他相信国务卿艾奇逊的一片好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很可能也不愿把“好心”这个捉摸不定的商品来换取他战略边境上的一块不动产。但是，

---

* 法国北部海口，1940年英军由此撤退。——译注。

在艾奇逊看来，中苏政治地理上的矛盾是如此根深蒂固，凭借意识形态上的联系是不可能加以克服的，套马克思的框框来说，中苏条约的政治地理基础和它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因此，中苏之间的敌对是无可避免的结局；事实上，它早已过了胚胎期，成熟只有待于时间罢了。

一般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是说它本来该注意北京的讲话，但是上述评论并不是这个意思。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大使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周的威胁很可能是试图讹诈联合国否决跨过三八线的决议。其次，警告是件双刃武器。它可以用来阻止愚蠢的行动，也可以麻痹行动的愿望，由于迟疑不决而让敌人夺得胜利。关键并不在于华盛顿忽视中共的恐吓；说到底，甚至连印度政府也不完全相信周的讲话，印度并没有投票反对10月7日的决议。它仅仅是弃了权。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出的警告是含糊的。“我国政府，”他说，“担心跨过三八线的结果，可能会使北朝鲜继续抵抗下去，甚至会扩大冲突的地区。我们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但是每个政府都应该以最可靠的情报来判断形势，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国务卿艾奇逊对北京政策的因素作出了错误的分析。

仅在仁川登陆前五天，即9月10日，国务卿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重复指出，在华北上空，“一大片乌云自北而来，俄国正在进行渗透。”他还说：“我如今相信北平的人们有足够的明智感觉到他们的遭遇。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和全世界自由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从而加深自己的分裂和毁灭。这些自由国家向来是他们的朋友，而

且经常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苏联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但他们从中得不到一点好处，我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屈服于那种压力。”

诚然，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政权相信，西方大国确实是“他们传统的友人”。但是这些话也反映了美国政府的信念，以为中苏矛盾会耗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未来几个月中的全部精力。结果，红色中国的干预就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名参议员后来问道，“中国人向我们猛攻过来时，他们真把我们给骗了，对吗？”国务卿只好回答“是呀，先生。”

美国在9月底和10月初跨过朝鲜战争中只能进、不能退的这个临界点的时候，它是取得盟国的同意的。粗浅一看，这种说法仿佛是多余的，但仔细一思考，却并非如此。只要回忆一下，麦克阿瑟在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的北朝鲜军事行动计划的同一天，他的军队已到达三八线，这是9月30日；二十四小时后，南朝鲜部队开始向北进军；10月2日前，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还没有开始考虑它将提交给大会的今后的政策；联合国大会把它们审议一直拖延到10月6日。这一系列事件不是说明了美国把既成事实摆在盟友的面前吗？三八线既已越过，他们怎能否定他们的领导者和主要支持者的行动呢？

令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居然会支持这类指责。将军回想起在9月30日，他曾把打算在10月2日发给第八军的命令电告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这个电文中，麦克阿瑟解释说，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6月27日决议中关于协助保卫大韩民国的建议，军事行动的地区只受国际边界和作

战需要的限制。部长回电说："我们希望，在你今后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再作解释或声明。一切服从作战需要。我国政府希望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避免使三八线成为问题。"这个电文的含意，惠特尼将军回忆说，使麦克阿瑟"大吃一惊，……麦克阿瑟很欣赏总统本来的意图是给联合国中其他各国政府来个既成事实。"

总统在9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三八线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也证实了这种看法。记者要求杜鲁门先生对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作出解释，这个发言人曾说"我国的立场是支持跨过三八线追击共产党军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原来就有这条。"总统对此只说了声，"决议范围很广。"然而，杜鲁门先生后来又说，"麦克阿瑟将军是直接听命于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他是听从命令的。"当问及"这些命令是否意味权威时，杜鲁门先生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杜鲁门先生还被提醒说"他最近曾说过，跨过三八线是由联合国来决定的问题，现在他又说，司令官是听命于他的，这怎么能对得上号呢？总统回答道，联合国本来会首先采取行动的，可以肯定，它将通过他传达每一个新的指令。"《纽约时报》记者指出，"这个回答表示成功湖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似乎和国务院发言人阐述的立场相矛盾，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谜。"

实际上，这不是个谜。这一连串的事件不能仅仅从表面来认识，马歇尔的电文也不应当根据字面来理解。确实，联合国大会在10月6日前不曾就跨过三八线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应当注意在9月29日至10月6日这段时间里，大会在休会。况且，当时只有南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假如必要的话，切断他们的后勤供应和战术上的支持，就可以把

他们撤回来。当然，人们会问，总统为什么在回答有关今后意图的问题上如此含糊其辞。与此同时，奥斯汀大使却曾十分明确地阐述过政府的立场。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领导人也是联合国主要负责人的象征，在联合国大会尚未审议前，他就宣布跨过三八线的决定，那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也很不策略。至少，从形式上看来，美国及其盟国在朝鲜进行的战争是在联合国领导之下的。

有迹象表明，不是因为美国把单方面的决定强加给在朝鲜的盟军，而是西方大国在9月底就已有了默契。9月 29 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启程回国前在纽约说，“没有什么北朝鲜或南朝鲜。他们都是朝鲜人，不应当人为地永远把他们分开。”在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英国代表肯尼思·扬格发言热烈支持朝鲜的统一；正是他提出了这个授意向北进军的决议。这一决议还得到北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坚决支持，如加拿大、法国、挪威与荷兰。而赞成这一决议的并不限于这些国家。大会最后以四十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七票弃权通过了这一决议。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斯彭德先生的讲话是代表大多数的，他说：

> 如果允许保留北朝鲜的军队，让它准备再次进攻并威胁南朝鲜，这样的决议是没有意义的。安全理事会6月27日决议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北朝鲜的侵略军，必须作为战斗部队而加以消灭；按道理说，我们就得追过三八线。跨过三八线的唯一目的是结束目前的战争，促使朝鲜统一。

记录写得很清楚。亚洲和欧洲的评论家，后来把中国的干预归咎于美国要求取得全面的军事胜利和统一，认为美国太愚蠢，把批评和事后的看法集中在美国身上，这是没有根

据的。

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见解是没法否定的，他说，“外国政府对跨过三八线，有的很积极，有的好像不大同意，有的担心过线以后会出乱子，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共已经有了参战的迹象之后。”

跨过三八线给政府和麦克阿瑟带来了短时间的密切合作。但是他们在这次行动上的一致，并不能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他们各自的态度——不论对欧洲和亚洲在美国防御的全球布局中的相对重要性，或者是对待蒋介石和毛泽东——差距太大。只有出现奇迹才能使政府和麦克阿瑟的观点取得一致，才能解决他们之间渊源很深的分歧。

显然，哈里·杜鲁门仍然相信会出现奇迹；何况，他还可以表演奇迹！10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授意军事统一朝鲜后三天，总统宣布他决定亲自和麦克阿瑟将军会晤。他的目的是向将军阐述政府的外交政策，从而使他改变看法。哈里·杜鲁门不仅是个顽强汉，他还是个乐天派。

第六章 威克岛：

一 鹰 两 头

“麦克阿瑟将军和我在周末将快速旅行，去太平洋会晤。”总统就这样随便地宣布了他的威克岛之行，他将在那里和他的驻日总督举行戏剧性的会谈。这次会晤后来引起许多争论，东京和华盛顿相互质询对方的动机和诚意，杜鲁门先生只有这么几句话没有引起争论：他愿趁这次访问的机会，向麦克阿瑟将军表达全国对他“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的欣赏和感谢。他是我们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战功卓著，现在还在机智、勇敢、有效地执行任务。”不过，总统也说得十分明白，他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对他的战区司令官作礼节性的访问，他还希望和麦克阿瑟“一起讨论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结尾工作。”

第二天，10月11日，总统开始了他去太平洋中部的长途旅行。据报道，他为完成任务作了充分准备。正如一名记者所描述的，总统的这次旅行象是“配备齐全的外交家”，他随身带了第四枚橡叶勋章以表彰将军卓越的功绩，为麦克阿瑟夫人准备了一盒五磅装的蜜饯，还有对亚洲的“宽厚的政策”。看来，杜鲁门先生是全力以赴，打算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建立真诚的谅解。

会晤在亲切的气氛中开始。当杜鲁门的座机抵达时，麦克阿瑟大步跨向舷梯旁，他伸出手来迎接总统，神态充满着热情和友谊。

“总统先生，”麦克阿瑟先打招呼，紧紧地抓住杜鲁门先生的右臂，使劲地握手。

杜鲁门总统微笑着说：“将军，你好。我能在这里见到你感到十分高兴。将军，我已等待好久了。”

“总统先生，我希望下次会晤不会隔得那么久。”麦克阿瑟将军回答道。

旁观者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敬礼。

在愉快的相互问好后，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立即进行会谈。会谈的具体内容至今不详。据麦克阿瑟的亲信惠特尼将军说，他们半小时会谈的内容竟是讨论菲律宾群岛的财政经济政策！据杜鲁门先生说，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向总统致了歉意，假如他的向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演说已经使总统感到任何为难的话。他预言敌对行动即将结束，在1951年1月份把一个师从朝鲜调往西欧。杜鲁门先生则告诉远东战区司令官“我国加强欧洲防务的某些计划。”

随后，总统和麦克阿瑟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杜鲁门的一些顾问都参加了。他们是：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国防部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白宫参谋人员、总统特别助理艾夫里尔·哈里曼。他们花一个半小时考虑了一些不同的问题：朝鲜复兴、选举、战犯审讯、对日和约、太平洋防御公约以及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干预的可能性。就在这九十分钟的会谈中，麦克阿瑟将军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假如中国人想进兵平壤，那里将会有一场最大的屠杀。”

布雷德利将军事后透露，这次正式会谈的议事日程里还包括一些其他项目，但是为了保密，在公布的记录中已被删除。这种说法在听证会上很快就站不住脚了。“我已看过删节部份，”参议员希肯卢珀说，“它们对于这次会谈的重要意义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寥寥数行而已。”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是“技术性的磋商”。麦克阿瑟将军和陆军部长佩斯以及布雷德利将军讨论了他的几个军事问题。同时，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约翰·墨西奥和总统及国务院官员进行了分组讨论。

根据这一记录，惠特尼将军断言，凡是向麦克阿瑟提出的任何问题，华盛顿都已掌握了将军的全部观点。像这类事情本来只要通过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通讯联系，就可以获得满意的解决。用不着总统和他的顾问往返威克岛去核实麦克阿瑟对中国共产党干预、朝鲜复兴以及太平洋防卫条约的意见。就这样，惠特尼沾沾自喜地排除了总统长途旅行的任何可能的理由，于是他指责总统的这次旅行必然有其他的原因，特别是下述两个：第一，在中期选举前，把政府和麦克阿瑟的胜利联系起来；第二，假如共产党中国最后决定参战的话，就可以为政府寻求遁词。因此，威克岛之行是“狡诡的政治埋伏”。

惠特尼的第一条指责是荒谬的，简直是近乎天真。依他看来，假如杜鲁门先生不去访问朝鲜的胜利者并表示慰劳，民主党人对这次战争的胜利就完全不能沾边。惠特尼居然提出这样的指责，少说也有点自相矛盾，令人发笑。因为在他写的“老头子”的正式传记里明讲暗示，非常清楚地认为：假如杜鲁门总统能更好地听取东京的至理名言，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可靠的保障。而当总统果真去看望麦克

阿瑟时，却又把他的目的贬低为旧时服饰用品的低劣手法，把他描绘成小镇上的政客。显然，总统只能在遭遇灾难和严重危机的时刻才可以去访问这位卓越的将军并听取他的意见。从中期选举的结果来看——肯定地推翻惠特尼的见解，他认为麦克阿瑟有本事转让所谓政治威望——好象这么做在政治上对杜鲁门更为有利。

惠特尼将军的第二条指责是比较有道理的。杜鲁门先生反复强调，麦克阿瑟曾给他个人保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参战，但是，众所周知，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当然，在威克岛上，总统可以向麦克阿瑟征询中国人干预的可能性，这是很自然的事。总统后来公开麦克阿瑟的意见证明他的战区司令官的预见性也有差错，因为他终究是人，这或许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有些决策和事件的结果并不美妙，麦克阿瑟本人怎么说也不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况且，杜鲁门先生已充分利用了麦克阿瑟的“预言”，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专程去威克岛的具体目的是取得这个保证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假如中国人果真决定进入朝鲜的话。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杜鲁门先生飞往威克岛是为了和他的战区司令官建立更亲切协调的关系，从而消除北京进行干预的任何理由。毛泽东决定参战，不外乎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他不信任国务卿艾奇逊向他提出的保证——华盛顿不同意这么看——或者他担心总统和国防部长控制不了麦克阿瑟。毛知道麦克阿瑟对他显然没有好感，因而他可能会猜测麦克阿瑟将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惶惑不安。

麦克阿瑟曾于7月31日去福摩萨访问了蒋介石。美国司令官回到东京之后，蒋谈了未来的“中美军事合作”和反共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两个人为“中美军事合作”作

了什么样的安排？麦克阿瑟对蒋说了些什么，致使这位大元帅有勇气谈论“最后胜利”？可以肯定，麦克阿瑟曾向华盛顿保证，他谨慎地把讨论的问题局限于台湾的防务，但他并不隐瞒他是同情蒋介石的。

在给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信件中，他不仅暗示：中国国民党领导人是忠诚的盟友，而且指出美国应当给予援助，以免失去蒋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他私下还说，国务院对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敌意态度可能会妨碍他自己的任务。和蒋建立真诚的政治关系是保卫福摩萨的先决条件。然而，政府声称，这种紧密的政治联盟不仅会疏远美国的盟国，失去亚洲多数国家的同情，还将使美国不可能利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利益冲突。我们对北京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颇有可能会防止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破裂；而且这种态度确定还会加剧共产党中国的反美情绪，并可能刺激北京干预朝鲜。所以，麦克阿瑟不应当再发表那些会给我们的动机和意图带来猜疑的声明。

麦克阿瑟还必须避免采取任何挑衅性的行动。10月9日，麦克阿瑟的飞机袭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苏联空军基地，这类事件本应尽力加以避免。莫斯科和北京不可能会相信，这种攻击是由于军事上的错误。麦克阿瑟早在9月27日就接到指示，他在北朝鲜作战期间，即使北京不理会国务卿艾奇逊关于其外交政策总方针的分析，并进行干预，将军也不要在邻近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地区使用非南朝鲜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攻击满洲或西伯利亚的目标。政府不准备让美国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大战。打大仗会妨碍欧洲的防务，而且可能会导致苏联的介入。美国国内只剩下一个机动师，必须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事故。6月26日的指示规

定麦克阿瑟必须把海空军活动控制在三八线以南，他早先对这一命令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今后他对政府的命令，再不能随便解释了。

当初麦克阿瑟猜到华盛顿的意图，就自作主张命令空军把轰炸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他的理由是，假如让北朝鲜依然是"一个防空洞的话，那么，共产党军队就可以在那里动员、调动并提供补给。"而他就不可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给南朝鲜军队以"有效的军事援助"。因此，他自己认为6月26日的指示是"灵活的、不是严格限制的，给战区司令官的命令措词谨慎是常有的事。"麦克阿瑟不能认为9月27日的命令也同样可以灵活应用，这次命令肯定必须严格遵守。

于是华盛顿强烈地感到，假如麦克阿瑟不严格遵照指示办事，其后果可能正好与华盛顿的愿望相反。麦克阿瑟向北挺进时，这个问题就日益暴露出来。在这方面，杜鲁门先生特别担心他的战区司令官公开表示过的信念：亚洲人尊重的只是富有侵略性的强有力的领导，这句话的含意是，亚洲问题得靠武力解决。而总统从威克岛回来时说，远东的和平问题"远远不止"是个军事问题。1950年10月12日安东尼·莱维罗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

> 今天，华盛顿消息灵通人士说，杜鲁门先生很想争取麦克阿瑟将军支持我们的远东政策。人们知道，将军在某些重要方面，没有表示同意，他主张以军事力量作后盾，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政府希望麦克阿瑟支持政策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武力去战胜的，政府的一些顾问认为，只有当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最大利益并不在屈从于

苏联的联盟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就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因此，当联合国军深入北朝鲜境内的时候，总统必须亲自设法和他的军事指挥官建立更为谅解而和谐的关系。还必须明确，总统并不认为，亚洲共产主义所造成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大陆上的问题，是能单凭武力就可以解决的。上述这些，至关紧要。战争必须是有限的，华盛顿的命令必须服从。美国不应在远东打大仗，把力量浪费在边缘地区；相反，美国必须积蓄力量，集中搞主要任务，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杜鲁门先生访问麦克阿瑟将军回来后，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他强调美国没有忘记它对欧洲的承诺，暗示政府对远东在美国安全格局中的重要性，不象麦克阿瑟将军估计的那么高。总统着重指出，苏联的威胁是针对“欧亚两洲”的，在他通篇的讲话中，只是在苏联的全球威胁这个更广泛的题目里谈论了朝鲜战争。

由此可见，总统飞往威克岛，不是为了作出某些具体的决定，而是为了确切地掌握情况。他并不企求得出任何具体的的结论，只是谋求团结的精神。“我知道有人对我这次旅行的原因作了种种的猜测，”杜鲁门先生说：“这里确实不存在什么秘密，我去那里是为了看望麦克阿瑟将军并和他聊聊。任何形式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谈话。……”这几句话乍听起来近乎随便说说的老生常谈，然而却恰当地点出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所在。威克岛之行并不是“狡诡的政治埋伏，”而是“友好的聚会”。总统和将军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不仅是件好事，在战争的现阶段，那是绝对必要的。这项任务不能等到下次大选前再去搞。

杜鲁门先生建立这种关系的手段是符合他的个性的，那

就是搞直截了当的个人外交。麦克阿瑟已在东方服役十四年，在那段时期里。虽然曾几次邀请他回国，但是他一次也没回来过。因此，总统的印象是将军“全神贯注在东方世界”，他与“国内人士”实际上已没有联系——“国内人士”在杜鲁门先生的词典里，无疑是他的政府官员的同义词。因为总统得出结论，他早先把政府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去影响麦克阿瑟将军的努力“收效甚微。如果他能直接听我（杜鲁门）谈这个问题，他认识的改变可能会容易些。”

不过，还有一个真正的谜没有解开：会晤为什么选择在那个特殊的周末？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在宣布这次会谈时，总统的新闻秘书说，作出前往会晤将军的决定“不是由于任何紧急的事件”。据当时报纸报道，总统原来计划在那个周末飞往圣路易斯，他的姊姊将在那里被授与密苏里州大牧师会模范总管的职衔，并接受东星圣章。而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了总统去中部太平洋作较长旅行的消息。在他的回忆录中，杜鲁门写道，他选择10月15日这个周末是因为他希望从联合国军总司令那里取得“第一手资料”，作为计划在10月17日和24日两次演讲的部分内容。但是电讯难道不能起同样的作用吗？总统7月19日向国会作报告时，电讯已起了很好的作用。

关于选定在10月15日开会，尽管《杜鲁门回忆录》和麦克阿瑟的正式传记都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但是从时间上来看，似乎不能说和10月9日的事件完全无关，那天有两架美国F—80战斗机袭击了西伯利亚的苏联空军基地。这个基地不在朝鲜边境，而是向北深入苏联领土六十二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十八哩。然而，苏联人没有开火。第二天，苏联政府向我们驻莫斯科公使衔参赞递交一份照会，抗议“粗暴侵

犯”苏联的领土完整。巴伯先生拒绝接受照会，声称战斗机是在“统一指挥下”采取的行动，因而这一意外事件应由联合国来处理。次日，国务院正式宣布支持这个立场。东京美军司令部的反应很干脆。一个空军发言人说，他“对苏联的抗议一无所知”。他对此没作详细的阐述，对国防部是否转交了苏联的抗议，或者他是否知道这次攻击也没加以澄清。

10月19日，国务院复照苏联政府，承认有这次攻击，并宣布美国愿意赔偿苏联财产所遭受的损失。同时，奥斯汀大使转送了麦克阿瑟将军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麦克阿瑟声称，这次攻击是由于“飞行上的错误和判断上的差错所造成的，没有搞清楚目标就加以袭击。”报告补充说，这个空军中队的指挥官已被免职，两名飞行员已受纪律处分。

当时很少有人注意这次袭击，总统突然决定在15日这个周末去看麦克阿瑟将军，难道是为了这个缘故？袭击发生在10月9日，苏联政府提出抗议是在10月10日。总统飞往威克岛的消息是在同一天发布的。会谈是在15日，而麦克阿瑟的报告发表在四天之后。这一系列事件足以说明，这次袭击很可能是促使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会晤的重要因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突出了总统的迫切愿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麦克阿瑟建立更好的工作关系。这类袭击事件必须加以防止，以免扩大战争，莫斯科和北京终究不会相信麦克阿瑟的飞行员仅仅是搞错了目标。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必须要以言论和行动来证明，美国对朝鲜或太平洋上其他地区没有侵略的意图。

显然，总统认为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密谈已经达到这一目的。会谈结束时，他声称会议“非常令人满意”，已经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杜鲁门先生的几个知友说他有点

“飘飘然”。“总统先生，会开得怎么样？”《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问道。“好极了。……自从我当总统以来，还不曾有过比这次更为满意的会谈。”莱维罗对威克岛会晤作了第一流的评论。他说，“杜鲁门先生满怀喜悦离开了威克岛，象一名保险公司的营业员终于让重要客户签署了合同，后者对赔偿范围看来还是将信将疑。”很明显，麦克阿瑟将军的心情没有这样愉快。记者们见到他时，麦克阿瑟老在看他的手表，会谈结束后，他拒绝留下来吃午餐。“东京有许多紧急事情等我回去处理，”他告诉总统说。大概总统的事务还没有他多，也不那么急。他在会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很简短：“一切都将由总统的新闻发布官来告诉你们”。这句话可能是措词不当，但是当问及对杜鲁门先生的印象时——“现在你已经见到了他，是第一次吧，”——将军却毫不相干地回答道，“这次会谈所讨论的问题都在罗斯先生（白宫新闻秘书）手中。”后来，他情绪稍有好转，说他“见到总统感到非常高兴。”还说：“总统访问太平洋必然会在远东激起极大的热情，人们把它看作是坚定决心的象征，太平洋的和平将得到保证，亚洲将获得自由，而不是受奴役。”这些话竟和惠特尼将军所说的毫无相似之处！

不管会谈和所谓的欢聚是否给华盛顿和东京带来了统一的观点，或者进一步的合作精神，可以肯定，总统认为他和麦克阿瑟将军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当麦克阿瑟将军和我讨论整个远东的和平问题时，我们认识到这远远不止是个军事问题。”可是在哈里曼——麦克阿瑟会谈后，他对此作了深思，不久他就感到失望。麦克阿瑟过高估计了福摩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固执地认为美国应该全力支持蒋介石。历史现在是否会重演？深入向北朝鲜进军将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第七章 “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灾难的前奏

在威克岛的会晤中，中国参战的可能性虽然是被排除了，然而，据报告，在10月15日至21日之间，愈来愈多的中共部队正在中国边境集结。根据汉森·鲍德温的估计，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在朝鲜边境附近，另有二十万人在满洲境内。华盛顿的反应是，一切都已过去，这只能是“防御性措施”，鲍德温继续说，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边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毛可能认为满洲将是美帝国主义时刻表上的第二站。“从愈来愈多的迹象”来看，俄国人正在“完全”撤出北朝鲜。向着东海岸的交通运输已告中止，俄国顾问和技术人员已经返回苏联本土。鲍德温确曾告诫说，“共产党的防御概念颇可能是向朝鲜边境以南推进一定的距离，在满洲和朝鲜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他还提醒读者，“中国共产党人，也许还有俄国人，对鸭绿江的电站可能是敏感的，它的供电范围，不仅包括北朝鲜，还有满洲的部分地区，如旅顺和大连港配电系统据信是在边境的北朝鲜一侧。”

鲍德温的推测立即在军事公报上得到反映。10月26日的军事公报说：“南朝鲜第六师的一个团在边界以南约二十五哩附近，遭遇一支顽抗的敌军。……”共产党的抵抗被说

成是“顽强的”，这个形容词在最近几乎已弃置不用了。第八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立即命令所有先头部队后撤，和他的主力部队相汇合。两天以后，林赛·帕罗特从东京向《纽约时报》报道说：

> 近几天里，敌军的抵抗中第一次出现了大批有组织的部队、大炮和迫击炮火力。……南朝鲜先遣部队在温龙村周围的处境最为危险，第六师的一个团在那里一度被敌军包围。大韩民国军队在那个地区挺进，直逼鸭绿江的大水丰电站，不仅北朝鲜用该站的电，就是沈阳和大连也靠它供电——这对满洲和苏联的工业来说，都是相当严重的事件。

帕罗特评论说，战斗“集中在北朝鲜的西海岸，离鸭绿江国际边境渡口约六十哩。这一地区，从成吉思汗那时候起，几个世纪以来一向是朝鲜和满洲之间侵略和反侵略的传统通道。……”

据报道，南朝鲜第一师也“和一支顽抗的敌军发生激战。”这次战斗是在云山附近。而美国第八军的一名发言人却对这些报道加以“嘲笑”，他宣称，“调查表明，报道的根据是两个战俘口述的故事，他们各自讲了六个不同的故事，加起来就是十二个故事，其结果就等于零。”不过，他承认“零”颇有可能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一支象征性部队，或许是一个团，就在北朝鲜的什么地方。（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这位发言人）对目前会有大部队越过边境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那两个战俘是10月30日在咸兴附近抓到的。第二天，东京总算承认中共参战，人数为一个团到一个师，他们实际上已经发动了猛烈的反攻，切断了正从东海岸向普戎水库推进的南朝鲜先头部队的运输线。“这一报道被认为和南朝鲜官

员的"一再断言"是相符合的："几天来，他们的军队遭遇的是中国第四十军，据称这支部队早已集结在鸭绿江边上了。"

大规模参战的迹象迅速明朗化。11月3日的报道说："某人士"认为，中国第四十二军已全部在朝鲜，而且"看来美国和中共的军队现在已经接触，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骑兵和步兵今天在军号声中发起攻击，以印第安人的杀敌方式切断了云山的美国兵和南朝鲜部队的联系。……"二十四小时后，"第一军发言人指出，中国的第三十八路军和第四十路军中的五个师已侵入吃紧的西区。……大韩民国的第七师已在那里被消灭殆尽。"东区第十军发言人报告说，他们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其力量为一个师或更多些。……"；但是有迹象表明，"敌人在西线已将生力军的大部分投入战斗，而且那里可能还会有增援部队。"在满洲边境侦察的飞行员报告，北线有"相当大量的部队在运动。"

东京依然没人承认情况的严重性和灾难临头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所谓中国人"只是增加些满洲出生的朝鲜人，如同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两个朝鲜人的师，在中国内战后就转调给了北朝鲜的红色政权。"总部在叙述10月29日情况时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确切的消息表明，联合国军的对手仍然是北朝鲜军队。上星期在云山附近，据说有几名中国战俘被抓住，(但是)没有大批跨过鸭绿江而涌入的中国士兵。"三天以后，11月1日，远东司令部承认，"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姑且用这个名称——已经参预了朝鲜战争。……(迄今为止的一些材料)仍不足以证实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以中国军队的组织形式，在中国或北朝鲜统帅部的指挥下参预了这场战争。"情况并

不严重。“顽强的抵抗说明共产党军队的指挥部已经调集残余部队和武器在作最后一次挣扎，（而并非）从共产党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增援部队。”然而《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在同一天报道说，来自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司令部的消息证明，阿尔蒙德的军队“在洪纳以北三十哩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团进行着战斗。这是官方第一次确认，中国有大部队在朝鲜和联合国军交战。认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美好愿望今晚在这里一下子破灭了。”詹姆斯报道说，“消息是在夜间传来的，当天有许多报告说中国人已经携带重武器进入北朝鲜。在洪纳的一支空军支援部队报告说，两个中国师正从各个通道向南挺进！当天晚上，总部说这个报告‘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第二天，东京肯定了这份报告，否定了它早些时候的公报，原来他们认为抵抗大部分来自北朝鲜的残部。联合国军队目前正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作战，不过，对这一说法旋即作了缩小范围的修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代表中国政府。”

这些公报对红色中国的干预报道得吞吞吐吐，正好说明麦克阿瑟吃不准北京的意图。

中国共产党的干预要达到什么程度？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旨在建立一个缓冲区呢，还是要联合国军撤回三八线？北京仅仅是关注鸭绿江水电站的安全呢，还是打算把麦克阿瑟的军队全部逐出朝鲜。据柯林斯将军说，华盛顿在共产党中国干预的全部期间，完全依靠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它一无所知。东京总部也同样茫然无知。塞缪尔·马歇尔的话是贴切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部队的主要秘密——实力、位置和意图——保守得非常完善，所以它的力量就增加一倍。”在没打大仗之

前，麦克阿瑟的聪明才智是无法揣测这些事实的。

> 调动和集结均未被发现。敌军只在晚间行动，白天操练时，保持严格的伪装掩饰的纪律，到达目的地以后，就隐藏在老百姓家里，不让暴露目标。空中侦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的调动。难民对此只字不提。因此，唯有依靠相当数量的战斗部队远远哨探，才能有机会发现他们。然而，这并没能办到。
>
> 没能远哨，并不需要借口。如果有人从未看到过北朝鲜的农村，或者没有体验到第八军的紧张状况，那是会随意提出指责的。在这个山峦重叠的国家里，一支缺少重武器的轻装部队可以在一块比猎狐队所占地还要小的地方隐蔽起来。同时，第八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驻地附近对敌人可能隐藏的每个角落加以搜索。前些天，正是由于这种冒险行动招致了几次严重的打击。小分队因过分深入搜索被歼灭了。

11月4日，正当麦克阿瑟无法正确估计中国的兵力和意图时，他告诫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得出不成熟的结论，并表达了他的意见，认为中国军队出现在北朝鲜并不意味着全面干预。虽则后者存在着“明显的可能性”，但是有许多基本逻辑上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结论。麦克阿瑟提出比较言之有理的三种情况：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仅仅是向北朝鲜提供不公开的军事援助；这些军队确实代表“或多或少”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援助北朝鲜人在鸭绿江南边保留一块名义上的立足点；最后，中国人投入这些军队是由于考虑到，非南朝鲜部队将要进逼满洲边界。“我建议，”麦克阿瑟最后说，“不要急于得出可能是不成熟的结论，我认为，最终的估计还有待于更完善的军事数据。”

然而，就在第二天，中国参战的证据已足以使麦克阿瑟将军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特别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联合国现在正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峙着，他们的部署是准备和联合国军队打仗。”他列举了十二次“敌对”事件：五次有关来自鸭绿江满洲一边的防空火力，射击在朝鲜境内飞行的美国轰炸机。其中两次发生在跨过三八线之前，一次是8月22日邻近细霍水库处，另一次是8月24日，在鸭绿江新义州附近。第三次发生在10月15日，当四架F—51战斗机在鸭绿江朝鲜一边“靠近新义州机场”飞行时遭到了射击；一架飞机被命中击毁。11月1日，又是在“新义州附近”，来自满洲一边的防空火力射击十三架F—80战斗机，另一架飞机被击毁。在同一地区内又发生了两次事件。一次是在10月17日，一架RB—29飞机遭到来自满洲一边的射击。最后一次，十三架F—80佩刀式喷气机在飞行中遭到飞越鸭绿江而来的六至九架共产党喷气机的袭击。

对地面部队也提出指控。如10月16日，中国军队的一个团越过鸭绿江向楚山和富山水库推进。四天以后，另一支部队部署在细霍水库南侧。10月30日，另外两个团出现在毗邻水库的长津附近。11月2日和3日，又发现了新的部队，但是没有说明他们所在的位置。值得指出的是，麦克阿瑟再次没有预测到北京的意图。

与此相反，他在第二天，紧接着这个报告发表了一份特别公报。宣称，联合国军正在和“外来的共产党军队作战，……充分的供应来自毗邻满洲边界不可侵犯的后方。”他谴责共产党人“严重地、史无前例地违反了国际法，”在交战之前不动声色就开始了行动。”他声称联合国军已经避开了一个“可能的陷井，那是……经过精心策划、秘密布置的，是用

来消灭联合国军的。……负责该地区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凭着他的远见卓识和指挥才能，彻底改变了他军队的行动方向，总算避免了这场可能的灾祸。……我们现在面对一支生气勃勃的军队，他们在外面可能有强大的后备，充足的物质供应就在近处，而我们却受目前军事行动地区的限制，对之只好无可奈何。”麦克阿瑟下面的几句话再次表露了他吃不准共产党中国的意图。“这些后备力量是否会向前推进，推进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都有待于今后的观察，这是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情。”

为了对此作出正确的判断，麦克阿瑟在11月7日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计划重新开始积极地“去确切掌握……敌军的力量。”但是，就在这同一天，“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在早晨采取突然行动，甩开在安州北面驻防的联合国军，……美国和南朝鲜强有力的巡逻队没能找到敌人。”北京的意图就这样落入五里雾中，东京警告说，这次脱离接触很可能不是撤退，而是一次短暂的休整，以便重新集结，进行“更猛烈的攻击。”11月9日，第八军发言人在朝鲜说，“在影响朝鲜战争前途的高级外交活动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可能不想在北朝鲜开仗……（中国人在西北区是逐步撤退的，前后持续了四天之久。）在东北地区，第十军的一位发言人说，中国第一八四师正在‘撤离’巨大的长津水电站。”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从一个大水库的撤退，来加深这样的印象：他们干预的目的是有限的，现在或许正好是谈判的时刻。

北京得到一次又一次的保证。11月7日，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宣称，联合国军是“完全支持”满洲边界的；三天以后，六大国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项决议，重申联合国将坚持边界“不可侵犯”，并“将全力保护中国和朝鲜在边界地区的利

益。”第二天，国务卿艾奇逊重复了这个保证，他强调联合国和美国对满洲都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打算。”如果中国人继续误解我们的动机，“那将酝酿一场最不寻常的世界性的悲剧。”总统重申了这个论点：“我们从来不曾对中国怀有敌意，就美国而言，我希望能明确地说，由于我们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事业，由于我们对中国人民长期的友谊，我们愿意采取一切正大光明的步骤，防止远东地区敌对行动的扩大。”假如北京误解我们的和平意图，“这只能是因为他们受了某些人的欺骗，这些人的利益在于延长并扩大远东的敌对行动，这对全体远东人民是不利的。”詹姆斯·赖斯顿在评述总统声明时指出，“今晚在这里（华盛顿）听到的、对杜鲁门先生声明的唯一批评是，它晚了几个星期。这里的几个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样的一个声明，假如发表在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首都的时候，可能会止住中国的干预，特别是假如美国也提出：允许联合国和平委员会接管中国边界朝鲜一侧的缓冲区。”

中国人拒绝了这类保证。他们指责麦克阿瑟的报告是“恶意中伤”。北京攻击说，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侵略福摩萨；美国飞机从朝鲜起飞侵犯了满洲的边界；简而言之，美国军队在北朝鲜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抗美援朝……就是保卫祖国。因此，自愿援助朝鲜是合情合理的。”中国共产党人说，“志愿”军的先例创始于美国革命时期的拉斐特；他们引证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的志愿队伍都在那里服务过。朝鲜人民曾在二十年代援助过中国革命，中共现在是报答他们。美国已经“横冲直撞地越过整个世界来到中国的领土，并且侵占了福摩萨。”他们再次向国务卿和总统表明，他们不曾误解我们的动机。北京摘引李承晚总统报告中的话，“战争不能停止在鸭绿江边”，还援引了参议员诺兰的提

议："为什么不能在鸭绿江以北十哩建立一个中立区呢？"政府就是利用这些"第二流人物"来陈述它真正的意图，因为"对于这些人的话，政府是不难加以否认的。"信誓旦旦地说着反话，"甜言蜜语加上威胁讹诈的混合剂……用以……缓和舆论，以便美国直逼中国边境，最后终于跨越边境。"

中国共产党提请人们注意，在战役不同阶段里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新闻报道。这种矛盾的报道往往出现在同一天内，有的说，联合国军不会越过三八线，但有的却说，他们已经过线，不过将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一百五十哩处。稍晚的一则路透社电讯说，只有大韩民国的军队被用来越过分界线，接着美国军队也用上了，只是他们不能进入鸭绿江以南二十哩的地区。

尽管有着种种不祥的预兆，至今仍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军队将发动全面的攻势，联合国军缓慢北上，遇到抵抗逐渐减弱。11月20日，美军第七师到达了俯瞰惠山雅河的山区，其他地区的联合国军也在缓慢地前进，小心地探索着撤退的共产党人建立在某处的一道防线，据说是在通往满洲的的主要交通线上。中国人释放二十七名战俘，一般认为前途大有希望。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代表抵达纽约，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麦克阿瑟11月5日特别公报的辩论，将军就在这天发动攻势，其"实际目的是结束战争。"

他在发动这一攻势时知道，正面的敌军至少有十万，后方还有四万游击队。他也明白，他的兵力不足以搞正面进攻；因此，他把进攻部队一分为二，其结果是在他的中线造成吸引人的致命的空虚。像在仁川一样，麦克阿瑟在作"惊人的赌博，但是他相信，他将会取得成功。中国参战的目的看来很有限：北京自己声称，它的军队仅仅是志愿军；麦克

阿瑟宣布他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之后，这些部队又脱离了接触；联合国军正在稳步前进——第十军继续沿东海岸北进；第十七团早已进抵鸭绿江；联合国军的战俘业已获释。一方面他承认中国有可能全面参战，同时在另一方面，麦克阿瑟私下给华盛顿的电文却反映了相反的意见。如今他希望他的胆略能使北京信服：朝鲜的命运已成定局，特别是由于他早已声称，现代化军队火力“新的使人丧胆的经验”和低空扫射，已使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并使他们的供应遭到很大困难。就在麦克阿瑟发动攻势的最后一天，他的总部报告说，空军已经“成功地封锁了敌军的供应线，有效地切断了来自那里的增援，明显地限制了主要补给品的供应。”将军对攻势的胜利怀有极大的信心，他的军事部署并不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会大规模参战，而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实的敌人的基础之上。……敌人就是北朝鲜军队，它实际上被我们的军队所击溃。……我们受到下列两个条件的限制：我掌握的军队人数；还有那赋于我的使命。我的使命是扫荡整个北朝鲜，统一它并使之自由化。我的部队的数量是有限的，我就是根据这些条件来部署军队的。事实上，即使我知道中国人将要发起攻击，我看也无法作出较好的部署。”

麦克阿瑟是根据两个指示向鸭绿江进军的。9月27日，汉城解放那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远东总司令，作为“政策”，只能允许南朝鲜军队跨过“隘口”，进入毗邻苏联的东北省份和满洲的边界地区。三天以后，麦克阿瑟收到另一个电文，这次是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我们希望你在三八线以北的进军中，在战略和战术上不要感到有任何的牵制。”麦克阿瑟认为，这句话是对上次指示的修正；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修正已经是足够了，这使他在追击敌人的战术上有权

作最后的选择——他决定向国际边界挺进。

所以，10月23日，美国第一军的发言人宣布，所有“外国军队将在鸭绿江以南四十哩停止前进，”难怪不到四十八小时，“在朝鲜的第八军发言人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就否认了这个消息……说‘外国的’联合国军部队并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说是要他们在边界以南四十哩处停止前进，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因为各国对北朝鲜共产党国家的红色、反侵略战争都感到很不安。”不仅没有命令过非南朝鲜的部队停止在国际边界，而且还“无意建立正式的‘缓冲区。’”总部没有说明，几乎全军覆没的敌人，怎么能重振军威，再次进犯。但是，杜鲁门总统在10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就他所知”只有南朝鲜军队可以进抵他们国家的北方边界，当时麦克阿瑟立即驳斥了这种意见。“联合国军的使命”，东京宣称，“是扫荡全朝鲜。”

尽管如此，10月24日，麦克阿瑟告诉过他的战场指挥官：向鸭绿江进军时，撤销以前的限制，可以使用非南鲜鲜部队。虽然他确曾告诫指挥官们，一有可能就撤回一切非大韩民国的部队，他还是授权使用所有地面部队攻占北朝鲜。在获悉麦克阿瑟的行动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给他发电，说明他的命令不符合9月27日的指示精神，指示要求在毗邻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地区，只能使用南朝鲜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进一步指出，他们知道远东总司令的有关指示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他们希望能知道这些理由，因为经过反复思考的行动也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麦克阿瑟回答华盛顿说，大韩民国的军队既没有力量，也不能领导处理当前的形势。“军事需要”使他理所当然地置9月27日的指示于不顾。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

麦克阿瑟说，他懂得这一指示的基本目的和意图，他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的。但是，他感到，如果不按他的办法去做，任何别的行动都可能在战术上发生危险。他说，整个问题在威克岛与总统会晤时都已谈过。麦克阿瑟断言，他挥军北上将会达到目的，并在朝鲜境内清除敌军。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胜利，所以别无其他选择。自然，假如中国人正在计划大规模的干预，他的挺进是冒险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会在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发起攻势前先发制人。

看来，中国人的反击对将军来说是个遥远的危机。他希望他的胆略和决心会使北京放弃没有指望的打算：在北朝鲜保留一块残余的江山。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他把他早已在数量显得不足的军队分作两路，并命令向前推进——仅仅几个星期前，他还第一次发表声明，说局势非常严重，他的司令部有毁灭的危险！凡是预料到敌军将要报复的将军，没有一个会发布这样的命令，还留出中部战线无兵守备。特别是他自己的总部先前曾报告过，在联合国军的后方，有四万名游击队已奉命北进朝鲜中部，那里，美国第八军和第十军在东海岸并没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在 11 月 24 日的特别公报中，麦克阿瑟却已谈到，一待攻势结束，“立即撤回联合国军。”

那天，将军飞往朝鲜亲自发布命令，开始现在著名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麦克阿瑟的话多半被指责为难以置信的自欺欺人之谈；但这次却是中国的“大规模报复”所促成的。麦克阿瑟自己解释说，他讲这话有三个目的：一是刺激厌战的军队；二是向布雷德利将军暗示，军队很快就可调去欧洲听命；三是向北京保证，联合国对鸭绿江彼岸没有野心。不管怎样，麦克阿瑟 11 月 24 日如此有信心的原因，

在当天晚些时候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换的电文里得到了清楚的说明。

在等待他从战场回来的电文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麦克阿瑟，由于他的部队向中朝边境全线推进，如果与中共军队的冲突范围扩大，联合国就日益关心是否要打全面战争。他们告诉他，联合国的一些提议并不欢迎他北上，还要加以限制；联合国会员国的情绪倾向于在他的军队和边界之间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希望这样做能消除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因他们担心联合国军会进犯满洲。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和其他官员参与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军政方面一致认为，虽然他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统一的朝鲜，同时又不能冒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但是他的使命不应作任何的改变。因此，要考虑以各种办法来缓和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人建议：在进抵或临近鸭绿江后，他可以把他的军队，主要是南朝鲜的军队，驻守在控制鸭绿江流域通道的高地上；联合国军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保护北朝鲜境内的水电站设施；联合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将在适宜的时刻和中国共产党政府相应的代表进行商谈，保证他们对水电站的电力有公平合理的份额。

麦克阿瑟立即作了答复。他"认为这些建议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将造成我们力求避免的严重后果……从军事观点来说，昨天我亲自察看了鸭绿江一带，结论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像建议所讲的驻守在江南的高地上。……"他继续说，他的计划是尽快巩固鸭绿江沿岸的阵地，及早以大韩民国的军队替换美国军队。与此同时，他将宣布计划，包括把美国军队全部撤回日本，有条件地释放全部战俘，在联

合国有关组织的帮助和建议下，由朝鲜人民自己来处理统一和恢复国民政府的一切事项。“我相信在达到我们的军事目的后，立即执行这个计划，将有效地使中国人在思想上承认这样做合情合理。如果没用，那么结局就不是我们停止军事行动，或者不执行目前的承诺所能影响的了。坚决地承担起这些义务，完成我们经常公开宣称的军事使命，是我们最美好的——确实也是唯一的——希望所在，这样做也许能制止苏联和中国的侵略计划，如果等到这些国家已经介入，又因政治上的缘故不能撤退时，我们就不好办了。”于是，麦克阿瑟继续向前挺进。

麦克阿瑟的乐观情绪在第一次公报中就得到了证明，进攻一开始很顺利，“北朝鲜军加上估计和联合国军力量相当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几乎没有抵抗。……据报道，敌人为保护满洲一边的鸭绿江水力发电站，在很远的北方设立了一道防线，所有的迹象表明，前进中的联合国军尚未打到那条防线。“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报告说，他们在长津水库附近，“遇到”一个新的中国师，在西南方的南朝鲜部队报告发现了另一个师。

11 月 26 日，联合国军继续北进，“逼进”满洲边界，一路上甚至没有遭到中等程度的抵抗。但是，第二天“敌军猛烈反攻……挡住了昨天联合国军的总攻势，”而东京，却反对任何不恰当的悲观看法。直到二十四小时后，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联合国军总部这才宣布：它正面临“一场完全新的战争。”敌军骑兵已于 11 月 30 日“纵深插入东线的美国第八军和第十军之间，可能已经和先前在红色首都平壤东北的强大的北朝鲜游击队会师。”中国共产党的反攻已经开始，麦克阿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麦克阿瑟错误估计“中国人的意图，”并抱有幻想，这在11月28日他发表的特别公报上，暴露得最为清楚。麦克阿瑟一开始就说北京的干预，“已经粉碎了我们的希望，我们曾以为中国人的干预只不过如他们公开宣称的那样，是在个人志愿基础上象征性的参战，朝鲜战争会由于我们向国际边界进军而迅速结束。……现在看来，这是敌人的诡计，他们在两星期前，和我们部队脱离接触，其目的是取得充裕的时间，秘密集结部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向我们全线进行突然袭击，利用所有河流及路基的冰固以减少我们空军封锁的效果，大大加快他们增援力量和补给品的前方运输。这个计划已被我们的攻势所破坏，迫使敌军提前采取行动。”

最后这句话给公报带上了辩护的口气，麦克阿瑟给华盛顿的秘密报告，以及他在10月24日至11月24日之间的行动清楚地表明，这个公开声明不仅仅是为了对局势恶化作夸夸其谈的开脱。只有当麦克阿瑟说到他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是军事上的侦察时，这才暴露了他原来是在撒弥天大谎。从来没有一个将军会以其全部兵力作军事侦察的！他以主力部队殿后是为了谨慎，特别是因为敌军可能插入他军队的两翼之间，从而袭击其中的一个侧翼及殿后部队，或将其两翼一并袭击。正如柯林斯将军后来所说的，“我相信，在最初阶段，他根本不是把这个攻势当作军事侦察来考虑的，因为麦克阿瑟是一心想要把北朝鲜军队消灭掉的。”

华盛顿的看法是，中国人派兵进入朝鲜，并不是由于麦克阿瑟将军没有阻止非南朝鲜军队进入中苏边境地区。他们在麦克阿瑟主力部队还未到达俯瞰鸭绿江的山地前，已经发起了反攻。

参议员莫尔斯：……你认为麦克阿瑟将军能停在离

鸭绿江一段路程的地方而稳稳地保住他的部队吗？

柯林斯将军：是的，先生。但是现在要为麦克阿瑟说句公道话，我应当说，中国人在11月24日发起大规模进攻时，他早就该往北打得更远些。

麦克阿瑟的错误性质要严重得多，他干扰了——在精神实质上，假如不在形式上——华盛顿向他阐述过的政策，虽则他曾引证马歇尔部长的电文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政府的政策是，只允许派遣南朝鲜的军队进入沿满洲边界的地区，和邻近苏联的东北几个省份；政府借此希望向北京保证，美国领导的军队不会侵犯满洲。麦克阿瑟指责这种战略是"姑息"，他命令战场指挥官在鸭绿江的进军中同时使用南朝鲜和非南朝鲜的军队。

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但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严重地违背了指示。柯林斯将军后来证实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曾给他任何不准在边界地区使用美国军队的命令，因为对远在七千哩外的司令官发出如此具体的指示是不可能的。按照美国的惯例，战区司令官在作战上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但是当他的行动不符合政府总的政策时，战区司令官必须首先向他的上级请示。这一点非常重要。

10月24日当他发出指示时，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和我们商量……当我们向他提出时，他反驳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军事需要。……这是一个不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宣布过的政策的典型例子。……根据我的看法，在这个指示发出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向参谋长请示汇报。……我想，这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但已足以说明麦克阿瑟将军的行动与基本政策是不一致的。我们开始担心，他既然能在这次事件中不和我们商量，干扰了我

们的政策，那么，在性质更严重的其他事件中，他也会这么干。

三军参谋长指出，在第一批南朝鲜军队扫荡“缓冲”区失败后，本来可以使用其他南朝鲜的军队。况且，柯林斯接着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同意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不可能驻守在俯瞰鸭绿江的高地上的答复。”因为这个制高点的大炮火力完全可以控制那条河。

在中国人进行干预的这个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他们的上级文职官员，对麦克阿瑟进行这次战役的结局已经作出了定论，正如麦克阿瑟过去对仁川一样。后来，当麦克阿瑟愈来愈反对华盛顿政策的时候，他们回忆起共产党中国大规模干预前几个星期，他们就担心麦克阿瑟会再次不听从下达给他的政策，从而引起导致世界大战的军事冲突。

但是，柯林斯将军作为华盛顿的一名官员，是否有资格批评战区司令官的行动呢？三军参谋长认为他完全有资格：他曾几次去过朝鲜，凭借地形图，他有充分理由判断出适宜于军队驻守的地方。通过他的军事生涯，他对地形学的研究给予极大的重视：“我认为范登堡将军、谢尔曼海军上将和我都完全了解朝鲜的地形对作战的影响。”

那么，麦克阿瑟为什么坚持要以他的全部兵力向满洲边界推进呢？为什么要拒绝在边界的南端建立缓冲区的主张呢？这是因为，首先，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建立统一的朝鲜。没有必要的魄力把仗打赢，就不能统一朝鲜，这样，朝鲜人就会说我们食言，中国共产党人和亚洲其他人民就会认为我们软弱无能。他认为，向共产党中国的侵略者割让北朝鲜一块土地的建议是不符合道义的，“它将使我们在亚洲的威望破产，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站不住脚。它不能阻止目

前形势朝着可能发生一场大战的方向恶化下去，相反，在不可避免地要打这样一场战争时，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利，我们会失去无数亚洲人的支持，现在他们很信任我们，很想和我们并肩战斗。”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向侵略者赠献这样的礼物，最近的先例是英、法、意同意德国侵占苏台德地区。

其次，麦克阿瑟深信只有坚决的行动才能阻止中国干预的扩大。亚洲人最尊重敢作敢为的领导，任何犹豫踌躇恰恰会导致华盛顿想要避免的后果。向鸭绿江边界进军将“有效地使中国人讲理智。”麦克阿瑟因此建议联合国应该谴责中国共产党，呼吁北京从朝鲜撤出它的军队。如果北京不肯照办，就要采取军事制裁，以示惩罚。他的政策当然是冒险的。但是，为了阻止中国人的干预，特别是在采取其他比较缓和的办法可能会纵容北京政权进入北朝鲜的时候，难道不值得来一次“惊人的赌博”吗？麦克阿瑟显然是认为值得的。

第三，麦克阿瑟认为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军事战略和联合国对北朝鲜水力发电站的控制是不相干的。例如，长津水库在联合国军抵达前一个月已遭破坏，但是迄今并未听到来自北京或莫斯科的抗议。关于“北朝鲜水力发电站设备的言论，多数是英、美方面的揣测，在苏联或中国的舆论中没有找到什么反应。”

第四，麦克阿瑟深信向鸭绿江推进是唯一可行的军事策略。他当时有三种选择。他可以把军队拉回到较短的、更便于防守的平壤、元山一线上来。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将毁掉我们对朝鲜作出的保证：联合国要统一他们受到战火摧残、创夷满目的国家，它还使北朝鲜军队仅仅被

击败，而没有彻底消灭，同时，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威胁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怯弱，必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威望。或者他可以向前挺进以测试北京的意图和力量。这一行动是冒险的，因为北京如果决定要打的话，它可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痛击联合国军使之后退，没有一个军事天才能挽救这一败局。或者他可以守住11月初他所抵达的那条战线。但是这条战线是不容易守住的：通过这个“隘口”的地形不适宜于设立一条防线，而联合国军总部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建立固定的防线。中国共产党人和他在数量上已经是五比一，这种差距正在与日俱增。到年底，预计差距将达十比一，而且还会继续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建立起“马其诺防线”是不可能的，甚至是白白送死。每个师要负责防守二十哩的前线。如此广泛的分散兵力将难以有效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渗透战术。因此，他不能停滞不前：就政治上来说，因为这将使北朝鲜的一部分留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就军事上来说，因为地形及兵力的缺乏，不可能守住一条完整的战线。所以联合国军总部必须先发制人，不让中国人渗入联合国军战线并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集中兵力，发动攻势。唯一的途径是往前打。当然，这是三种选择中最危险的途径，考虑到在中国人大规模干预下减少这种风险，并保住他军队的大部分，麦克阿瑟制订了一个第八军和第十军迅速而有组织的撤退计划。

麦克阿瑟的批评者不接受这最后的说法，他们认为在攻击开始之前根本没有订过这种计划。他们把“有计划的撤退”看作是真正的败退；他们还质问麦克阿瑟向前推进的理由。早在11月初，将军自己就吁请人们注意这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干预而引起的“新的战争”；他自己曾大声疾呼，他面临的新的军事力量，已威胁他的总部，有全军覆没的危

险。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军队和联合国军脱离接触之后，麦克阿瑟的公报还继续报道说，朝鲜现在有大批中国军队，还有更多的在满洲待命，准备跨过边境。例如，11月10日，"在东海岸或西海岸的战场上，和敌军都只有些小接触"，《纽约时报》却以大字标题刊登东京的报道："麦克阿瑟说，六万名中共士兵参战，更多的在待命。"这个"更多的在待命"是另外的六万名，加上"在满州集结的有十万人之多的部队，"他们可以"随意"通过"满洲境内短距离的交通线，不受任何袭击。"一星期前，麦克阿瑟曾私下告诉华盛顿说，这五十万人分成五十六个正规师；另外，他还报告说，有三十七万地方保安部队和其他军队还在陆续从中国内地调来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发起攻势是最愚蠢的冒险，他这样做，犯下了希腊悲剧中最严重的罪行——狂妄自大。

批评者接着说，由于11月初麦克阿瑟早就讲过他的总部受到毁灭的威胁，这个事实使这次攻势更显得愚蠢。就在那个时候，敌军与他自己的部队在数量上的差距已愈益增大。况且，他早先曾经说过，他不能以手下数量有限的军队来守住这处于腹地的狭窄的"隘口"，然而，他竟然在三百哩长的战线上发动了攻势。他的批评者指出，守卫漫长的中国边界反而容易，守卫短得多的"隘口"防线却很难，这种说法特别不符合逻辑。《纽约先驱论坛报》战地记者霍默·比加特认为，麦克阿瑟的攻势"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自讨苦吃。"因为即使联合国军到达了边界，他们还必须分散开来，驻扎在相互隔绝的营地里。中国人可以渗入未设防的缺口，将联合国军的营地消灭——这比在"隘口"处容易得多，而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能在"隘口"停步不前的理由，恰恰就是这种防止不了的大规模的渗透。

这些批评者最后说，由于麦克阿瑟发动攻势时分兵两路，这就几乎已注定了他的失败。他们驳斥了他这样做的理由，即所谓兵力不足和“崎岖不平，棘状突起的山脉”迫使第八军和第十军分开行动。他们问道，假如认为这个前线地区对于联合国军的推进显得太“崎岖不平”的话，假如认为敌军很难渗透这个地区，他可以分兵两路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话，那么中国人怎么能突破呢？——特别是麦克阿瑟不止一次地预料过，就在这个地方要打上一仗。11 月 26 日，东京总部曾估计，“有迹象表明，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假如在战争结束前要碰上一次的话——可能在那白雪复盖着的山区酝酿要打。据说那里有着与联合国军数量相当的北朝鲜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于没有发生较大的抵抗引起了疑窦，揣摩敌人在西线纵深五十哩的楔形地区干些什么。”麦克阿瑟总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只能预感，我们将遭到顽强的抵抗。我们迄今还未碰到过这样的抵抗。”在六天前，东京报道过“各种不同的消息”，如说有四万名北朝鲜游击队奉命“突破中部朝鲜，往北进军，那里，美国第八军和东海岸的第十军联系并不密切。”11 月 28 日的报道说，“这里的观察家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敌军在中部地区搞‘迂回包抄’，这种行动将构成威胁，即在联合国军的两翼之间插入一个楔子，袭击其中的一翼及殿后部队。”

从这些公报看来，麦克阿瑟的批评者认为，他本来应当集中考虑防御措施，而不应发动攻势，因为他前有数量相等、即使不占优势的朝、中两国军队，后有四万名游击队；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在他的军队之间造成如此吸引人的真空，而应当准备好防御的阵地，在发生意外事件时，让他的军队有个退守的地方。由于他没有采取上述行动，导致美国

军队惨败，而敌军只有一些轻武器，实际上还没有空军。

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假如政府坚持认为，在边境使用非南朝鲜的军队是危险而带挑衅性的话，那它为什么不制约麦克阿瑟呢？假如它对这些行动是如此忧虑的话，为什么不命令麦克阿瑟停止前进或不准他分兵两路呢？柯林斯将军已经为华盛顿不愿这样做举出了一条理由，那就是战区司令官有决定他自已战术的传统自由。但是身在战场上的人，在敏感的有限战争的条件下，对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和政治含义的战术问题，该不该单独作出决定？美国的传统观念是在战争中要首先考虑军事，其次才是政治因素，难道这一条不应当颠倒过来吗？难道政府的政治领导者，对在情况特殊的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人，不能加以最严格的控制吗？乔治·凯南曾警告说，过份尊重传统会把我们引向灾难。

艾尔索普兄弟和詹姆斯·赖斯顿，在当时的专栏里都曾指出政府没能制约麦克阿瑟的另一个原因。艾尔索普写道，政府的文职和军职领导者，对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都感到不安。但是正如布雷德利将军所说，“他不能替麦克阿瑟打仗”，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地”是受了麦克阿瑟前些日子辉煌胜利的影响，他们唯恐相反的命令会激起人们的指责，说政府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软弱无力”，故意扔掉麦克阿瑟努力争取得来的果实。赖斯顿的调子也一样，他说，杜鲁门总统不仅和麦克阿瑟一致认为中国不会进行全面干预，而且，自从仁川登陆以后，麦克阿瑟在国内和国会中都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以致杜鲁门先生不愿和战区司令官发出公开的分歧。赖斯顿还可以再加上几句，说经过中期选举，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力量已急剧下降，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而与此相反，麦克阿瑟在

国会中的政治影响却已显著上升。

威克岛“融洽无间”的精神已经烟消云散；事实证明，这种精神只能保持在太平无事的环境中。它经受不起危机的考验，但是从现在起，危机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

第　三　篇

朝鲜战争，1950年12月到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干涉时期

第八章　麦克阿瑟与塔夫脱联盟：

大　辩　论

麦克阿瑟在12月3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令人沮丧的电文。他描绘出一幅暗淡的画面。由于受北朝鲜地形和鸭绿江国际边界的限制，空军在阻断敌人补给线方面的效果已"显著地"减少。海军的作用也因敌人集中在内陆而大为缩小。麦克阿瑟补充说，两栖作战，再也行不通了。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作战的潜力因之大幅度降低，而地面部队的战斗力相形之下变得越来越重要。他的部队，除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外，全都缺员，并且已经"精疲力尽、士无斗志"；大韩民国部队的战斗力是无足轻重的。

对比之下，麦克阿瑟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二十六个师投入了战斗，另外正有二十万人当时正在整装待发。他们全都"斗志昂扬，组织完善，训练有素，装备齐全，显然处于最良好的状态。"所以，"除非立即采取积极的行动，不然的话，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稳定的消耗将导致最后的失败，这是意料中的合情合理的结果。"（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这一电文的涵义被解释为"总部必须撤离"，除非增援部队到达和联合国立即"全力"以赴。）

……在对这里的情况作出总的估计时，必须看到我

们面临一场完全陌生的战争，我们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作战，对手是具有巨大军事力量的完全陌生的大国。以北朝鲜为敌的作战指导原则，已经由于事态的发展而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相对弱小的军队现在面对着共产党中国的全部进攻力量，他们还有苏联在各方面的物资供应。打北朝鲜时适用的战略概念，过去取得了成功，如今对付这样的军事强国，就再也不能继续使用了。这就要求政治决策和战略计划，使之完全适应当前的现实。为此，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敌人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却在下降。

麦克阿瑟电文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除非采取“积极行动”，不然的话，部队必须撤离。后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谁首先提出撤离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论，是麦克阿瑟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麦克阿瑟坚决否认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怀疑我们能否在朝鲜站得住脚，而我认为是可以的。”事实证明他的说法不对。东京和华盛顿都考虑了撤离；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这条指挥渠道的两头不曾作过认真的考虑——这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反而会使人感到惊异。人们都知道，麦克阿瑟不会首先提出“撤离”这个词；那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提的。但是后者仅仅引申了麦克阿瑟电文的涵义，特别是12月3日的电文。这在谢尔曼海军上将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

整个12月份，大家都在讨论撤离的各种可能性，认为很有必要。据我回忆，是麦克阿瑟将军给我们的一个电文使我确信，必须对撤离的可能性予以考虑。

在12月3日的急电中，他阐述了情况，还说了这么一些话：

稳定的消耗将导致最终的失败，这是理所当然地可以预料到的。他的话使我感到，假如军事形势发展到最后将全军覆没，那就显然应该考虑让他们撤退。

不管怎样说，由于预料到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会在元旦发动新的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2月29日给麦克阿瑟一个重要电文。他们告诉他，他们掌握的材料表明，共产党中国具有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的能力。只有大量增加在朝鲜的美国军队，或者给敌人以惨重的伤亡，才有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采取上述这两个措施：首先，因为派遣更多的美国军队将严重地危害日本的安全，“要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中得到一定数量的增援部队，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其次，因为中国的干涉可能是一场大战的前奏，而朝鲜不会是主要的战场。因此，把我们现有的其他地面部队投入那里的战斗是不明智的。

正因为如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分阶段进行自卫，而“主要应考虑对日本的持续的威胁，”作出有远见的决定，以便在最后的合适时机中有计划地撤离。关于决定撤离时应具备的条件，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了麦克阿瑟的看法；他们说，在听取他的意见后，将发一个关于撤离条件的明确指示。“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补充说，“在朝鲜某些地方成功地抵抗中国和北朝鲜的侵略，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威望，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极端重要的，假如我们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不致遭受严重损失的话。”

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清楚而明确的指示。中国的干预可能会点燃起一场大战，这场战争不一定局限于远东地区，因此，理智要求美国为了应付那样的意外事件而节制使用它的力量。事实上，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它没有一支有相当

数量的生力军。再者守住朝鲜诚然是可取的，但是与其让第八军冒覆没的危险，还不如把它从半岛上撤出来；即使它在一段时期内能守住一个滩头阵地，然而将因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而遭到不断的消耗。因此，没有必要让全军将士去冒生命的危险而使日本失去地面部队的保卫。

可是，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个指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朝鲜某些地方”进行成功的抵抗对于我们是极为有利的，而同时他们宣称，朝鲜不是打一场大战的地方。麦克阿瑟的意见是，当他的行动受到华盛顿定的框框约束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只有冒进行一场大战的风险，才能打击中共的威望。所以，在他12月30日的电文中，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指示加以说明。

事情非常清楚，他说，得到苏联后勤支持的共产党中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正在奋力扑向我们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抽调赴朝部队的地区势将成为空城。同时，他的海空军力量目前仅仅动用了一部份，而中国国民党在福摩萨的军队的“巨大潜力”，和大陆上的游击活动却被忽视了。

于是，麦克阿瑟制订了报复措施，他认为照此行事，就不必撤离而且还能取得胜利：即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以空军轰炸中国工业区、交通网、军需品仓库和军队集结地；调国民党中国的军队增援他的部队；利用蒋介石骚扰易受攻击的大陆地区，作为可能导致反侵略的牵制活动。”采取这些办法，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说，将“严重削弱并大大地抵消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从而不仅能确保朝鲜的胜利，而且还能“把亚洲从它面临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

麦克阿瑟接着说，中国已经“全面地，毫不含糊地”把

自己投入了战争。美国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也不会使形势进一步恶化。麦克阿瑟表示了他的信念，认为苏联不会干预这场冲突，因为作出这样的决定将依据“苏联自己对有关力量的估计，而不会考虑其他因素。”换句话说，他的战略计划是相对安全的，风险是有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但也只是一切国际关系中生来就有的一点风险罢了。

另一方面，假如华盛顿拒绝他的建议，代之以不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任何报复性的打击而撤离朝鲜，那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严重的后果。首先，这种麻木不仁的行动将疏远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其次，它将要求“大大加强这个战场上的部队……假如我们要守住这条实际存在的防线以抵制果断的进犯。”第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军队撤离朝鲜，将使投入这场战争的中国大部份军队立即得以脱身，另找地方打仗——十分可能转向比朝鲜本身远为重要的一些地区。……”

麦克阿瑟指出，他完全明白欧洲安全的需要，他同意在那里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容忍在其他地区的失败——这种容忍带来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不久以后在欧洲本身的失败。他驳斥了关于美国军队还应该被用来支持和补充欧洲的防务，而不应被牵制在朝鲜的那种说法。他说，最乐观的估计认为，欧洲再过两年也不打紧；所以在目前的远东事件中使用美国军队，无论如何也不会损害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好相反，使用这些今后将驻扎在欧洲的部队，会使他们得到充分的锻炼——正如他在12月3日期望的那样，使用“最大量”的地面部队。

麦克阿瑟最后说，假如他的军事建议不能付诸实现的话，“把防线不断向南退缩到釜山桥头堡的战术计划，是完成撤

离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在这么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中，在军队被迫撤到桥头堡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没有必要事先作出关于撤离的决定。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1年1月9日拒绝立即采用这些建议。海军封锁要取得英国的同意，因为他们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经过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的；海空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攻击朝鲜境外的美国军队时，才能这样做。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在其他地方——如保卫福摩萨——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在朝鲜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战斗价值”并不高，这是温斯顿·邱吉尔经常说的。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重复说，由于他的主要使命是保卫日本和他的部队的安全，麦克阿瑟必须在朝鲜保存好自己的力量，待到“在你的判断中，看出撤离主要是为了避免人力和物力的惨重损失时……”，他就应当把军队撤回日本。

麦克阿瑟仍然感到不满，他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给他明确的回答或指示。他们回避了他的中心问题：他们是怎样把打击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军事威望和撤离朝鲜这两回事调和在一起的？结果，在1月10日，他又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次他强调对这个问题有加以澄清的必要，“不言而喻，我的部队目前没有足够的力量在朝鲜守住阵地，同时还要保护日本防御外来的攻击……”。他接着说：

> 毫无疑问，我们的现有力量是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守住朝鲜的滩头防线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就难免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是否“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全看人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的解释……
>
>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是否想撤离朝鲜，这个决

策非常重要，影响美国和整个世界，远远超过了一个战区指挥官的权限。……

麦克阿瑟指出，这个决定不应当“为敌人的行动所左右，而在你们的来电中，却把敌人的行动当作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他要求回答，美国当前意图是无限期地守住朝鲜的阵地，还是只守一定的期限？再不然，是否为了尽量减少损失而立即撤离？这个问题，他强调说，“必须取决于美国为其在远东的利益而制订的总政策。”

在麦克阿瑟“相当悲观”的电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朝鲜的军事指挥官受到特殊的条件限制，”联合国军队看来必须撤离，否则就将“全军覆没”。政府对这一电文的反应是采取三个行动。第一，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12日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列举十六点行动计划，在必须撤离朝鲜时付诸实施；这种不幸的可能性是执行该计划的“基本设想”，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在12月30日提出的四点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他们的计划当天上报国防部长，也给麦克阿瑟送去一份副本。

第二，总统在1月13日给麦克阿瑟一封长信，解释了“我们国家和国际上对继续在朝鲜抗击侵略的基本目的。”杜鲁门先生告诉麦克阿瑟说，在朝鲜的抵抗如能成功，就能达到下述目的：

（1）表明我们和联合国都不会容忍侵略，并为自由世界提供团结一致的机会，促使它动员全部精力迎击苏联现在对全世界造成的威胁。

（2）降低共产党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望，它已经被夸张到了危险的地步，中国现在威胁着要破坏自由亚洲的抵抗力量，并巩固在中国本土上的共产党统治。

(3)为亚洲，包括中国国内外的非共产主义抵抗组织，提供更多的时间，并给予直接援助。

(4)忠实地信守我们对南朝鲜人的承诺，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友谊在困难的时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5)为签订十分满意的对日和约提供了可能，为在条约签订后，日本的安全和大陆间的关系作出巨大的贡献。

(6)鼓舞那些生活在共产党大国阴影下的许多亚洲、欧洲及中东国家的人民，让他们知道，现在没有必要急于跟共产党达成协议，这种协议意味着彻底投降。

(7)在对付苏联或共产党中国的突然袭击中，鼓舞人们响应号召，抗击强大优势的敌人。

(8)加紧促使西方世界迅速建立防卫力量。

(9)通过联合国为集体安全作出第一次巨大的努力，产生自由世界的联合阵线，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10)提醒铁幕后的各国人民，他们的主人是坚持侵略战争的，这种侵略罪行必将遭到自由世界的抵制。

总统继续说，假如不可能在朝鲜守住阵地，那么，只要办得到，麦克阿瑟就应当在朝鲜的沿海岛屿上继续进行抵抗。但是，假如一定要撤离的话，就应当“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撤退是迫于军事形势，在侵略行径没有得到纠正以前，我们在政治上或在军事上，都不会承认这个结局。”

最后，政府派柯林斯和范登堡将军亲自去朝鲜视察军事形势。这次视察，以及总统强调在朝鲜继续打下去的重要性的信件，都暴露了政府的想法：认为麦克阿瑟或许在故意夸大军事形势的危急，以便他自己的战略计划得到批准。政府

每次问他，在规定给他的职权范围内，是否可以保持对朝鲜的控制，麦克阿瑟总是干脆地回答“不行”；要他控制朝鲜，除非让他的军队“不受约束”。他从未告诉过华盛顿所急切需要知道的情况；他只是回答说，如果政府采纳他的战略建议，他就能够守得住。看来，他实际上是在说，只有遵照他的意志，他才愿意和政府合作；而在他迫使政府把战火扩大到鸭绿江彼岸的压力中，政府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给他帮了大忙。华盛顿不知道，麦克阿瑟关于他的军队“终将覆灭”的预言，是不是实际军事形势的客观反映，或者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政府支持跟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

结果是，柯林斯和范登堡将军在研究了假如联合国军必须撤出朝鲜时，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后，于1月12日晚飞离华盛顿。五天以后，即1月17日，他们在东京报告说，他们刚从朝鲜归来，他们在那里看到联合国军的情况良好，没有必要撤离；因此，也没有必要采取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研究过的一切措施。这个措施本来都是为应付最特殊的意外事件而制订的；现在这类意外事件已经不存在了。

对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提交给国防部长的备忘录，麦克阿瑟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的。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总统列举的战争的主要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即将获得解决。正如惠特尼将军所说，麦克阿瑟“高兴地得悉，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纠正了他们关于对中国的还击会引起全球战争的错觉，”他们建议：

我们将继续在对华贸易方面加强经济封锁。

我们准备对中国进行海军封锁，一俟我们在朝鲜的地位获得巩固，或者在我们撤离朝鲜后立即付诸实施，

视当时的情况而定。

取消现在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禁令。

解除现在对中国国民党军队行动的约束，对有效地抗击共产党的这些军队，我们都要提供给他们一定的后勤援助。

对于这些重复使用的词句“现在、将要”和“一俟我们在朝鲜的地位获得巩固，或者在我们撤离朝鲜后，”麦克阿瑟都理解为几乎立即要执行这些建议。他认为这个计划中的用语没有说明撤离是执行新战略的先决条件。他确实没有看到政府观点的逻辑和优点。政府认为，由于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影响将是一样的，因此，把这个计划的执行放在美国军队被迫撤出朝鲜后较为稳妥，而不能在撤退之前执行。

后来有人问他，尽管他自己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已有默契，为什么他认为这个新战略不是不能实现的。麦克阿瑟回答道，它必然是“在审批过程中的某个地方被卡住了”，很可能是在国防部。于是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麦克阿瑟作如是想，是因为他以自己的心愿，断章取义地阅读总统的电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的；或者更为可能的是，他讲他的军事同僚们赞成他的意见，其目的是增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看来不能使人相信，柯林斯将军在东京期间，会不向麦克阿瑟阐述1月12日计划的正确含义，和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执行这一计划。何况，麦克阿瑟明白，1月12日计划不是指示，在没有取得国防部长、国务卿和总统的批准前，它不能算是一个指示。

即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他们上级之间的意见不一致，麦克阿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没有证据，而1月13日的信件

清楚地表明，上述计划不会很快得到批准。

> 我们在这个时期内的行动方针（杜鲁门先生告诉麦克阿瑟）应当是团结联合国中的大多数。这个大多数，不仅仅是该组织的一部份，而且是在苏联进攻我们时，我们急切需要依靠的盟国。另外，在增强我们国防力量期间，我们的行动应当十分谨慎，不能随便扩大战争地区。有步骤本身具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可能有助于朝鲜的战争，但是只要因此而把日本或西欧卷入大规模冲突的话，那将是不足取的……。
>
> 在对朝鲜问题作出决定的最后过程中，我要经常想到的是来自苏联的主要威胁，以及迅速扩充我们的军队以应付这个严重危险的需要。

换句话说，不准备把军事制裁手段使用到中国国境内。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已改变了仁川之战后的政策：以军事统一朝鲜。从中国干预之日起，政府又重新采纳了它原先的主张：恢复北朝鲜侵略前的现状。现在再要取得朝鲜的统一，唯有依靠“和平的方式”；联合国10月7日正式批准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决议已置之高阁。麦克阿瑟关于撤离的不祥的预见既告流产，朝鲜分裂也已不可避免。麦克阿瑟没法使自己适应这种形势。

麦克阿瑟确信，美国人民知道他反对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主张取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对于中国人的干预，他也是没有责任的。国内对他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意见很大，麦克阿瑟显然感到深沉的伤痛。他觉得有必要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对此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些诽谤的来源是前线的不负责任的记者，加上国内另外一些不爱国分子的煽动。”“不负责任的”这个形容词，看来是针对某些老练的战地记者而发

的强烈指责，他们经常不把总部发布的消息和解释报道作为准则，而往往喜欢自作主张进行判断。关于形容词“不爱国的”，与其说反映了那些批评麦克阿瑟在北朝鲜的战略和战术的人们的爱国主义，不如说又一次暴露了将军那种众所周知的不肯认错的个性。

可以肯定，在失败的迷乱状态中，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寻找替罪羊；对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预，总得有个交待。幻想西方和北京并没有“真正的”冲突，自然是比较舒服的，武断地指责麦克阿瑟，说他促使中共参战，这也很省事；但在面对中国的敌对行动和麦克阿瑟所说的“新战争”，就很艰难了。结果是，这个在仁川登陆后被捧为军事天才的人，现在普遍地被贬低为军事上的庸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说他要对“美国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负责，因为他“混淆了事实和情报而铸成大错。”事实上，虽则麦克阿瑟在北朝鲜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很难把他的声誉和一贯正确的至圣战神等同起来，但是他仍然不失为11月攻势前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官；毫无疑问，他极力主张轰炸并封锁共产党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是主要因素，至少是他希望在公众中恢复他的声誉。

不过，还得补充说，在这几个星期里，麦克阿瑟所受的严厉的、有时是辛辣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冤枉的。多少年来，麦克阿瑟参谋部把这个“老头子”不仅描绘成军事天才，而且是一贯正确的将才。麦克阿瑟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麦克阿瑟有个朋友叫乔治·肯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空军参谋长，他与原麦克阿瑟参谋部其他人员的唯一区别是，他把麦克阿瑟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来写了本书，书中描写将军也有高度的热情和感人的魅力。据他回忆：

新闻发布官个个都敬佩麦克阿瑟，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对于他们说来，每一则新闻都必须把将军描绘得出生入死，放在人间最高的宝座上，不然的话，就不能发表。除了颂扬麦克阿瑟完美无缺、一贯正确的新闻外，其他新闻很少有机会能从审查官眼前通过。他们（不可以加上他参谋部的全体成员）看来都自以为担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将军向全世界作"广告"，他们并不信任新闻记者能正确理解麦克阿瑟。他们好象从来没有识别，他们毫无必要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作广告。将军才华横溢、丰采引人，值得敬慕，没有任何吹捧，反倒更受人欢迎。他不是个半人半神的怪物，他是个人。

约翰·根室听说麦克阿瑟总部成员把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比——自然认为亚历山大还不如他——把他描绘成前所未有的伟人。不幸的是，麦克阿瑟过去一直在积极吹捧他自己，如今成了他自己传奇的牺牲品。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爱虚荣的人，也有许多值得自豪的本钱；但他不是一贯正确的。在北朝鲜的战争中，麦克阿瑟亲手粉碎了常胜将军的传奇。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本来应该接受批评，这确实应该是最尖锐的批评；像他这样一个有着辉煌经历的人，理应从善如流。但是麦克阿瑟总是坚持要把他的业绩保持得完美无缺。结果是，他那种对待批评的过敏导致他把批评与不忠等同起来，把他的困境和失败归咎于华盛顿的文职和军职的上级，从而减轻他自己的责任。

麦克阿瑟在11月底和12月初，对他的上级发起了接二连三的口头上的攻击。11月28日，他发表一份特别公报，并向三星新闻广播电台的雷·亨利发了一份海底电报；11月30日，他答复了前一天《纽约时约》阿瑟·克罗克发来的电

文；12月1日，他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并给美联社社长休·贝利一份长电。他还接见了其他一些人，发了另一些电报，其中有伦敦《每日邮报》的沃德·普赖斯，国际新闻社总编辑巴里·法里斯，以及东京新闻联合会。在这些公开的声明中，麦克阿瑟提出了许多问题。

第一，他再次强调，是他的"结束战争"的攻势迫使敌人提前动手，使敌人企图隐蔽地集中兵力的战略计划没有得逞。该计划中的兵力十分强大，可以在"一次秋风扫落叶的行动中"，彻底摧毁联合国军并征服朝鲜。

第二，他坚决否认共产党中国的干预是他在北朝鲜指挥作战所引起的。"把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或多或少地归咎于战役本身的战略方针，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他反复申说，他的每一个战略和战术行动，"完全符合"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精神。据传，"权威方面曾指示麦克阿瑟，要他在执行任务时，不要让部队越过三八线或平壤，或除国际边界外的任何一条防线"，麦克阿瑟驳斥了这类"容易令人误解的无稽之谈"。（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不是"权威方面"。）不论怎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动反对联合国的战争唯一的基本原因，只能是他们经过长期预谋后的决策，采取行动是他们的卫星国北朝鲜军队失败的直接结果……"

第三，麦克阿瑟反对把他从北朝鲜"有计划的撤退"说成是一次全面的溃退。他指责说，这个印象是记者的无知所造成的，他们混淆了"迅速撤退"和"仓惶逃窜"；撤退计划早在11月24日发起攻势前就制订好了，当时就设想中国共产党可能会进行干预。事实上，这次"撤退"是井井有条的；这确实是他所指挥的一次最出色的军事行动，或许是他空前的杰作！他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某些

战术上的成功,"但是他们能达到这些目的仅仅是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事实确也如此，他们只是靠“惊人的伤亡”才赢得了这么些战果。

最后，麦克阿瑟认为,他之所以不能打败中国“志愿军”,是由于华盛顿给他的种种限制。这些“史无前例”的约束是执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的巨大障碍。他不能使用空军袭击在满洲的中国供应线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障碍；由于鸭绿江南岸崎岖的地形，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黑夜的掩护下调动他们的军队和物资，而我们的空军既不能觉察，也没法轰炸。

杜鲁门先生对麦克阿瑟的一连串声明感到很恼火。因为他认为麦克阿瑟正在设法减轻他“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失败的责任，说什么“他原来是可以打胜这场战争的，只是我们华盛顿当局不让他按照他的想法去打……我本当在那时就地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不希望在表面上好像由于他进攻失败而被撤职似的。我从来不愿在人们不走运的时候丢弃他们……。”但是麦克阿瑟必须知道，他陆续发表的公开声明逾越了常规。

于是，麦克阿瑟在12月6日接到了两个指示；虽然是通知全体行政官员的,但特别是为他而发的。第一个指示是，有关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所有讲话、新闻或其他声明，在未取得国务院或国防部批准前一律不准发表。这个指示的目的被解释为“保证公开报道的正确性，并使之完全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第二个指示说,“在国外的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在公开声明中必须十分谨慎，除了他们与各主管部的例行公文外，一切都要经过审批，不准向美国的报纸、杂志或其他宣传机构直接议论军事或外交政策。”从这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沉默了一阵子；但是，盘踞在美

国参议院里的另一个有权有势的集团，这时候已接过了他的战斗口号，这就是新近在中期选举里取得成功而恢复了元气的共和党塔夫脱派。

政府在11月份的选举中遭受了进一步的挫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由十二降至二，在众议院下降了三分之二。在伊利诺斯、依阿华、犹他、加利福尼亚和马里兰，那些拥护政府外交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都败给了共和党人，后者把外交政策作为主攻方向之一。政府的三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民主党多数派领袖，参议员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还有多数党组织秘书、参议员弗朗西斯·迈耶斯都已落选；另一方面，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伯克·希肯卢珀，尤金·米利肯，霍默·凯普哈特，亚历山大·威利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却重又当选。其他几个选上的人，是支持国民党中国和拥护麦卡锡的，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约翰·巴特勒和理查德·尼克松，他们加强了政府的反对派。在国际危机的严重时刻，这些人的东山再起说明，选民们对这些议员的讲话，显然是用心听的。他们把中国的“丧失”和共产党的其他一些胜利归咎于美国政府内部的阴谋，他们投票选举这样的候选人：主张更强硬的反毛政策，削减经济援助，少听些西欧盟国的意见，彻底“清洗”国务院，国务卿当然是首当其冲。理查德·斯特宾斯后来指出，政府在欧洲和亚洲的政策虽然在颇长一段时期内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从来不知道这些批评是否真正代表着国内大部份人的意见。而在“11月7日以后，可以确信，美国人民中的大多数已不赞同政府的策略，并对其目的也开始怀疑起来了。”

这次中期选举是两党在对外事务上的合作破裂后举行的

第一次选举，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国民党中国的崩溃，很多人在怀疑政府的无能和不忠，美国原子垄断的结束，还有那朝鲜战争，如果不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也突然威胁着要和中国进行一场大战。某些国内的因素使抑制政策受到挫折而幻想破灭了，这一政策在许多方面看来无法进行抑制，只有使美国更加不安全。这些因素，加上所有的其他原因，在1950年的选举中，对外交事务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据塞缪尔·卢贝尔的意见，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国家早已因二十年的赤字开支而债台高筑；最初是把国家从萧条和大量失业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稍后就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打仗，并把他们打败；接着就重建欧洲的经济，使欧洲不受共产主义的统治。税收很高，广大群众都不愿增加税率去搞更多的援外承诺。此外，以商人为例，他们希望避免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也不要政府管得过多；复员军人也不愿再打一次战争。卢贝尔最后说，朝鲜战争是在这样的一段时期里进行的，当时很难“平衡商人、农民和工人之间，以及他们和没有组织的公众之间的利益。”另一个美国政治舞台的老练的观察家阿瑟·克罗克看来是正确的，在选举揭晓后的第一天，他简明地总结了中期选举的结果，他的话很短：国务院在这次选举中是失败者。

参议员塔夫脱，现在是共和党在国会中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很可能是1952年的总统候选人，他赞同这些意见，并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从两个具体方面来解释共和党的胜利，特别是他自己在俄亥俄州的辉煌胜利。第一，胜利表明，反对本身就是个好策略，只有对政府的所有建议进行激烈的批评，共和党的保守派——唯一“地道的”共和党——才得以在国会中增加席位和影响，从而赢得1952年的总统选举。1948

年，杜威和他的异端的“国际主义者”在选举中失败，是由于他们搞的是温和的“随声附和”的竞选运动；1950年，共和党人增加了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是他们打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硬仗的结果。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塔夫脱认为，象他那样类型的共和党人要当选为总统——保守派中有谁比他更适宜于去竞选总统呢？——只要像在俄亥俄州曾经获胜那样，打上一场相仿的硬仗。据同情他的传记作者威廉·怀特说，塔夫脱确信，他重新被选入参议院意味着俄亥俄州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怀着极大的好感。只要凭借他的“出色的、无坚不摧的攻击来搞竞选运动，就能使他，或者其他真正可靠的共和党人在任何地方获胜。”怀特又说，塔夫脱从未想到过，在俄亥俄州，成千上万的人投他的票，“根本不是赞许他过去在国会中的业绩，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感觉，认为不让一个最有权势的、在全国、甚至全球享有盛名的同乡回到参议院去，从历史上来看有点说不过去”；他也没想到他的获胜是由于对手约瑟夫·弗格森几乎是个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声望的人；还因为有些劳动群众厌烦拉选票的人粗暴地告诉他们该投谁的票。

第二，选举的结果证实了塔夫脱在选举前的估计，那就是共和党对政府的攻击不应局限在国内的政策上——因为塔夫脱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人看来很难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他们应当继续加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攻击。这方面是猎取选票的好题目——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阿尔杰·希斯和近年来更多的一些间谍案件；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的崩溃。他选择对外事务作为党派批评的主攻目标，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特别是塔夫脱自己对于选举的期望，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竞选当总统。这里还

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问题。在野党的作用就是要反对；它的作用就是监督执政党对外交政策负责，为了维护美国的安全，决不允许执政党打着两党合作的旗号，掩盖错误和失败。

共和党人迅速开始行动，创造激烈反对的纪录，在公众面前，提出他们的另一套政策。他们的战略分为两类密切配合着的攻势。第一，他们攻击国务卿艾奇逊，并要求他辞职，尽管他反苏的立场一直是坚定的，战后有人提出俄国具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警告，艾奇逊是最早的一个。他曾负责制订杜鲁门主义，拯救了希腊和土耳其，并防止了苏联在中东、南亚和北非打开缺口；马歇尔计划重建了欧洲，在全球力量的平衡中，把这个决定性的力量放在美国的天平盘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军事上把美国和欧洲联结在一起，并且把西德的力量也罗织在西方大国的一边；他曾带头建议美国接受共产党在朝鲜的挑战。这些功绩颇可证实埃尔默·戴维斯的预见，历史学家有一天会把艾奇逊列为美国第三个最伟大的国务卿，紧随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威廉·西沃德之后。

然而艾奇逊作为国务卿，是美国介入全球事务的象征，随之而来的恐慌和失望，大部分都集中在他身上。早在艾奇逊受围攻的五十年前，有卓见的观察家亨利·亚当斯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往往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世界各地决定一切事务，于是老百姓就会失望，就要通过国会猛烈抨击国务卿。“国务卿总是形单影只，象个历史学家。他必需高瞻远瞩，在党的负责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估计各方面的力量，在国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经发觉国会或多或少地对他怀有敌意。国务卿的设立只是为了认识国会容易忽视的世界的另一面……自参议院成立的第一天起，只要国务卿的行动不得已地超过指派领事的权限时，它就往往阴谋反对国务

卿。”这是容易理解的：国会不愿面对选民，要求他们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军，也不愿批准增加税收，用作更大的军事开支，并继续在经济上援助朋友和盟邦。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有政治风险的任务，特别是因为政治家没法向选民们作出保证，说世界上的一些问题能很快得到解决，好象这些问题确实能获得解决似的。在对外事务上，国会议员也没法向选民许诺，说他们的负担立即可以减轻，他们的牺牲很快可以结束；他们提不出一个除此以外、别无抉择的最妥善的外交政策。

所以，国务卿艾奇逊不仅是个引人注意的目标，他还是个易受攻击的目标。他在国会中的地位向来不是很高的；在民主党内，他从不曾有过一批拥护者，没有发挥过多大的影响。他依靠其他三方面的支持：白宫的撑腰，他的政策成功，以及他对辩论的擅长。但是总统在国会中也从未享有过高度的声望。蒋介石政府的崩溃，阿尔杰·希斯伪证罪判决后、国务卿关于不背叛朋友的声明，引起了很多人对艾奇逊的怀疑；他惯于让“对手下不了台”的做法惹恼了许多国会议员，其中很多人看不惯国务卿孤芳自赏和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派头——漂亮的小胡子，做工讲究的衣服和黑色的窄边帽。总之，艾奇逊在国会里没有什么朋友，选举的结果使他更容易挨打。因为这次选举的意义不仅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丧失了关键性的席位，而且今后将不会有民主党人站出来替迪安·艾奇逊辩护，对任何批评，甚或是无耻的诽谤进行反击。

配合对国务卿的这些攻击和要求他辞职的呼吁，塔夫脱集团对政府的整个外交政策，特别是欧洲政策，发动了正面攻击。11月13日，参议员塔夫脱提议美国应该“重新审查”它对欧洲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范围、方法和性质——这下惹恼了艾奇逊，他把塔夫脱比作“一个每天清晨把所有的

庄稼拔出来，检查一下它们在晚间长得怎样的农民。”然而，此后不久，这个参议员达到了他的愿望。政府由于担心苏联或许会学共产党中国的样——只是在世界的另一方——派了四个师去加强欧洲的防务，并委任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统帅。参议员塔夫脱立即责问总统，未经国会批准，根据宪法，总统是否有权派出这些军队。塔夫脱认为，“我们此刻最好不要派美国部队到欧洲去，……我们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派军队去欧洲。”两天以后，共和党在议会中的领袖，参议员惠里向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现决定，在国会制订出具体政策前，参议院认为，不应当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调美国地面部队去欧洲地区驻防。”

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随后持续了好几个月，一般称之为“大辩论”。中心问题有三个：美国地面部队，除了作为德国的占领军外，是否应调去欧洲？如果应该调去的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下，美国有义务在欧洲驻扎多少个师和人员？总统不经国会的批准是否有权调遣军队？这些问题不是在有利于反复思考的气氛中进行讨论的，而有关国家存亡的各种战略却需要平心静气的考虑。11月底，联合国军取得胜利的前夕，共产党中国全面干预朝鲜战争，结果联合国军败绩，长距离撤退到三八线以南；麦克阿瑟声称，妨碍他取得战争胜利的是政府给他的种种限制；伤亡人员日益增多；还有我们最密切的盟友明确表示愿向共产党中国让步，以求结束战争——这一切都加速了美国人民对冷战的幻想的破灭。他们激烈反对政府和美国的欧洲盟友的情绪，表现为共和党人猛烈抨击政府的欧洲政策；他们不愿忍受经常性的全球介入和“纠缠不清的联盟”所带来的痛苦，同时又想攻击总统和国务卿，反对英国和法国，反对共产党中国。他们找

到了一个发言人，这就是参议员塔夫脱。在表达公众的既要闭关自守、又要积极进取的矛盾心理方面，塔夫脱不仅是“共和党先生”；他变成了“美国先生”——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形象，直到麦克阿瑟将军，一个更为戏剧性的天神似的人物从战场上回来。

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4月，塔夫脱和他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以及国会外的一些人，象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从三方面指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政策。首先，这一政策，滥用了美国的经济力量，假如它再继续一段时间的话，确实将导致全部经济的崩溃。塔夫脱表示深切的忧虑，他唯恐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度强调……在欧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美国或许会派遣“远比”六个师更多的军队去欧洲大陆。“假如我们自己对欧洲计划的承诺不加限制的话，我们将不断地扩充军队，并因此付出庞大的开支。在欧洲大陆和俄国本土，基本上能担负起打赢一场反苏战争的军队，其规模和费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事实上，总统目前计划中所设想的仅有的二十五个师——“要控制欧亚大陆显然是不足的”——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我们经济能力的极限。

其次，政府政策使美国在欧洲承担了“地面作战”的义务。这是个不明智的战略设想，只会刺激俄国“打一场本来可以不打的战争”。政府或许会申辩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但是美国“需要有在一个晚上能转变成进攻武器的适当的防御力量”；俄国也许十分担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新武装，特别是美国军队的增加，可能会威胁它的安全。“假如俄国人不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我认为，只有在我们这方面给予刺激才可能改变他们的主意而开始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是创造一个形势，使俄

国人害怕我们将入侵俄国，或者侵入紧邻的卫星国，构成今后入侵俄国的威胁。”除了形成这种挑衅外，政府的地面战略，打起仗来只会对共产党有利，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也只会打败仗。美国军队在欧洲很容易被孤立；俄国人能迅速地用原子弹炸毁那些我们军队赖以得到增援和补给品的港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来一个美国的敦刻尔克*。总之，民主党的战略是在为几百万美国兵准备墓地；它将逐步耗尽一切西方文明的活力。在拿破仑的大军和德国人的二百四十个师战败过的地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六十个师是打不赢的。因此，美国必须依靠海空军的优势来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不让敌人入侵西半球。

第三，这种几乎全部依靠海空军的力量以对抗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强国的战略，使欧洲成了可以牺牲的地区。“根据我的意见，”塔夫脱说，“我们完全能保卫美国本土。”即使失去了欧洲，赫伯特·胡佛断言“美国人也没有理由对我们的安全和未来变得歇斯底里或丧失信心。”必要的是保存这个“西方文明的要塞”。塔夫脱和他的支持者就这样否定了政府的基本设想：即欧洲对美国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欧洲大陆和英国，由于战祸、破坏和饥荒必须在美国的卵翼下首先给以护理，使它恢复健康和力量。他们宣称，欧洲基本上是个健康的社会，假如它具有必要的决心的话，是完全能够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来自卫的，因为所缺有限；没能建立这样一个防御体系的原因，共和党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欧洲人传统性格的象征：怠惰、不可靠、不守信用。欧洲国家有着充足的人力、自然资源和工业，完全可以建立他们

* 法国港口，1940年英远征军由此撤退。——译注

自己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缺乏的是意志力。欧洲防务主要应当由欧洲国家自己来搞。用塔夫脱的话来说，“主动的应当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不愿意把美国军队派到欧洲去，除非有“充分的成功机会”；然而，因为他曾对这种成功表示过极大的怀疑，因此，塔夫脱实际上是在说，在欧洲变得强大到不再需要任何美国帮助之前，美国将不会派兵支援欧洲的防务。或许由于赫伯特·胡佛不再打算竞选当官，他更直率地说，进一步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先决条件应当是，“有组织的、配备齐全的战斗师，其数量之大，如同建立起牢固的水坝，足以防止红色的水灾。”

这些批评，除了暴露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的反欧偏见外，再次显示保守的共和党人顽固地抱着他们的理想不放，那就是实行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理想决定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整个立场。他们反对强大而有实权的行政机构，害怕会引起独裁统治，取消一切政治和公民的自由；他们反对大量开支，因为这会使政府有机会搞“社会主义”经济，控制工资和物价，不让它们螺旋上升。他们反对高税率，因为这会窒息私营企业的积极性。然而比起新政来，执行这个对外政策更需要这些条件：能处理我们和外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庞大的政府；一个能当机立断、拥有实权的总统；一笔巨额拨款，足以维持相当规模的军备力量、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总之，根据共和党保守派的哲学，积极参预世界事务就不能保持政治民主和企业自由，也就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基石。不仅是战争，即使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必需用来防止战争的军事力量也会损毁这些基石。为了维护国内的社会制度，保守的共和党人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和美国的自给自足。他们不会首先估计国际形势，然后决定是否需要提供更多的

经济援助或扩大武装部队，或确定总统按宪法是否有权调遣美国军队去朝鲜或欧洲。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就加以反对。他们永远不能正视事物的另一方面，也不肯问问自己，为了国家的生存，美国的民主制度难道确实不能扩大总统的权力或增加预算了吗？那样做将意味着放弃他们的基本信念：外交政策必须绝对服从国内政策的需要。

结果，塔夫脱那帮共和党人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保卫美国周围的海洋。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大洋的深度和宽度，而不是敌人的力量和意图，敌人隔洋窥视着美国这个堡垒，而近代技术的发展已把大洋变成了小湖；他们不关心政府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军队，以保证美国人民有一定的安全感。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美国堡垒”里坐等共产党为他们安排好的命运；他们唯一的信念里，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能自给自足；他们唯一的计划就是美国必须“不管闲事”——当然，蒋介石和佛朗哥是例外。这不是三十年代的孤立主义，两者的策略是不同的，但是基本态度是相似的。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抨击影响了政府的欧洲和远东政策。共和党人坚持认为，总统在未取得国会批准前无权调遣军队去欧洲，这一点已写入1951年4月4日提出的麦克莱伦决议的折衷方案。这个决议采纳了政府调遣美国军队承担欧洲防务的计划；同意遴选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最高司令。但是这个决议也包含了共和党人的所有要求：美国军队的调遣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今后向国外派遣任何增援部队也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欧洲人必须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作出主要的贡献。为了强调这最后的一点，决议要求总统每六个月向国会报告一次欧洲防务的状

况。尽管如此，损失已经造成。

四个月的辩论表明，许多美国人对政府关于欧洲是美国“第一条防线”的基本设想是怀疑的，或者是反对的。因为虽然国会最终批准了总统派四个师去欧洲的决定，但是胜利还属于那些不信任政府欧洲政策的人，他们希望限制美国对欧洲国家的支持，如果不是一下子停止的话。一个法国记者总结了欧洲对这次大辩论的印象：国会，特别是参议院，看来是世界上最不稳定和最无法预测的立法机构。它使总统在抵制麦克阿瑟对政府的舆论攻击中不能采取果断的行动，它动摇了确立美国政策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位记者说，欧洲不再把总统看作美国的代表而是把参议院等同于美国。参议院不信任欧洲，欧洲以牙还牙，也不信任参议院。“假如不立即建立信任的基础，就会在政治上产生明显的影响，问题就很严重。同时，大西洋联盟的精神和政治基础，势必在不信任中趋于瓦解。”

共和党人对政府欧洲政策和盟国的攻击，也影响了它的远东政策；他们加紧在政治上支持麦克阿瑟，增加对政府的压力，要求采纳他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迫使政府无法听从盟国的愿望，那就是在共产党中国所要求的基础上，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同意它加入联合国，并把美国舰队撤离福摩萨。假如政府为了维护盟国间的团结，同意向北京作出这些让步的话，那么，共和党人就要以政府取消在欧洲的承诺相要挟。共和党人声称，他们只要美国在亚洲奉行它早已在欧洲实行的政策。“广义地说来，”参议员塔夫脱说，“我争论的对象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在欧洲全力以赴、甚至做超越我们能力之外的事，同时却拒绝对远东执行我们总的方针和战略。……（而在朝鲜，）政府不肯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一切现成的手段，

其理由是我们可能会刺激俄国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在欧洲，我们却毫不犹豫地几次三番肯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当我们介入希腊支持当地政府时，俄国人可能会介入支持共产党。在离莫斯科那么近的土耳其建立陆军和空军，其对俄国的威胁远远超过轰炸满洲的中国供应线。”塔夫脱一伙共和党人要求在亚洲执行同样强硬的政策。

塔夫脱实用主义地忽略了他观点上的矛盾。1950年6月，他认为北朝鲜的侵略是受了苏联的鼓励，他曾担忧这次侵略“可能导致反苏战争。苏联完全有可能派兵支援北朝鲜，目前有限地区的冲突可能会扩大到整个文明世界。”在共产党中国干预后，他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和侵略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他现在发觉，没有迹象显示俄国本身有进攻的意图。“我认为，只要不派兵入侵中国，俄国不会把轰炸中国看作是对俄国本身的侵略行动，也不会被当作发动战争的藉口。”所以他全力支持麦克阿瑟的建议，轰炸鸭绿江彼岸，对共产党中国实行经济和海军封锁，并“听任”蒋介石入侵或者摆出入侵的架势以威胁“华南，使之骚动不安。”在亚洲，他不大关心“更强硬的”美国政策会把朝鲜战争转变为全球性的大屠杀；他心甘情愿地冒这个风险。但是在欧洲，他害怕他希望在亚洲实施的“更强硬的”政策会惹恼苏联。他过去投票反对批准北大西洋公约，大辩论期间，他又反对派遣美国军队去欧洲的理由之一就是，他认为，俄国人也许会因为感到他们的本土或卫星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而发动进攻。

塔夫脱认为，共产党中国参战之前，苏联是个威胁，之后，就不存在这个威胁；与这条分界线相一致的是，他把美国反对北朝鲜的战争看作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把目前政府和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战争认为是“民主党”或“杜鲁门”的战争。战争爆发后，他曾同意杜鲁门总统参战朝鲜的决定——虽然按宪法说来，总统的这个决定是不合法的——因为这说明政府终于对远东采取了遏制政策，而不再把它局限于欧洲；他欢迎总统采取更为坚决的反共政策，这正是他和他的同僚在六个多月中竭力促使政府执行的政策。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扩张主义意图的暴露；所以，共产党的侵略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因此，政府参战的决定成了全国一致的行动，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共产党中国干预以后，塔夫脱改变了他的主意。朝鲜战争从来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联合国是根“脆弱的芦杆”，它把美国“吸”去办力不从心的事情。总统轻率地把手头所有的美国兵都派到朝鲜去了；杜鲁门先生这样做“完全是篡权，宪法没有赋予他这种权力。”另外，在“惩罚侵略者的政策显然不能贯彻执行”之后，美国的盟国为了“姑息”北京，正在疏远美国，要跟共产党中国打仗，明摆着“是完全不可能打赢的。”塔夫脱在两种主张之间徘徊着：一是美国从朝鲜撤退，守住更容易防守的日本、冲绳岛和福摩萨一线；二是推行麦克阿瑟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在这方面，塔夫脱也是前后矛盾的。

然而，不管塔夫脱是如何的前后矛盾，他抨击美国政策的总影响是，不让政府在外事方面有任何程度的机动灵活。当然，这种日益增长的死板僵硬的现象，自从1950年初以来就已很明显了。它第一次表现在6月下旬，决定保护福摩萨的时候——虽然总统当时曾补充说，第七舰队的存在并不承担永久保护的义务，一旦恢复和平，“最复杂的问题也可得到解决。”推测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可以在那时最终澄清并采取新的对华政策，允许中国共产党入侵这

个岛屿。但是，在1950年6月至11月下旬期间，当中国首次全力进行干预时，美国政府被迫逐渐稍稍向蒋靠拢。7月28日，国务院宣布，他派了一个代办去福摩萨的首府台北。7月31日，麦克阿瑟将军访问了该岛。四天以后，麦克阿瑟将军的代表、福克斯少将抵达台北，开始考察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并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汇报。

北京参战后，美国更加接近国民党领导人。在1951年的头三个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高达三亿美元，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援助顾问团，担负训练任务。国防部发言人宣布，运往福摩萨的军火同运往欧洲的军火享有"同样的优先权。"与此同时，政府在口头上同意共和党人在对待福摩萨和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永远"不会让福摩萨陷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它将继续投票反对北京加入国际组织。这个问题在四十六个国际组织中已经提出过七十七次；只有在一次万国邮政联盟的投票中赞同接纳共产党中国，但过后不久，又给否决了。然而美国并不希望利用否决权来维护它的立场："假如中国共产党人在联合国的四十五个组织中占有席位，而只是在一个组织中没有席位的话，否决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如果美国一旦发觉自己处于少数地位，它将请求国际法院予以裁决；尽管如此，美国并不希望自己处于少数地位。重要的是说服大多数国家相信美国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申请者不能以暴力来谋取联合国的席位，也不能采取蔑视联合国并攻击其部队的手段来进入联合国。"

可是，政府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新调子却强硬起来了。调子确实变得很强硬，1951年5月1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讲话，听起来很象要煽动共产党中国内部的革命，还

要求美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

> ……美国不会默认强加于他们（指我们在中国的朋友）的衰落，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我们不承认北平政权，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北平政权可以算是一个俄国殖民地的政府……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它没有经受过任何检验，它不是中国人民的。……
>
> 我们承认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虽则在它控制下的领土非常有限。我们认为它真正地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见，特别是他们摆脱外国统治谋取独立的历史要求，那个政府将继续从美国得到巨大的援助和支持。

政府再一次拥抱了——肯定是勉强地——蒋介石。这一行动是美国国内政情对外交政策产生双重影响的象征。它一面对政府增加压力，要它在必要的时候单方面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同时又堵塞了与共产党中国协商解决战争的途径，而停战正是我们欧洲盟国的强烈愿望。

第九章　盟国寻求和平：艾德礼先生和毛泽东—铁托

没有比西欧对于进攻中国大陆的提议感到更为焦虑不安的了。英、法及美国其他大陆盟国刚遭受过战争和沦亡的灾祸，他们仍继续在从事复兴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不反对扩大战争而作出任何其他的反应，那将是不可理解的。在他们看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只会导致以下两种后果中的一个：它可能引起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或许仅局限于远东，但是美国的力量将因此而转移至亚洲，使欧洲没有象样的防御力量；也可能由于轰炸中国和满洲而招致苏联的干预，战火就不能局限于远东，欧洲将很快遭到红军的侵犯。对于欧洲人说来，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中期选举里共和党人影响的增长，和国会及公众对麦克阿瑟战略计划的支持，使上述两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有了现实感，这可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国会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的这个冬季里，情绪看来是好战的。1月19日，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应当采取行动，并立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当局是朝鲜的侵略者”；四天以后，参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相似的决议，要求谴责共产党中国。美国好象愿意打上一仗，只等麦克阿瑟一声令下。美国公众看来不考虑一切

后果，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党人的新挑战，这种情景使大西洋盟国感到惊惧。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并暗示是否使用完全由麦克阿瑟将军自己作主。于是，战争真要扩大的危险，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了。总统随后又声明，“根据法律，唯总统有权批准使用原子弹，但我至今还没有把这种权力授与任何人”。可是这丝毫也不能减轻人们对原子屠杀的恐惧，因为总统有话在先，杜鲁门先生认为，使用原子弹只要由美国来作出决定，而我们的盟国则认为，“象这类重要事项不能随便代替联合国作出决定，必须事先和目前在朝鲜参与国际警察行动的成员国进行最充分的商讨”——或者，用现代话来表达著名的美国革命口号：“没有代表们的协商一致，就不能打歼灭战”。

在总统发表他令人注意的讲话九十六小时后，艾德礼首相抵达美国，进行四天的国事访问。会谈期间，首相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国家。会谈在形式上当然是双边的，但是双方所讨论的问题，对于所有北约组织成员国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艾德礼动身离开伦敦前曾和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进行过会谈，由此可见他这次访美的重要性；根据法国和英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他们两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形势已经有了普遍一致的看法。艾德礼这次来到华盛顿，既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国的领导人，又是整个西欧的发言人，这是非常现实的。他的使命是确保在朝鲜问题上，一切重大决策必须协商一致，从而防止美国过深地陷入朝中的战场上。

首相关切的确实是个最根本的问题：战略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决定和共产党中国大战一场，将会削减美国本来可

以用在欧洲的力量，在重建欧洲的任务完成之前，减少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还可能迫使政府——由于环境所驱使，也由于共和党人的压力——把欧洲降到次要的地位。作为英国和西欧防御堡垒的北约组织，就将因此而被剥夺去军事力量、经济繁荣和政治压力，剩下的只是写满美丽辞藻的一纸空文。当然，假如俄国人越过易北河发起进攻的话，美国仍将有义务出兵应战；但是这样的攻势很难阻挡，俄国人必定能直逼英吉利海峡。虽则另一个大规模反攻的日子终于会来到，然而美国人进入的将是一个被原子战争破坏了的大陆。总之，他们解放的将是一堆废墟。

所以，防御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安排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俄国使它不敢进攻，或者在他来犯时，把它打回去。英国人和欧洲人不愿在朝鲜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或者过多地把北约组织所属的有限力量，投入遥远的亚洲半岛上去打“消耗战”。这个基本理由即使是温斯顿·邱吉尔先生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也会坚决同意的。没有人会指责邱吉尔是个“姑息者”，也不会说他对美国缺乏同情。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他作为反对党领袖期间的几段讲话就行了：

> ……（苏联的）计划显然是尽力促使美国和联合国深陷在中国，这样就可以阻止欧洲防御力量的增加，使之不能成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声东击西，这是人人皆知的战略和战术方法，几乎已经用滥了。……毫无疑问……联合国应当千方百计地避免和中国打得难分难解，脱不了身。
>
> ……虽则远东对我们的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个牵制而已。我们应当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致命的危险也在这

里。或许由于我们居住在欧洲或欧洲附近而怀有偏见，但是人们应当认为，我们自然形成的偏见，对客观事物没有任何歪曲。

邱吉尔先生的讲话令人钦佩地概括了英国人和欧洲人的论点，再也不要作任何补充。

假如英国对欧洲安全的关心——欧洲毕竟是通向英国本土的必经之路——是她主张美国在远东要加以克制的基本原因的话，那么她还有好些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或许是英国关于中苏关系前景的看法。总的说来，英国人对此比较乐观，他们认为毛泽东政府的性质有别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

这种信念只是部份地基于工党左翼成员的设想，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就象十九世纪英国的激进分子，其宗旨是承袭西方的民主路线，改革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这种幼稚的态度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不是无足轻重的，即使艾德礼政府愿意采纳麦克阿瑟的战略，但其影响可能会造成工党的分裂，使只有微弱多数而掌权的政府垮台。假如哈里·杜鲁门不能忽视在野党谴责他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太软弱”的喧嚷，克莱门特·艾德礼对自己党内指责他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太强硬”的呼声，自然也不能装聋作哑。

然而，这种信念的主要根据是希望中国不要被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土生土长的党；他们取得政权，靠的是卓越的组织，坚强的意志，还有更大的团结愿望和明确的目标。英国人深信，假如给新中国以适当的鼓励，并使之与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它的政府就能够同莫斯科断绝关系，还可以利用它抵销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英国人同样深信，美国敌视北京，继续支持蒋介石，只能使苏联和共产党

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英国的政策是打算提供另一条途径，鼓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把名字改为毛铁托。很明显，英国的政策完全是推理出来的，因为1917年后，西方敌视新生俄国的政策效果并不好。根据外交大臣贝文的解释，俄国对西方大国的仇恨，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沙皇帝国崩溃后对俄国进行干预的结果，还因为他们在战后试图孤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苏联。西方的这些行动，加深了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敌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倾向；西方的友谊和信任，本来是可以克服这种思想上的猜疑的。美国和英国不该再次把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当作社会所排斥的人来对待，西方应该取得它的信任，而不要惹起它的对立情绪。

中国广大群众已经抛弃了曾和美国沆瀣一气的蒋政府。假如杜鲁门政府现在利用蒋的反共而再度把封建统治强加于人民的话，美国将会失去中国人民的友谊。地主阶级曾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社会支柱之一；结果是国民党不能满足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渴望。没有一个政权甘愿自取灭亡。中国共产党由于主张土地改革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美国支持的蒋政府作为社会上的反动派，已经信誉扫地；相反，毛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尊的化身。

英国政府认为，美国虽然具有反殖民的传统，但它既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也未看清其反对西方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敌意只会加强群众对毛的支持，稳定中国人民和他们新政府的反美情绪；美国仇视毛并继续支持蒋，就会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并使农民担心失去即将分给他们的土地，这两条都对共产党政权有利。另一方面，西方对新中国的友谊和支持将表明，西方大国，

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群众的民族和社会愿望并不怀有敌意；美国和英国将成为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象征，而不是殖民主义和社会反动派的代表。英国政府声称，由于认识到印度人民要求自治和较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它就没有疏远印度，使她留在自由世界这一边。只有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毛的中国的愿望，美国才有希望保持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并取得他们新政府的信任；忽视这些愿望，就会把毛推向斯大林的怀抱。

所有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确实都在注视着西方接受还是拒绝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是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还是以武力来推翻它，他们是支持亚洲人民的革命愿望还是和反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在亚洲人的眼光里，中国是西方对亚洲新潮流的了解和同情的试金石。就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对英国政府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如印度政府作出是否留在英联邦内的决定一样。印度是它最大的成员国。

英国政府向西方大国提出两个可以采纳的方案，以谋求毛的转化和赢得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同情。第一个方案是承认毛的政权作为大陆中国事实上存在的政府，并和它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本身已经在法律上承认了它。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影响英国对它的承认；毛看来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大陆；况且，英国并不赞成有些国家的政府形式，如俄国，但几个世纪来英国一直和他们有外交关系和来往。当然，和共产党中国的完全外交关系还有待于争取，但是在北京有一个英国代表无论如何比一个也没有要好些。第二个方案是同意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这是在承认新政

权对大陆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有效统治后的必然逻辑。不论是承认还是同意进入联合国，都不是什么道义上的或者是该不该的问题；两者都是事实问题。假如毛的政府在蒋从大陆撤退到福摩萨后立即获准进入联合国的话，西方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可能会和谐得多。正如外交大臣贝文1950年11月29日在下议院的外交政策辩论时所阐述的，“假如国际组织中的会员国有共同讨论问题的机会的话，当前我们在远东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困难也许避免不了，但会员国现在必然会协助解决困难——因为，用艾德礼的话来说，“对另一方的‘讨厌家伙’的存在，装作视而不见，那样的态度是没有用的。”朝鲜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联合国，“我个人认为，这样我们会少丢些面子，跟别人在联合国外打交道是挣不了什么面子的”！一旦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内有了席位，“我们与他们交涉时，就有可能利用联合国原则来和他们辩论，他们不在联合国内，这就没有法子办到。”这里，再次表现了英国的信念：毛泽东政权多少有别于其他共产党国家，因为上述这些言辞意味着，一旦中国共产党人获准进入国际论坛，他们将不会和苏联伙伴完全一样，他们在理解宪章条文时，会更符合西方的民主思想。

在了解英国立场时，还应当注意到第三个因素：英国人看待朝鲜战争，特别是对中国人的干预，和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英国在朝鲜的利益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美国作出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其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承诺：苏联侵犯欧洲时，美国将作出同样的反应。正如《经济学家》在战争开始后不久所指出的，“有人怀疑，美国是否真的会援助被侵略者，现在答案已经明摆着了。”然而，与此同时，英

国却不愿深陷到这个和他们并没有多大关系的半岛中去。

由于深信中国的干预至少部份地是因为美国政策不明智的缘故，英国就更不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和美国的力量过多地投入朝鲜。一名国会议员表达了英国人普遍持有的这种看法，他说，在他看来，联合国的向北进军和对北京警告置之不理，惹出了共产党中国的干预。“中国在朝鲜的行动，和历史上任何其他大国在相似情况下的行动如出一辙……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为了防止敌军占领低地国家或法国的海峡港口而派兵出战。因此，我们终究必须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人是有道理的。我们自己不应当由于在国际政治中的优越地位，而表现出过分的自满和德高望重的样子。”邱吉尔先生是美国的忠诚朋友，就连他也赞成这样的立场，他当然提得更加巧妙。他说，他曾希望麦克阿瑟将军的挺进会停止在朝鲜半岛的咽喉部或中部，留出一块当时可由联合国空军控制的无人区。

突破一条严密的防线不仅需要集中大量的炮兵，而且还要有高度集结的装甲部队。这些部队都是占优势的空军的明显目标。看来，如果中国军队要进攻这样一条防线，可以肯定，他们会在更大程度上重复我们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痛经历，如在索姆、帕森达尔、以及其他浴血激战过的地方，我们曾多次吃过苦头。我不禁有这样的感觉：假如两国首脑在适宜的时刻，能在华盛顿，对这些事情及时进行磋商的话，一切就好办了。

邱吉尔先生固然策略地不给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任何批评，工党的左翼成员却忍不住要触美国的神经。“我本来以为”，一名工党成员在谈到11月7日中国人脱离接触时说，“假如中国人后撤一段长距离而我们并不去追击，假如他们

存心让出这大块无人区，并着手释放一些俘虏的话，那他们是打算坐下来找人谈判的。我们不但没有派人前往和他们谈判，麦克阿瑟将军反而选择这个时机，在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中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攻势。”总之，是麦克阿瑟将军挑动中国人出兵朝鲜，并把世界推向原子战争的边缘。

除了工党左翼，不信任麦克阿瑟将军者大有人在。英国人几乎都不喜欢或赞赏将军傲慢的态度、咄咄逼人的言辞、过份的自信以及急于求成的性格。英国人看不惯麦克阿瑟的部分原因，是民主社会的正常反映，他们往往不信任那些急于制订政策，扩大战争范围的将军；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相比，则后者谦逊、友善、肯合作、好商量，所以得到人们的崇敬和好感，这就使欧洲人更加不信任麦克阿瑟。另一部分原因是，麦克阿瑟成了几乎全体英国人的活靶子，他们认为西方和新中国之间没有基本矛盾。他们认为，假如美国不跨过三八线，麦克阿瑟不发动“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也不阻挠在北朝鲜建立一个缓冲区，那么，北京本来是不会出兵朝鲜的；假如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亲国民党的国会支持者，不为蒋的失败所激怒，审慎地让政府采取英国“较明智的”和比较妥协的态度对待北京的话，那么，即使到了那时候，战争和一切突出的远东问题都还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英国人也在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不负责任、急躁和轻率的危险性格中，看到了他们大洋彼岸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小兄弟”的典型，后者希望自己年青充沛的精力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而完全不考虑后果。英国人感到气恼的是，大英帝国是政治上“成熟的”强国，长期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在居然给刚愎自用的美国当起配角来了！看来只有英国的智慧和美国的膂力相结合才行。

因此，英国人担心，假如政府目前顶不住麦克阿瑟将军与共和党塔夫脱集团正在对它施加的压力，世界完全有可能很快就打第三次大战，那是十一年中的第二次。由于大多数英国人不赞同美国的远东政策，麦克阿瑟就成了这一政策的象征，因为将军坚决反对共产党中国，寸步不让，一般人差不多都认为这种政策很危险，容易惹起战争。

但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英国采取调和的态度，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的安全，和同共产党中国通商有利可图。在他回国后，麦克阿瑟作证说，“香港目前是大量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涌向红色中国的通道。”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一份报告表明，在1951年2月份的下半月和3月份的第一周期间，有二亿一千万港币（合四千万美元）的属于美国战略物资清单中的货物流经香港。麦克阿瑟列举了这个“简明清单”中的一部份：“多种化学制品……仪器及附件……无线电另件……机器及燃料……矿石……，各种药品……金属……实验设备……汽油。”当参议员诺兰问他，这些进口物资是否对中国共产党人会有实质上的帮助时，麦克阿瑟回答道，“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军队活动的命根子。”

英国人否认香港的安全和对华贸易在决定英国对北京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朝鲜战争之前，英国已经全部禁运武器弹药，并对共产党国家和平时期正常消费的物资和产品，凡有战略价值者，也限制供应。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这类限制变得更为严格。商务大臣哈特利·肖克罗斯先生在1951年5月宣称，英国和它的殖民地没有向中国出口过任何会构成军事潜力的物资。“非常明白，对于在国际支付中不大依靠出口的一些国家来说，必然会采取较严格的

限制。但是事实上，应当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除美国外，比较其他国家要更为严格。”那种以为英国把大量增强中国作战能力的物资运往香港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完全不是事实，没有丝毫的根据。”

为了证实这一点，哈特利先生以英国向共产党中国出口橡胶为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主要依靠出口橡胶的收益，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依靠这些货源。然而，英国发觉1951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橡胶已经超过民用的需要量，并且完全可以供他们用一年；因此，它要求马来亚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保证在当年不再向中国出口橡胶。英国政府愿意收购马来亚和新加坡已订购的橡胶；这将增加英国正常的收购量。哈特利先生指出，任何别的橡胶生产国都没有以英国为榜样。

其余贸易中的大部份确实都通过香港，但香港是个国际港口：美国货和英国货一样，都通过它进入共产党中国。这种贸易以及进口原料、输出成品的地方工业是香港的生命线；总之，断绝了贸易，两百五十万居民就无以为生。此外，这个岛屿还得靠中国供应食品和饮水。对香港的贸易作出如此严格的限制，将造成食品的严重短缺，并为共产主义的诞生创造经济和政治条件。香港虽然高度依赖同中国的贸易，香港政府除了完全禁运武器、飞机和弹药外，还限制了两百多种工业品的出口。

从麦克阿瑟列举的清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的关注，那就是不让共产党中国取得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首先，这份清单，并不如麦克阿瑟所说的，是由美国总领事开的，而是由香港政府编写的；这是严密监督对中国的出口，并检查统计数字的部分材料，由英国提供给美国当局的。麦克阿

瑟列举的战略物资，如柴油，汽油，煤油和润滑油等，这是正确的。

> 这些物资肯定都开列在清单上……看来他未曾提到的是……清单上写着，有些项目并没有向中国出口。事实上，这类物资早在1950年7月间就禁运了。……再就另外一些物资来说，虽然开列在清单上，但一般并不认为有战略意义，如肥料、手工具和农药……余下的一些，他所特别提到的，其输出数量很小，可以说是没有战略价值的。我不想把事情说得过于荒唐——但是在将军明确地引用的2月19日至3月4日这段时期内的清单上，他特别指出了摄影机。清单上写着，在那段时间向中国出口的摄影机只有一台。

哈特利先生最后指出，香港政府之所以没有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全部禁运，其原因同麦克阿瑟将军准许日本在1950年第四季度，即在中国干预朝鲜后，大量增加对共产党中国出口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1950年，日本向中国输出的物资，价值一千九百五十万美元，其中一千七百万美元是钢铁、机床和精密仪器之类的东西。哈特利先生的意思是，日本生计所必需的，也为香港生计所必需；同样的规律，适用于两个地方。

哈特利先生还可补充说，麦克阿瑟考虑到他统治下的国家所必需的东西，英国政府认为对于英国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英国和日本一样，是依靠出口为生的岛国；没有足够的出口量，英国的生活水平就要下降，武装力量也将随之减少。其后果是双重性的：这将增强对工党左翼的支持；英国无法继续履行她在西欧、中欧、中东和远东的军事义务。所以，英国再也不能丢失任何市场；英国人屡次提出，他们

的国家宁愿增加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但是遭到了美国关税壁垒的阻碍。中国市场，虽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却有助于英国人的生计，使英国少拿些美援也可以过得去。对日本说来是符合“道义的”事，对英国说来也不能算是“不道义的”。

由于受下述这些考虑的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防御体系中，欧洲处于优先的地位；英国人把毛泽东看作是在远东抵消苏联力量的潜在的铁托；还有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极度不信任——英国人和欧洲人决定反对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更有甚者，这些因素使盟国的重点从“惩罚侵略”转移到妥协和调停。这一态度的转变不是美国老生常谈的所谓欧洲人“背信弃义”，“懦怯”，或是企求“姑息”的结果；这是对国家利益作出迥然不同的解释的产物。

当朝鲜战争局限于打击北朝鲜人时，欧洲与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尚未暴露，待到北京参战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及其特点的不同看法，就显示出来了。欧洲人认为，北京的要求并非是完全不合理的，作为中国大陆实际存在的政府，她具有“合法的”权利在联合国中取得代表权；盟国在战时许诺把福摩萨归还给“中国”，也应该兑现；假如美国过去对新中国政权采取较友好的态度的话，今天，她或许不会进行干预：美国继续奉行目前那种僵硬的政策，只会激化早已严重的、有可能爆炸的形势，把整个欧洲卷入战火之中。

盟国关于遏制美国比遏制共产党中国更为重要的观点，得到以印度为首的“中立的”阿拉伯亚洲集团的有力支持。确实，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盟国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和北京妥协以求结束战争的戏剧，以前曾由印度和美国在较小规模上演出过一次。印度曾在战争开始时，要求美国给

予北京“合法的”权利，以防止可能发生的一场战争。因为印度和英法一样，在共产党中国干预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非常害怕打大规模的战争。虽然印度曾投票赞成6月25日的决议，并“承认”6月27日的决议，这是因为她反对以侵略解决国际争端的缘故。印度已明确表示，“承认”安全理事会的第二个决议，并不意味着她的外交政策有任何改变。“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一切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它继续奉行唯有印度的理想和目标才能决定的独立的政策。印度政府热切期望，即使在现阶段，仍然有可能结束战争，并以调停的办法来解决争端。”

印度希望在战火遍及整个亚洲之前，通过调停来结束战争，主要有下列几方面的考虑，对此，西方的高级政治家、特别是英国的领导人曾给予密切的关注：首先，作为先前是殖民地的国家，一提起西方的影响及其统治，印度就非常敏感。尼赫鲁总统坚信，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在不理解亚洲人民的思想和需要的情况下，还在那里闭门造车，作出影响亚洲广大地区的决策。美国不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美国决定继续支持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封建腐朽的蒋政权，就是这一套老框框的再现。由于它支持国民党政权，并不给中国人民以自决权，美国正在使自己成为反革命和社会反动派的总头目。北京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美国不予承认意味着干涉中国的内政。1950年8月3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说，旧的帝国主义形式或许已经消失，但是新的殖民主义形式正在产生。“我们亚洲人，”他继续说，“比较清楚地了解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中国和印度支那的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西方政治家仍然在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现在该是他们平等对待亚洲的新国家、并倾听他们意见的时候了。

因此，对过去深受西方统治影响的印度及其领导人来说，任何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战争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征讨，他们把中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深得人心的、民族主义的激素，它正在促使亚洲和中东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起来革命。

印度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愿望，还受到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这和一个半世纪前美国所受的影响相仿。当时美国优先考虑发展经济，不大强调外交政策。对印度来说，只有独立是不够的，这跟早期的美国是一样的；独立必须得有社会和经济的含义，那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尼赫鲁首先下决心自力更生发展他的国家，以便人民在经历几世纪的贫困、疾病、缺少卫生条件和教育机会之后，能开始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印度需要长时期的和平。她没钱介入冷战，不能联合这边或者那边；“介入国外争端”意味着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花在军备上，并在人民中造成分裂。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印度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设法扑灭在朝鲜的战火，不让它蔓延到全世界或整个亚洲。因为苏联全力支持北朝鲜，使得在大国之间进行调停看来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俄国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继续代表中国留在安全理事会内，已经退出了该组织。这样，迅速解决朝鲜战争的第一步，就是让俄国返回安全理事会。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在安全理事会中给共产党中国以“合法的”席位；这不仅因为北京是事实上存在的中国政府，还因为她是朝鲜的强邻。朝鲜历来是日本侵略满洲的跳板，在谈判决定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岛的前途时，没有北京的出席和参与，要取得稳定的、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因此，尼赫鲁总理于1950年7月13日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国务卿艾奇逊和斯大林总理。“印度的想法”，他声称，“是把冲突局限化，打破目前安理会中的僵局，促使早日和平解决争端，让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在安理会取得席位，苏联社会重新返回安理会。然后，让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协助和合作下，在安理会内或在安理会外，通过非正式的接触，探索结束冲突和永久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

斯大林很快就表示同意，但他补充说，“我认为，在安理会中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对于迅速解决朝鲜问题是有好处的。”由于北朝鲜共产党人是朝鲜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还因为平壤当时控制着该国大部份地区，斯大林的话实质上意味着，苏联不打算同意恢复三八线作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总之，斯大林在利用尼赫鲁谋求和平的诚意，把它作为手段，不仅迫使西方同意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还要以和平方式达到他原来想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目的。斯大林不愿恢复联合国1950年6月25日和27日决议中提出的现状。尽管如此，尼赫鲁认为斯大林的答复是“令人鼓舞的”；他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以致斯大林对他来说，仿佛成了愿意和解的老好人。

对比之下，就他看来，美国好象是反对迅速停止战争的。美国的立场，正如国务卿艾奇逊向他解释的那样——自共产党中国干预后，艾奇逊曾向我们的盟国多次重申这一立场——是，“我们认为解决来自北朝鲜的侵略，并不有赖于摆在联合国面前的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就我们看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席位的争论，应由联合国依法加以决定……联合国不能在非法侵略或者任何其他强迫行为的驱使下

作出决定，我想你会同意这个意见的。”这样，在印度看来，即使在北京干预之前，美国对战争的继续和可能扩大，负有大部份的责任；朝鲜问题没有它强大邻国参与讨论是不能解决的；但是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也不承认它对福摩萨的主权。结束朝鲜战争的第一步就得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共产党中国进行干预后，朝鲜战争即使不扩大到欧洲，也将蔓延到亚洲广大地区。美国的欧洲盟国全心全意地支持印度的立场。结果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和以印度为首的阿拉伯亚洲集团联合起来，两次试图和共产党中国妥协，以求结束战争。

阿拉伯亚洲集团首先作出努力。12月12日，他们提出了具有两个目标的决议：一、停火，二、召开有关远东问题的会议。这一决议在12月14日以五十一对五票通过，苏联集团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拥护；责成由大会主席纳斯罗拉·恩蒂柴姆、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和印度的贝内格尔·劳先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与双方最高司令官或他们的代表协商，并向联合国大会汇报，为举行停火会议准备基本条件。这个小组工作时一点不摆架子、十分迁就。北京当时有代表在成功湖，辩论中国共产党指控美国侵华问题，三人小组就吁请北京让代表们留下；它向中国共产党保证，它和十二个提出决议的亚洲国家的意见是，停火后“立即”由美国、英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举行会谈，心平气和地解决突出的远东问题；这个小组甚至提出去北京！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失败了。

北京认为，联合国涉及重大问题的决议，特别是有关远东的事项，如果没有北京的参与和赞同，就是非法的，无效

的，就是一张废纸。因之，人民政府不愿和非法的“三人小组”有任何接触。毫无疑问，提出这个决议的阿拉伯亚洲国家是出于和平的愿望，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支持停火后进行协商的决议的全部阴谋，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考虑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建议。”外交部长周恩来充分利用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胜利，宣称：

> 我们坚持以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尽管遇到坚决的拒绝，联合国中的情绪还是倾向于再作一次努力。共产党中国的干预把世界带到了战争的边缘，而美国的愤怒已经到达了很难说它不会接受这个挑战的地步。在伦敦，英联邦总理敦促大国召开会议，协商解决他们的分歧，以避免战争。他们说，我们不应当失望，我们应该与需要和平的、“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民取得联系，……我们要以全人类的名义，作一次最大的努力，彻底了解彼此的思想感情。”挪威驻联合国代表的调子略有不同，他说：战争“带来死亡和毁灭，它对军人和非军人的影响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象任何一个参战的政府一样，应该千方百计谋求光荣而和平地解决争端。这是当务之急。这样的努力不应当被看作是姑息。”

这个新决议由三人停火小组和英联邦总理共同起草，1月11日由莱斯特·皮尔逊向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

两天以后，以五十对七票通过（一票弃权）。该决议共有五条：

1，为了避免生命和财产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在采取其他措施恢复和平的同时，必须迅速安排停火。这样的安排应当包括足够的安全措施，确保停火不被用作掩护，暗中准备发动新的攻势。

2，一旦在朝鲜实现了停火，不论是正式安排的，还是在这种安排下敌对行动的暂停，都必须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考虑恢复和平的步骤。

3，贯彻执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朝鲜应当是统一、独立、民主、立宪的主权国家，政府应当在自由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因此，一切非朝鲜的军队，都应适当地分阶段撤离朝鲜；遵照联合国原则，作出合适的安排，让朝鲜人民表达他们自己的愿望，自由选择未来的政府形式。

4，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前，按照联合国原则，还应对朝鲜的行政以及维护那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安排。

5，停火协议一旦达成，联合国大会就应设立一个适当的机构，它将包括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以便根据目前的国际职责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谋求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北京拒不接受这“五条决议”，理由同它早些时候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决议一样：它不愿意在协商之前停火。为此，它提出了四点反建议：

甲、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

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

乙、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

丙、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

丁、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

美国认为这些反建议毫无可取之处。国务院艾奇逊1月17日向报界发表声明，指责北京"蔑视全世界对和平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再次表示了"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全然缺乏兴趣。"联合国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以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了。"现在我们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挑衅。"

第一委员会的成员国在讨论共产党中国的答复时，并不完全认为联合国在寻求和平解决战争问题中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依然担忧着，在他们看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在准备和中国共产党打一场全面战争。贝内格尔·劳先生代表印度政府说，他并不认为北京的反建议毫无诚意，"而是部分可以接受，部分不能接受，有的需要说明，有的是些反建议。"接着，在谈到国务卿艾奇逊关于北京无意停止它对联合国挑衅的声明时，贝内格尔先生说，进一步的协商，不会如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损伤联合国的权力和威望，也不会被看成是姑息。这里，人们必然会问"中国干预朝鲜的理由。虽然没人能正确作出回答，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即干预的目的并不是扩张中国的领土或影响，而是担心

中国自己的领土完整会受到侵犯。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使这类或那类战争持续打了二、三十年，以及在联合国没有代表权所造成的孤独感和其他一些原因，使得中国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疑惧。”贝内格尔先生坚持认为，“联合国虽然知道这类疑惧是多余的，但联合国单单了解事实是不够的。这个组织还应不遗余力地去消除人们思想中一切没有根据的疑惧。消除很可能会导致战争的误解和没有根据的猜疑，这样的工作不是没有价值的，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协商，不应当被说成是姑息。”因此，把共产党中国定为侵略者，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采取这个步骤而不随之以其他的措施，那就很难提高联合国的威望。由于至今尚未考虑，随后的措施是否行之有效，所以，这样一个决议的后果，不仅不能解决一切远东问题，还会使这些问题弄僵。……”

两天以后，即1月22日，贝内格尔先生宣布，印度政府已请中国共产党人对某些提法作出解释，新德里接到北京的答复如下：

一、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将负责劝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返回本国。

二、我们认为，关于停止朝鲜战争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可分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个步骤，可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期限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

第二个步骤，为了达到完全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东亚和平，全部停战条件都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并商定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步骤和方法；向朝鲜人民建议如何实施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步骤和

方法；依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以及远东有关诸问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

美国在这份“说明”中，看不到北京的立场有什么重大改变，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拒绝美国所坚持的绝对的先决条件：政治协商前必须先行停火。美国谴责共产党中国再次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印度不同意这个看法。英国也不同意。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先生认为，北京的“说明”完全有希望在联合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前，获得进一步的探讨。他说，北京“并没有完全拒绝谈判前这一原则。”中国在答复中提到了在规定期限内实行停火作为第一步。这段期限的长短至少是可以协商的；当然，北京指的是一个星期还是六个星期，那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样明显的是，关于由朝鲜人民解决朝鲜内部事务的条款，将在停火以后的会议上加以协商解决。北京原先的意图是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处理。关于共产党中国希望在谈判前获得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格拉德温·杰布先生认为，“假如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结论就会完全不同，因为……这里唯一的问题并不在于北京政府该不该进入联合国，而在于它是否有权代表中国……这不是道德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假如这个简单的真理能被大家接受的话，我们中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就可以避免。”最后，格拉德温觉得，对北京向志愿军作出“劝告”后的反应，不必引起任何巨大的关注，因为有人担心，如果志愿军不听劝告，那该怎么办。西方不应该期望北京会一下子把以前的话全部推翻。北京也得顾全自己的面子。

北京刚赢得巨大的军事胜利，盟国和中立国家认为它必将顾全面子，显然是由于他们一方面害怕爆发大战，另一方面又同情中国要求进入联合国和收复福摩萨。我们的盟国和支持他们的阿拉伯、亚洲国家都知道，他们对美国的要求将牵涉美国根本改变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就不赞同美国的立场，他们就欢迎美国改变政策。他们认为，美国改变现行的政策是向前跨进了一步，而不是外交上的倒退。但是，即使是个倒退，他们也认为这总比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要少受些惊吓。理由很简单，朝鲜是不“值”那个代价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不“值”得为朝鲜而打一场大战。然而，美国政府一方面和它的盟国一样，都打算在战前朝鲜分界线的基础上安排停火；另一方面，又和它的盟国不一样，它坚决不肯让出福摩萨或允许北京“恃强进入联合国。”美国在这方面拒绝对共产党中国作出让步，使北约组织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中国进行干预后的几个星期里，如何保持北约联盟就成了美国政府最伤脑筋的一个问题了。

第十章　谴责中国并罢免麦克阿瑟：杜鲁门作中间人

在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期间，美国政府真是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政治支持者向它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是盟国的观点和压力。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天差地远，根本不可能调和。麦克阿瑟认为共产党中国是西方的宿敌，而且是亚洲前途的巨大威胁；挽救的办法就是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而盟国则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莫斯科控制不了北京，如果西方大国让通向自由世界的大门敞开的话，那么，共产党中国将会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总之，他们把北京看作是潜在的朋友，可以在亚洲抵消苏联的力量。将军认为，不能解放整个朝鲜是美国和联合国没能兑现向朝鲜人民许下的诺言；而欧洲人却并不承认有过这样的诺言。远东地区总司令深信，联合国和红色中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并不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只要解除现时对海空军的约束并让蒋介石"出兵"就行了。盟国担心，在远东扩大战争将会使相当大量的美国军队调离欧洲，使欧洲失去防御的能力。麦克阿瑟及其支持者不相信苏联会公开参加战争，因此认为提出谈判结束战争是懦弱的表现，这只会引起、而不会阻止苏联的干预；盟国则认为，克

里姆林宫是要参战的，这就会突然引发全面战争，而西方却毫无准备。

双方只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对方是完全错误的。麦克阿瑟觉得欧洲人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不现实，指责他们过份倾向于"姑息"；而在欧洲人方面，他们不信任麦克阿瑟，他们不喜欢他急于求成，在政治上多管闲事，他们总是忧心忡忡，唯恐华盛顿控制不了他。

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压力，确实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它该采纳谁的意见呢？难道它竟听从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而冒世界大战和疏远盟国的风险？还是接受北约盟国的意见，在国内，特别是和国会立即开始打冷战？要作出抉择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管群众有什么呼声，政府并没有完全拒绝战区指挥官提出的论点，也不会全心全意欢迎盟国的观点。它同意前者不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任何让步，它又同意后者不使战争再行扩大的主张。

政府坚决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也不让它在福摩萨海峡自由行动。这种态度的根据并不是国内政治生活的事实，反对作出让步的理由是妥协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产生不利的影响。迁就姑息会鼓励共产党人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很可能还会使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使他们的胃口不再增大，以进入联合国和福摩萨为代价的解决办法，将会削弱亚洲人对美国的信心，特别是在日本和菲律宾。对北京侵略的犒劳就等于承认共产党人"已经赌赢，现在可以捞进赌注了。"艾奇逊在艾德礼访问期间告诉他说，美国人民不能在欧洲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而同时在远东却容忍侵略。至少说容忍一个大国的侵略——"这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如果共产党中国进入朝鲜，预示着苏联有可能插手朝鲜或其

他地方，那么，设法买通中国将是个可悲的错误。“我个人的想法，”艾奇逊说，“这样干是不行的。我们可能得到的只是拖些时间，但是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能做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事。这段时间只够把我们的人民痛苦地分成两派，只会使我们丧失道义上的力量。”我们宁可被赶出朝鲜，也决不愿在枪口下进行谈判。

显然，共产党中国的干预，至少在眼下已经改变了国务卿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即中苏在中国北部是否有可能发生权力斗争。11 月 29 日，他在同一个讲话中曾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中在考虑联合国对北朝鲜的意图。”艾奇逊指责北京的干预“是猖狂的侵略行为，这是五个月中的第二次……这不仅是朝鲜战争的另一方面。这是一次新的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比第一次更蛮不讲理。”当英国首相建议，西方大国应当采取使中国转而反苏的政策时——在中国干预前，艾奇逊自己也曾希望在福摩萨垮台后就执行的一项政策——艾奇逊回答道，“我们不能花钱去买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我们没有必要设法证明，我们比俄国人对他们更友好。就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言，看来中国人得做出样子，证明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麦克阿瑟将军认为，接受中国的要求将是政治上的灾难，政府同意这一意见，但并不赞成他热衷于搞积极的军事行动。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同意盟国的意见，认为从空中或海上轰击共产党中国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红色中国是苏联最大、最有力量的盟邦，或者说是卫星国。所以，体现在中苏条约里的俄国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威望，使它很难对中国大陆的直接进攻表示漠不关心。

事实上，即使美国不轰炸共产党中国，政府也认为它已

处于战争的边缘了。«杜鲁门回忆录»里有一段故事，说明政府认为苏联即将发动进攻，可谓燃眉之急：1950年12月16日清晨，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向白宫报告说，在北方国境线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大量国籍不明编好队形的机群。于是战斗机立即起飞进行搜索，警报讯号飞满整个新英格兰的防空中心。显然，在短时间内一般人都认为，是来炸美国城市的苏联轰炸机。事后，洛维特告诉总统说，刚才的报告是错误的，差错的原因，是一些异常的大气现象干扰了雷达设备的缘故。

总之，中国的侵略看来已经使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感到惊慌失措。遏制政策的基础是，假设苏联不会在1952到1954年前冒险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北朝鲜的侵略，以及目前共产党中国的干预，说明苏联的时间表颇有可能比原来预期的大为缩短了。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谈论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为了恐吓西方大国和削弱它们的抵抗力量；它很可能已经决定，和美国及其盟国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苏联的军事准备及其宣传活动表明，它可能在柏林、西德、印度支那、南斯拉夫或伊朗采取行动。

在这些地区里，一次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就会给俄国人找到进行干预的借口。要尽可能避免发生这类事件，因为美国及其盟国都没有准备打全球战争；它们最严重的弱点是缺少地面部队。在美国国内，当时只有一个处于战斗准备状态的师。可以肯定，朝鲜战争使美国和西欧都开始搞大规模的重新武装计划——包括重新武装西德的建议——但这只是开了个头，艾森豪威尔将军最近才被任命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美国确实拥有配备着原子弹的比较强大的空军。但是，据信，俄国人也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夺

取战略空军司令部在欧洲的基地；失去这些基地，该司令部的效率将下降75—80%之多。美国几乎没有洲际喷气轰炸机，在飞机和飞行人员方面，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足够的数量来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两者的消耗率是很高的。

即使苏联不干预朝鲜——在这方面政府再次认为自己和盟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美国也必须限制对这个遥远的亚洲半岛的承诺，保留它的力量，以应付世界其他地区将来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朝鲜的长期战争使西方不可能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而欧洲在美国防务中的优先地位，最近已在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的会谈中重新得到肯定。毫无疑问，在远东地区拖住并消耗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仅使欧洲暴露在红军的面前，甚至还可能诱发突然袭击。这个风险是不能冒的，因为欧洲的战略位置、技术力量、自然资源、工业基础、以及空军基地等等，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在全球实力平衡中，欧洲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欧洲人在本世纪已经受过两次战争的灾难；他们希望尽可能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次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但这并不是说，当苏联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时，他们也不会奋起反抗；诚然，当较为体面、而损失又较少的机会仍然存在时，他们就不愿让美国的急躁情绪把他们推向灾难的深渊。根据他们的意见，为了解决朝鲜问题，不值得去冒全球冲突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考虑他们的观点，而执行麦克阿瑟的计划，那么，美国将会损害盟国间相互信任的基础，这可是北约组织赖以生存的关键。结果甚至可能疏远盟国并失去他们。这样的前景是不堪设想的，特别是政府不能肯

定，是否会马上同苏联交战。正如总统所写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克里姆林宫一直试图在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它期望我们陷于孤立。它期望我们得不到信任。它期望我们的盟国怕我们、恨我们。而我们的盟国是赞同我们方针的。他们不相信我们会积极扩大远东的冲突。如果美国打算扩大这一冲突，我们最好还是单干。

如果我们在亚洲一意孤行，那就可能破坏自由国家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团结。我们欧洲的盟国比我们更邻近俄国。他们的处境是危险得多。如果我们的行动不去考虑面对着他们的危险，他们就有可能不关心面对我们的危险而采取行动。一意孤行曾经给世界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我们不能在亚洲单干，而在欧洲采取集体行动。……

我不想在面对苏联威胁时，把我国和盟国分裂开来。集体安全的道路，是唯一可靠的防御方针，只有它才能防止威胁我们的危险。

"一意孤行"并不是可靠的防御方针。

政府既和盟国有矛盾，又和战区指挥官有分歧，这就使它面临两个极难解决的政策问题。第一，在顶住盟国要求向北京作出让步的压力下，同时保留他们对美国的支持，还要维护对美国安全极端重要的地区——西欧——的团结一致，政府在朝鲜该执行怎样的一项政策？第二，政府如何拒绝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要求，而不增加国内的分歧和政治上的派性？这种矛盾再闹下去，势必危及整个外交政策，因为它失去了过去一般能得到的支持。

美国决定不屈从共产党人的要求，并顶住盟国及中立国的压力。这样做的结果分裂了自由世界，孤立了美国的领导力量，支持了共产党人认为美国是和平障碍的论点，因为它剥夺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对福摩萨的统治权。事实上，共产党人要做的一切，看来就是等待时机。他们知道，政府不愿在朝鲜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此外，他们还清楚地知道，即使美国政府倾向于谈判，但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会阻止这样的谈判。共产党人一直努力离间美国和盟国的关系，麦克阿瑟共和党人的压力确实给他们帮了大忙。由于经常保持着大规模战争的威力，这种压力使盟国急于结束敌对状态，向北京让步也干！共产党人暗示同意停火，但以加入联合国和控制福摩萨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在盟国看来是合理的。共产党人越是坚持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共和党人反对这样的"姑息"就越是起劲；共和党人要求扩大战争的呼声就喊得越响，盟国要政府承认中国"合法权益"的压力也就越大。政府对此显得无能为力，左右为难。共产党人却隔岸观火，颇为得意。

假如美国希望防止北约组织土崩瓦解，防止它与印度和阿拉伯亚洲集团其他成员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疏远，并把延长战争的责任推卸在北京身上，那它就应当支持联合国结束敌对行动的努力。而这正是政府当前所执行的政策，虽然这样做在美国国内很不得人心。到处可以听到对"姑息政策"的辱骂声。但国务卿艾奇逊当时就这么说，联合国会员国中的绝大多数都支持这两个决议，他们仍然相信能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停止侵略行动。美国不这样想，但它确实知道，许多国家都由衷地持有这一见解，而美国的弃权或反对，将会破坏他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况且，接受这些决议并不表明接

受北京的要求；这只是意味着美国准备在停火得到安排和生效后，同意讨论尚未解决的远东问题。“《联合国宪章》总的原则是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我们有义务到联合国组织中去讨论问题。我们并不是去举手表示同意的。我们并不是去放弃立场，或者丢弃我们认为是基本利益的任何东西。”美国并不把共产党中国的席位或者福摩萨问题当作解决朝鲜问题的组成部份。这类问题只有在共产党中国停止侵略后，才能进行讨论。

因此，美国支持了联合国结束敌对行动的两次尝试。但同时又在两个建议中写进了北京不能接受的条款。总之，在接受联合国的两个决议时。特别是1月12日的那个决议，华盛顿耍了个鬼花招，**它在形式上接受了谈判，而在实质上拒绝了让步**。这就造成一个印象，一方面，美国愿意和盟国合作，迅速结束敌对行动，并且热切地试图排除今后在远东最容易爆发战争的因素；另一方面，政府断定停火后的会谈永远也开不起来，因为它知道北京不会接受有些条款。国务卿艾奇逊坚决反对“向共产党人承认他们已经赌赢，现在可以捞进赌注；因为这好象在酬答他们的侵略行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这一条，艾奇逊也宁愿不进行任何谈判，即使让共产党人打胜仗把我们赶出朝鲜也在所不惜。”同样，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我们没有理由为达成协议去（向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友好，让中国共产党人进入联合国……假如我们现在同意接纳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为了和他们进行谈判，那就等于我们作出了极大的让步。我们曾多次表示愿意谈判，但是不应当在目前尚未同意和我们谈判前，就要求我们作出让步。”

为了阻碍举行这样的会谈，华盛顿坚持联合国的两个决

议都必须包括同样的条款：停火。第一个决议要求谈判前必须停火。由于停火将使前线冻结，让联合国军队在遭到敌人的打击之后有时间恢复元气，毫无疑问，共产党中国是要拒绝的。在拒绝12月22日阿拉伯亚洲国家的建议时，周恩来巧妙地反问道，为什么美国突然对立即停火感到兴趣？他引证说，当美国人在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推进的时候，他们对停火或者和北朝鲜谈判，并没有显示出多少热情。周说，仅仅是现在，他们自己吃了败仗，这才改变了立场。他们的建议只不过是争取时间的手法。他们想获得“喘息的机会”，准备另一次进攻。周恩来清楚地表明，北京将步美国的后尘；美国军队在十月份“蛮横”地跨过三八线时，他们就已经“彻底地破坏了、因而也永远铲除了政治地理上的分界线。”

美国坚持的第二个条件是，在任何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放弃使用武力。简而言之，美国愿意商谈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以及对福摩萨事务的行政权问题，但美国也决心维持现状。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参议员不一样，他们清楚地知道美国的先决条件将使它不能达到目的；只有使用武力，才会引起西方对北京要求的合法权益立即给予认真的考虑。一旦放弃使用武力，北京就再也不可能为达到目的而施加有效而足够的压力，它的要求也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紧急考虑。谈判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是给美国军队争得了时间补充他们所遭受的损失。所以，共产党中国在“谈判”没能满足其野心之前，不愿意接受停火；结果，两个决议都遭到北京的拒绝。

华盛顿巧妙的策略使北京承担了破坏停战的责任。这么一来，政府就巩固了西方的联盟，有资格要求谴责共产党中国

是侵略者。事实上，北京对两个决议的否定态度，使其他国家不可能投票反对美国的这一动议。美国政府曾不顾它在国内极端困难的处境，随和着普遍的要求，两次向北京提出方案，要求结束战争。正因为如此，奥斯汀大使坚决提出谴责北京是侵略者。印度认为，假如共产党中国被谴责为侵略者，那么今后再有解决冲突的建议，北京连听也不愿意听了。但是联合国大会现在否定了印度的意见，却接受了以色列大使的尖刻的论点，以色列认为，北京毫不犹豫地指责联合国的某些成员国为侵略者，但这并不妨碍它邀请他们去北京参加会议。这好象是说，中国共产党政府默认辱骂之后仍然可以谈判和达成协议。从联合国的辩论中，北京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最反感的是北京出兵朝鲜。正式的裁决只是进一步证实了几个星期来一直在陈述的意见罢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以四十四对七票（共产党集团，印度和缅甸）通过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九票弃权（八个阿拉伯亚洲集团中的七个、瑞典和南斯拉夫）。理由是直接援助那些早已在朝鲜搞侵略的人，它本身也和联合国军处于交战状态。决议要求北京停止敌对行动，并从朝鲜撤出它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不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决定“继续在朝鲜采取行动抗击侵略，”它号召“所有国家和政府当局继续全力支援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决议还准备成立两个机构，一是集体行动委员会，“按紧急情况”考虑“采取补充措施以抵御侵略”；二是斡旋委员会，其作用是“以和平手段促使朝鲜停战，并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

就美国的观点看来，两个机构中的第一个更为重要，因为它将考虑采取制裁行动，如经济上的禁运。然而，迅速而有

意义的行动，即使是非军事性的制裁，看来也是不会采取的。同情共产党中国合法要求的倾向，不可能因为有了一项正式决议而一下子消失，何况该决议是美国强加给联合国大会的，它的通过也只是因为北京两次表示不肯妥协的结果。艾德礼先生1月23日在下议院说，“就我们来说，我们对协商解决朝鲜战争并没有失望，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起传统的作用，并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同时，对美国挑动大战的恐惧也不能很快就消失；政府的态度可能是温和的，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国会支持者就不一样，他们不赞成自我克制。参众两院的决议明确表示，要求联合国把红色中国定为侵略者，杜鲁门总统对艾奇逊国务卿能继续顶住全国上下的情绪吗？如果顶得住，那么能支持多久？制裁将会引起共产党的报复，并使远东地区——假如不是全世界的话——爆发全面战争，这种估计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无效的制裁只会损害联合国和西方大国的威信，所以最好还是不搞什么制裁。事实上，只有设法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在投票赞同谴责中国的决议之前，英法两国曾得到奥斯汀大使的保证：优先考虑斡旋委员会的工作，其次才是集体行动委员会。“我们对斡旋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最大的关切，”格拉德温·杰布说，“我国政府确信，总统将会不失时机地任命这个机构的其他两个成员，以便能立即开展工作……。即使在今后的一段长时期里，联合国大会也不要去考虑制裁（这将是‘危险的、利弊参半的、或者仅仅是无效的’），以免损害可能存在的解决争论的希望。”

政府成功地在形式上维护了盟国间的团结，但这是以放弃实际行动为代价的。正是由于不愿在谴责共产党中国后，

随即进行有效的军事制裁，这才引出麦克阿瑟最后的挑战。

麦克阿瑟不愿顺从地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上，特别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能把他的军队赶下大海，这说明中国军队不是不能战胜的，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并有满洲作为巩固的后方。只要允许他利用地面强大的火力，让他在海空方面有更大的机动性，他就能够把敌人赶出朝鲜，象在政治上一样，在军事上也给北京以惨重的打击。根据他的设想，这样做是绝对必需的；经过12月和1月初那段阴暗的日子，他“甚至比以前更深信”，华盛顿和成功湖面临的问题，不是在朝鲜能消灭多少红色中国的军队，而是怎样防止今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侵略。大量杀伤中国军队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新兵是可以征集和训练的。现代战争的标志不是人力，而是物力；防止北京今后军事扩张的唯一途径，是现在就摧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承认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增援和供应的潜力都很大，还有巩固的后方提供空前有利的军事保护，美国眼下的战略是在三八线或其附近造成军事对峙的局面。关于这些，麦克阿瑟在2月13日和3月7日的两次声明中都说得很清楚。

谈论再次越过分界线并向北朝鲜挺进，他说，“纯粹是纸上谈兵”和“幻想”，因为：

> 如果我们把战线北移，敌人的供应情况将会逐渐获得改善，而我们空军的效率将逐渐降低。这样，敌人在地面上的数量优势就会在战场上日益发挥作用……，目前，我们的反攻行动受到限制，兵力也没有重大的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战线理应保持对峙局面。据此，我们更向前推进，在军事上受益的将是敌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必须作出一些极其重要的决策——这些决策

远远超出我这个军事指挥官的职权范围，它们既非纯属政治，也不纯属军事。而是必须在最高的国际范围内提出答复，澄清由于红色中国在朝鲜不宣而战所引起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个暗示是清晰的。

据惠特尼将军说，可以肯定，麦克阿瑟早在2月11日就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不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而把他们打败。首先，他将收复汉城一线，作为今后作战的基地。然后，他并不进攻满洲和中国，而是在北朝鲜“设置放射性微尘的防御阵地”，用来封锁敌人主要的供应线和交通线。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使鸭绿江南岸变成无法通行的地区。同时，他将在靠近中国的北朝鲜沿海两岸进行两栖登陆和伞兵着陆——可能以蒋介石的部队增援他自己的部队——来封闭这个“巨大的罗网”。“这将是仁川的再演，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在参议院意见听取会上，没有证据说明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但这并不是说，在麦克阿瑟的思想里，或者在东京的计划里，不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可是麦克阿瑟始终否认，他在朝鲜战争中建议使用原子武器或原子弹。此外，他在3月后的一些声明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仍指望着统一朝鲜和打败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方针依然是中国刚参战时他就制定的：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去。

政府没能批准这个方针使麦克阿瑟向他的上级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至少是向他的文职上级挑战，因为他显然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致的。他就这样卷入了最后的争论，以为他不仅可以得到国会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能取得四个人的撑腰，这些参谋长的威望比美国政

府中任何一个小组都高。看来应当公平地补充一句：麦克阿瑟对武力统一朝鲜和摧毁共产党中国军事潜力的信心是如此之足，即使他明知得不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他也决不会保持沉默。

总之，冲突的焦点是跨越三八线的问题。以前作过尝试，但是失败了。难道还要再试一次吗？和远东地区司令官的意见不一样，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用武力统一朝鲜——至少用不着搞第二次；而麦克阿瑟认为，扩大战争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风险。中国人已经遭到重大的伤亡，现在，南朝鲜的大部份地区已经获得自由。于是，华盛顿认为，在不附带任何威胁和指责的情况下，北京很可能乐于接受停止战争并恢复原状的建议。国务院为此起草一项声明，3月19日，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防部长进行了讨论。

3月20日，麦克阿瑟接到通知说，总统很快就要宣布，他愿意讨论合适的条件以求结束流血战争，同时也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问他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当美国和盟国政府协商这一新的措施时，还需要一些什么具体的权力，以便他的军队能够自由行动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同敌人的接触。联合国军总司令在答复中提出，对他的司令部不能再有更多的限制。他再次指出，按他现有的部队，在种种限制下作战，要想扫清北朝鲜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取得任何可喜的效果都很难办到。他最近发布的一些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情况。

在接到这个电文后，政府就把即将发布的总统声明提交给有军队在朝鲜参战的盟国。这个声明强调，中国人大体上已被赶回到共产党人原先发起进攻的地方，“因此，击退北朝鲜和中国共产党人侵略大韩民国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声

明呼吁中国共产党人停火，并且说，“朝鲜问题的迅速解决将会大大缓和远东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和平解决该地区的其他问题打开了道路。”同时，声明警告北京，如果她拒绝谈判，联合国将继续战斗下去。

三天以后，麦克阿瑟在3月24日发表一则他后来称之为对形势的“军事评论”。他在这里也谈到了南朝鲜的解放。但是，他声明中其他部份的内容和调子，正好与政府所提的相反。他声称红色中国已经暴露“她完全无法以武力征服朝鲜”，虽然他的军队所受的种种限制，已经让北京在军事上占了便宜。“人海战术”在现代战争中不能代替工业潜力。他指出：

> 单靠数量不能弥补这种缺陷本身的弱点。控制海洋和天空，就意味着控制供应、交通和运输，这在今天和以往一样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当这种控制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敌人的地面火力又处于劣势时，由此而产生的差距，就不是狂热的勇敢，或者根本不管人员的大量伤亡，所能克服的。

联合国军战术上的成功，和中国在进行现代战争中没有能力给军队配置许多必需的关键性的装备，说明红色中国并不是人们有时所想象的“狂妄自大的军事强国。”

“承认了这些基本的事实，如果按朝鲜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解决而不受那些与朝鲜无关的外来干扰，如福摩萨和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那么，对朝鲜问题作出决定不应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麦克阿瑟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和敌军最高指挥官协商以便“在军事上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流血战争，达到联合国的目的。“对此，每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加以反对。”麦克阿瑟提出，假如中国人不接受他的

条件，联合国就要把战争引向中国本土。敌人“现在就应该痛苦地意识到，联合国不再努力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的决定，通过我们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将注定使红色中国马上就有军事崩溃的危险。”

这个声明算不算，如麦克阿瑟所说的，是一篇“军事评论”，那是颇成问题的；麦克阿瑟还把它当作心理战的武器，那种提法也是值得怀疑的。麦克阿瑟关于他声明的主旨和时机选择的第三个解释看来是比较中肯的。他认为，他防止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容忍中国的侵略，以放弃福摩萨和转让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换取朝鲜的和平；“毫无疑问，他粉碎了这一秘密计划。”

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秘密计划”，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证实。但解决朝鲜战争能够为和平解决其他问题打开道路，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这句简短结论确实只是重申美国早在12月和1月间的立场：先停火，后谈判召开“和平”解决一切问题的会议。此外，西方大国这次一字不提停火后会谈的具体安排；这就不仅减少了敌对行动停止后立即举行会谈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停火本身受到了影响。

因此，麦克阿瑟建议的更为可信的解释，必然在于他的愿望，那就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去；因为麦克阿瑟断定，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美国最高利益的需要。只有摧毁共产党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才能防止它今后在亚洲其他地区搞扩张。谈判将使中国的战争潜力保持完整无损，还能得到加强，为今后的战争作准备；因此，必须阻止这样的谈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麦克阿瑟除了发表实质上是最后通牒的声明之外，再也没有更合适的办法了；因为他要北京承认已经打了败仗。宣布盟国是胜利者，而北京唯有承认这一

简单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做法肯定不会使北京放下武器。如果美国早就愿意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敢于冒全球战争的风险，或者把大量的资源投到远东地区，胜利可能已经来到了。既然政府不愿这样做，要安排停火只好双方都不以胜利者自居。大国一般都不肯公开承认打了败仗，或摆出打败的样子。所以要求共产党中国承认失败，肯定会遭到她的拒绝，这样，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

看来，这是麦克阿瑟3月24日声明的真正目的，就这方面来说，它是成功的。麦克阿瑟知道，战争停不下来的结果必然会出现他早就提到过的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但只是为了守住一条防线，而政府，得承受人员的伤亡，这能支持多长时间？面对国会的强烈反对，群众情绪又如此低落，以致要求采取"强硬的"报复性措施，从政治上看，这一方针又能坚持多久？英国人肯定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根据《观察家》的外交记者报道，英国政府"有些怀疑"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是否能无限期地执行原来的政策，顶住麦克阿瑟及其国会支持者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其他盟国普遍都有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美国也并不例外。

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约瑟夫·马丁，发表了3月19日麦克阿瑟写给他的一封信，到此，麦克阿瑟向政府的挑战达到了高潮。在这封信中，麦克阿瑟再次表示他对限制朝鲜战争的不满。对他的约束并不符合"以最大的反击力量迎击暴力的传统惯例，""我们过去一直是这么干的。"马丁认为，应当允许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北京对朝鲜的压力。麦克阿瑟说，"这在逻辑上和传统上来说都是不矛盾的。"麦克阿瑟还公开重复仁川登陆前他向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说过的话。在亚洲作战必须具

有决心而不能折衷。因为“这里是在亚洲，共产党的阴谋家选择它作为征服全球的舞台，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和他们交锋了。”所以，在克里姆林宫吸收对象的名单中，排在首位的是亚洲，而不是欧洲。“假如我们在亚洲被共产主义打败，那么欧洲的沦亡将是不可避免的。如能打赢这场战争，欧洲很可能会免除战争的灾祸，还可以保持其自由。”简而言之，政府为了不愿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因此不把军队调往亚洲并将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这种战略是错误的。因为麦克阿瑟早先曾反复说过，只有坚决进行反击，才能防止苏联和中国进一步的侵略。

麦克阿瑟后来把他给马丁的信说成“仅”是日常的通信，“那种信我写过好几百封”。但是众议院只有一名少数派的领袖，而麦克阿瑟在给马丁写信时，明明知道这个批评政府的人派性很大，他的信件将不可能是保密的。正如国防部长马歇尔在意见听取会上所说，高级指挥官不应当向反对派领袖说“他，作为指挥官，完全不同意他自己那帮人的意见。”应该肯定，马丁征询将军的意见，“可以是老朋友之间私下打听消息，也可以不是”。但是麦克阿瑟的回信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希望不要把意见传播出去。

麦克阿瑟给众议员马丁的信件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的挑战。3月24日的声明使总统确信，他再也不能忽视麦克阿瑟对他权力的威胁，因为宪法规定总统有权管辖外交和军事。麦克阿瑟的信件只是坚定了他的这一看法。总统和战区指挥官之间的矛盾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如果我（杜鲁门）允许他（麦克阿瑟）如此蔑视政府的权力，那我自己将违背坚持并保卫宪法的誓言……麦克阿瑟逼得我别无选择，他不听指挥，我无法再忍受下去。”麦克阿瑟迫使总统作出抉择：

要么顺从他，要么把他撤职。杜鲁门先生认为，他已经忍耐够了；将近一年来，他一直在设法争取麦克阿瑟赞同他的政策——或者至少让将军了解政策的性质，使他能耐心地加以执行，而不要在每个关键时刻，几乎都要提出挑战。总统相信，他已向驻日总督表示过融洽相处的愿望：对将军在军事上的成就，他曾给予表扬并授与勋章；他曾经派遣特使去解释政府的政策；他甚至亲自前往威克岛，与将军建立友好的谅解。他的一切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报酬。麦克阿瑟坚持向总统的权力挑战，而总统却唯恐失去这些权力；杜鲁门认为总统有权调军队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去保卫美国的利益，他不能容忍参议院试图分享这种权力，他也同样不能容忍麦克阿瑟干扰他作为美国总司令和外交决策人所持有的权力。在这些情况下，杜鲁门不再犹豫了；美国总统的权力正在摇摇欲坠，所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最后总得有个解决。杜鲁门总统遇到危机时，好象总有一股勇气，于是他在4月10日采取果断的行动，撤消了麦克阿瑟的一切领导职务：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以及远东美国陆军司令。一个伟大的军事政治家下台了。他居然坚持向国家的军政领导挑战，而不是驯服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是衡量麦克阿瑟过分自信的最可靠的标准。麦克阿瑟还有一些更应受到指摘的习性，如对待批评的过份敏感，自以为一贯正确，把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归咎于别人，假如这些习性是由他性格上的特征所造成的话，那么，这种性格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德，它曾在1950年7、8月间黑云压城的日子里，给自由世界带来了鼓舞和好处。假如这种同样的乐观主义使他看不到中国干预北朝鲜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中几乎人人都这么认为——那么也正

是这种乐观主义，使他在战争过程中正确地评价了光辉的仁川两栖登陆战的影响。在北京进行干预后，他竭力主张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他的自信导致他向总统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挑战，那就不能肯定地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认为朝鲜对自由世界是个考验。今后能否阻止侵略，就得看西方现在是否能惩罚侵略者。“他最后的要求是，如果他能有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手段和权力，他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他却受命打一场有限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因为害怕他那可能是正确的主张而称他是战争贩子；多数欧洲人和很多美国人由于害怕他的见解可能是错误的，就说他危险，不负责任。”

麦克阿瑟被罢免，实际上有三个原因。第一，他没能把自己的声明报请上级审批，因为12月6日总统曾经指示，国外所有的文武官员“在发表公开声明时要极端谨慎小心。“除例行公事外，都要分别上报”国务院或国防部批准。3月24日事件之后，政府曾提醒他注意这些命令。

第二，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发言人，麦克阿瑟对此也提出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自己，主要责任应由总统来负。所以，他必须保持最重要职务上的最高指挥权：执行外交和军事战略。他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负有主要的责任，他又是民主信念的化身，那就是文官政府有权控制军队，而且必须这样做。美国不能允许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唱两个调子，何况一个是文官，另一个是武将。

麦克阿瑟向总统权力的挑战，使政府感到极大的困恼，盟国则感到惶惑不安，因而妨碍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作用。3月24日声明发表后，盟国政府急切地询问华盛顿，

美国政府是否已经改变政策，准备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国务卿艾奇逊只好回答说，麦克阿瑟的声明既属意外，也算越权；可是，这些话并不能消除盟国的疑虑。因为“不负责任的声明”，英国国务大臣肯尼思·扬格说，“时有所闻，往往还是领导机关发布的，这些声明都未经联合国批准，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没有同意”，但这些声明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得到民众的拥护，这会使政府很难保持它的政治立场，除非采纳反对派的政策。

麦克阿瑟多次声明的影响不仅使美国和盟国间的关系复杂化，3 月 24 日的声明，还妨碍了总统政策的执行。将军认为，他的声明仅仅是对“军事形势”的评价，也是心理战的武器，旨在搞垮敌军的士气。华盛顿对于这样的解释是十分不满意的。将军曾公开向宪法规定的，总统指导国家外交政策的权力进行挑战。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来说，“这个声明一经发表，总统就很难再有什么声明，换句话说，框框已经定下，声明已经发表，假如总统再来一个声明，人们就会把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和总统的声明放在一起，相互比较而且提出疑问，这是政府的政策吗？或者，当发现两者有不同之处，就会问，这不是政府的政策吧？谁是美国的发言人呢？因此决定暂时把这事情放一放。”

麦克阿瑟被撤职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不赞同把冲突局限于朝鲜的决定”，而华盛顿则认为必须“有个更听话的指挥官。”

华盛顿的官员们没有忘记，麦克阿瑟以前对他自己的命令往往作随心所欲的解释。6 月 26 日，他曾指令不要攻击三八线以北的目标，后来又解释成“仅供参考，不是硬性规定”。由于他深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发布过

一些结合具体情况的命令。华盛顿曾决定建立一个缓冲区，只许南朝鲜军队进驻，麦克阿瑟对此也同样作了任意的解释。“正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不执行政策”，柯林斯将军就此事发表意见说，“在其他情况下，他也可能会干扰政策，性质或许更严重。”麦克阿瑟最近的声明，恰恰是政府所担忧的。在意见听取会上，国务卿艾奇逊代表所有的军政同僚说出了这种心里话。

参议员莫尔斯：……因为国务院以及这里的国内政府官员都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不赞成政府对他的约束，让他当司令官打局限于朝鲜的战争。你作为国务卿就担心随时都会出乱子，因为麦克阿瑟在行使战区指挥官的权力时，很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超出我国政策规定的范围使我们卷入一场较大的战争。这样的结论公平吗？

国务卿艾奇逊：你说得对。我认为……战区指挥官需要很大范围的行动自由，你这个结论是公平的。他不可能在行动上谨小慎微；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担忧的是他在行使职权时，会把战争引向扩大，而不是加以限制。

华盛顿忧心忡忡的原因最后终于透露出来了。那是将军回国后，在参议院意见听取会上作证的时候。这将是麦克阿瑟最后的、公务上的“历史使命”。

第 四 篇

麦克阿瑟听证会

第十一章 麦克阿瑟回国：鹰的归来

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职务的消息震惊了美国人民。但是，震惊很快就变成愤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立即拍电报给他们的议员，电报如同雪片似地飞向国会。十之八九都反对总统的决定。总统宣称，麦克阿瑟威胁了文官政府的优越性，但老百姓不听他的话。一位知名的南方参议员，在麦克阿瑟被撤职后曾说，“至少在我这个地区，人民几乎要发歇斯底里了。”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也莫不如此。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老百姓烧了总统的模拟像。洛杉矶的市议会休会，“沉痛悼念麦克阿瑟将军在政治上被暗杀。”贴有“杜鲁门，靠边站！”的标语的车辆出现在城市的热闹区域。伊利诺斯州议会大为震惊，它指出麦克阿瑟是抵抗独裁者侵略的先进代表，认为总统已经丢弃自由世界的决心；并且作出决议，“我们对麦克阿瑟将军表示无限的信任，强烈谴责总统不负责任的任性行动，简单地把他解除了领导职务；我们更要谴责这样的决策，居然不给麦克阿瑟将军和他司令部的其他人员一个机会，向我国人民介绍朝鲜和远东的真实情况；我们进一步决议，我们要批评和谴责目前政府的政策，至今封锁消息，对这一行动不作任何解

释。”密执安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议会都通过了相似的决议。白宫受到电报和信件的轰击，绝大多数函电，毫不含糊地告诉总统，他的决定是错误的。麦克阿瑟下台后，杜鲁门先生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出席棒球季节的开幕式，当他掷出第一只球时，遭到了轻蔑的嘘声。

共和党人抓紧时机，利用公众这种狂乱的情绪。在宣布解除将军职务后几个小时，该党的几个主要人物，包括罗伯特·塔夫脱和议会中的头目肯尼思·惠里，就在议会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的办公室里开会。上午十点钟刚过，共和党议员马丁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并向聚集着的新闻记者宣布，会议已取得一致意见：第一，国会应“根据最近悲剧性事态的发展”，对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审查；第二，应当邀请麦克阿瑟将军来国会，陈述他的全部观点。“另外，”马丁继续说，“还讨论了可能进行弹劾的问题。”记者们注意到马丁强调了“弹劾”这个词。当马丁拒绝对这一点作出详细说明时，共和党人在私下谈论，他们心目中的弹劾对象，不仅是杜鲁门总统，还会涉及国务卿艾奇逊和“其他一些人。”

在参议院，参议员威廉·詹纳指控说，“我国，今天已落入一小撮掌权的内奸手里，他们受苏联间谍的秘密领导。我们必须立即从政府中清除这个阴谋集团，象切除瘤肿似的把它整个挖掉。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弹劾杜鲁门总统，查明谁是这个秘密政府的领导人，他们居然能如此高明地把我国引向毁灭的道路。”这一席话博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鼓掌。参议员尼克松提议严肃批评总统，要他恢复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他说，麦克阿瑟的撤职，无异是对世界共产主义姑息的晋级。参议员麦卡锡称总统是“狗娘养的”，他想必是在喝多了“威士忌和甜酒”后作出决定的。麦卡锡号召美国人民

同总统的决定展开斗争，不然的话，“红色的浪涛就会拍击我们的整个海岸。”他警告说，除非公众要求停止执行“艾奇逊行动计划，”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都可能会陷入共产主义。”他呼吁民主党人协助制止这个趋势；如果他们拒绝，那就等于把他们的党贴上“卖国党”的标签。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奥伦·阿姆斯特朗认为，“麦克阿瑟的撤职是中国垮台后共产党人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小弗雷德里克·库代尔，要求立即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可以罢免，或者迫使他靠边，进行重选，只要国会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投不信任票。共和党政策委员会发表一致通过的宣言，质问“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三人执政小组”是否准备在亚洲搞“超级慕尼黑”。“他们在1945年决定把中国让给共产党，朝鲜战争中断了这个方针，他们现在是否打算自作主张加以恢复？”然而该委员会没能详细说明理由，为什么当时的决策者会改变主意，唯独在朝鲜问题上一度不肯姑息共产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国防顾问朱利叶斯·克莱因准将说，自巴丹战役*以来，美国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克里姆林宫应当放二十一响礼炮以示庆祝。

克里姆林宫并不注意克莱因将军的建议，反正就那么回事。美国当时在等待麦克阿瑟从东京归来，举国上下一片喧闹声，俄国人的礼炮是永远也听不到的。4月16日，星期一，估计有二十三万群众，包括放假的学生，在路旁送别麦克阿瑟，这是他最后一次经过东京的街道。日本人给他们的征服者以最崇高的敬礼：天皇亲自去美国大使馆看望麦克阿瑟。日本天皇拜访没有官衔的外国人，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

* 指菲律宾的巴丹半岛战役，1942年1—4月，美军曾与日军苦战于此。——译注。

的；这位天皇早先曾几次拜访过麦克阿瑟，但那时麦克阿瑟是最高统帅。东京机场鸣放礼炮十九响向麦克阿瑟致敬，十八架喷气战斗机在上空盘旋翻腾，四架超级飞行堡垒轰炸机编队掠过机场。夏威夷是麦克阿瑟飞返美国途中的第一站，约十万人群站在二十里长的大道两旁，热情欢呼，向他告别。

麦克阿瑟将军于4月17日下午八时二十九分到达旧金山。

"麦克阿瑟夫人和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想望着这个时刻，"他向近五十万迎候他的人们说。那天是旧金山历史上交通最为拥挤的一个夜晚。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程，通常不超过三十分钟，麦克阿瑟的车队居然走了近两个小时。官方的车队，越深入市区，车速就越缓慢。汽车不得不在每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人群摩肩接踵，水泄不通。另外，估计有三百万人在电视中观看这个现场实况。

第二天，4月18日，将军化两小时游览该市金融商业区，向他欢呼致意的人群，估计并不亚于头天晚上。很多围观者向光着脑袋的麦克阿瑟抛撒彩色纸带、纸屑和撕碎了的电视节目单。好几个住在麦克阿瑟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的旅客，甚至撕裂他们的枕头，把里边的羽毛撒在麦克阿瑟将军身上——这是一种爱国热忱的大胆表示，旅馆经理却要他们每个枕头赔款十五美元。

商业界试图利用群众高涨的热情，这是他们的特征。纽约第五街普卢默公司已经在做广告："麦克阿瑟将军塑像啤酒杯，色彩和军服真是相像得天衣无缝。维妙维肖地活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人形象。七吋高，定价10.5美元；六英吋半高，定价8.5美元；五英吋半高，定价6美元；四英吋半高，定

价 4.25 美元；三英吋半高，定价 2.75 美元。”胜利电视机公司向顾客保证，他们一定能看到“当代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戏剧性新闻……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期待着看伟大的历史性高潮……”为了吸引顾客前来购置电视机，以便收看麦克阿瑟将军即将向国会发表的讲话，胜利公司问道：“他的讲话，他的姿态，他的面部表情——这些对于我国的命运将意味着什么？……你将在胜利电视机里看得最清楚，感到最满意。”颇具象征性的是，参议员范登堡就在这天去世了。

4 月 19 日，午夜刚过，麦克阿瑟飞抵华盛顿。机场上欢迎的群众“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官方的欢迎人员有国防部长马歇尔、各军、兵种参谋长和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沃思少将，但欢迎的场面是如此之狂热，以致他们几乎还来不及表示欢迎，一万二千名群众已经冲破了与官方代表分隔开来的绳栏。人群把高级官员们推挤在一旁，蜂涌到麦克阿瑟将军座机的周围。麦克阿瑟在机场耽搁了十五分钟，其中十三分钟是在奋力挤过人群，才坐上汽车。麦克阿瑟一家人都被挤散了；麦克阿瑟最亲密的友人和顾问惠特尼将军，站立不住，跌倒在地。受命采访麦克阿瑟将军抵达首都的消息的记者和摄影师有三百人，他们中间有的人作了较好的准备：居然戴上了橄榄球运动员的头盔！

将军向国会做报告那天是戏剧性的日子，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华盛顿。众议院按通常的时间开会，那是正午。十三分钟后，麦克阿瑟夫人进入楼座，全体起立，向她欢呼致意。五分钟后，小约瑟·麦克阿瑟和他父亲手下的一批官员走了进来；他们在通常为联席会议期间保留给总统内阁成员的座位上就坐。那天内阁成员都没有出席。十二时二十分，人们有了预感，当时泛光灯大亮，参议员们迈步进入会场，唯独

不见麦克阿瑟。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慢慢地过去，令人难受，气氛也随着紧张起来。终于在午后十二时三十一分，麦克阿瑟将军以国会门卫作前导，在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簇拥下来到了。当这个归来的英雄经过通道走向讲坛时，参众两院的议员和旁听席上的一大批群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随后响起了门卫的声音："议长先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到。"麦克阿瑟在扩音器前就位，那地方通常是国家首脑使用的。议长雷伯恩为将军作了介绍。群众激情的表示持续近两分钟。

当一切平静下来后，麦克阿瑟开始了他的讲话。

> 主席先生，议长先生，尊敬的国会议员们：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既感到深切的歉疚，又觉得无比的骄傲。歉疚的是，我没有为我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缔造者争光，他们以前也在这里站立过。骄傲的是，这个立法辩论的讲台，反映着有史以来最地道的人类自由。
>
> 这里集中人类的希望、抱负和信念。
>
> 由于我所讲的问题是根本性的，而且超越了党派利益的范围，所以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任何党派作辩护的。假如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前途是有保障的话，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加以解决。因此我相信，你们会公正地对待我所说的话，这些话只是表达了一个美国同胞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我已风烛残年，和你们讲话，既无深怨，也不痛苦。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为祖国服务。

那些在后半小时中观看电视或收听无线电的人，看来是不会忘却当时的情景的。他们可能记不住麦克阿瑟讲了些什

么；但他们将会永远记住通过电波再现出来的这个人的形象。这是个坚强的形象：麦克阿瑟刚强的个性，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自信，清楚地表露在他的开场白里。从他开头的几句话里，显然可以看出他是完全掌握情况。他的举止威严笔挺，讲话坚定而从容不迫，但是整篇演讲的紧迫感却溢于言表。他讲话的抑扬顿挫，既考虑到使他的观点具有吸引力，又要对听众有深刻的印象。他口若悬河，措词雄辩有力。他把动人的章句和历史性的概括结合在一起使用，效果非常好。

……历史明确而强调地告诫我们，姑息只能招致新的流血更多的战争。没有一个事例能说明姑息而有好结果的，姑息至多带来虚假的和平。如同敲诈勒索，姑息为越来越高的要价打下了基础，最后唯有以暴力对付，别无他法。我的士兵们问，为什么在战场上把军事优势拱手让给敌人？

麦克阿瑟停顿了一会，然后以较柔和的声音说，“我没有作出回答。”

他策略地颂扬了“你们出征的孩子们，”把他自己和他们的幸福结合在一起，而把政府和他们的困境联系在一起。他说，他们全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而且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好样的。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是为了保存他们光荣地结束这场野蛮的冲突，让时间遭到最少的损失、生命遭到最少的牺牲。日益增加的流血，引起我最大的痛苦和焦虑。那些勇敢的人们，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和我的祈祷中。

接着，麦克阿瑟的演讲达到了高潮；不大讲礼貌的一些人，也许可以称之为“十足的陈词滥调”。

我五十二年的军事生涯即将结束。我参加军队甚至远在这个世纪来临之前。参军使我实现了童年的希望和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操场上宣誓以来，世道已经变了许多次，我的希望和梦想也早已破灭了。但我依然记得当年兵营里的一首最为流行的歌曲。有一句高傲的歌词是：

"老兵永远不会死，只会慢慢地消失。"像那歌谣中的老兵那样，如今，我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告老还乡，那是个试图完成上帝赋予他责任的老兵。

再见。

这是一出难以忘却的表演。

但是麦克阿瑟暂时还不能退出舞台。那天下午，将军去宪法大厦和美国爱国妇女协会，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之后，在林荫大道的欢迎会上，他接受了一套银制的茶具和华盛顿市的钥匙。当车队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时，喷气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大街上空编队呼啸而过。近二十五万人观看了这一盛况。仪式完毕后，麦克阿瑟飞往纽约，盛大的欢迎安排在第二天举行。

纽约盛况空前，欢迎不遗余力。"全市狂呼大喊又尖叫，差不多弄得精疲力尽"。"这个大城市形成巨大的欢迎队伍，为七十一岁高龄的军人政治家大声欢呼"，历时长达六小时二十五分钟之久。走出家门的人群估计达七百五十万；超过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将近一倍，那是1945年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欧洲凯旋归来的时候。人人都出来想看一看麦克阿瑟将军的丰姿：有纽约州人、新英格兰人和新泽西州人；有抱在怀里的婴儿；有中小学生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们排列在十九英哩长的大道两旁；很多人手握标语牌和横幅，上面写

着“欢迎麦克阿瑟回国”、“麦克阿瑟永远不会下台”、“上帝保祐，我们不要艾奇逊”。

欢迎队伍这回向麦克阿瑟抛撒的彩色纸带、五彩纸屑和各种飘带共重二千八百五十吨之多！纸屑从高楼大厦的各个窗口飘落下来，掉在回国的英雄身上。看上去纽约彷佛在4月份经受了一场暴风雪。在看不见的地方，港口船只、汽车和工厂、汽笛长鸣，向麦克阿瑟致敬。似乎对于地面和海上的这种欢迎还嫌不够，这个城市又雇用飞机在空中排成长达两哩的蔚为壮观的字样：“欢迎归来”、“干得好”。

麦克阿瑟到处受到美国人民自发而热情的欢迎，道理何在？为什么成百万的美国人出来欢迎麦克阿瑟？他们干吗不去看棒球比赛？又为什么随身带着袖珍无线电收听麦克阿瑟的讲话呢？毫无疑问，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好奇心。麦克阿瑟反对总统，他的被解除职务，以及他和杜鲁门先生的对峙，所有这些都增添了戏剧性的紧张。人们要亲眼瞧一瞧这个挑战者的模样。欢迎同时也是感谢声，感谢他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色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在渴望有个英雄的公众心目中早已成了英雄。珍珠港的灾难之后，美军惊魂未定，又在菲律宾吃了败仗，麦克阿瑟在巴丹面临绝境，然而他照样顽抗到底，这就是美国的勇气和耐力的象征。当政府命令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去澳大利亚时，他的著名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来，”表达了复仇和夺取胜利的信心。麦克阿瑟将军军事上的天才，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他达到了这个胜利的目的，并终于使得他永远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在欢迎麦克阿瑟的歇斯底里狂热的另一面，还存在着同样重要的相反情绪，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那就是公众对

国家连续参与世界事务感到厌倦。首先，因为他们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努力；紧接着就是失望，因为他们经过长期的战争年代后非常希望有个长时期的和平。其次是遏制政策的遭到挫败，这一政策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经验是背道而驰的。冷战并没有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划上一道明确的界限；它使美国既不能摆脱同外国的牵连，以便优先关心国内的事务，也无法利用其巨大的军事力量，迅猛地打击敌人，因为这些敌人分散了美国的精力，不能专心处理国内问题，应该全力以赴，加以“惩罚”。遏制的目的，不在于打个漂亮的胜仗，一劳永逸地根除苏联的威胁，而只是改善共存的条件，主要依靠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政策，谋求生存的可能性。国务卿艾奇逊有一次说，“我们称它是头疼症，你服了药，症状就消失了。可是由世界形势所造成的苦楚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将缠住我们不放，到死方休。我们必须懂得，在我们这一生中，将充满着危机和反常事件，我们需要警惕、努力和纪律，这对于我们是件新鲜事，也是件难事。”

说来还令人泄气。对外政策的失败是个新的经验。假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已经堵住了欧洲的红色浪潮，使美国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那么，1949年和1950年初发生的事件——蒋介石的垮台，美国原子垄断的结束，和政府内部间谍活动的被揭露——就使他们丧失了这种安全感，并丢弃了幻想；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大大地增强了这种不安全和焦虑的感觉。当美国人民心神不定地在适应领导世界的新任务时，以参议员塔夫脱为首的共和党保守派，到处宣讲美国人民消极失望的情绪，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人民广泛的支持。因为许多美国人和参议员塔夫脱一样，渴望过几年前的那种和平安定的日子，

要求指责某些人，把他们国家卷进了“不可收拾的国外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在他归国时的戏剧性的形象，代表着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情绪，他以人们熟知的语言作了表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美国人民”的语言，胜利的语言，展示的前景是迅速而成功地结束流血战争。这些话表示信任，并赞赏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在世界上完成她心目中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些话还谴责了一些人，他们由于害怕俄国和不好对付的盟国，用“懦弱”和“姑息”这两块石头，压住了骄傲无敌的美国巨人的手脚。在冷战失利的消沉情绪中——朝鲜战争使这种情绪公开化、激烈化——麦克阿瑟将军就成了这种传统的美国精神的化身。

塞缪尔·卢贝尔后来告诉人们，他于1950年会见一对名叫亨特的俄亥俄州的老年夫妇。“虽然亨特夫妇认为不可能和俄国达成协议，但他们还是不大愿意说战争是唯一的出路。他们也不满足于当前不战不和、半死不活的局面。‘我们应当有所行动，让那些俄国佬明白他们应该适可而止，’亨特说，‘如果马立克和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抨击我们的话，理应有人上去打他们的耳光’！当我准备告辞时，亨特总结他的体会说，‘我觉得我想说的是，现在是恢复美国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麦克阿瑟被撤职后，报社收到的来信证实，公众对冷战怀着同样厌倦的情绪。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不动产兼保险商的来信，是许多群众情绪的典型：“让我们清洗一下自己的思想，让我们再作一次献身。思想明确之后，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发布命令的，我们不听别人的指挥。不论什么地方的大国，如果向我们挑战，就让我们来个秋风扫落叶，把他们清除掉！前进！”另一封信问道，为什么

“大头目”不支持他们的同僚，“反而迁就破产的服饰用品商”和“卖国的”国务院，他们将“把我们出卖给英、欧洲和共产党。”新泽西州的一个妇女，把麦克阿瑟神化为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她写道，将军具有“上帝的品性；他和善、宽大、坚定、公正，那就是我理想中的上帝。”这种把麦克阿瑟比作上帝的人，并不限于“一般的”美国老百姓。麦克阿瑟向国会发表演说后，一位曾在哈佛、牛津和海德尔堡受过教育的众议员杜威·肖特说，“我们看到了活着的上帝，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赫伯特·胡佛的评价比较有分寸，他把麦克阿瑟看作是“圣保罗的再生，是来自东土的伟大将领。”麦克阿瑟已经触动了美国最敏感的心弦——具有宗教、甚至神秘色彩的“美国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束手无策，只好等待公众愤怒的风暴过去。这个日子也总是要来的。埃里克·戈德曼讲了麦克阿瑟到马球场看巨人队和菲利斯队比赛时的情景。经理为贵宾的光临而感到荣幸，放了十七响礼炮的录音；麦克阿瑟的包厢装饰着星条旗，将军告诉观众说，他很高兴“前来观看棒球比赛，这是一项精彩的美国运动，对美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很大。”麦克阿瑟及其随行人员比其他球迷先离开赛场，他们经过球场走向中场出口处，场上响起了“老兵永远不会死”的乐曲声。当将军走近出口处时，一个冒失的布朗克斯球迷叫嚷说：“嗨，麦克，哈里·杜鲁门现在怎么样啦？”群众报之以狂笑声。

在参议院开始审查麦克阿瑟撤职问题之后，这类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正是这个调查，让许多美国人明白麦克阿瑟终究可能是有错误的；对于另外一些美国人来说，这只能证明麦克阿瑟是一贯正确的。

第十二章　将军的申辩：

抗命的原因

共和党人要求全面审查政府的远东政策，民主党人如果反对，那就未免显得莽撞蛮干。这种反对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共和党坚持听证会由特别委员会主持，两党各派相等的代表参加，并向群众公布会议情况，然而，民主党根本不同意这样做。最后，采纳了折衷的办法：质询将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由参议员理查德·罗素主持；听证会情况不直接向群众公布，即不搞电视或无线电转播，但是，证词在删除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后，将在报刊上予以披露。

1951年5月3日，在参议院办公大楼318室，参议员罗素揭开了这次“大辩论”的序幕：

> 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先生们：今天，我们为一些重大问题召开听证会。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每个公民的生活，而且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维护我们自由政府的体制，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
>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同意在听证会上第一个作证。我认为没有必要由我来详细介绍受到美国人民敬仰的麦克阿瑟将军的业绩。

在我们历史的不朽篇章中，谱写着他在三次战争中的功勋，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将领。他不仅是伟大的军事领导人，而且由于他对政治科学具有广博的见识，使一个战败国在他的治理下得到恢复和稳定，为他自己和他的祖国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他们曾一度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将军今天在这里和我们的委员会一起讨论问题，并协助履行我们的法律责任……

今天和今后几天中，指引我们的准则必须是国家的利益，因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命运。

罗素接着就让麦克阿瑟宣誓作证，并请他开始讲话。但是将军事先没有准备好发言稿。"当国会给我特殊的荣誉，让我给他们做报告时，我已经把意见都讲过了。今天，我根本不是作为一个自愿的证人到这儿的，而是委员会要我来的，我完全听从委员会的安排。"不管是自愿或不自愿，麦克阿瑟看来是个非常能合作的证人，有时还很健谈。

表面上看，麦克阿瑟完全是从军事角度来进行论述的。他说，战争表明"你已经使尽一切可能解决分歧的办法，"一旦战争发生，"那就别无选择，唯有千方百计迅速地结束战争。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胜利——不是旷日持久的胜败不分。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胜利。"麦克阿瑟宣称，战争从来不是"零敲碎打"地进行的；你不能打一场"半吊子的战争。"目前政策的基本设想是，"当你使用武力时，你可以有限制地使用，""这就给军事行动带来了新的概念——姑息的概念……"但是"抵抗侵略"的真正含义是"你可以摧毁侵略者继续袭击你的潜力，而不是胜负不分地

缠个没完。"

政府的目的显然不是要打胜仗。它的意图是"拖拖拉拉地打着，军队打仗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像拉手风琴似的、伸伸缩缩地进行抗战，这就意味着累计伤亡数将大得惊人。"麦克阿瑟指责这是破落户的方针，其后果只能是"持续的无限期的流血牺牲。"他承认，战争是可怕的，朝鲜所遭受的破坏是他从未见到过的。"我想，我见过的流血灾难，不会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少，但我最后一次去那里时，确实使我反了胃。在我看到废墟和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以及其他一切之后，我呕吐了。现在你们是否打算让这种情景继续下去……？"假如他自己的战略不被采纳的话，最好还是向敌人投降，依他们的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算了。

麦克阿瑟随即把话题转向他所选择的方案，他觉得这个方案能以"正常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伤亡取得公正而光荣的和平。首先，美国必须在战场上击败共产党的军队。"当你只是说'我们将继续抗击侵略'时，侵略并不是敌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敌军作战的意图非常明确——摧毁我们在朝鲜的军队。"为了不让敌军达到这个目的，将军重复了他早先曾几次阐述过的建议：以海军封锁中国，加强经济禁运，撤消对蒋介石的"限制"，轰炸满洲和中国的机场、车站和集结点。他清楚地指出，假如不让摧毁鸭绿江以北敌军的基地，"假如不让利用福摩萨约六十万人的友军，假如不让封锁中国的海岸以隔绝红色中国来自外界的援助，假如没有希望得到强大增援，那么，从军事观点看来，远东司令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肯定，实施这一方案不需要大量增加地面部队；只需要"一定数量的海军和空军。""主要是解除加诸于空军的种种约束。"他对一个参议员

说，"你是一个桥牌爱好者，你懂得桥牌的第一个要领就是攻你力量最大的花色。"

认为采取这些措施能够取得军事胜利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战场上所有的指挥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全部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1年1月12日的建议中，除了轰炸满洲空军基地和供应仓库外，采纳了所有他的意见，并且"就我所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修改过这些建议。"所以，这些建议必然是被国防部长或者总统所否决了的。

参议员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的文件，支持你所提出的方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证据？

麦克阿瑟将军：就我所知，没有什么书面的证据。

参议员约翰逊：口头的有吗？

麦克阿瑟将军：我没听说过。

如果他的方案被采纳，那很快就能取得胜利，风险和伤亡也将是最低的。一次又一次，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他的方案是达到"决定性目的而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唯一途径。""我确实相信，假如你让朝鲜战争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你就会招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前线尽力抵抗，而在一个地区搞姑息的话，那么，打大仗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

对于那些害怕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的人，他指出，中国缺少"现代战争必须具备的工业基础，"而通往苏联的一条铁路"任务几乎已经挤满……人们过分夸大了共产党中国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他继续说：

我们必须了解，中国本身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让老百

姓吃饱饭。我敢说，中国每年总得有五百万到一千万的人由于饥饿或营养不良而死亡。她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一旦加以破坏，就会使大部份人产生不满，社会也就不得安定(麦克阿瑟后来估计，结果会有五千万人挨饿)而国内的紧张将有助于破坏她战争的潜力……

中国共产党特别经不起封锁，也受不了轰炸给她国内造成的破坏。

如能利用这些因素，她按逻辑就更难、甚至不可能维持军队在国外作战。(麦克阿瑟早些时候曾作证说，“在分配制度瓦解后，”中国最多只能供养五十万到一百万军队，而现在却有四、五百万。)

我认为，我们只要稍为在军事上努一把力，就会有绝好的机会来结束朝鲜战争。

但是，有个参议员问，假如我们采用新的战略，确实设法把中国共产党赶出了北朝鲜，而那时他们却拒绝停战，那他将采取什么方针来结束战争呢？麦克阿瑟回答道，“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有的。我很难想像敌军在被赶过鸭绿江之后，还有可能保持进攻的姿态。”

麦克阿瑟还深信他的战略不会引起苏联的参战。有人问及苏联是否会眼看共产党中国的失败而坐视不救，他的意见是，俄国并没有“充分介入”朝鲜战争，“红色中国的失败，只是被迫撤离朝鲜，苏联认为，这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事业，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轰炸满洲不会招致苏联的干预——除非苏联决定不管什么情况都要进行干预。只有在全球力量平衡估计对苏联有利时她才有可能派兵去朝鲜参战。但是这种力量平衡中的某些因素，将会阻止苏联参与这场战争。

过些日子，麦克阿瑟对这些论点作了详尽的阐述。参议员哈里·伯德当时正在调查由于弹药不足以致影响作战一案，麦克阿瑟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整个弹药和供应问题的根子，一直是个无法预知的悬案：苏联是否打算征服全世界。假如她要这样做，她就掌握着时间和地点的主动权，而且还难免要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即美国在原子武器方面的领先地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同样，美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和共产党国家相比，也是如此。总之，我始终认为，目前我们可能采取的解决远东问题的任何行动，在引起世界大战时，将不会是个主要因素。

麦克阿瑟不相信“苏联能集结巨大的后备力量，从亚洲大陆发动掠夺性的袭击”。苏联军队的部署，“主要是防御性的。”苏联的远东军队没有大工业企业的支持，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为了维持目前的远东驻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俄国能够对日本发动毁灭性的攻击，但是在美国海空军的优势面前，她看来是不能入侵日本的。苏联空军的战斗力很可能维持不了很长时间，因为俄国在西伯利亚缺乏维修设备和石油。在海参威地区游弋的大部份潜艇，续航距离都很短，而且主要用于防御目的。所以，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看来，俄国力量的规模似乎并不太可怕，其威胁程度肯定没有西方世界所认为的那么大。

有个参议员提醒麦克阿瑟，1950年10月他曾同样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干预朝鲜战争。

参议员麦克马洪：……如果你这次刚巧估计错误，使我们卷入了一场全面战争，我想知道你心中打算怎样来保卫美国、对付那场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参议员先生，那可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在太平洋地区。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的各种机构在日夜操劳，设法全面解决世界性的问题。现在我并不熟悉他们所研究的情况。我没有插手过。我的全部精力一直都倾注在世界的另一边。因此，详细讨论我连碰都没有碰过的问题，对于这个委员会或任何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参议员麦克马洪：将军阁下，我认为你讲得很好，那也正是我所要讲的。那些参谋长和美国总统兼总司令，必须在全球基础上考虑全球性的防御问题。

你是个战区指挥官，据你自己所说，你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过研究。但是你建议我们们执行的行动方针，却会把我们卷入世界大战。

麦克阿瑟将军：参议员先生，牵涉到国际关系的每一事情，都是一场赌博，也是一次冒险。你必须得承担这些风险。

麦克阿瑟继续说，原先决定保卫大韩民国时，生来就冒着苏联干预的风险。鉴于美国领先的工业力量，较多的原子弹库存，以及发射新武器的能力，看来是值得冒这个风险的。凡是承认美国无力保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政策，就等于是姑息养奸。“我看，我们是有能力做到的。假如你说我们做不到，那你就是认输。如果敌人有力量，并分兵驻守所有这些前沿阵地，我们就必须有能力去对付。”这种形势在几年内可能会有所改变。

因此，麦克阿瑟驳斥了有些人的想法，他们认为美国被迫在朝鲜拖延时间，是为了加强防卫力量和扩充她的军队，准备在今后几年内打一场大战。麦克阿瑟反对这种说法，并

不是因为美国有充分准备与苏联打世界大战——他确实承认"就我所知，我们现阶段的准备并不充分"——而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相对说来，我们实力的增长要比敌人快得多。这种设想很值得怀疑……"拖时间可能对自由世界不利。

所以，美国在朝鲜的战略不能建立在时间会纠正力量不平衡的假设上，根据政府的看法，这种不平衡当时是存在的。参议员麦克马洪建议："停下来，瞧一瞧，听一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不要盲目执行会使我们面临绝境的方针，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思想准备。"那样的建议是荒谬的，只能是一种"推论的诡辩。"可以肯定，苏联可能会干预；那是一种可能性。但朝鲜没完没了的"屠杀"却是个现实问题——除非采用麦克阿瑟的军事计划。"我在太平洋遇到的情况，并不是预测在将来发生的事件。它就在眼前，你打算怎样制止朝鲜的屠杀？你准备让它继续下去吗？你那保卫美国不受战争影响的全球计划，是否包括让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无限期地打下去？"

对于那些征询他意见的人，麦克阿瑟反复重申他的信念，那就是只有坚定不移地争取胜利，才能阻止俄国的进攻。

> ……要制止苏联或其他潜在敌人的任何突然或掠夺性袭击，最好的办法是打赢朝鲜战争，让潜在的敌人感觉到，假如他发动战争，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把他打败。我认为，如果我们认输，我们就会显示出软弱的征兆，或者让最终没有明确目标的、骇人听闻的屠杀继续下去，这样下去不会产生别的结果，唯一的后果正好是你渴望避免的灾难。

麦克阿瑟自然十分明白，美国的欧洲盟国不大愿意采纳他的比较强硬的军事计划。他觉得这种态度是十分自然的。“对欧洲人说来，欧洲的利益和安全自然是首要的。他不用害怕来自西方的攻击，只是担忧来自东方的攻击。所以，友好方面对稳定亚洲所作的每一项贡献，欧洲人都看作是欧洲增强安全的损失，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种论证既没有远见，也毫无道理。“对东方自由的任何破坏，都会给西方自由带来可怕的威胁。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不理解这个事实，发展下去就会最后断送我们的自由。”麦克阿瑟强调指出，“假如不以勇气和必胜的决心来进行战斗，迎击亚洲的挑战，那就真的会在欧洲战场上打起来，而且可能会打败。”总之，西欧的第一条防线在朝鲜，而不在德国；他们采纳麦克阿瑟的战略建议，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高利益的——特别是由于他的建议并不需要什么增援部队，几乎不要额外的战略物资，不会严重影响美国用于欧洲的实力。

但是，麦克阿瑟又说，假如我们的主要盟国被俄国所吓倒，以致无法认识他们的方针是无济于事的话，那美国就只好“单干”。美国不能把她自己的切身利益置之不顾，因为欧洲大国“还没有清醒地看到姑息的后果。”我们在朝鲜的利益是极端重要的，“假如一个国家尽了百分之九十的义务，而有些国家只尽一小部分义务，那么在作出决定时，他们要有过多的发言权，是很不恰当的。”用邱吉尔先生的话来说，这么多的政府，只尽这么点义务，而要求这么大的权利，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

然而，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他的建议，不顾盟国的抗议而被采纳和执行的话，盟国还是不会抛弃美国的。归根结底，这些国家得依靠美国，而不是相反。但是，他重复说，

假如为了维护盟国的团结，而必须牺牲美国切身利益的话，这样的团结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能、确实也不应该，为团结的形式，而牺牲行动的本质。

麦克阿瑟纯粹从军事角度说出了他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他宣称，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胜利，而不是旷日持久的胜败不分。一旦战争爆发，那就别无选择，只有用尽一切手段把战争结束。早些时候，他曾讲过“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付我们的反攻时，可以保护它的军事潜力，这是空前的有利条件”；讲过“以最大的反攻力量迎击敌军”；以及给他的“反常的军事约束”。这样申辩下去的逻辑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应当停止“干预”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在这方面，麦克阿瑟承袭了罗马将军卢修斯·阿米利厄斯·保罗斯的理论。

……指挥官应当听取意见，主要对象有：知名的天才；熟读兵书而有实战经验的人；亲临前线，知己知彼的人；以及善晓兵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人。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当参谋，对我所指挥的战争能提供意见……就让他随我出征……如果他认为这样太麻烦，宁愿呆在城里享福的话……就请他不要……担任领导职务。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坐在远离战场数千哩外的办公室里人，怎么能知道形势的要求呢？当然，柯林斯和范登堡将军是有军事素养的，他们也安坐在华盛顿，但是，这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至少访问过朝鲜，亲眼看过那里的军事形势。由于麦克阿瑟还有这样的印象——至少有人认为他有这样的印象——即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同意，必须采取某些军事措施，以反击共产党中国的干预。没有实行他的建

议，只能归咎于政治上的“干扰。”

此中涵义是清楚的：既然他，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击败敌军的措施方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总统早就该接受他们的建议。看来将军受了美国军事学说的影响，认为军事部门在政治上是中性的机构，它的行动应当不受干扰地由它自己的规律来指导。军人是非政治性的人物。他指挥作战时，不问政治，但求实效。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胜利，就是彻底击败敌军。

仔细一想，似乎就产生了怀疑，难道麦克阿瑟真的会相信军事和政治能截然分开吗？朝鲜战争期间，如果把他的一些决策和建议都看作与政治毫无关系，那肯定是有困难的。仁川登陆之前，他曾说过：朝鲜战争是对自由世界的一次考验，和西方的声誉存亡攸关；只有取得迅速的，戏剧性的胜利，才能挽回西方的威望。“千百万东方人”正在等着瞧谁是胜利者。11月下旬，麦克阿瑟拒绝把军队停在不到朝中边界的地方，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不能统一朝鲜就是对朝鲜人民的背叛，也是懦弱的表现。这不仅会失去亚洲人民的支持，而且是在给共产党中国的军队鼓气。此外，麦克阿瑟3月24日的“军事评论”，显然是打算防止把福摩萨和联合国中的国民党席位让与共产党中国。所以，纯粹用军事涵义来理解麦克阿瑟使用的“胜利”这个词，将是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麦克阿瑟在共产党中国干预后的政治目的有四个。第一，他的任务是“扫荡北朝鲜，统一朝鲜并使之自由化。”这个目的在中国共产党干预前几乎已经达到了。局势的转变“要求在外交方面作出决定，实事求是地调整军事战略。但是政府一直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结果，“我只好在我称

之为真空的状态中指挥作战。”换句话说，麦克阿瑟认为，他接受的政治任务是具体的——军事统一朝鲜——他没能实现这个目的，是因为政府对他的部队、尤其是对空军所作的种种限制。他不想接受这种局面。1950年11月，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在军事上不能实现“公开并反复重申的目的，也就是没有歼灭朝鲜北部边界以南的全部敌军，……将被朝鲜人民看作是一种背叛……背叛了联合国替他们承担的壮严的使命。”

麦克阿瑟的目的并不限于把中国共产党赶出朝鲜。他的第二个目的是抵制共产党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早些日子，他曾电告国防部长马歇尔，指出中国是

> 亚洲一个新兴的举足轻重的大国，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已和苏联结成盟国，但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方法，它已经成为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这类帝国主义往往渴望扩张地盘和增强实力……其侵略矛头现在不仅指向朝鲜，而且还指向印度支那、西藏、甚至再要往南，这突出地反映了贪求权力的欲望。创世纪以来，每个征服者开始时都有这种欲望。

所以，他希望“重创并大力压制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这样才能拯救亚洲，否则就有灭顶之灾。”这个目的不用冒巨大的风险就可以达到，因为苏联在原子和工业力量尚未赶上美国之前，看来是不会打仗的。在实力大致相等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必须制止共产党中国在远东的扩张；摧毁红色中国的作战潜力，将大大削弱她的政府，并威胁苏联对亚洲的控制。

另一方面，不给共产党中国以沉重的打击，反而接受朝鲜的僵持局面或搞个停战协定，将使亚洲的战略前线从朝鲜

转移到印度支那，让北京政权继续在别处进行扩张。惠特尼将军在得知朝鲜停战的时候说，麦克阿瑟预见到了法国殖民地的命运，并且还引用了他的话："这是对印度支那的死刑执行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麦克阿瑟将军和参议员麦克马洪之间的一段最容易误解的对话。

参议员麦克马洪：将军阁下，共产党这个阴谋的策源地和指挥中枢在哪儿？

麦克阿瑟将军：我怎么会知道呢？

参议员麦克马洪：你是否认为克里姆林宫是个策源地？

麦克阿瑟将军：我可以说，那是策源地之一。

小阿瑟·施莱辛格和理查德·罗维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回答表明将军的信念，那就是苏维埃俄国对世界和平及美国安全的威胁，并不比别的共产党国家大，因为敌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共产党国家，而是共产主义本身。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麦克阿瑟确实主张，从思想上和军事上根除地球表面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麦克阿瑟把"世界共产主义"确定为我们的主要敌人，并且除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他拒绝接受任何别的方案。

与麦克阿瑟的证词和先前声明中的内容相比较，他给参议员麦克马洪的回答的含义就有些不同：共产党中国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大国；必须抵制她的威胁以免她扩张到亚洲其他地区；而在防备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时，不应忽视北京对亚洲未来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也不该在全球力量的平衡仍然有利于我们的时候，否认有迎击她的必要性。换句话说，麦克阿瑟军事建议的目的，不仅是要统一朝鲜，而且要改变远

东的整个战略面貌。毫无疑问，这是将军的方案中最为主要的目的。

麦克阿瑟的第三个目的，是要赢得亚洲人对民主事业的支持。不对共产党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不争取统一朝鲜，将被亚洲人民看作是软弱的标志，并将失去他们对美国的同情。这是不能允许的。麦克阿瑟长期以来对亚洲的前景一直怀有基督徒的美好设想。到了1951年，他仍然持有这种观点。他看到“世界事务的整个中心”又转回到了它原来开始的地方。美国未来的繁荣主要将依靠同亚洲新兴国家的贸易，而这些国家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搞自力更生。

麦克阿瑟强调指出，他对亚洲的关心，并不意味着对欧洲的相应的忽视——虽然他曾一度怀疑过欧洲对于美国的价值。尽管如此，现在他声称，他的方案将给欧洲提供更多的保护和安全。他说，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而且是互相关联的，因此考虑一个地区的问题而忽略了其他地区的问题，只会给全局带来灾难。亚洲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的门户，同样，说欧洲是亚洲的门户，也并没有错。对于一方的巨大影响，必然会在另一方产生反响。”朝鲜是对西方盟国的考验。不仅要在欧洲守住抗击共产主义的防线，而且也要在亚洲守住。正如对付俄国的扩张一样，对红色中国帝国主义，也必须给予同样坚决的抵制。欧洲的防线目前还不在伦敦、巴黎或华盛顿，而是在朝鲜。在欧洲，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的斗争，继续采取外交的方式，麦克阿瑟不恰当地评价为“耍嘴皮子”；但是在亚洲，双方早就以武力交火了。如果朝鲜战争失利，民主党人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遭到一次最大的挫折，就会暴露出他的缺乏决心和勇气，而这只会鼓励共产党挖西方

国家的墙脚，可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如果战争取得胜利，欧洲或许能免遭战祸而保持自由，因为我们能守住防线，把所有的突破口都给堵上。

这些就是他的四个主要目的——也可以说是三个半，因为欧洲的防务看来是附加上的——也就是“胜利”这个词的政治内容。麦克阿瑟选用这个广义的名词，是有其精明的打算的，那就是争取最大量的公众支持他的观点。因为这个词仿佛会有迅速的决策，会把仗打赢。这个词使麦克阿瑟显得是个忠诚的军官，他的唯一愿望是按常规指挥战争，不去理会华盛顿那帮昏聩无能的外行。这帮人过份害怕俄国人和中国人，听了他们盟国的意见，就会改变主意。他让这个词骂文职上级为“政客”,“政客”作为贬义词，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只有用在法国才更有效。他们确实还不只是“政客”,这些人看来连亚洲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都弄不清楚。他们的眼界只局限于大西洋，他们可以被称之为“北大西洋的孤立主义者”;但麦克阿瑟却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成为无辜的牺牲者。

所以麦克阿瑟把政治和军事截然分开，并不表明他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说的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看来，他只是希望用这种鲜明果断的姿态来陈述问题，以加深他对公众和国会的影响。认为政策和武力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样的神话或许在国会中最得人心。人们普遍呼吁取得迅速而彻底的胜利，因为美国人对和平与战争历来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码事。当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外交政策就很少考虑武装力量；维护和平是外交家的事，外交手腕根本不作军事打算。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政府就一下子改变对国内事务的优先关心，军事因素实际上完全排除一切政策而占首要地位；唯一的目的是迅速取得军事胜利，惩罚侵略

者，因为他们蛮横无理地进攻美国，破坏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乐趣。

但麦克阿瑟从“军事”角度来提出申辩，是为了证明他不听政府指挥是有道理的。因为历代的起义者往往引用自然规律，证明他们造反有理。他们声称，当局由于滥用职权，从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利。所以麦克阿瑟也把他抗命的责任，推在政府身上；不按照传统的军事准则行事的不是他，而是政府。所以应该受到责难的不是他——虽然他由于向上级文职长官挑战而背离了民主的原则——而是华盛顿，因为后者以“非传统的”、甚至“非美国的”方式来进行战争，结果使他成了个抗命者，即使不在行动上，至少在思想和言论上是这样。许多年的军事经验，加上清醒地掌握了有关的战略因素，使他采取了新的方案。

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在言论上是公开反政府的。没能通过正规的渠道改变华盛顿的政策，使这个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最痛苦的问题：如何忠于对宪法的誓言、为他所理解的美国最高利益服务，而同时又尽忠报效掌权的政府？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他不能同时为宪法和政府服务而不背叛其中的一个。他深信美国政府现行的远东政策对美国是不利的——虽然要过几年才能明确看出害处——他还深信，他比华盛顿更懂得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在太平洋地区。麦克阿瑟的感受也许很像1940年的戴高乐将军，后者当时“根本不听”政府的指示，拒绝放下武器。因为麦克阿瑟和戴高乐两人彼此十分相像：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两人都有强烈的优越感，都主张强有力的行政领导，而且孤芳自赏。“具有个性的人”，戴高乐曾经写过麦克阿瑟可能也会写的话，“往往是冷

淡的，因为权威不能没有声望，而要有声望就不能有热情。在同他上级的关系中，他发觉自己处境很困难。他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也知道有多少实力，他不愿作出让步以求讨好别人。他……不会盲从……况且，从事伟大事业的人，往往不管陈规陋见。一九一四年，莱奥蒂不顾上级的命令，守住了摩洛哥，而在日德兰战役后，费希尔勋爵严肃批评了杰利科的急电：'他具有纳尔逊的一切优点，只有一点例外：他没有学会抗命。'"（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和欧洲的首脑都抨击麦克阿瑟，唯独戴高乐公开谴责这些领导人，——"敌人害怕这个外国统帅的勇略，抨击他就会让敌人得到好处"。"对于这位伟人的传奇似的功绩，欧洲政治家理当给予应得的颂扬。"）

不管麦克阿瑟是否受到戴高乐的思想感情的启发，麦克阿瑟在忠于国家和忠于那些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们之间，划上了一条明确的界线：

> 我发觉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的概念，那就是我们武装部队的成员认为，应该首先忠于当今政府的行政首脑，而不是忠于国家和他们誓死保卫的宪法。这是最危险的想法。

假如这个声明的含义是为了说明麦克阿瑟的方针是正确的话，它仍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既然不能通过合法而现成的渠道来"纠正"华盛顿的政策，那他为什么不辞去司令部的职务回国，然后游历各主要城市，群众必然会给他热烈的欢迎，他就可以大造舆论。他被解除职务后的事实证明，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也许是，麦克阿瑟认为假如他留在东京的话，他越过政府首脑向美国公众特别是向国会作出的呼吁，能更为有效些。

自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漫游美国各地，他将不能像远东司令那样对华盛顿产生同样程度的政治影响——要是因为他以前的身份，他在当时能不让杜鲁门先生作出最困难的政府决策，即不解除他的职务那该有多好！在他没有被罢免的时候，他给政府两种选择：一是把他撤职，这从政治上说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他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他自己，可能加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方，国会的坚决反对和公众的批评为另一方。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妙，因为两种方针最终都会迫使政府十分勉强地采取反对派的政策。麦克阿瑟可能认为，第一种选择既然很难办到，第二种选择将会带来他长期主张的可喜变化。将军毕竟是很自信的，不幸的是，和以往的许多将军一样，他低估了总统的勇气。

麦克阿瑟把情况讲得很有说服力，提法也很恰当。然而，它有三方面的弱点和自相矛盾之处。他的论证里生来就有这些弱点，因为作为战区指挥官，他正在向国务卿艾奇逊所谓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挑战。首先，将军拒绝接受华盛顿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在别的场合，他称之为华盛顿的“政治情报。”但是，他曾预言，共产党中国不会干预朝鲜战争，后来又为自己开脱罪责，说北京作出参战的决定是政治性的，超越了朝鲜战场上军事估计的范围。“一个国家即将发动战争的情报，”麦克阿瑟说，“对在一个小地方打局部战争的指挥官来说，是没法获悉的。那份情报早就该送给我了。各大国都有一些机构，在世界各地收集情况……为作出这类结论提供非常广泛的基础。”华盛顿理应提供他这个情报！

然而，麦克阿瑟目前认为，“苏联不一定和我们的行动纠缠在一起。犹如眼镜蛇，只要它感到全球范围的军事或其他因素对它比较有利时，就更有可能袭击任何新的敌人。”这是

否意味着麦克阿瑟可以随心所欲，作为战区指挥官在一霎那间居然能预见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向了呢？若然如此，他是没有资格作出这种判断的，这是他自己承认的。只有华盛顿可以作出判断；只有华盛顿掌握着“政治情报”，可以预见另一个国家未来的意图。政府未能预见共产党中国的动向，这并不能解决麦克阿瑟论证中自相矛盾的问题。

其次，将军从未放弃过他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身份，而且他绝不接受他的建议造成的全球性后果：

> 参议员麦克马洪：将军阁下，如果一定要打大战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就绪，跟苏联开仗？就我所知，你大概无可奉告吧？
>
> 麦克阿瑟将军：参议员先生，像那样的问题是由我的上级来研究的，……
>
> 参议员麦克马洪：还有，你作为前陆军参谋长，是否认为那些上级领导应该考虑战区指挥官所无法考虑的许多因素？
>
> 麦克阿瑟将军：当然应该，……这是他们领导的本职工作。
>
> 参议员麦克马洪：假如他们到这里来说，他们已衡量了所有这些因素，认为我们目前在东方奉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政策。我想，因为那些精干的领导人是根据你所不知道的因素而作出决策的，你不会不同意他们的吧？
>
> 麦克阿瑟将军：参议员先生，他们作出的任何决定，和所有的人作出的其他决定一样，都得通过舆论的最后审议。

麦克阿瑟最后说，没有什么决定是始终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正是因为它们是由几个当权派所决定的。

然而，这个解释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关键不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否正确，而在他们根据全球性情报制订政策时，是否比战区指挥官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麦克阿瑟承认他们的有利条件，但同时暗示，他承担的责任虽然比较小，却也能预见苏联的意图和美国的能力。假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他的意见。错误在他们，而不在于他。

麦克阿瑟当然决不会承认他和军方上级之间存在着这种分歧。他反而说，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 1951 年 1 月 12 日的建议，曾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虽则一切迹象表明，这不是事实。这些建议没有被执行，显然是因为遭到了政治家的否决。

麦克阿瑟第三个难圆其说的矛盾是，既然他和军方上级就在朝鲜击败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总统和他任命的行政官员应当停止“干预”战争中职业军人的行动。这里，麦克阿瑟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当年我何其聪明，真使我大吃一惊，”将军无可奈何地听着参议员麦克马洪宣读一则声明，这是他本人过去担任陆军参谋长时写的。“任何战争中的全国性战略，”他那时宣称，包括“决策都必须由国家元首审定，与政府的公开意图保持一致，任何部门的领导，不管他有什么特殊的作用或头衔，都不能够也不应当负责制订这类决策。”如果总统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任何下级，”这样做“就不是在授权，而是在弃权。”总之，麦克阿瑟过去同意克莱门赛和杜鲁门的意见，认为战争是头等大事，不能放手让那些将军去单独处理。

第十三章　政府的答辩：折衷主义取得成功

麦克阿瑟坦率而明确地指责了政府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我是在我称之为真空的情况下作战。谁也不能说我反对连自己都不了解的政策。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政策的具体内容。"毫无疑问，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麦克阿瑟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他的讲话表明，自从共产党中国干预后，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手风琴式的战争——忽上忽下——代价之大，"令人吃惊"。"洒落在朝鲜土地上的不仅仅是尘土……还有美国人的鲜血。"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计划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能迅速取得预期的效果——战场上的胜利，统一的朝鲜，和敌对行动的结束。他唯一的要求是，解除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给他的种种约束。主题有两个——政府的犹豫不决和他自己的当机立断——这是麦克阿瑟经常反复重弹的老调。他的方针是积极的，杜鲁门的方针是消极的。他争取的是胜利，总统谋求的是僵持。何去何从，是明摆着的。

杜鲁门政府自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麦克阿瑟的战略。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强调的，它将冒"和中国作战的巨大风险，还有可能与苏联打仗，并将严重削弱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所有这一切能换得什么呢？难道是为了采取早日结束

这场冲突的一些措施吗？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却是我们军方负责人所怀疑的。”因此，美国不能同意战区指挥官的要求，不能为了在局部地区取得军事胜利而影响全球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由于他的战略建议在军事上很难实现，在政治上也不受欢迎。

为了说明这几个论点，为了反复强调它们，政府动员一批给人深刻印象的证人出席委员会，他们是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国务卿、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从5月7日到6月7日，他们总共作证一个月，而麦克阿瑟只干了三天。

在麦克阿瑟作证的日子里，他争辩说，他的击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计划，曾经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而他所受的种种限制，都是政治性的。那些参谋长很快就否定了这两种说法。他们十分明白地指出，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他们早就反对扩大战争。换句话说，他们内行的意见是，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军事上是行不通的。这方面最重要的军事见证或许是空军参谋长。他的证词曾经遭到严重的忽视，部份的原因无疑是由于这时已接近听证的尾声，公众的兴趣正在急剧下降。尽管如此，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发言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一下子全盘否定了人们的误解，当时有人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也会受到非军事方面的干扰。

范登堡将军在宣布反对轰炸满洲时，先讲了几句关于空军的话。他说，美国人没有很好了解空军的作用。战略空军只能用来摧毁敌人的工业中心。他并不怀疑空军能把共产党中国和满洲的城市夷为废墟，但其效果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在战争中，首先就没有什么保证，不能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中国的军火库在苏联境内，所以，尽管对满洲和

大陆中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俄国人仍然能通过满洲边境供应武器。

此外，摧毁红色中国和满洲的城市，需要“全部出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力量。不然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损耗率是很高的。飞机的损失和飞行人员的伤亡，将会很大，根本来不及补充。严重的后果将使空军丧失对苏联进行“大规模回击”的能力。“……美国空军，假如全部投入使用的话，能摧毁满洲以及中国的主要城市，但是……给我们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损失，在我看来，会使我国在未来几年里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而没有防御能力……”轰炸满洲需要两倍于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的轰炸机的架数。所以，在目前情况下，空军打不起“外围战”。战略空军司令部必须时刻准备担负它的主要任务——制止苏联的进攻，并保持全球力量的平衡；假如它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就去摧毁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心脏：苏联的工业中心。“我的看法是，要么我们摧毁俄国今天的工业潜力，要么摧毁满洲的农村以及中国的主要城市。我们不能双箭齐发，因为我们空军的规模太小，只有八十七个联队。我们是在拿两万元本钱，打算做两千万元钱的生意。”

因此，最好还是集中力量轰炸北朝鲜二百哩长的供应线。“我们能够高度集中地攻击那条供应线。如果再延长一百哩，深入满洲境内，虽然你可以炸另一些基地，但是使用同样的空军力量，必将削弱你目前对朝鲜境内二百哩供应线的袭击。”

美国不能袭击满洲，不仅因为空军将受到很大损失，势必损害它的威慑力量，而且还因为“单干”将在另一方面严重影响美国的总体力量。如果我们在亚洲“单干”，我们就很

可能在欧洲也得“单干”。这将使美国丧失她在欧洲和北非的基地。保持这些基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驻在邻近苏联的轰炸机，可以少装些汽油，多带些炸弹。驻在较远处的飞机，就没有这些优越性。从美国大陆上出击的飞机每次来回都需要加油二至三次。这样的话，每架飞机每月只能执行二至三次任务，同样一架飞机从欧洲或北非起飞，每三十天能执行十五至二十次任务。据范登堡估计，撤除美国在海外的基地，她的空军力量就必须为目前的五至六倍。因此，欧洲基地虽然不能算是“绝对必要”，也是“非常实惠的。”

经济封锁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它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共产党中国迅速结束战争。海军上将谢尔曼认为，效果不大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要考虑的是，共产党中国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现状。中国工业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仍然很低，封锁对她不会象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那样，产生同样迅速的影响。由于中国经济中只有城市和军事部门依赖进出口，封锁只能经过很长时期才能奏效。禁运下列这些物资，如橡胶、石油、石油产品、化学制品、药品、机床、机械、工业和汽车的另部件，金属、电气和电子设备等，会造成失业和社会不安，阻碍工业生产，并引起严重的财政困难。这样中国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因为共产党政权的重型军事装备、交通运输设备、汽车备件、替换式扩充重工业所需要的一切制成品、以及许多种药品，几乎全部得靠进口。举个例子，禁运大量的药品是特别有效的措施，因为这会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对付传染病。结果将削弱他们军队的机动性。

封锁共产党中国效果不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不能彻底切断中国主要进口物资的供应线。漫长的中苏边界使任何封锁

都不可能严密无间。谢尔曼海军上将强调指出，由于海军封锁，东西不能进口，这将迫使共产党中国更加依靠苏联，从而使苏联经济和贯通西伯利亚的铁路增加负担。这条漫长的铁路早就超过了负荷，并且很容易被轰炸或海军突击队所破坏，所以它不能很好地弥补海上禁运所造成的损失；况且，苏联往中国运物资，只好减少它远东部队的军需供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就没有谢尔曼海军上将那样乐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对谢尔曼的分析作了修正，他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在每天固定的吨位运输量外，还能增加一万七千吨。俄国人还建立了一些物资仓库和军事工业，以减轻战争期间的货运量。这句话的含义是清楚的：俄国部队在远东有“相当可观的军事能量”：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只需要少量的物资供应，多余的吨位可以调去供应共产党中国。

所以，封锁本身不能迅速结束敌对行动。封锁只能产生缓慢的效果，因为它主要得靠饥饿和消耗起作用。海军封锁只有和空中轰炸等其他军事措施相配合，才能立即见效，没有这类补充手段，封锁就不能严重影响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海军上将还强调，联合国海军封锁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盟国之间全心全意的合作。任何有效的封锁必须把旅顺和大连港包括在内，而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在该港口享有军事上的特权。俄国人“很有可能”要求不要妨碍这两个港口的通航，阻拦苏联船只可能惹它参战。“假如联合国宣布海军封锁，俄国人可能会照办，如他们同意联合国封锁朝鲜那样。假如美国单方面宣布封锁，俄国人很可能不听，他们要是用武力对抗，也是预料中的事。”

海军上将谢尔曼的话的含义是清楚的；美国单方面进行封锁将表明美国在盟国中是孤立的；由于这样一来美国空军

实际上无暇他顾，莫斯科可能感到有机可趁而突破大连和旅顺港的封锁。因为不能动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强大的报复力量，战略空军司令部打起仗来只能发挥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作用。反之，假如美国和大西洋盟国联合起来进行封锁的话，那么，苏联的任何对抗行动都有可能立即遇到北约组织的反应，更具体地说，西欧和北非基地上的美国战略空军就会采取行动。"客观事实是，我们的盟国不愿参与海军封锁中国的行动，而且在建立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动作也很缓慢。"

需要由联合国出面进行封锁的另一个理由同样是明显的，运送战略物资去共产党中国的大多数船只，都挂着联合国非共产党成员国的旗帜。谢尔曼建议用较大的力量集中提高经济封锁的效果。他说，最近几个星期来，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已禁止在年内出售橡胶给中国，5月18日，联合国大会以四十五对四票通过决议，对武器、弹药、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实行禁运，虽然国务卿艾奇逊着重指出"许多国家早已照办了……；另一些国家却没有执行。"

在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时，艾奇逊强调，早在1948年，美国就和盟国一致同意开列清单，限制对苏联集团出口武器、弹药、战争器材和原子能设备。这份清单中的物资在1949年有所增加，到年底，参加禁运的欧洲国家，已经停止向苏联集团出口美国专家当时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业物资，占该禁运项目的三分之二。在以后的两年中，不准向共产党地区输出的物资种类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受到限制、或者严密监督不让超额输出的物资品种总数增加了三倍。结果是，在1951年初，被美国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约百分之九十已列入禁运目录。况且，从1949年

冬起，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某些特殊的石油产品，如航空用汽油和高级润滑油，早已禁止运往中苏集团了。艾奇逊强调说，自从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几个月，英国政府曾联合美国和美、英两国主要石油公司，对运往中国的石油产品的品种和数量作了限制，即明显地仅供民用。共产党人在朝鲜发动进攻后不久，英国海军部就接管英国在远东的全部油库，并取得英国公司的保证，同意执行与美国公司相应的销售政策。香港政府更是积极执行这一政策，严格监督香港船只的加油情况，规定运往澳门的油量，以防偷运去中国。多次查获违禁品，没收有关船只，并对走私者征收巨额罚金。尽管采取这些措施，少量的石油产品仍有可能走私进大陆，但是艾奇逊说，“……没有像样的军用石油产品从自由世界的任何地方运往共产党中国，这点倒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表明，自由世界的主要工业国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物资，早就实施了经济禁运。”经济禁运比海军封锁更为重要。“我想，在一些国家同意继续实行经济封锁时，进一步要求他们进行海军封锁，那是办不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海军封锁是更为严厉的制裁。”

因此，美国政府，特别是那些军事顾问，对使用空军和实行海军封锁，是否能赢得朝鲜战争，表示怀疑。麦克阿瑟始终认为，执行他的方案不需要增加地面部队。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不同意这种说法，麦克阿瑟的战略要取得成功，美国得派“相当数量的”增援部队去朝鲜。布雷德利将军确实认为，只有派遣美国军队进入中国本土，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

康纳利主席：……假如我们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

争，而这场战争又扩大到中国，那么，事态发展到一定时候，我们势必派地面部队去中国本土，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对吗？

布雷德利将军：为了取得决定性的效果，我认为你应该……假如你同中国打全面战争，我想你有必要仿效日本人的做法。打进去并设法解决战斗。我认为，单凭海空军的行动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康纳利主席：那么，不使用地面部队，而只以海空军来对付中国，这只能起牵制的作用，是这样吗？

布雷德利将军：对，我想这将是一个长期不分胜负的战局。如果不在中国本土采取积极行动，我们只能轰炸他们的交通中心，尽可能多地破坏他们的工业，并设法限制他们的供应和食物。

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可以被大量杀伤，但是不挖她的根子，就不能把她打败。海空军能削弱中国的作战能力、但是无法把她摧毁。假如除了军事胜利就没有别的办法，那么，除了军事侵占也同样没有别的选择。北朝鲜刚开始侵略时，麦克阿瑟自己也承认，只凭海空军是不足以抵挡共产党人的进攻的，必须使用地面部队才行。如果对苏联的卫星国适用这一条，那么对共产党中国肯定也能适用。

不管怎样，即使不必使用美国军队进入大陆中国，大量的增援部队还是需要的。和共产党中国进行全面战争，需要"大幅度"增加陆海空军的力量，还要补充后勤部队以支援前线的军队。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得有更积极的动员计划，并扩大生产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

这些军队能不能由国民党中国来提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行。蒋介石需要部队保卫福摩萨，而他的士兵又不是

第一流的军队。麦克阿瑟将军去福摩萨时已“觉察到这些部队看来打不了胜仗……。”国民党军队“战斗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在进攻方面。正如麦克阿瑟将军自己指出的，他们几乎完全需要我们的后勤支持，而且还要我们提供运输设备……他们的指挥、装备和训练水平都较低，在进攻战中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此外，任何对大陆中国的牵制行动，都将需要超额的海空军支持——超额的含义是，从这样的投资中是捞不回本钱的。军方认为蒋军作用不大，但这并不是不使用这些部队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虽然在听证会期间未曾明确加以阐述，是政府对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政治前景的估计。国民党军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重新征服大部份的中国，假如不是全部大陆的话，那就是在他们登陆时，中国共产党军队纷纷投奔蒋介石，像法国人民和波旁王朝的军队归附从科西嘉回到法国的拿破仑那样。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蒋介石缺少的正好是这种群众的信任。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失去群众，在短短的四年中，从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降为远离中国海岸的小岛上的“流亡者”。离开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会恢复他们对昔日领袖的感情，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总之，没有什么部队可以取代美国军队。但是把美国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朝鲜，就意味着削减其他地区的兵力，降低不让苏联插手世界这些地区的威慑力量，使这些地方更容易受到攻击。事实上，美国军事力量的损耗，特别是陆军和空军，将大大降低美国对付其他地区意外事件的能力。甚至可能严重削弱美国而引起苏联的进攻。因此，美国不能“把力量过多地投入并不是重要战略目标的地区。”但是，这恰恰是麦克阿瑟的战略意图；再也没有什么事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更为高兴的了。用布雷德利将军的名言来说，就是“把我们

卷入到错误的战争中去，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认了的敌人作战。”

这样做，也可能使我们和真正的敌人交锋，由于轰炸共产党中国，使苏联最亲密、最强大的盟国遭受严重的失败，以致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别无良策，唯有进行干预。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

> 我们知道苏联在北朝鲜的影响，知道苏联对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的援助，我们也知道这种援助必然伴有默契。我们还知道，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签订了条约。即使没有这个条约，中国仍然是苏联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卫星国。俄国在远东有切身的利益，在共产党范围内，有必要保持它的威望。因此人们很难设想，直接进攻中国大陆时，苏联会坐视不救。

诚然，麦克阿瑟将军说过，假如美国及其盟国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断行动的话，苏联将不会干预。可是，政府当局记得，在共产党中国参战前夕，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这里补充一下，麦克阿瑟的预见，在其他一些场合，也同样有过失误。1939年，他曾宣称日本不会进攻菲律宾。他说，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没有懂得“日本人的心理逻辑。”假如日本真的觊觎这些岛屿，那么，他的菲律宾部队肯定能把入侵之敌打败。1941年初，他曾怀疑日本人是否打算自杀，如果他们胆敢袭击不可一世的美国海军。要是日本当真发动进攻，那么，以美国、英国与荷兰当时在远东的军队的一半来对付日本，就绰绰有余了！显然，政府在11月24日前，也完全同意麦克阿瑟对北京意图的错误估计。但是，政府现在不愿再犯第二次错误。“即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苏联都将无动于衷。我们自己的政策不是这样制定的，我认为，俄国的政

策也不是这样制定的。那样的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以国家的基本安全来进行赌博。”

俄国人能够采取好几种办法。艾奇逊认为，“他们可以把大批飞机连同‘志愿空军’交给中国，以便在朝鲜国境内外进行报复活动，他们可能派遣苏联空军和潜水艇参加战斗。”或者，“克里姆林宫会仿效北平的行动，以五十万或更多的地面部队‘志愿军’进行干预；再不然就干脆发动全面战争。单独采取一种办法，或者同时采取几种办法，都有可能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爆炸性的事件。”

然而，目前必须避免和苏联发生冲突。没有必要打这场战争，不仅是因为苏联帝国主义已被遏制，没有得到侵略的果实，而且还因为要打的话，美国很可能单独应战。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我们的盟国

> 显然不愿在远东介入全面战争——这场战争有可能变为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抵制侵略的过程中，由于美国缺乏耐心而引起的战争。盟国认为，经过努力可以体面地解决争端，灾难也少得多。
>
> 假如我们采纳那些建议，我们将增加风险和承诺，同时，由于降低我们联盟的力量和决心，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会有所削弱。
>
> 如果我们采取的步骤会使盟国的老百姓遭到不必要的威胁，那我们就不能期望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会长期存在下去。要是有人带他们跨越嶙峋的冰隙、走非常危险的近路，他们一定会再三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
> 就全世界所受的威胁而言，我们的安全需要我们加强，而不是削弱集体安全体系。
>
> 我们结成联盟抑制进攻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靠

盟国间的共同愿望和相互信任。假如我们采纳建议里的措施而削弱那种力量，特别是在北大西洋地区，那将会使该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势必大大影响我国本身的安全。

盟国害怕在远东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害怕美国力量相应地从欧洲调往世界的另一端——或者说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人很可能会占领她们的国家——但这并不是华盛顿不愿听从麦克阿瑟对于苏联意图的看法的唯一理由。即使美国愿意“单干”，甚至愿意脱离她的盟国，她也必须抵制这种考验，理由很简单——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

参议员约翰逊：将军阁下，从我国军队在全世界的总体部署来看，如果苏联提前发动进攻，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打赢牵制战？

柯林斯将军：先生，目前还不行，确实不行，特别是在欧洲。我想，我们在远东有足够的力量与之相持。阿拉斯加的兵力也足以对付。我认为，我们在欧洲没有足够的军队。

布雷德利将军更强调指出：“我不会拥护脱离军事现实的政策，在我们尚未作好准备前，就轻率地逼我们摊牌。”

甚至在亚洲，俄国人也有能力进行干预，并且能打上一场漂亮仗。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相反，政府的证人把苏联在远东的力量看成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有“好几千架飞机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大连、旅顺港、哈尔滨和满洲。在邻近日本的库页岛，还有重兵把守。”在过去几年里，俄国人已建立起他们的远东工业基地，“毫无疑问”，他们已贮有充足的物资，“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供养他们的军队。

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认为，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军事计划并不等于“姑息。”

有些人对当前的朝鲜军事形势感到懊丧，敦促我们扩大与红色中国的战争以解决这个问题。与红色中国较量并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它不能保证朝鲜战争的结束，也不会使中国屈膝投降。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日本当年是个最大的军事强国，它侵占中国整整五年，几乎完全控制了大部份的中国领土，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我认为，较小的冲突发展成较大的悲局，付出的代价也得增加。我个人的意见是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战争，因为我们不能保证在朝鲜取得胜利，而要战胜红色中国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一些批评我们战略的人说，假如我们不立即轰炸满洲军队集结点和机场，就是“姑息。”假如我们不立即封锁中国的港口——这一封锁必须包括英国和俄国的港口才能收效——就是“姑息”。这些批评者还会说，假如我们不提供后勤支援和海空军以协助中国国民党军队反攻中国大陆，就是“姑息”。

这些批评者忽视了下列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

假如采取这些行动，能确保朝鲜的胜利吗？

这些行动将使俄国参战，这是否意味着战争会延长呢？

这些行动是否会使我们在朝鲜和世界其他地区失去我们的盟军呢？

从军事观点看来，姑息的定义是不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也不搞讨价还价，就让侵略者不花任何代价而得到什么东西。抛弃朝鲜——指的是主动撤出战斗而不是被

迫撤离——倒是对侵略的一种姑息。拒绝扩大战争以免削弱我们的全球力量，这肯定不是姑息，而是在目前情况下正确的军事方针。

拒绝麦克阿瑟的计划，是否意味着政府将继续“一如既往”呢？它是否像麦克阿瑟指责的那样，继续牺牲美国人的生命而“没有明确的目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否定的。美国人在朝鲜不是白白牺牲的。

我们在朝鲜采取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北朝鲜和中国共产党都曾宣称，他们的目的是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并在整个半岛上实行共产党的统治。他们的目的未能达到。

有人指控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在朝鲜打的是一场毫无意义、没有结果的战争。

事实是不能抹杀的。他们有辉煌的战绩。他们英勇、果断，打了胜仗，阻止了共产党人的挺进，还使他们往后撤军。他们使共产党军队遭到惨败，因此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盟军的胜利使共产帝国在亚洲的目标遭到严重的挫败。

1950年6月，共产党人的阴谋有着美好的前景——迅速而不大费劲的胜利，不仅使克里姆林宫赢得朝鲜，而且会动摇亚洲的自由国家，使欧洲的防务瘫痪——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但美国及其友邦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都是消极的：

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巩固。使美国和北约组织内外的友邦，在备战方面有了更

强大的动力。

我们把军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战略物资产量激增，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

集体安全的思想经受了考验，而且已经坚持下来。信赖集体安全的那些国家已经证明他们能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迫切要求与日本举行和谈，并为在太平洋地区谈判增强防御力量作出初步安排。

这些都是我们进军朝鲜以后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所不曾预料到的——我敢肯定，也是他们非常不欢迎的后果。

由此可见，朝鲜战争是取得成功的。但是现在该怎样来结束战斗呢？难道真如麦克阿瑟将军所建议的那样，要停战就非得把战争打到中国本土去吗？政府的证人讲了许多悲惨的后果，我们不冒这些风险，当真能结束敌对行动吗？他们的证词看来是在建议美国无休止地打下去，一直打到中国不想打的时候。不用说，这种主张对于美国公众来说是不受欢迎的，这主要应当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因为它讲不清楚以前冷战冲突的性质，以及这些冲突与目前朝鲜战争之间的关系。

全面地介绍一下政府的政策，本来是可以澄清一些问题的。如战争前，东西方每次发生冲突时，双方都只抱有有限的目的，并以有限的手段去达到这些目的。苏联统治者从来没有打算一下子全部消灭西方大国，因为只有通过世界大战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每次都以同样有限的反应来对付共产党的挑战，因为西方大国也不愿意打全球战争。

双方都不打算发动原子战争，双方都具有几乎相等的实力，现代武器的破坏力限制了他们能安全地寻求的目的。两个集团都放弃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打算。谁也不追求全面的军事胜利，谁也不会无条件投降。

总之，目的已经受到手段的限制，形势需要就得搞折衷。因此，政府认为：首先，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的行动时，必须有所节制，只求恢复原状就行。其次，苏联政府的设想是，西方国家如果成功地抵制了她的扩张，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停止战斗，接受战前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把美苏之间断断续续的较量看成是一系列的冲突，其目的是精确地划分共产党国家和自由世界的边界线。美国的遏制政策不能允许俄国人再次侵越这条界线，苏联帝国主义只有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才有可能满足她的野心。

柏林问题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俄国人希望把西方盟国赶出前德国的首都，他们原来打算封锁这个城市的公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盟国由于经受不住柏林陷落后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后果，对这种威胁只好进行抵制。同时，大西洋盟国和苏联一样，不愿以全面战争的代价去换取有限的目的。结果，他们就没有派坦克和军队去向红军挑战，以重新打开柏林通道；他们克制自己，只搞空运。苏联人对此没有进行挑衅，因为他们也知道，阻挠空运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而双方都不希望大打。美国和苏联都不想为彻底解决柏林问题而冒这么大的风险。结果，这个问题就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按传统的含义，谁也没有赢得胜利，相反，双方都接受这个僵持的局面。

封锁问题也没有很快得到解决；危机持续十五个月之久。执行封锁政策需要耐心、坚定和决心。因为它还得有足

够的压力才能达到目的，但是压力不能太大，以免引起世界大战。正如马歇尔部长所阐述的，"我们已经在费用和人力方面作了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抑制侵略者；我们已经千方百计设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在柏林花费很大，但是，这比打一场全面战争好，谁也受不了大战给各方面造成的巨大破坏。

朝鲜和柏林情况很类似。"在这长期、艰苦、持续不断的世界斗争中，朝鲜只是一场最新的挑战。我们在那里执行的政策，正好是我们以前在世界其他地区成功地抵制过侵略的政策。"这场战争也是在某些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满洲作"特殊的后方"，但美国也有同样的后方，那就是日本、冲绳、南朝鲜，特别是釜山这个主要港口的周围地区。"他们没法轰炸我们的港口和供应设施，"布雷德利将军说，"他们也没法轰炸我们的军队。"

这场战争的目的同样是受到限制的。那就是恢复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进攻前的状况。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说，他对"停留在我们起步的地方"这个提法"有点迷惑不解"，艾奇逊回答道：

> 参议员先生，假如你完成了本来打算做的事，我认为并不等于说你停留在起步的地方。
>
> 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做两件事。一是击退武装进攻；二是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
> 如果我们现在做了这两件事，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原先的计划，我认为这就是胜利。

这样，政府虽然没有直率地表示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意图，国务卿却告诉了共产党人，美国愿意在三八线上停火。统一朝鲜的代价太高昂了；还是维持原状好。

艾奇逊往往坚持说，美国从来不曾有过其他的目的，但是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严格的审核的。从布雷德利将军的证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确曾打算以武力统一朝鲜，只是形势迫使美国接受目前的解决方案。

布雷德利将军：……当我们进一步向北挺进时，联合国再次作出决议，要求建立统一、自由的朝鲜。这就是他们在9月下旬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任务。(实际上联合国决议是在10月7日通过的，但布雷德利将军并没有说错，因为这个任务原先由华盛顿下达给麦克阿瑟的时间是九月下旬。)

参议员凯恩：从军事观点来完成那项任务，或者从政治观点来达到那个目的，在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什么变更的话，我们就需要打败敌人，不仅把他们赶出南朝鲜，还得赶出整个朝鲜。不然的话，先生，我们怎么能使朝鲜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呢？

布雷德利将军：嗯，我想，我们或许会有个折衷的军事目的……

在9、10月之交，政府曾经主张，必须跨越三八线才能保证南朝鲜的安全；因为北朝鲜如果没有被打败的话，她就能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在将来的什么时候，再次进攻南朝鲜。自共产党中国干预后，政府方面的证人就不再重复这种论调，虽然今后对南朝鲜的威胁依然存在——威胁的程度当然只有更厉害。这次他们解释说，尽管在三八线停火只是重新肯定战前的状况，但它可以保证制止另一次侵略。他们一字不提1950年10月时为什么不考虑这样的安排；这就意味着那时不存在接受停火的问题，也不存在其他任何问题。摧毁了北朝鲜的军队，就有可能在军事上统一朝鲜。现在，

情况已经改变。三八线已恢复原状，政府愿意在这条界线上停火。

这里只存在一个问题：北朝鲜本来是从三八线开始进攻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愿意和他们以前的俄国人一样，在这条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国务卿艾奇逊相信，他们会愿意的，虽然他无法预言具体的时间。但是柏林问题搞了十五个月才解决；希腊拖了一年半；朝鲜当时才九个多月。但是，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还是有希望的，其理由如下：第一，“敌人的进攻已被粉碎和击退，敌军伤亡惨重。这些挫败……向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中国的人力资源是雄厚的，但训练有素的人员还是有限的。他们不能补充严重的伤亡。他们没法解释为什么征兵数愈来愈大。”第二，“红色中国领导人背弃了他们长期以来关于复员的诺言，军事上对人力的需要反而增长。”第三，“北平还践踏了关于改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诺言。在依靠进口原材料的大城市里，失业人数在增加。这个政权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有所增加。”由日益增长的伤亡率和未能兑现的诺言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已经有了反映，那就是“显著增加的镇压措施，和鼓舞老百姓低落情绪的宣传。根据这些情况，”艾奇逊作出结论，“我认为，继续给在朝鲜的中国人以惩罚性的打击，就能以最小的风险和最少的损失，最满意地结束他们的侵略。”换句话说，大量杀伤中国的军队，摧毁其士气及“受过训练的成员”，就能使中国共产党同意以谈判结束战争，而不致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艾奇逊发表这一声明后不久，共产党人第一次表示愿意结束战争。1951年6月23日，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明白表示，苏联准备在朝鲜停火，由此可见，共产党也

曾打算征服整个朝鲜半岛，就是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决定把三八线上的僵持局面和几乎是全球性的对峙结合起来，仍然以过去决定的边境作分界线。

折衷主义取得了成功。他们恢复了大韩民国战前的边界，在远东设法避免了战争的扩大和附带的危险，维护了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并通过重新武装计划，把力量增加了好几倍。他们已经把实力搞得可以和俄国的力量相对抗，还在扩张的道路上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拒绝在共产帝国的周围浪费军事力量，把它保存下来用在刀口上，那就是不断地抵制共产党的野心，并鼓励苏联政治和社会制度内部的反抗倾向，这种倾向产生的压力是如此之大，它甚至能压制苏联领导人的野心。

归根到底美国政府的信念是：苏联帝国主义是可以遏制的，不必害怕另一次世界大战；克里姆林宫的欲望多次遭受挫折之后，会使这个政权变得较为温和些，愿意就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协商，根据现实的军事力量以及同大国妥协的必要性，使苏联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因为任何神秘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特别是克里姆林宫搞的那一套，”乔治·凯南曾预言，“经过不断的挫折之后，总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自己适应事物变化的逻辑。”所以，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力量对苏联的政策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近年来从未有过的、非常慎重的态度。这样就能刺激那种反抗倾向，最后势必使苏联政权不是垮台，就是变质。”再不然，就像国务卿艾奇逊在听证会上所讲的：“……我们应该创立实力地位，有了实力，我认为，就苏联实现其目前意图的可能性而言，世界的整个形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各方的谈判地位也将因实力变化而有所不同。这样一来，我希望克里

姆林宫就会愿意承认通过我们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现实，开始考虑东西方之间的一些困难问题、至少也得解决几个具体的争端。"总之，时间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国一边——只要西方大国能够维护团结，遏制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并且在**维持原状**的基础上，保持实力的均衡。

第十四章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对峙：艾基利斯恢复元气

1950年6月北朝鲜发起进攻前，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认为，苏联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莫斯科的领导人一心一意要消灭一切非共产党的国家。乔治·凯南把苏联的扩张比作

> 奔腾不息的河流，无孔不入，向着特定的目标流去。在世界权力的水域里，它主要关心的是不能放过每一个角落和隙缝。但是当它流经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就来个逆来顺受，使自己适应环境。主要问题是施加压力，经常不断的压力，指向预期的目标。在苏联的心理学里，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必须在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

因此，美国的任务是在苏联势力推进的道路上，“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以遏制其进一步的扩张。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柏林空中补给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这项政策的组成部分。

“遏制俄国的扩张是一个长期任务，它需要耐心、坚定和警惕”，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摧毁苏联和她的卫星国，而是建立实力均衡以实现这种“遏制”。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威慑

克里姆林宫，使她不要靠全面战争谋求世界霸权，而要请俄国人到谈判桌上来，解决冷战中的主要问题。遏制的第二个特点是，美国有这样的设想，要取得这种“实力地位”，只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盟国通力合作。从传统上说，美国的独立和安全需要欧洲内部力量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野心国家以吞并沿海国家为前提，首先灭亡英国，然后征服全世界。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瓦解是不能容忍的。

遏制政策在军事上的核心是战略空军，要防止或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几乎全部得靠它。部署在欧洲的西方军队，其力量不足以阻止俄国军队抵达英吉利海峡。北约组织的军队主要起着“荧光屏”的作用，它会发出偷袭警报，让美国战略空军飞向苏联目标。西方设想中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是全面战争，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苏联对美国、或者对美国在西欧的“第一道防线”进行突然袭击。

正是由于信赖全面战争的战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建议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艾奇逊和麦克阿瑟将军则把大韩民国排除在太平洋环形防线之外。因为在全面战争中，南朝鲜对美国来说，确实既无战略上的重要性，且又难于防守；它的命运将由其他战场上较量的结果来决定。因此，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人发动的有限战争，使总统、顾问和政府都左右为难，十分苦恼。

一方面，共产党人对南朝鲜的侵略，打破了美国政策的基本设想。如果遏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那么，美国在苏联侵略面前无动于衷，只会鼓励她在将来得寸进尺。独裁者的胃口是满足不了的；供餐一次只会刺激他们的食欲，使他们感到更饿。如果遏制的目的还包括西方大国的团结，那么，美国拒绝拯救遇难的朋友，将会导致北约

组织的分崩离析。我们的欧洲盟国将会相信，一旦遇到同样的危机，他们也同样会被抛弃。结果，他们会把美国的盟约保证看得一钱不值，为了安全而转向中立，孤立美国，并大大削弱战略空军的威慑力量。

另一方面，苏联在朝鲜的有限挑战打乱了我们的战略方案。为了南朝鲜，肯定不“值得”打一场全面战争；狡诈的俄国人利用政府强调空中原子打击力量的片面性，使我们不能对莫斯科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但是我们需要比较有限的反应。凑巧，美国有几师人员不足和“训练较差”的军队驻扎在附近的日本。于是，滑稽得很，政府为了维护其全面战争的政策，只好被迫打一场有限战争。她被迫以低于全面战争的规格来回击苏联的卫星国，目的是防止政府原先政策的失败，这项政策是以大规模报复为主要手段，威慑苏联不敢发动全面战争，或者把她打败。

美国没有准备打局部战争，只好在战略上临时凑合。政府官员们依然深信，主要的对手是苏联，争夺的地盘是西欧。他们认为，朝鲜战争只是克里姆林宫战略上的一条妙计，旨在削弱美国的力量，并把美军调离欧洲。政府的军政领导人知道，苏联在朝鲜的有限进攻，已使美国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作出反应，于是他们就决定，尽可能限制在“遥远的”亚洲半岛上的战争规模。朝鲜战争是不得不打的：要教训苏联领导人，侵略是不合算的；要维护西方盟国的团结；要保存遏制政策的军事基础。然而，它还是一场“边缘”战争。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其目的是恢复大韩民国战前的地位。麦克阿瑟将军辉煌的仁川两栖登陆战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取得的军事胜利，使本来只求重建原状的防卫战变

为进攻战，打算永远改变原状。北朝鲜人已被击败；军事形势有利于实现美国多年来的目的：统一整个朝鲜。政府因而把重点从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转移到武力解放苏联的卫星国。

与此同时，政府放弃了以前与苏联发生冲突时采取的两点战略设想：第一点，美国在遏制苏联扩张以恢复原状时要有节制；第二点，如果美国设法恢复了以前的平衡，俄国领导人就会停战并接受危机前的均势。但是，在仁川登陆以后，美国政府没有象过去在柏林对抗胜利后那样，通过外交途径来谈判结束敌对行动。政府只打算全部扫清北朝鲜，不给苏联人有别的选择；按照政府自己的结论，对俄国行动的反应，不能超过恢复原状的程度，否则就有危险；政府理应知道，要求北朝鲜无条件投降，必然会被拒绝。国务卿艾奇逊本人也曾说过，政府从来不能谈判自己的生存问题。由于美国坚持军事统一朝鲜，只好使战争继续下去。

1950年10月7日，官方正式宣布了这一目的。在此之前，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恢复原状：由于非共产主义的南朝鲜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已存在，自由的大韩民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威胁，不会比1950年6月25日以前大。但是在10月7日，当美国领导的军队向北挺进到满洲边界时，对共产党中国工业中心的威胁就大大增加。而政府却认为，长驱直入北朝鲜，把苏联的卫星国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据说中国人为了防止苏联对华北、满洲和新疆的肢解，已与后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北京焦急不安的目光在关注华北几省的局势，无暇顾及朝鲜；中国历史上的敌人是俄国，而不是美国。

结果，民主党人在1950年10月和11月所采取的、两年后又被共和党人所鼓吹的行动，导致了共产党中国为了调整平衡而进行干涉。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政府很快否定经过修改的目标，再次恢复**维持原状**的主张。朝鲜之所以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完全是政府拒绝麦克阿瑟关于反击中国干涉的军事建议所造成的。

拒绝的理由之一是，政府担心苏联可能突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政府坚持美国不应当向俄国提供任何进行干预的借口。"每当我就朝鲜战争问题作出决策时，"总统后来写道，"心里总惦着这样一个目的：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别让它给文明世界带来可怕的毁灭。这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为苏联人提供借口，以致把自由国家都投入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中去。1950年12月中旬，最紧张的地方看来是柏林、西德、印度支那、南斯拉夫和伊朗。在这些地区，很容易闹出一件小事故，给俄国人进行公开干涉作借口。……克里姆林宫也许并不是在吓唬人，她很可能早已决定，认为跟美国打全面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从政府看来，麦克阿瑟的轰炸共产党中国、封锁港口、让中国国民党反攻大陆等战略措施，正好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这种借口。

即使苏联始终当个旁观者，美国也不应该扩大战争；她应当避免与中国的人力资源打"消耗战"。朝鲜会"榨干我们的鲜血"，使我们不可能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御。美国力量大规模地使用在亚洲，不仅将把欧洲暴露在苏联军队面前；还可能在欧洲大陆美国兵力最薄弱的时候，引来一场攻击。布雷德利将军指出："克里姆林宫感到最高兴的，莫过于扩大朝鲜战争，把红色中国也包括在内。这就需要增援部队，特别是我们的海军和空军，而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可以

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投入一兵一卒。与红色中国打‘有限战争’，将使我们投入过多的力量，增加我们的风险，而那个地区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略价值。红色中国并不是谋求统治世界的大国……”正是由于这一理由，麦克阿瑟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认了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总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稳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些敌人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因此，美国必须保存她的力量，以遏制主要的危险——苏联，这是个谋求统治世界的大国——而不能把力量浪费在边缘地区。

英、法的观点与此相同。美国的主要盟国不愿意在欧洲有力量反击俄国的进犯之前，让美国把力量投放在远东；他们不打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为了对他们很少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且他们希望，他们的友好态度将会加快中国共产党人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分裂，至少也会证明，英、法是同情亚洲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的新动向的。这样，如果美国决定把战争推向共产党中国，看来她只好“单干”。但建立“实力地位”、与苏联保持均势或打赢全面战争的前提，是北约组织的团结一致和联合起来的力量。国务卿艾奇逊强调说，“在可能出现险情的世界各地，我们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和盟国步调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

由于上述这些理由，美国决策者愿意在三八线上停火。共产党人曾打算取消这条分界线，把南朝鲜并入共产党集团以扩张他们的势力；不论北朝鲜人或者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还希望破坏西方联盟并孤立美国，

他们在这方面也遭到了失败。北约组织依然存在，而且由于重新武装计划和增加四师美国驻军而大大加强了。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让共产党人知道，西方列强不会容忍共产党人依仗军事力量进行扩张。现在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所以，最明智的策略就是结束这场战略牵制，终止边缘战争，重新集中力量搞主要任务：加强空中原子攻击力量，威慑苏联不让发动全面战争，并在西欧建立“实力地位”。

麦克阿瑟指责政府的主要点是，政府对他的约束使他在战场上不能取得“胜利”。这一指控的根子是麦克阿瑟对政府基本设想的否定，尤其是政府认为，苏联已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因此美国不应当给跃跃欲试的克里姆林宫提供任何进攻的借口。

麦克阿瑟认为，政府的理论是与实践脱节的。在理论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的设想，即美国拥有足够的力量，特别是空中原子攻击力量，可以威慑苏联，不让发动全面战争；在实践上，美国决策者却认为，有限度地扩大战争，会给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提供借口。一方面，据说克里姆林宫不大愿意与美国打全球战争，因为美国有较强的报复力量，主要是战略空军的毁灭性力量；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又藐视我们声称的威慑力量，她甘愿冒全面战争的风险，也不愿让共产党中国遭受有限的失败（有限的失败可使北京政权不至于无条件投降或被推翻，只是削弱她的力量，仍然让她统治中国大陆）。

麦克阿瑟认为，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脱节的；其理论根据是原子武器大规模报复的威力，而行动却跟不上。如果美国确实掌握原子优势——麦克阿瑟认为如此，政府也承认——那么，他提出的空军轰炸和海上封锁共产党

中国的建议，就能顺利地执行。战略空军司令部将继续威慑苏联，并保证使这场局部战争虽然有所扩大，仍将控制在中、朝两国的战场上。我们占优势的战略空军将提供保护伞，我们就可以在伞下打这场扩大的局部战争。麦克阿瑟指责说，有人认为美国空军轰炸满洲，将为跃跃欲试的克里姆林宫提供参战的机会，这种想法纯属无稽之谈。苏联拥有的报复力量远在我们之下（俄国人到1954年才发展远程空军）；我们为什么让她束缚我们的手脚呢？美国拥有原子优势；为什么不利用这一优势呢？麦克阿瑟指出，力量较弱的一方，居然使攻击力量较强的另一方丧失行动的勇气，实属荒谬。政府不敢根据他的建议打过鸭绿江，结果造成朝鲜战场上的僵局，但这不是军事上的僵持，而是苏联领导人与美国决策者之间的对峙，前者在军事上没有能力摧毁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心，后者在心理上不愿利用原子优势，而美国正好认为这种优势是和平的主要保证。

如果俄国领导人确实在军事上有力量打赢全面战争，只是在寻找一个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适当借口，那他们根本不需要美国来提供这种借口；他们完全有本事自己来造一个。然而，如果他们害怕美国的空军力量，他们就宁愿让主要盟国遭受有限的失败，也不愿冒自杀的危险。北朝鲜之于苏联，犹南朝鲜之于美国，都“不值得”付出全面战争的代价；只要美国的目标局限于朝鲜半岛，共产党中国也“不值得”为北朝鲜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政府认为，即使进攻共产党中国没有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也不应当打“消耗战”，因为这个方针会削弱北约组织，刺激苏联参战；麦克阿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是俄国人要弄的花招，吸引美国力量调离欧洲，

并使其消耗在中国的人海之中，对于这个战略牵制，必须以最小的代价尽快使之约束，以便集中精力加强我们防止全面战争的威慑力量。对于上述这个论点，将军也认为是错误的。

由于“俄国的政策……是不肯牺牲自己的军队，而是利用朋友的军队，”因此，不仅对欧洲第一号敌人“真正的”挑战是假设性的，而且

> 杜鲁门先生根本不懂得苏联持久不懈地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他不懂得世界变化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可能爆发战争的三大地区：中部是欧洲，侧翼是北面的亚洲和南面的非洲。杜鲁门先生显然认为中部是最高利益和潜伏着战机的地区，只要能保住它，其他地区失利是无足轻重的。……
>
> 苏联要猎取的是世界经济资源区——北面的亚洲，南面的非洲——这些地区蕴藏的原料极为丰富，是世界上财富的宝库。中部在经济发展方面已不起什么作用，而两翼则前途无量。苏联的战略是在欧洲取守势，通过侧翼扩张势力；使自由世界把力量集中在中部，而置最重要的侧翼地区于不顾。

因此，朝鲜战争是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间进行的一场恰当的战争，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错认敌人。因为共产党中国是苏联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和最强大的友邦。所以，共产党中国遭到的失败，即使很有限，也将影响苏联在亚洲的力量、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力量均势。我们在朝鲜打败中国共产党，将会加强亚洲人民，特别是日本和菲律宾对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接受僵持的局面将使美国威信扫地，从而失去他们的同情。共产党中国却反而被认为是“东方的

军事巨人”。美国不敢显示优势力量，会使我们的朋友感到不大安全，使那些中立国更加中立；由于北京一帆风顺地被认为是个强大而具有威胁性的邻邦，将使这些国家更加坐立不安，因而用更友好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国家，更忧心忡忡地仰人鼻息，唯恐挨打。摧毁共产党中国的工业基地、军需仓库和交通网，将会大大削弱中苏在远东的进攻力量，阻止莫斯科和北京从事任何新的侵略冒险。而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半岛，并在维持原状的基础上结束战争，就会使中苏力量完整无损，鼓励他们今后在其他地区利用西方的软弱和犹豫而得到好处。确实，如果朝鲜战争“失败”——按麦克阿瑟的解释——西方民主国家将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承受最严重的挫折，而苏联却壮了胆，她可以放手在西欧搞新的破坏活动。麦克阿瑟断言，如果按照他的战略把中国共产党人赶出朝鲜，那就会向西方国家表明，在面临风险时，即使中苏联盟也是会退缩的；让大家知道共产党力量有限，美国以优势兵力打了胜仗，这就会提高欧洲的自信心。正因为这个理由，麦克阿瑟坚持认为，朝鲜是对北约组织的考验，欧洲的第一道防线不是在德国，而是在朝鲜。

因此，他在朝鲜进行的战争不是一场穿插表演，而是世界斗争的大轴戏。这场战争肯定包含着风险，但这是生来就有的，由国际政治的性质和在朝鲜作战的最初决策所造成的；这场冲突还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给中苏集团以有限而沉重的打击，显示美国的决心和力量，增强西方的斗志和自信心，并防止亚洲友好国家滋长不满情绪。冒所有这些风险而得到这个机会，还是值得的，特别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空中原子威慑力量，使这些风险缩小到了最低限度。

麦克阿瑟还强调指出，盟国只有对面临的危险性质看法

一致的时候，才能有果断的行动。如果盟国没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作动力，那么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有损害，因为他们将束缚美国的手脚，不让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美国的利益。有人认为，政府不能接受他的建议，是因为苏联在威胁欧洲，美国不能让自己孤立。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联盟本身不能阻止敌人的侵略，起作用的是团结一致的决心，以及遇到具体事件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如果缺乏这种决心和意志力，美国就必须保护她自己的利益。政府不愿冒丧失盟国的风险，就使美国的政策被较弱的盟国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谋求联盟的团结只能是自拆台脚；因为继续合作的代价是美国不能采取行动。麦克阿瑟认为，这个代价太高，而且主导思想也不对头，即美国在亚洲单方面采取行动将会损害北约组织、孤立自己、并鼓励苏联进攻欧洲。麦克阿瑟认为，这样判断问题，未免过早，因为在国家安全方面，他们的看法是美国更多地依靠欧洲盟国，而不是欧洲更多地依靠美国。

由于维护形式上的团结就不能采取行动，有行动也只是半心半意地应付差事，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做，他就建议：为了防止出现他所预见的、接受朝鲜僵局的灾难性后果，美国应当“单干”。欧洲人不愿意卷入远东的这场大战，这不应当妨碍政府为了美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政府不能让一个联盟影响全球性的策略，因为各盟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利益冲突，已使这个联盟处于瘫痪状态。

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单独打朝鲜战争，如果有必要，她应当单独行动，独自执行旨在维护优势力量的政策。美国不能因为盟国害怕而改变战略，接着就丧失这种优势。因为归根到底，欧洲的安全得依靠美国维护这个均势的能力。北

朝鲜入侵后，美国并没有事先征询盟国的意见，他们是否同意美国参战。美国政府是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而采取行动的。盟国是在事后表示同意的，但这并不是美国行动的先决条件。政府现在也应当根据自己的先例而采取行动了。

共产党中国在战场上的出现，使政府和远东总司令之间的分歧全部公开化。从战争一开始，这种分歧虽然没有表面化，但也有不少人知道，它确实影响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关系。战争爆发不久，麦克阿瑟曾公开主张美国要尽最大努力来援助蒋介石，并以坚定的态度反对共产党中国。他多次从"军事方面"批评政府，说她优先考虑欧洲问题，忽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中国参战后，这种对政府政策经常而激烈的挑战，和文官的最高统治权是不相容的，因为总统既是外交决策者，又是军队的总司令，为确保国家本身的安全，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制定和执行一些政策。麦克阿瑟使政府感到困恼，因为他给世界的印象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有一文、一武两个发言人。他使我们的盟国惶惑不解，更加不愿意执行美国的政策，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可能管不住他。他3月24日的声明实际上阻碍了总统政策的执行。这种情况是难以容忍的，致使杜鲁门先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撤除他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但是总统付出的代价很大，其中包括采取比较坚定的反毛护蒋政策，这正是那个不愿消除影响的"老兵"所主张的。

政府在国会中政治力量单薄，很容易受责难，这是杜鲁门、麦克阿瑟冲突的另一个原因；特别明显的是，总统在参议院里说话没人听。这是由于1950年初，国会中共和党主管外交政策的领导权已经转移，由该党的东部自由主义派交给传统的保守派，其中绝大多数是中、西部的代表，他们是国

会中共和党的多数派。这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反对“两党”合作。他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两党各执己见是可取的；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中，搞“人云亦云”的结果是在选举中失败。带有政府标记的政策，如果取得成功，选民们就归功于执政党，而不会赞扬支持这些政策的“忠心耿耿的”反对党。此外，共和党塔夫脱派确信，民主党在共和党东部“异己分子”的支持下，正在破坏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只有恢复共和党“正统”继承人和忠臣良将的权力，才能制止这种破坏。他们的信念是，要有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平衡的预算、以及尽量减少政府对工商企业的干涉。这样看来，派性外交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需要。

保守的共和党人把批评的火力集中于新政推行者。后者罪行累累：他们曾在美国推广“社会主义”，建立福利国家；他们曾把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曾在战争年代里，和斯大林的会谈中“出卖了”中国和东欧；他们曾让共产党的代理人及其“同情者”渗透进美国政府。总之，新政推行者对于改变美国传统的自由制度、让美国卷入复杂的国际纠纷、有意无意地援助世界共产主义的力量，是有罪过的。在美国的战后历史中，搞阴谋曲解美国的国内外政策，这是最合适的时机。冷战使公众的情绪普遍出现低落。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取得的成就，向党内正统的战略家表明，反对本身就是很好的政治，而且他们在选举前所作的估计是正确的，那就是攻击外交政策在政治上会有好处。结果在1950年11月7日以后，他们不再把不断攻击的目标局限于雅尔塔、德黑兰、波茨坦这些公告文件，也不限于抨击阿尔杰·希斯之类的间谍案，以及政府“丢失”中国和在朝鲜战争中应负的责任。现在他们已开始全面攻击美国的外交政

策，特别是对欧洲的政策。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有塔夫脱、惠里、布里奇斯和诺兰，他们大多同情亚洲。麦克阿瑟将军与他们关系密切，这就大大助长了批评的威力。

这些攻击甚至早在1950年6月25日以前，就以日益坚定的势头针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他们防止政府执行毛铁托政策，并不让美国彻底抛弃蒋介石。北朝鲜侵略战争爆发后，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福摩萨，只是暂时满足了反对派的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他们要求执行更坚决的反毛护蒋政策，抨击也越来越甚嚣尘上。他们在选举中获胜，加上共产党中国的参战，更增强了对政府的压力，要它接受麦克阿瑟的建议，扩大战争，打过鸭绿江去。

虽然凭借这些攻击还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国内的政治力量已足以控制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排除了以谈判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促使政府同意一项大规模的军事援蒋计划，对蒋政权发表一篇令人将信将疑的热情声明，甚至还号召共产党中国内部起来革命。于是，在1951年5、6月间，参议院质询麦克阿瑟撤职事件时，出现了可笑的特殊情况：一方面，政府为限制战争的规模作辩护，说明罢免麦克阿瑟将军是因为他的主张与政府背道而驰。而同时政府又拒绝接受现状，因为维持现状意味着承认北京政权，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权本身的生存是关键问题。由于政权的生存是没法协商的，因而只能通过与共产党中国——或许与苏联——打全面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又是政府早就否定了的方针，因为打起来太危险。因此，如果北京认真对待政府在共产党中国内部煽起暴动的话，美国就将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而不可能通过谈判或停火来结束战争。

沃尔特·李普曼后来写道，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致杜鲁

门总统

> 已无法恢复和平，因为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太软弱。他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因为风险实在太大。艾森豪威尔的当选解除了杜鲁门的困境……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停战协定，接受朝鲜的分裂局面，取得了没有胜利的和平，因为他本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胜仗的司令官，又是共和党人，他不会被攻击为绥靖主义者。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看来决不能在中国人可以同意的条件下取得和平，而艾森豪威尔接受的，正好就是这些条件。民主党人实在经不起攻击，当时的抨击者包括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信徒、举足轻重的参议员麦卡锡、以及共和党的整个右翼。

由于权力分散，更需要用抽象的概念来说明外交政策的目的，这是美国特有的倾向。总统为了取得国会和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必须大肆吹嘘他的政策。总统在宣传时，不是把主要问题作为没有偏见的——不过还是“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利益提出来，而是把这些政策吹嘘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目标。

但是利益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原则却没有妥协的余地。唯有彻底摧毁敌人、完全消灭那些威胁并歪曲或废除原则的罪恶，才能保证原则的完整和存在。不充分使用“正义的力量”，不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造成不能忍受的差距，结果往往是普遍的失望。

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接受批评者提出的很多政策，明摆着没有本事签订停战协定，以三八线或其附近为分界线，而且也没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限制麦克阿瑟自作主张的权力。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发生在北朝

鲜，中国共产党参战的第一批征兆显露之后。麦克阿瑟当时认为，显示一下勇敢和力量，会使北京相信，朝鲜的命运已经决定，任何犹豫将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还会引起全面的干涉。政府提出，只有南朝鲜军队可以派往与满洲接壤的地区，以及邻近苏联的东北边境。政府希望这样一来，可使北京放心，美国军队不会侵犯满洲。但是麦克阿瑟提出正统的“纯军事性的”考虑，声称他必须进军鸭绿江，而政府居然乖乖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政府后来解释它不坚持原则的理由是，美国向来给将军们在决定战术时有很大的自主权，以便达到目的。这种说法只是掩饰而已。美国决策者不会看不见战术与战略概念、政治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无能为力应归咎于政府害怕指责，说它对共产党“手软”；归咎于政府没有本事断定，麦克阿瑟是否能象仁川登陆那样再次赢得“辉煌的胜利”，并慑于战区司令官在那次胜利后的崇高威望，以及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时所获得的胜利。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中国全面参战的原因是麦克阿瑟决心发动“结束战争”的攻势，或者是政府未能制止他的缘故。中国干预的决定因素很可能是跨越了三八线。然而华盛顿在麦克阿瑟进军北朝鲜时，放松了对他的政治领导，这是不能原谅的。美国政府为了使盟国支持跨越三八线，曾经保证，在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将会谨慎小心，避免采取一切可能刺激苏联或中国的行动。从盟国的观点看来，麦克阿瑟的行动和这个保证简直没有共同之处。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好战的”声明，加上向鸭绿江进军，使北京有理由怀疑美国的意图，至少也为中国的干涉提供了一部分正当理由。结果，伦敦和巴黎都不同意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对岸，降低了和美

国一起谴责共产党中国的调子，后来干脆脱了身。他们认为，这事件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麦克阿瑟可以任意——更恰当些说，或许是未经授权地——解释政府的命令，二是政府对他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由此看来，盟国失去信心，美国不能坚持限制战争规模的政策，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杜鲁门在国内地位的软弱。

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激烈的论战，不仅让麦克阿瑟自己介入了这场斗争，能利用立法机关作他的强大后盾，而且迫使政府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出面，公开支持它的政策。于是，滑稽得很，总统撤除麦克阿瑟职务的主要理由是维护文官治军这个原则，如今这一行动却几乎完全要靠布雷德利将军及其三个同僚来为之辩护。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般被认为是纯粹专业性的、公正无私的组织，他们能左右参议员的视听，因为这些参谋长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又是技术专家。因此他们就负责解答参议员的质询，说明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的关系，欧洲和亚洲对美国安全所作的贡献，以及盟国在美国政策中的价值和作用。尽管国务卿艾奇逊在作证时口齿清楚、有条不紊、说服力强，但人们听起来总觉得差劲。他讲话时，国会听众的心情是怀疑而敌对的。

如果政府在政治上的脆弱地位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只能以他们的魅力来支持政府的政策，那么，为了维护政治上的公正立场，他们也未免滥用了战时树立的威望和声誉。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不久，参议员塔夫脱发表声明说，他不再相信布雷德利将军专业性的判断了——好象“纯军事性的”评价向来是不带政治色彩的！——这是公众改变态度的征兆。显然，参议员塔夫脱认为布雷德利的观点是受了亲民主党的偏见的影响。然而塔夫脱的批评即使是正确的——一切证据

都证明他是错的——也很难说是恰当的。因为他争论的事实，并不是军人在公开场合表示赞成或反对引起热烈争辩的国家大事，而是就布雷德利将军同意总统的政策，而不同意他、参议员塔夫脱的观点而提出质疑的。他的论点并不是他和前总统胡佛提出的批评，完全依靠海空军的力量，因为保卫美国的直布罗陀本来应该是领导军队的文官的事。他的论点是，布雷德利将军已觉察到他的战略用不上。因此，他所关心的不是两党将军之间的联合，以保证今后的文官统治；他恼火的只是，除了象麦克阿瑟那样的“共和党将军”之外，还有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样的一帮“民主党将军”。

不过，塔夫脱对布雷德利将军的敌意，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总统和国会之间权限分明，这就吸引军事领导人也介入政治斗争。参议员塔夫脱好象认为，这方面的危险不在于军官分属两大政党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真正的威胁在于将军们的独立判断被两党所利用；在于这将标志着，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共和国内开始出现完全不能容忍的现象：即在军队内部民主党将军与共和党将军开始闹分裂。其结果将大大削弱文官统治和总统对外交政策的领导。”

我们对杜鲁门、麦克阿瑟冲突的研究表明，要维护文官统治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只靠若干宪法上和制度上的适当保证是不行的。事实上，“统治”这个词的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不清，因为这意味着要防止来自职业军人的威胁，只要对他们进行约束就行了。事实并非如此。在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如1950年和1951年，公众及其选出的官员们念念不忘的是安全，政府内外的文官都把军事优势和“军人”作风放在首位。如果这样的危机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或者其他危机接踵而来，那就更应该强调军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

民主社会可能会变成“军管国家”，一切权力都集中于行政当局，职权分工趋向衰落，民主制度下的自由仅仅是残留的回忆。路易斯·史密斯强调指出，这种局面可能“不是军人存心夺权所造成的，而是在舆论支持下不断地适应国防的需要。也不是出于阴谋诡计，而是根据公民投票。这种掌权并不冲击一贯约束军人的文职机构，反而得到这些机构的支持。”

这说明决定文官统治效率的主要因素，也是最容易觉察的因素，那就是国家文官首脑的素质。政治领导人必须有能力识别威胁他们统治的力量，为了维护其领导权，还得有魄力采取行动，不管他们的措施多么不得人心。

> 文职领导人必须遵循民主的信念和程序，坚持文官的观点，才能维护其必要的统治权。在面临“冷战”或全面战争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忧虑和紧急事件，关键问题看来是，他们必须要有智慧和理解力、明确的目的和方向、以及勇气和信心……文官如果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就可能很快丧失领导权，这好象军方蓄意要搞掉文官、抢班夺权一样容易。

在战争期间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战区司令官不能激烈反对让他执行的政策，至少不能激烈到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没有一个政府能容许军官对其整个外交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这种宽容势将破坏政府决定国策的权威，分裂国内支持政府的力量，疏远政府与盟国的关系。

鉴于美国传统上给军官的权力一向很大，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战区指挥官更多地同情官方的策略。对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军事指挥官，政府通常是不发具体命令的。由于判断失误或蓄意搞阴谋，指挥官作出的决定很可能在政治上和战略上

产生严重的后果，妨碍甚至破坏政府预期达到的目的。因此，迫于形势，我们得重新审定传统的军事自由，以防止它给我们带来灾难。在有限战争中，不仅军事战略，有时甚至军事战术，也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

要对战场上的将军施加约束，就需要改变美国的传统观念：打仗纯粹是军人的事。军人必须和他们的上级文官一样，承认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工具的定义，即军事行动不仅要服从政治目的，而且根本就没有自作主张这一面，也就是无所谓按纯军事规律去指挥作战，不受"外来干涉"。在指挥过朝鲜战争的其他将军中，除了李奇微将军唯一的例外，谁都是从他自己狭隘的专业定义来理解战争的，从来也不曾放宽过眼界。范佛里特、马克·克拉克和特纳·乔伊，都把麦克阿瑟的话当圣旨，响应他的争取军事胜利的号召。说到底，叫嚷的不只是麦克阿瑟，这不是很明显吗？

只有当全体军人认为有必要接受严格的政治指导时，他们才不会发表反对"政治干涉"的公开声明，在指挥有限战争的过程中，他们一直不乐意接受这种干涉。的确，除非他们放弃"打仗是军人的事"这个观点，否则，他们就很难全部接受有限战争的概念。看来军人有时忘记了他们是国家的公仆，忘记了衡量他们功过的标准，并不是他们执行的政策的性质，而是只看他们执行这些政策的效果。实际负责制订策略的是他们的上级文官，而不是他们自己。把他们的不同意见带到公众论坛上去让全国辩论，这不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

显然，除非军人更谨慎地遵守职务上的种种规定，否则他只会帮倒忙：破坏上级文官对他的领导。有位作者写得很恰当：权力分散造成"永恒的诱因，即使不是不可抗拒的力

量，吸引着军事领导人介入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的反对派总是把战区司令官的批评（或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一个或几个成员的批评）公诸全国，利用美国公众无能为力或不愿打局部战争的心理，以夺取政权。目前，总统和国会之间存在着传统上和心理上的猜忌，政府软弱无力，屡遭失败，党纪松散，中期选举有可能被击败，这些因素使不负责任的反对党在政治上得到很多好处。同时也严重地限制了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在“和平时期”的外交自由，不让他发挥才能，执行他自己制订的外交政策，于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只好屈从政敌的纲领。反对党和战场上的将军、特别是深得人心的将军之间的联系，将会加剧这种倾向。

但是要维护有效的文官统治和减少军人与反对党联合的可能性，根本问题是美国人民在冷战的压力和紧张的局势下，必须迅速改革传统的制订外交政策的方法：他们应该尽快领会，美国不能一会儿专心致志搞国内事务，几乎完全不顾外交政策；一会儿当敌人的威胁变得明显时，又集中全部精力想把他们彻底消灭。他们还应该赶紧锻炼，以便应付经常遇到的有限挑衅，甚至局部战争。要既不紧张也不绝望，因为这种情绪一高涨，不是打全面战争，就是陷入孤立。学会这些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整个情况看来，”罗伯特·奥斯古德说过，“1945年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出色地适应着新的挑战性的形势。”然而，这个历史记录“不论在武力和政治的基本概念方面，或者在具体的政策方面，都不能说明有什么真正的改革，从中见不到用有限手段来抵制局部侵略的战略原则。在对付史无前例的事变时，这种适应性肯定经不住传统的习惯思想的压力。”

不过，在军队中，这种适应的过程可以通过教育来缩

短。军官应当接受比过去内容更为广泛的训练，让他们知道军事政策必须经过更多方面的考虑才能决定。有些文官可能担心，军人在充分了解影响军事战略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后，将会提出更有实效的军事观点，以致损害文官的权威。事实上，恰恰是这些政策观点更为开阔的军官，对文官统治所造成的威胁最小。麦克阿瑟事件自当别论。但类似麦克阿瑟那样的军人，愿意公开地向政府挑战，力图改变政府的政策，使之更加符合他们自己的政治偏见，还是很少见的。而象马克·克拉克、范佛里特和特纳·乔伊那样的军官，却不在少数，他们坚信战争不是政治工具，要政治家和外交官都不"插手"，仗才能打赢。克劳塞维茨针对这些军人的思想，写道，"从最高的角度来看，战争的艺术就成了政策，当然这是打仗的政策，而不是写通告的政策。按照这一观点，战争和政策之间存在着区别是不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根据这个区别，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或者为这一行动而制订的计划中，将允许有**纯军事方面的审定**；同职业军人商讨战争计划确实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提出**纯军事性的意见**……(由于)战争是政策的一个工具，它必须具有政策的特征，它必须用政策的尺度来衡量。所以，指挥战争，就其广泛的含义来说，就是执行政策，只是以剑代笔而已，但是不能因此而不考虑战争本身的规律。"美国的传统信念是把军事和非军事因素截然分开，这在闭关自守的时代，也许并没有什么害处。如今美国与世界各国关系复杂，这种信念如不加以修正，必将造成损害，甚至会带来灾难。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
作者＝
页数＝２９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